

# 近代經濟學說

沈志遠 著

生活書店發行

活生

近代經濟學說史

沈志遠 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

# 近代經濟學說史

每冊實價壹圓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沈志遠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一節 經濟學說與社會經濟條件之相互關係	三
第二節 經濟學說史底對象	七
第三節 經濟學說史底研究方法	一四
第四節 經濟思想史底任務	二〇
第二章 重商主義底發生與發展	三二
第一節 重商主義底社會經濟背景	三一
第二節 重商主義之爲特殊的經濟政策	四一
第三節 重商主義之理論與體系	四七
第四節 重商主義之崩潰	五七
一 近代政治經濟學底首創人威廉·彼梯	五七
甲 近代經濟學說之社會經濟基礎	五七

乙 威廉·彼梯底方法和理論·····	六二
二 威廉·彼梯以後經濟思想之發展·····	七三
第三章 重農學派·····	八二

第一節 十七世紀後半和十八世紀前半的法國·····	八三
---------------------------	----

第二節 重農主義首創者弗朗梭亞奎奈·····	八七
------------------------	----

一 概說·····	八七
-----------	----

二 奎奈底方法·····	九〇
--------------	----

三 奎奈底經濟學說·····	九四
----------------	----

第三節 重農學派的主要人物·····	一〇五
--------------------	-----

第四節 都哥底經濟學說·····	一一一
------------------	-----

第四章 亞丹斯密·····	一二三
---------------	-----

第一節 亞丹斯密底時代背景·····	一二三
--------------------	-----

第二節 「國富論」評估·····	一三〇
------------------	-----

第三節 亞丹斯密底方法論·····	一三六
-------------------	-----

第四節 亞丹斯密底經濟理論	一四三
一 分工與交換	一四三
二 貨幣論	一五一
三 交換價值與勞動	一五八
四 收入國民分配論	一六八
甲 工資論	一六九
乙 利潤論	一七三
丙 地租論	一七六
五 資本之組成及其他形態	一七九
甲 資本總論	一八〇
乙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	一八三
丙 資本的應用	一八七
第五節 社會資本・再生產與積累	一八九
第五章 達微・李嘉圖	一九七
第一節 李嘉圖底時代背景	一九八

第二節	李嘉圖底社會經濟思想與政治思想	二〇七
第三節	古典派方法底集成者——李嘉圖	二一一
第四節	李嘉圖底經濟學說	二一七
一	價值論	二一八
甲	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	二一八
乙	價值與交換價值	二二一
丙	價值與勞動	二二三
丁	價值與生產價值	二二五
二	資本與利潤	二二七
甲	關於資本的理解	二二七
乙	剩餘價值與利潤	二三一
三	分配論	二三四
甲	李氏分配論概要	二三四
乙	利潤和利潤率	二三七
丙	工資律	二四〇



丁 地租論	二四四
四 工業危機論	二四八
第六章 古典學派之沒落（一）：俗流經濟學說	二五三
第一節 賽依底學說	二五三
一 賽依底時代	二五四
二 賽依的經濟學說	二六〇
甲 生產論	二六一
乙 價值論	二六三
丙 分配論	二六四
丁 市場論	二六八
第二節 馬爾薩斯	二七二
一 概論	二七二
二 馬氏底人口論	二七七
三 馬氏在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	二八四
第三節 西尼歐	二九四

一	概論.....	二九四
二	四氏底「四原則」.....	二九五
三	財富與價值.....	二九八
四	資本利潤和工資.....	三〇〇
第四節	巴師夏.....	三〇三
一	概論.....	三〇三
二	換交與價值.....	三〇六
三	利息與資本問題.....	三〇九
第五節	約翰·密爾——古典學派之沒落.....	三一三
一	概論.....	三一三
二	社會哲學思想.....	三一四
三	生產與分配論.....	三一六
四	商品與價值.....	三一八
第七章	所謂經濟浪漫主義.....	三二三
第一節	西斯蒙蒂底社會經濟背景.....	三二四

第二節	西斯蒙蒂底社會經濟思想總評估	三二九
第三節	西斯蒙蒂底研究方法與對象	三三五
第四節	論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	三四一
第五節	生產與分配，資本與收入	三四五
第六節	論實現與危機	三五—
第八章	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想	三六一
概說		三六一
第一節	聖西門	三六四
一	概述	三六四
二	方法和理論	三六五
三	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	三六七
第二節	聖西門學派	三七七
第三節	傅利埃	三八五
一	概述	三八五
二	方法	三八八

三	文明的批判	三九六
四	政治經濟學批判	四〇四
五	社團說	四〇七
第四節	渦文	四一〇
一	實踐家兼理論家	四一一
二	渦文底經濟思想	四一五
第五節	渦文主義者——湯普遜	四二一
一	方法和基本原則	四二二
二	他的經濟思想	四二七
第九章	普魯東主義	四二七
第一節	引論	四三七
第二節	一般的前提和方法	四四一
第三節	普魯東底「體系」及其「柱石」	四四九
一	價值底矛盾	四五〇
二	綜合的價值	四五四
三	貨幣觀	四五七
四	交換實現和分配	四六一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經濟學說與社會經濟條件之相互關係

經濟學說或經濟思想，是人類的意識形態之一；它跟一切意識形態一樣，爲社會的存在(Social being)——社會的經濟關係——所決定。換句話說，凡屬一種經濟思想或經濟學說，總有一定的社會經濟關係做它底基礎或背景的。任何一派經濟學說，總是某種經濟關係底產物，代表着某一或某些社會集團底利益。它跟其他意識形態不同的地方，只是它更直接更顯明地反映着一定的經濟關係，代表着一定的社會集團底利益。例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商業資本統治時代的那些經濟關係底產物，它彰明昭著地代表着商業資產集團底利益。古典學派(Classic School)顯明地反映着青春時期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productive relations)，因而同時就代表統治的工業資產集團底利益。最後，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學說底勃興，反映着資本主義關係底崩潰和社會主義革命底經濟前提底成熟，因而它是托命於社會主義體系的產業勞工階級底意識形態。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經濟思想或經濟學說既有社會經濟關係做它底背景，它就必然隨着這些關係發展和變化而發展變化。社會經濟關係——說得確實些，即是生產關係，——不斷地隨着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以這種關係為基礎的經濟學說，也就變動不居地向前進展，產生了許多歷史的經濟學派。所以經濟思想史跟社會經濟發展史實有十分密切的連繫。但是由於意識對於存在的反作用律，不但社會經濟底發展引起經濟思想底變動，而經濟思想或經濟學說本身反過來也能促進經濟關係底發展的。例如重商主義這一經濟思潮，原是十六、七世紀時代封建的土地關係開始崩潰、商業資本勃然興起的那種社會經濟條件底產物，可是重商主義思潮本身底盛行，反過來又給當時商業資本底發展以強有力的推動。這是再明顯沒有的事實。

從原始時代經過自足自給的氏族社會時代到封建制度底初期（即物物交換時期），人類的經濟生活異常簡單，社會經濟關係，尙未成為獨立的科學研究對象，而且當時的人類也沒有把它當作研究對象的需要。因為即在交換經濟底萌芽時期（即單純的價值形態成為唯一的商品交換形式的時期），農村公社間的剩餘生產品交換，是範圍極小的偶然現象；那時候社會分工是不存在的，經濟的生產關係簡而易見，根本不需要成立一門科學來研究它。即在中古時代（即西歐封建制度底全盛時期）經濟學也沒有成為獨立的科學；祇是在政治學、法律學、倫理學以及宗教教義中附帶着一些

關於經濟生活的思想罷了。直到十六世紀時，隨着商品經濟底蓬勃發展，國際貿易底加速擴張，經濟關係底日益複雜，商業資本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了統治的地位，那時才有獨立的經濟學說出現。這種學說，最初便是重商主義，其次是代表法國農業資產者羣利益的重農學說。

從古典學派底鼻祖亞丹·斯密氏(Adam Smith)起，經濟才當作一門完整的獨立的科學而被建立起來了。當時英國的封建制度業已加速崩潰，進步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日益發展。產業革命底開展，機器工廠制度底建立，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日益鞏固而擴大。亞丹·斯密底經濟學說，就適應着這種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而產生的。古典學派鑒於舊的封建的生產制度——工業底行會制和土地經濟底壟斷制——底束縛和封建專制政治底壓迫，使着資本主義的工業不能盡量發展起來，因此他們就主張生產經營底自由放任而反對一切干涉。他們是自由競爭底首倡者。無疑的，這種理論在當時給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一個強大的刺激，它代表着當時進步的英國新興資產集團底要求，因而是歷史地進步的經濟學說。當時英國的資產集團不但對內要求自由放任，即對外——在國際貿易上——也一樣地要求自由競爭。因為從十八世紀起，英國在國際市場上擊敗了資本主義關係最先發展的尼德蘭(Netherland——即今荷蘭)，一躍而為海上霸王，事實上壟斷了世界的市場。英國之所以達到這樣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固然是英國產業革命所促成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底澎

脹，使英國成爲「世界底工廠」，但是鼓吹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反對封建束縛和宣揚資本主義爲唯一合理之生產制度的古典學派經濟思潮，確實也大大地助長了英國經濟勢力底擴張和鞏固。這是無可遮掩的事實。這裏也就明白地顯示了經濟思想和經濟底相互關係。

十九世紀初葉，由於產業革命底完成，社會生產力猛飛突躍地增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一日千里地發展。這便是西歐資本主義全盛時代底開始。可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力底發展，隨着國家社會財富底增進（即資本底積聚），不斷擴大着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所包藏的社會矛盾，也不斷地發展起來了。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造成的資本和勞動底對立日益尖銳化了：一方面生產手段日益集中於資本階級之手，社會財富愈趨愈多地爲少數資本家所壟斷，這便是資本底積聚過程；另一方面由於勞動者與生產手段分離過程（即生產手段從勞動者方面被剝奪去的過程）底完成，專靠出賣自己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勞工階級，就陷於愈趨愈貧困的境地，這便是勞動大眾底貧乏化過程。社會財富儘管增進，却只是在少數資產者荷包中增進，勞工階級不但絲毫享受不到這一增進底福利，而且反因這一增進而愈趨貧乏了。這便是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在作祟。這也便是勞資對立日益尖銳底根本原因。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就開始了（差不多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古典學派底崩潰。因爲亞丹·斯密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底勞動價值論是承認勞資對立的。尤



其是李嘉圖，公開而直接地承認資本家和工人中間的利益矛盾。這種承認在資本主義發展底初期是無關重要的，可是一到了資本主義猛烈發展，勞動和資本兩大社會集團底衝突日益劇烈而達到很高的程度時，統治的資產集團就不需要、甚至厭恨這種經濟學說。當勞資間的爭鬥達到極高度時，資本家和地主集團底衝突就成爲無關重要了。他們甚至跟地主們妥協起來以全力對付站在面前的更大的敵人——勞工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古典派經濟學說之反封建的意義已失時效，而它底揭露勞資矛盾、「挑撥」勞資「感情」的勞動價值論，對於資本階級却大大地不利，於是布爾喬亞經濟學便由正確地敘述和解釋資本主義的學說，轉變爲替資本主義經濟辯護的學說了。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即理論經濟學）逐漸地強辯化（即以替資本主義辯護爲唯一任務）和俗流化（即以表面現象底研究爲限，用資本家底眼光去觀察現象間的連繫）。這時，古典派底學說就開始沒落了。

大概從前世紀三十年代起，資本階級的經濟學者如賽依（J. B. Say）西尼爾（N. W. Senior）流，都竭力否認亞丹·斯密和李嘉圖底勞動價值論。爲要證明利潤不是工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一部分，他們便杜撰出一種新的利潤來源說來。賽依說，利潤是資本家所有的生產手段底生產力創造出來的（即「資本生產力」論）。西尼爾則認爲利潤是資本家節欲底報償。當布爾喬亞經濟學完全變成強辯的和俗流的「理論」時，反對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思潮，就開始抬起頭來了。

在這些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反對者中間，有代表土地貴族利益的理論家（如馬爾薩斯 *Malthus*）有手工業勞動者和農民大衆底保護者（如西斯蒙蒂 *Sismondi*），有初期的勞工階級利益保護者（空想社會主義者），和最後有真實的革命的勞工階級思想家——科學社會主義者。自然，所有這些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反對派底產生，也一樣地有它們客觀的社會經濟的根源。這些留待以後各章中詳論，這裏暫且用不着提。

綜合上述一切，我們可以堅信不疑地指出，任何一種經濟思潮都有它一定的社會經濟的背景，它們都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底產物。但同時它們反過來又能積極地影響着社會經濟關係底發展或變遷。所以經濟思想底發展史是跟經濟發展史交融並進的，經濟思想底發展隨時隨處反映着社會經濟本身底發展。

可是正因爲經濟思想史跟社會經濟發展史有着密切的交互關係，而社會經濟底發展是在諸社會集團（或社會羣）底長期鬥爭中實現着的，所以經濟思想史，又必然跟社會鬥爭史有着不可分離的連繫。經濟思想底演進和其他社會思想底演進一樣，是同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鬥爭底演進密切地連繫着的。經濟思想並不從天空中掉下來，而是從各個社會形態底社會羣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各派經濟學者便盡了各個社會羣（即社會集團）底戰士底作用。他們鍛鍊出思想的武器來保

護各自所代表的社會集團底利益。前面已經指明，任何一派經濟學說，總是某種經濟關係底產物，代表着某一或某些社會集團底利益。唯其如此，所以經濟學說與別種社會意識形態（如政治學說、文藝理論、哲學等等）一樣，都變成了社會鬥爭中的武器之一，它以這種武器底「資格」來保護一定的社會集團底利益。它在社會鬥爭底三大形式之一……思想鬥爭中，盡着極重大的作用。

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要正確地理解某派經濟思想底全部本質及其意義，我們就不僅應該精密地研究產生這種經濟思想的經濟關係底發展，而且同時還應把這一研究跟社會鬥爭過程底研究密切地連繫起來；不僅應該研究經濟思想史跟經濟史底相互關係，而且還應把這一研究跟社會鬥爭史連繫起來。講到這裏，我們底討論已經接觸到研究方法問題上來了。關於方法問題，我們下面再闡出一節來討論吧。

## 第二節 經濟學說史底對象

經濟學說史底研究對象是經濟學說本身。現代的政治經濟學，狹義地說，就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科學，它是隨着這一生產方式底發生和發展而發展的。同時這種發展又跟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底實際矛盾和社會鬥爭之發展並駕而行。從發展中去觀察政治經濟學，即把它當作一個過程

來觀察時，它是隨布爾喬亞經濟本身底發展而發展的。經濟思想領域中各種思潮各種學派底鬥爭，是社會鬥爭底形式之一，它跟經濟和政治陣綫上的鬥爭合併起來，形成整個的、巨大的、推動歷史發展的社會鬥爭。經濟學說或經濟思想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成爲經濟學史或經濟思想史之對象的。

在每一歷史階段上，一種歷史的（即代表時代精神的）經濟學說，總是過去的經濟思想長期發展底結果。現階段上的政治經濟學，便是這樣一種長期發展底結果。價值論、貨幣論、剩餘價值論等等學說，無一不有它自身底長期歷史。我們知道，勞動價值論在十七世紀的經濟學者威廉·彼梯（W. Petty）底學說中已經有了萌芽。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底思想中，我們可以發見商品交換底分析底萌芽（亞氏在商品交換中揭示了諸商品底同一性和均等性）。但是在那些理論中（即在勞動價值論及其他各種經濟理論中），它們底歷史、它們底發生和演進底說明，並不直接提供着的。因而這一發生和演進底過程，也就成爲經濟思想史底研究对象了。

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英國的古典派經濟學，……所有這一切學說，不論它們中間的區別怎樣大，它們每一派有怎麼樣的特點，它們却都是布爾喬亞經濟思想底演進運動中的各個階段。這一運動，在李嘉圖底體系中，達到了頂點；到這裏，布爾喬亞經濟思想底演進運動已宣告停止。『資產集團在法國和英國已經取得了政權。從這時起，社會鬥爭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呈現着日益顯著和可怕

的形式。同時，科學的、資產者的經濟學就到達了死亡的時辰……」（見資本論卷一，第二版後序）。

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底死亡時辰，也就是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經濟學底誕生和開始發展底時辰。政治經濟學自被卡爾（Karl Marx）解除了資產集團底偏狹見解以後，它就一步一步地向勝利之道加速前進，把布爾喬亞經濟學所猜不透的謎題，都一個個解決了。最主要的一件事是實現了政治經濟學底基本任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運動規律底暴露。這便是卡爾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學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

然而科學社會主義（以下簡稱「科社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跟別派學說一樣，當然也不是突如其來地發生的。它跟它以前的布爾喬亞經濟學有着繼承的連繫。關於這一點，科社主義底創導人之一，鄔梁諾夫（V. I. Ulyanov）說過以下的話：『哲學史和社會科學史十分明顯地指示出來，卡爾主義中完全沒有類似那些閉關的、僵硬的、脫離世界文明之發展大道的學說的那種「教派性」（sectarianism 或譯「教派主義」）。相反的，卡爾底卓越天才恰恰表現於他給予過去人類底前進思想家所已提出的各種問題以解答。他底學說是過去所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底偉大的代表底學說之直接的繼續。』（見卡爾主義底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當勞資兩大社會羣底社會衝突發展到了相當的高度，資產集團業已取得了政權的時候，——從這時候起，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就到達了死亡的時辰。但是這並不是說布爾喬亞經濟學從此就絕跡了。實際上，它在某種意義上說依然在「發展」着的。我們所說的祇是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具體地說即是古典學派底學說）底崩潰，而布爾喬亞經濟思潮本身却依然存在而且「發展」。不過它底「發展」往後是採取俗流化（Vulgarization，亦譯「庸俗化」）和辯護士化底方法和形式罷了。

俗流化底成份，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中也已經有，古典派跟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鎖鑰關係，正由於這種俗流化底成份。這種布爾喬亞俗流經濟學底首創人便是賽依（J. B. Say），他是亞丹·斯密之特殊的「信徒」。賽依把斯密氏學說中庸俗化成份宣揚起來、加強起來，形成了這些成份底結晶。而現代的俗流經濟學跟賽依底連繫，也是顯而易見的。

科社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利用了古典學派底科學成份，現代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則接受並擴大了它底俗流化成份。固然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也曾詆毀過古典學流，可是他們所詆毀的，恰恰是古典派學說中的科學成份，而不是它底庸俗成份。相反的，這些庸俗成份反被他們發展和加強起來了。而且不僅布爾喬亞經濟學向着庸俗化發展，即卡爾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到歷史發展底一定階段上（即帝

國主義底階段，尤其是資本主義總危機階段上），也免不了被人庸俗化和歪曲起來。向這條道路發展的，便是茨茨基（Kautsky）、希弗亭（Hilferding）及其他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

卡爾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整個卡爾主義本身一樣，當然也是在發展的，因為經濟和社會爭鬥自身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新的階段、帝國主義底階段，一些新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這些問題已由鄔梁諾夫根據卡爾主義的一般經濟理論（資本主義經濟底理論）而予以解決。但是卡爾主義政治經濟學底鄔梁諾夫階段，却並不盡於帝國主義論。在卡爾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中，鄔氏曾加添了許多補充。我們知道，科社主義的理論一般地不是死的教條而是活的實際行動底指導，所以這種理論總是隨着社會和政治的實踐底發展而充實和發展起來。

卡爾既解除了政治經濟學底布爾喬亞見地底偏狹性，他就奠定了所謂廣義政治經濟學（註）底基石。弗里德列赫（Friedrich Engels）說過：『爲要各方面地進行對布爾喬亞經濟學的批判，單單認識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底形式，是不夠的。我們還須研究、那怕是極扼要地研究那些在它（資本主義）以前有過的，或那些在發展落後的國家中迄今還跟它並存着的經濟形式，並把這些

（註）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就是以研究一切社會經濟形態之發展規則爲任務的經濟學；它底反對方面是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後者便是單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運動規律的經濟學。

經濟形式作一番比較。直到現在爲止，做這樣的研究和比較的，只有卡爾；我們向來關於布爾喬亞以前的理論經濟學的知識，差不多完全靠他底作品的。」（見反杜林論）

古典學派底敵視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是跟基督教徒底敵視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樣的；古典學派把資本主義孤立地來觀察，在歷史以外去觀察它。固然以後也有些經濟學者（特別是歷史學派底經濟學者）曾努力研究過封建時代、古代社會等等。然而第一，他們缺乏理論；第二，他們所闡述的歷史本身也是無定形的（*amorphous*，或譯無一定性質的），不劃分界限的，——這是看不見經濟形態之交替的「歷史」。站在科社主義的立場看來，歷史和理論不但互相排斥，而且相依爲命的（當然，所謂相依爲命，也並不是混合爲一的意思）。卡爾在研究資本主義底發生、發展和崩潰時，他同時提供了資本主義底理論和資本主義底歷史，這就是說他同時闡明了前資本主義形態和後資本主義形態。

資本主義底研究本身，就越出這一生產方式底界限以外。卡爾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爲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歷史地暫時的生產方式，爲人類歷史中的一個階段；他用這樣的見解研究資本主義時，同時就闡明了前於資本主義的那些經濟形態和繼資本主義以後的經濟形態。正因為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階段，所以它既與它自身所由來的那些社會經濟形態密切地連繫着，又與繼它後



的、由它創造物質前提的那個新的社會形態密切地連繫着。因此，資本主義底研究是不能孤立地進行的。

科社主義底另一創導人弗里德列赫，是把「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底術語引進經濟科學中去的第一人；他關於前資本主義形態和後資本主義形態也有過不少的說明。而尤以弗氏所著的反杜林論和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兩書，說得特別透澈。但廣義政治經濟學之更完滿的發展，却表現於鄔梁諾夫底著作中。後者對於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經濟，提供了充分的理論的說明。

前面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經濟學說或經濟思想是跟着經濟本身和社會鬥爭之發展而發展的。這裏我們還須着重指出，政治經濟學底發展跟其他科學——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哲學——底發展，尤其跟一般的方法論底發展，有密切的連繫。重商主義學者還是直率的經驗論者，可是威廉·彼梯——重商主義崩潰時期底經濟學者——却已經把自然科學底研究方法引進政治經濟學中去了。重農學派又繼續彼梯底事業，而尤以這一學派底首創人弗朗梭亞·奎奈 (François Quesnay) 職業的醫生——對於自然科學特別注意。重農主義底全部經濟思想，是有一定的社會學的和

哲學的觀念——天賦人權和自然秩序底觀念——做它底前提的（關於這一點，將在第三講中詳加論述）。亞丹·斯密和李嘉圖也以自然法權（即天賦人權）和自然秩序底觀念爲出發點，但是更進一步地發展了前人們底觀念和研究方法。

卡爾主義的經濟學說是整個科社主義底組成部分之一。而科社主義是提供一完整的世界觀的總理論。鄔梁諾夫說得對：『卡爾主義的學說是完整的，有機構的，它提供吾人以完整的世界觀，它不跟任何迷信、不跟任何反動思想、不跟任何布爾喬亞壓迫底保護理論相妥協。它是十九世紀人類所創造的優良學說——如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社會主義——之合法的繼承者。』（見鄔氏全集卷十六）

正因如此，所以我們不但不應丟開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亦且不應丟開了科學和哲學思想底發展去孤立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或經濟理論思想。

### 第三節 經濟學說史研究方法

卡爾主義底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科社主義者把這個方法運用到一切知識部門中去。但是每一特殊部門底研究性質，爲一切科學所共同的方法（唯物辯證法）之特殊的、具體的運用，那是首先

當由研究對象本身來決定的。

經濟思想史所研究的是歷史上的經濟理論、經濟學說體系和各種經濟思想。經濟學史底研究者，首先就得知道這些理論、學說或思想體系，並根據書本材料分別加以研究。這步工作是必要的，但這僅僅是初步的準備工作。經濟思想史家所應做的正式的工作，却在於揭露他所研究的每一經濟學說所表達的經濟和政治的情況。而這種經濟和政治的情況本身又被生產力發展底水平和與此水平相適應的諸生產關係所決定的。

布爾喬亞經濟思想史家，往往從某某世紀底「時代精神」出發，來解釋那一時代底經濟思想和學說。同時，他們又常常企圖使自己的學說遠離社會鬥爭，遠離黨派性。可是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事實上某一時代（和某一地方）底經濟思潮，除了根據那時代底社會經濟條件、那時代底物質的生產關係來解釋外，便沒有別種更正確的办法。用所謂「時代精神」去解釋經濟思潮，就等於用意識去解釋意識，那是一輩子也解釋不清楚的。至於社會鬥爭和黨派性，除非倡某種經濟學說的人是住在天空中而不吸人間烟火的仙人，他怎麼也規避不了的。前面也已經講明，任何經濟學說都是為一定的社會集團所使用的社會鬥爭底思想武器；經濟學說既是一定的階級性，那末它底黨派性也就不能免了。因為近代的一切階級，那一個沒有各自的黨派呢？卡爾主義者所持的見解恰恰跟布爾喬

亞經濟思想家完全相反。鄔梁諾夫說得好，他說在工錢奴隸制（意即資本主義生產制）社會裏來期望一種不偏私的科學，其幼稚與愚蠢是跟期望一個工廠主不偏不私地減少利潤和增加工資一樣的！（參閱鄔梁諾夫全集卷十二，下冊）

卡爾所提供的政治經濟學史，堪稱最科學的經濟學史。卡氏說：『工藝技術科學是表現人對自然的積極作用，表現人類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因而也就揭露了人類生活底社會關係和發生於這些關係的精神概念。甚至一切的宗教史，捨去了這種物質基礎也就無從批判起。用分析底方法去找出神秘的宗教思想底「地上根源」，當然要比相反的從現實生活諸關係中演引出適應於此種關係的宗教形式來容易得多。後一種方法是惟一唯物的方法，因而也就是科學的方法。』（見資本論卷一）卡爾向宗教史家所提出的方法，他自己應用到經濟學史上來了。他『從現實生活諸關係中』演引出相適應的經濟學說來。換句話說，他根據現實生活底諸關係（主要的自然是生產關係，亦即我們前面所說的社會經濟關係），來解釋與此等關係相適應的各種經濟學說。他從商業資本底現實生活關係，演引出重商主義底學說。他不但用這樣的方法研究重商主義，並且採取同一方法研究重農學說、英國的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俗流經濟學說、小布爾喬亞經濟學派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底經濟理論等等。成熟的（發達的）經濟學說跟比較幼稚的經濟學說之間，當然存在着內部邏輯結構底嚴密

程度上的區別，理論澈底性程度上的區別；關於這種區別，吾人自不容忽視。但同時吾人亦不應爲一種幻想所迷：彷彿由比較幼稚的理論變爲比較發達的理論，只是思想本身底自動似的。如果我們存着這樣的見解，那就落在唯心論、主觀主義底泥坑中了。

史的唯物論底基本原則告訴我們，社會存在底發展決定社會意識底發展；在階級社會內，這種意識是有階級性的。經濟科學便是這種階級意識底形態之一，而它底發展是現實生活諸關係或社會經濟關係發展底結果，一切的科學思想，包括經濟思想在內，必然是隨着現實的社會經濟諸關係之發展和變化而發展變化的。關於這點意思，在第一節中已經充分地說明了。

但是我們也曾指出，經濟思想不但隨着社會經濟關係底發展而發展，而且它又是酷烈的長期社會鬥爭底產物；經濟學說不僅是社會關係底表現，而且又是社會鬥爭底武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槍鋒是準對着當時尚保存着的封建關係和產生於商業資本之統治的諸關係，其後俗流經濟學說底槍鋒則準對着正在覺醒的勞工階級。而科社主義的經濟學則顯然是工人集團用以解脫資本羈絆、爭取自身解放的戰鬥工具。因此我們應該把政治經濟學當作社會經濟關係底表述和社會鬥爭底武器來研究。正因爲，像第一節中已經說到的，經濟思想史一方面與經濟發展史有密切的交互關係，另一方面又跟社會鬥爭史有不可分離的連繫，所以我們應該把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底研究跟這一思想和學

說所由產生的社會經濟關係和社會鬥爭過程底研究，密切地打成一片。譬如說，假使我們要正確地理解重農學說底整個體系，我們就非首先研究十八世法國底社會經濟關係和從這些關係中所產生的社會鬥爭不可。自然，我們也不應爲重農學說底社會經濟根源底研究所限制，而應該從這些社會經濟關係和社會鬥爭形勢底研究，演引出重農學說體系本身底研究來。

當今社會改良派（亦被稱爲社會法西主義者）底觀察法恰恰背反了這種原則。他們堅持着科學底超階級性和無黨派性底觀點。對於經濟科學的看法，亦卽如是。這派底大理論家希弗亭（Hilferding）在其卡爾政治經濟學之史的形成一文中寫道：

『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把科學底發展解釋成思想之適應事實和思想之互相適應。思想之適應事實是生物的必然性，是人類生存底條件；科學也就是人類生存競爭中的武器之一……。思想之互相適應，却是吾人思惟底邏輯職能（Logical function），它發生於思惟底本性，這（係指思想之相互適應而言——沈）是「經濟思惟」底結果，同時也是它底原因；它要想用最經濟的方法——卽藉盡可能少的概念之助，來整理一切現象；它試圖藉盡可能少的法則之助來了解現實底全部。』（見德伏拉茨基編的論文集政治經濟學底基本問題，頁一八三）

希弗亭並且「證明」、甚至舉例說明：政治經濟學底發展（它底歷史）就是思想之適應事實和思想之互相適應。希氏發表這段言論，還是在他被稱爲「左翼社會民主派」的時候。這位「左翼的卡

爾主義者」，現在已經轉變爲「純正的」社會法西主義者了。他把卡爾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發展論當作馬赫底科學發展論理解了。他竟至於公然地說，在卡爾底剩餘價值論中，政治經濟學底發展是按馬赫底觀點來研究的。照希弗亭底意見，從彼梯（W. Petty）起，每一個後起的經濟學者，總是循着思想之互相適應和思想之適應事實底路綫去修改他們前人的學說的。

卡爾底修改李嘉圖，也按照這兩條路綫進行。關於剩餘價值論一書底方法，希氏發見了下面的「新大陸」：「從方法上去觀察該書全三底部闡述時，首先就會碰到一件不尋常的驚奇之事，——須知這是黑格爾底方法啊！卡爾所解釋的，正是政治經濟學底自動發展；它開始於彼梯和弗蘭克林（Franklin）之承認勞動爲商品與貨幣底共同本性這一最先的正確觀點，而結束於卡爾底理論體系。」（同前書，頁一七三）

照希弗亭看來，不但政治經濟學底發展應當根據馬赫底觀點來解釋，而且連被他稱爲「唯物的歷史」的歷史唯物論，他也要按照馬赫底觀點來解釋。希弗亭從歷史唯物論中閹割去了社會鬥爭底理論，於是留下來的只是：經濟發展底每一階段替經濟思想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換句話說，思想（此處是指經濟思想）應當適應新的事實（此處指經濟發展底每一新階段），這纔是十足馬赫底說法。

自然，希弗亭也並不絕口不談社會鬥爭（因為他是「卡爾主義者」啊！）。不過他認為社會鬥爭底作用在於它產生了不正確的理論，阻礙着正確理論之按照其內部的邏輯而發展。他底意見以為由於爲擁護社會集團利益而起的社會鬥爭，足以妨礙（且已經妨礙了）正確理論之邏輯的發展。他並且舉出例來說，如像馬爾薩斯底理論是維護貴族和牧師底利益而反對工業資產者的，所以它妨礙了勞動價值論底發展。由於某一社會集團底經濟利益，於是就產生脫離勞動價值論的思想；這種思想自然是跟科學的不偏私性相衝突，是跟科學發展底內部必然性相衝突的。換句話說，表現階級利益的思想，——照希弗亭底意見，——足以妨礙科學的理論思惟之邏輯的（即按照必然性的）發展的。這樣，社會法西主義者底領袖，公然在否定科學底階級性和黨派性了。他們跟卡爾、鄔梁諾夫主義相去距離之遠，於此可見一斑！

#### 第四節 經濟思想史底任務

凡是科學史，都應以揭發科學發展底規律性爲其中心任務。因此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就應以揭發經濟思想或經濟學說發展底規律性爲主要任務。

照馬赫底意見，科學思想底發展法則是一種自然的法則。在前一節所引希弗亭底一段文章中已



經說過，馬赫底意見認為「思想之適應事實」是表現「生物的必然性，人類生存底條件」，而「思想之互相適應」則表現「吾人思惟之職能，發生於吾人思惟之本性的職能」（希弗亭認為這就是「唯物史觀」底見解）！這樣看來，這裏一方面是生物學的法則，另一方面又是思惟法則。但是假若遵照馬、希兩氏底觀點來解釋的話，那末對於生產和分配底法則，我們更有根據視之為自然法則了。因為試問誰能否認物質資料底生產和分配是人類生存底條件呢？

但是事實上物質的生產，總是決定於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生產；同樣的，「精神的生產」，即科學、藝術等等，也被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近代古典名著之一政治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序言中寫道：「在社會內從事生產的各個人，因而亦即被一定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各個人底生產，——這便顯然是研究底出發點。」把這句話換一個方式來說，就是：在社會中從事科學研究的各個人，因而亦即被社會條件所決定的各個人底思想工作，——這便顯然是一切科學史底出發點，同時也就是經濟科學史底出發點。

重商主義者所研究的是流通，重農學派則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從流通範圍轉移到生產範圍中去。這當然不是因為在重商主義時期生產不是人類生存底條件或不是流通本身底條件，而只有在重農主義時期它（生產）纔成為這樣的條件。絕對不是的。重商主義者底忽視生產或認定流通之意義超

於生產以上，這應當用社會歷史條件來解釋的。現代經濟學資本論第三卷中有以下的一段話：

『現代生產方式之第一次理論的檢討——重商主義的體系，——在當時必然要以流通過程底表面現象爲出發點，這些表面現象是在商業資本底運動中取獨立的形式存在着的，所以它（指重商主義體系——沈）僅及於現象底表面……真實的現代經濟科學，祇是當理論的研究從流通過程轉移到生產過程中去時候纔算開始。』

不獨重商主義體系底內容，亦且它底方法，也都是決定於社會歷史條件的。重商主義者視社會財富爲純粹商業資本底，這些經濟思想家在當時除了重商主義體系以外，便創造不出別的學說來。重商主義的體系是表示政治經濟學底童年時代，這正像商業資本底統治表示資本主義底童年時代是一樣的。

古典學派曾經嚴厲地批判過重商學派，前者視後者底見解爲幼稚直率的，甚至譏笑它爲荒誕無稽的。當然古典學派底科學和哲學的程度要比重商主義者高得多，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決定的要素却不在此而在於古典學派是工業資本底代表。因爲這樣，所以他們反重商主義的鬥爭是工業資本反商業資本鬥爭之理論的表現。經濟學說史底任務在於尋求經濟學說底發展法則，但不應從發生於一般的人類生存條件的「生物的必然性」中去尋求，亦不應從「發生於吾人思惟之本性的思惟職能」中去尋求。經濟學說底發展法則，應當從經濟本身底發展中去尋求，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發展

中，從它們中間的矛盾底發展中去尋求，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則又表現於社會羣底衝突和社會爭鬥底尖銳化。

在這個問題上，今日蘇俄一位有名的經濟學家，也發表過多少相反的意見。這位有名的經濟學家便是蘇俄的貨幣學專家特拉赫頓貝（Trakhtenberg）。特氏指出了一大堆各種不同的信貸理論而加以魯莽的判斷道：『學說這樣的分歧和缺乏共同的觀點，如果完全根據「經濟科學具有階級性和每種經濟思潮反映一定的社會集團底利益」這一原則，那是難以解釋的，信貸底理論要比社會羣底數目多得多呢』（見特著，現代的信貸及其組織，俄文版頁二〇）。但是我們可以告訴特拉赫頓貝先生，利潤論、資本論、工資論、地租論、危機論等等，其不同的理論之多，也要比階級底數目大得多呢！照這樣說來，社會羣的觀點，理論之階級的估量變成毫無用處了，因為它是沒有認識價值的。

當然這種對於社會羣和理論的純數量的比較觀是跟卡爾主義底觀點不相同的。因為根據後一種觀點，第一，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永遠如此的、停滯不動的社會羣（或稱社會集團，亦有稱為「階級」者）；第二，在各個社會集團內部都包含着許多不同的階層利益不同的各個階層；第三，還有所謂中間集團（小資產集團底各層）底存在；最後，第四，各個社會集團不是相互隔絕地生存着，

——我們知道，甚至勞工集團中的某些階層（例如熟練工人）也往往為資產集團、尤其小資產集團底影響所支配的。根據這幾個論點就可以知道，把社會羣和理論作靜的、純數量的比較，未免太機械而且呆板了！

我們不妨舉個例子來解釋一下。亞丹·斯密、李嘉圖、賽依、（J. B. Say）巴斯夏（Bastiat）等等經濟學家都是工業資產集團底代言人，但是他們底代表工業資產集團，第一是在資產集團歷史發展底各個不同的階段上，第二是在各不相同的地域的和民族國家的條件之下。須知建立在手工工場生產基礎上的布爾喬亞關係跟建立在機器生產基礎上的布爾喬亞關係是不同的：這是布爾喬亞社會發展底兩個階段。抽去了時空底條件去探究學理（思惟）和社會羣（存在）底關係，當然不會得出科學的結論來。

就上面所舉的幾個布爾喬亞經濟學家來講，亞丹·斯密和李嘉圖中間雖相隔時間不多，但就這一段時間底歷史意義來講，它却等於一個整個的時期。英國的產業革命，法國的大革命，反甲可賓的和拿破崙的戰爭，——這些便是這個時期底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再說李嘉圖和賽依吧，這兩位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可是前者所代表的社會羣是英國的工業資產集團，而後者是法國的。而英國和法國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發展却處於兩個不同的階段上，其所以不同者，是這兩個國家過去的歷史

發展上的差別所促成的。李嘉圖繼續發展亞丹·斯密氏理論中之科學的原素並發展他底方法底科學方面；賽依則發展斯密氏學說體系中的庸俗原素，因而變成庸俗或俗流經濟學說底首創人。李嘉圖和賽依底出發點都是亞丹·斯密，可是他們兩人發展底方向却不同了。李嘉圖以後，俗流經濟學在英國也抬起頭來了。然而它在英國是跟法國的俗流經濟學不相同的，這主要地仍然由於兩國經濟發展上的區別所致。現代各色各樣庸俗的布爾喬亞經濟理論，由於同樣的原因，相互間亦有重大的區別，不但相互間有區別，而它們跟賽依、巴斯夏時代底俗流經濟理論亦一樣地有重大區別。這樣看來，在我們研究布爾喬亞理論的時候，我們不僅必須揭露它們底一致性，亦且應當說明它們底差異點。我們底任務是在說明從一個社會根源中如何生長出一棵有許許多多枝條的大樹來，而那許多從同一大樹主幹上生長出來的枝條，則又互相分歧頗大。假如只在枝條中間兜圈子而不見或不願看見樹底主幹，更看不見或不願看見這許多樹枝底總根源，這樣就必然要得出極錯誤的結論來。

雖然古典派經濟學跟俗流經濟學有原則上的區別，可是我們絕對不能因此就忽略這兩種布爾喬亞經濟學體系底一致性。這兩派學說底一致性，首先就表現於它們社會出身底共同性，因為這兩種體系都是資產集團底意識形態。古典派經濟學是資產集團青年時代底進步傾向底表現，俗流經濟學則表現它底狹窄的實際主義的，侵佔性的和強辯性的傾向。但同時却也不能過分估高資產集團底進

步性，這種進步性畢竟是很有限度的。

科社主義底創建人，解除了政治經濟學之布爾喬亞的限制性或狹窄性，澈底地改造了它。雖然如此，卡爾和古典學派間的連繫還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研究政治經濟學史的人，過分估高了這一連繫而把卡爾和古典學派間的區別只認定是細小處分歧或認為只是社會政治見解上的區別。另一部分研究者則祇見卡爾和古典學派間的區別而過分估低了他們中間的連繫。這兩種人底觀點都深深地中了形式邏輯的毒，而不會辯證地把握一致和差異底辯證法。

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和卡爾主義經濟學之間，存在着一條橋樑；這條橋樑，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空想社會主義給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出發點以極嚴酷的批判。這個出發點是說布爾喬亞制度是適應人類本性的自然制度（註）。空想社會主義底歷史功績在於它最先提倡以社會主義生產制代替資本主義生產制底任務。固然空想社會主義者不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歷史的必然性，同樣地也不了解破壞資本主義的力量（即所謂資本主義底掘坟墓者）是在資本主義自身

（註）其實空想社會主義者並沒有一般地否認社會制度底自然性，他們只是否認資本制之自然性，但仍主張社會主義之自然性，他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的生產制是適應人類天性的。所以他們底方法論也跟古典學派一樣地帶着形而上的色彩的。

內部成熟起來的。同樣地，他們又完全不知道資本主義底發展法則。然而在攻擊資本主義、呼籲社會主義這一點上，他們却表現為替科學社會主義清道的先鋒隊。唯其如此，所以我們稱空想社會主義為由古典學派到卡爾主義的一條橋樑。這種清道工作，也就是它底重大功績之一。

關於商品價值由勞動時間所決定這一點，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完全贊同李嘉圖底立場的。但是他們認為這一法則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特別在勞動和資本底交換中，却被破壞了。他們跟古典派一樣，也不了解「勞動力底價值」這個範疇，因而他們視活的勞動與事物化的勞動（即勞動之體現於事物——資本——者）之交換為不等價的交換；他們以為作為工資的那部分資本上所體現的勞動比工人償還給資本家的勞動要少些。因此他們當中一部分人主張依照社會主義原則改組資本主義生產，另一部分人——即普魯東（Proudhon, 1809—1865）這一派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者，——則主張把業已發展的資本主義一下子毀滅掉而代之以單純商品經濟，因為只有在那種情形之下，商品才會按等價交換。

可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底攻擊古典學派，並未促成「等價交換」的「理想」社會底實現（須知這是向歷史開倒車的勾當呀！），而客觀上倒反助成了俗流經濟學底勝利。在那時，俗流經濟學就起來跟社會主義——首先跟空想社會主義，然後跟科學社會主義——做「你死我活」的爭鬥了。

從卡爾主義底學說出現後，科學的和俗流的兩派政治經濟學中間發展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接受了古典學派底一切寶貴的、科學的成份，俗流經濟學則相反，它或者完全拋棄古典派經濟學之科學的成份，說它們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或者把它們曲解到莫名其妙的地步。俗流派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往往偽造着政治經濟學史，把勞動價值論者的亞丹·斯密和李嘉圖硬要當作生產成本論者來解釋。

理論跟現實是不可分離的。這對於政治經濟學史（廣義地講，就是經濟思想史）當然也一樣地適用。科社主義的（亦即科學的）經濟學史是跟一切非科學反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思想經濟學說作鬥爭、跟一切科社主義底歪曲理論作鬥爭的重要武器之一。要在這種鬥爭中達到勝利，不但必須澈底地了解那些學說底現在，而且還須了解它們底過去。同時，要正確地了解科社主義底理論，又必須對這種理論作歷史的研究，因為它是在歷史的爭鬥過程中生長和鞏固起來的。在這種鬥爭底各個階段上去研究這種鬥爭，不斷地發見出許多的新問題來，然後再進一步地闡明它們底意義。這同時就是理論陣綫上的優良的鬥爭訓練所。對於這樣的研究，科社主義底創導人已經給了我們研究經濟思想史底一切基本的方針；我們有了這一切指示，——關於研究方法的、關於科社主義政治經濟學



以前和以後的經濟學說和現代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經濟學說之正確的估量的各種指示，——我們對於經濟學史或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就輕易得多了。



## 第二章 重商主義底發生與發展

### 第一節 重商主義底社會經濟背景

誰都知道，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底意識形態，不過它不是一般的商業資本底意識形態，而是一定的歷史時期底商業資本——直接在工業資本以前的商業資本——底意識形態。所以在研究重商主義本身之前，先把它所代表的，為工業資本之前身的商業資本底性質，作一番估量，是絕對必要的。

商業資本（或稱商人資本）是資本遠未組織生產以前早就存在的一種歷史的資本形式。它底生存和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時，它就成為資本主義方式之必需的歷史的前提。這種前提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商業資本是貨幣資財集中底先決條件；第二，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乃以為商業的生產為前提的，換句話說，以大量的批銷而不以個別的零星購買為前提的，所以工業資本底誕生必然以商人集團底存在為必要條件，這一集團的人並不為自己個人底需要而購買，在他每一次購買底行

爲中事實上集中着許許多多人底購買行爲。同時，商人資本不斷地發展，使生產日益以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爲目的，日益使勞動生產品轉變爲商品。

商業資本自身之前提爲商品流通，可是從另一方面講，商品流通又受商業資本之極大的積極影響：商業資本促使商品流通底範圍愈趨愈大，日益擴大交換範圍，把一個區域底生產品輸供到別個區域去。但是商業資本之更重大的作用乃在它發展了貨幣資財這一種財富底形式。具有使用價值的自然品財富是以榨取者集團底需要爲界限的；貨幣財富底效用却毫無限度。再則，商人把一個區域底物品供給於別個區域，同時就擴大了需求；商人底供給產生了需求。這種需求首先就是對貨幣的需求，而貨幣需求底加強就引起佔有剩餘生產品底貪慾，因爲商人有了更多的剩餘生產品，就可以變成更多的貨幣。

在中世紀末期，西歐各國底輸入品大半都是奢侈品，後者是由工業比較發展的國家輸出來的，而這些國家本身則輸入原料品。不過這些輸入物品也多半是貴重的金屬品。這樣看來，國外貿易是真實的貨幣資財底重要來源了（註）。

所以當時的商人就是貨幣資財底代表，商人集團便是擁有貨幣資財的社會羣。假如說以前財富

（註）所謂「真實的」貨幣資財，乃指直接可以作爲鑄造貨幣之用的那些貴重金屬品而言。

產生於土地底佔有，土地是財富底主要來源，隨着商業資本底發展，貨幣形式底財富就跟消費形式（意即物品形式）底財富對立起來了。所謂消費形式底財富，就是封主們所佔有的物品財富。

商業資本底歷史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產生於商品交換的商業資本，本身又促進商品交換加速發展。在商品流通還限於地方性的時候，小商品生產者往往親自把自己大部分生產品帶到地方市場上去出賣。這是行會統治底時期，是城市和區域底閉塞時期。第二時期之特徵為廣大市場底形成、世界市場底產生、小生產受商業資本支配以及工場制度底出現。商業資本在這時已經發達到了頂點。這個時代是巨大的貿易公司出現、豐厚的商業利潤和大規模的殖民地掠奪底時代，這時工業資本尚處於從屬的地位：工場主假如同時不是大商人的話，他就只是一種次要的人物。

然而我們却也不能過分估大了商業資本底意義，以為它是一種自身能創造一切的力量。商業資本底發展，「就它本身言，不足以促成一種生產方式之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並予此過渡以解釋」（見資本論卷三，第二十章）。商業和商業資本底發展，到處都促使生產按照以下的趨勢發展：即生產底目的日益成為交換價值，生產底規模日益擴大，生產品底種類日益複雜，使貨幣發展成為世界貨幣。因此商業資本底發展對於以使用價值為主要的目的的那些生產組織，到處給予或多或少分解影響（破壞作用）。然而它對於舊的生產方式的分解作用底程度如何，這首先却當視這種生產方

式本身底內部結構，及其鞏固性爲斷。而這種分解過程底結果如何，卽由何種新生產方式來代替舊的，這也不決定於商業而須視舊生產方式本身底性質爲斷。例如在古代社會內，由於商業和商人資本發展底影響，結果產生了奴隸主的經濟，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發展，却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此可以明白，這些結果本身，除商業資本外，還得由其他條件來決定的。

商業資本給予手工業的行會組織以分解的影響，並將小商品生產者羣置於自己的從屬關係之下；小商品生產由於它自身內部的本性，必然要趨於潰解，因爲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時，就要碰到一種爲它自身所不易解決的（商業資本便是這種矛盾底運動形式）——分散的生產與集中的銷售間的矛盾。當小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的時候，它一方面創造着主觀因素（富有的商品生產者），另一方面又創造着客觀的因素（如貨幣底積累，市場底擴大等）；這些都是商品生產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同時商業資本又予封建采邑經濟和封建諸關係以潰解的影響，然而這種經濟和社會關係之所以潰解，還是因爲它們自身已經發展到這一潰解地步的緣故。大量的封建地產底集中，廣大的采邑底形成，產生了跟爲封建制度之基石的自然性經濟的矛盾。廣大的賦役經濟所出的大批生產品，那些封主們，王公們，僧院底主持者們（這些都是賦役經濟底所有者）都無法脫售，於是他們奢侈生活就無以滿足（因爲沒有大量的共同交換符號——貨幣），甚至要把所收的全部穀物都磨成粉，烤成

麪包以給養王公們屬下成百成千的食客僕役亦有所不能。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商人就出來「幫忙」了：商人不但担负起了替封主們銷售賦役經濟底剩餘生產物的任務，而且還供給封主們以必需的物品，特別是封主貴族們所需求的奢侈品。到後來，隨着商品經濟（因而亦即貨幣經濟）底發展，他們底消費更形浩大，生活更形奢華，對於貨幣的慾求亦與日俱增，於是他們就日漸深入地陷到對商人階級的債務關係中去了。這便是商人資本潰解封建經濟的過程。

再則，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經濟底發展，結果自然貢賦（即封建時代農民繳納於封主的農產物，亦即封建時代的物品地租）就被貨幣貢賦所替代。因此「剩餘生產物」就留在封主制之下的農民手上了。農民為要繳納貢賦，不得不求助於商人脫售這些「剩餘農產物」，藉此獲得貨幣。由於類似的過程，農民大眾也都被商人高利貸資本底鐵鏈子緊緊地鎖住了。

同樣的，國家的中央政府，也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經濟底加速發展，對於貨幣需求日益增進，於是它所征收的賦稅也不得不改為貨幣形式。同時，因為給養軍隊，從事戰爭，維持巨大的國家機關，無事不需要大宗資款。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的中央政權也因藉商人底「幫忙」而逐漸落到他們底影響之下去了。

這樣看來，在封建社會末期（即十五到十七世紀），各種形式底經濟和舊制度下的一切社會

層，都無一能躲避商業資本底影響，且這種影響是隨着歷史的前進而日益擴大和強化的。代表商業資本利益的重商主義就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說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意識形態，這句話我們不能把它了解得太簡單，不能把它解釋成重商主義只是商人底意識形態。所謂「重商主義為商業資本之意識形態」，乃是說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時代底意識形態。科社主義底創建人告訴我們：「統治集團底思想在每一時代總是統治的思想；這就是說，為社會之物質的統治力量的社會羣，同時也就是它（指社會——沈）底精神的統治力量。……所謂統治的思想，無非是統治的物質關係之觀念的表現而已，是思想形態上所表現的統治的物質關係，也就是使某一個社會羣成為統治者羣的那些關係，亦即這一社會羣統治底思想而已。」（見卡弗二氏文存卷一）

商品流通底發展，市場和商業關係底擴大，——這些就是生產力發展底表現。生產力底發展，使經營商業的人們轉變為一個社會集團，——商業資產集團。商業資產集團雖然從來沒有達到像以後工業資產集團那樣的強有力的程度，然而它却也有充分的力量，能夠影響於社會全部經濟的和社會政治的組織。

桑巴特（Sombart）和其他布爾喬亞研究家往往把商業資本時代（桑氏稱之為早期資本主義）底



濟經的和社會政治的組織或結構看作中世紀底經濟和社會政治組織底擴大再生產，亦即所謂「城市經濟」和「區域經濟」組織底擴大再生產。照桑氏底意見，認為以前商品底生產和流通是由手工業行會、城市作坊和地方的封建政權來調節的，可是到了商業資本時代，社會經濟生活底調節和指揮却變成集中的國家政權底事情了。

桑巴特對於重商主義的解釋是跟他底上述的觀點相關聯的。他既然認為商業資本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組織只是中世紀的社會經濟政治組織底擴大再生產，那末重商主義自然可以解作在較廣大的領土內所實施的城市經濟政策了。「實際上重商主義無非是施之於較廣大的地域的城市經濟政策而已。城市把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心的地位，而把一切他人底利益置諸自己目的底支配之下，同樣的，在國王政權治下的廣大區域底政策，根本上也是自利主義的……」（見桑巴特著：現代資本主義，頁三五七）。

還有一位俄國的經濟思想史學者褚潑羅夫（Chuprov），對於重商主義的解釋，也持類似的立場。在他底意思以為國家干與經濟生活的政策，在英國和在好些別的国家一樣，是中世紀制度之自然的傳統。他把商業資本極盛時代（即商業資本統治底時代）代表商業資產集團利益的國家政權之採取重商政策這一現象，跟中世紀時代（即典型的西歐封建時代）封建主干與庶民經濟生活的情形

一樣看待了。

這樣的解釋重商主義，顯然是只根據外表徵象和外部類似點而不透過外表去觀察事情本質的庸俗見解。須知封建時代的行會和城市作坊之調節商品底生產和售賣，是根據小商品生產者底利益來進行的；進一步說，行會和作坊並且保護小生產者，使他們能避免正在產生的商業資本底打擊。反之，商業資本時代國家底經濟政策却在保護商業資本和專制主義的利益。那種經濟政策底作用是在迫使小生產者受大商業資本家底支配，迫使封建的地方政權受中央政權底支配。布爾喬亞研究家只見現象與現象之外表的類似點而看不見它們底階級的差別。

波格唐諾夫(A. Bogdanov)和史威班諾夫(J. Stepanov)在他們所著政治經濟學教程中，也持類似的(抽去階級要素的)觀點。他們說：『隨着國家的統一，采邑底經濟政策就擴大到全國的範圍，最後乃至形成一有原則性的觀念體系，這便是人人共知的「重商主義體系」』(註)這裏，『采邑底經濟政策就擴大到全國的範圍』一語，完全抹煞了采邑底政策和國皇底「國家」(“National” policy)政策間的階級差別。這二位作者以為由一個封主躍升為一個統一國家底君主時，他必然仍舊繼續實行舊時在自己采邑上所施行過的那個經濟政策。二位作者完全忘記了采邑時代底經濟政策

(註)波、史合著政治經濟學教程卷二，上部，頁一六六。

與統一國家君主底經濟政策有社會本質上的區別。須知一封主之躍升爲國君，必然是他征服其他許多封主之結果。這時許多被征服的封主已經變成了他底臣屬，他們是帝王底支柱，但是他們已失去了舊時的權力。假使說過去（即做封主時）的他所採取的政策是代表農民小生產者利益的，亦即代表封建的生產制利益的；可是從他躍升爲一個統一國家底君主之後，帝朝的經濟政策却顯然在袒護商業資本底利益了。

在這個過程中，在由封主的采邑政策轉變爲專制君主國家底經濟政策之過程中，盡極大的積極作用的勢力之一，便是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爲第三等級(Third Estate)之首腦層的商業和高利貸的資產集團。在同一過程中，又形成和鞏固了專制政權和第三等級首腦層底聯合。僅僅根據這一點，就可知專制政權底經濟政策決不會成爲「采邑經濟政策」之簡單的繼續的。

現在還要講幾句關於高利貸資本的話。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照卡爾底說法，是兩位血統關係密切的近親。高利貸資本之必要的前提，也是單純的商品流通。資本論裏有一段話：『爲要使高利貸資本能夠成立，只有一件是必需的：至少須有一部分生產品變爲商品，並且除商品賣買外，貨幣亦須發展它自己的職能』（註）。這就是說，那時商品生產尚處於單純的小商品生產底階段。

（註）見資本論卷三，下冊。

貨幣形態的財富底積聚，是高利貸資本底、同時又是商業資本底歷史意義。但是假若說高利貸資本對於小生產和封建所有權起着破壞的作用，那末它對於君主政權却是有利的。當時的貨幣資本家做了帝王和貴族底信貸人。高利貸和商業資本這二位「誦親兄弟」底成長和強大，一方面表示舊的社會關係底解體，另一方面又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造成了物質的前提。

商業和貨幣資產集團底統治「拜物教」化而被人視為貨幣底統治了。因為當商業貨幣資本高度發展的時候，人人都需要貨幣，人人都追求貨幣，人人都貪得貨幣。商人，高利貸者，工場主等人需要貨幣，因為在他們手上貨幣就是資本，他們可以利用貨幣來生產新的貨幣。帝王和貴族們也急迫地需要貨幣，因為有了貨幣他們就可以養活大批的門人食客，可以滿足奢侈豪富的生活。這樣，「金錢萬能」底觀念就深深地種入每個人底心坎中。封建的統治者羣爲了需要貨幣，於是把他們大批的穀物、原料等等農產品（這是他們底采邑或封土上的產物）都投入商品流通界中去了。他們底生活既惟商業是賴，他們對於商業的重視，自然更不用說了。這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無人不視掙得貨幣爲發展財富之惟一手段，高利貸和商業資本就自然然而變成了新興的統治集團。他們底利益是受專制主義的國君之保護的。

## 第二節 重商主義之爲特殊的經濟政策

有些人把重商主義解作特殊的經濟政策之體系，有些人則解釋重商主義爲特殊的經濟思想之體系、特殊的經濟學說。但實際上重商主義是兩者兼而有之。現在我們先把重商主義當作特殊的經濟政策底體系來大略解釋一下。事實上，重商主義底實踐確是先於重商主義底理論。那種重商主義底實踐是商業資本時代經濟發展底全部進程所促成的。先有了重商政策底實踐，然後才有重商主義底學說。

自然，我們也不能說，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理論）從來不曾先於經濟政策（經濟的實踐）而存在。理論家可以根據經濟發展底客觀趨勢而創造一種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過了一個時期才轉變爲事實。但是我們這裏所講的只是關於重商主義，而就重商主義言，確是經濟政策先於政治經濟學而發生。

那末重商主義的實踐究竟是什麼呢？

重商主義實可分爲兩個階段：早期的和成熟的（發展了的）重商主義。兩者均予貨幣以決定的意義，但兩者意見亦有紛歧之處：第一，在取得和保存貨幣底方法上；第二，成熟的重商主義對於

貨幣的態度已經不像早期重商主義那麼的直捷而原始。一個業已走上商品流通發展之路的國家，是應該有貴重金屬的，這種貴重金屬底數量應當隨商品流通之發展而增長。當初信貸尙極不發達，一切買賣差不多都是現錢交易。在這種情形之下，吸收貴金屬到國內來和保持此種貴金屬於國內，——這些問題就變成國家政府之迫切要政了。

已經走上了商品經濟發展道路的國家，在最初的時候，單靠一種經濟手段是吸收不到必需的金銀量的。於是就需要用行政手段來補助了。在早期重商主義時代的英國，這類行政手段可以歸納爲：（一）政府對英國商人的統制，和（二）英政府對外國商人的統制。在國外經商的英國商人，只許在一定的「棧積地帶」做買賣。楊儲爾 (Yanjour) 在其英國之自由貿易一書中寫道：「英國商人把自己平常的商品——羊毛、皮、鉛、錫、魚等物——供給這些棧積處所，而從那面換取必需的物品——大部分是製造品……。國家爲想這種貿易中吸取若干利益並統制之，就成立了特殊的機關，後者之職務有二：（一）監督羊毛輸出應繳關稅之徵收；（二）對於輸入英國之貨物，務須注意其所繳之關稅，一部分應用外國鑄幣或貴金屬充之……。」（註）這樣就執行了吸收貴金屬到本國來的任務。

對於在英國經商的外國商人的統制，情形要複雜得多。帶了金錢到英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

（註）楊儲爾著英國之自由貿易一書，頁六。

必須取最短途徑先到皇朝貨庫或專管貨幣兌換的御吏處去把自己所帶的外國鑄幣換成英國貨幣，而換得之數量則任御吏規定。假如兌換之後，仍發見該商人尚留有外國貨幣時，這些貨幣即須沒收歸皇室國庫所有，而該外商本人且須受嚴厲之懲罰」(註)。英國皇朝採取這種政策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從外國商人方面所收進的是滿價的金屬貨幣，而皇室貨庫所償還他們的却是損壞的、低成分的鑄幣。就算外國商人所攜來兌換的也是低成分的(虛價的)話，那也無甚關係，因為外國貨幣底收受是按照實在的分量計算的，而外國人兌換所得的英國貨幣底數量却任御吏規定。這樣一來，英國皇朝就得到了一大筆現貨的進款，這種現貨是皇室需要得異常急迫的。

但是除強迫外國商人交出外貨來兌換外，皇朝還得採取必要的政策來阻止外國商人將出售商品所得貨幣攜帶出英國國界的行為。爲了這事，皇朝曾頒佈了一條法律：一條是關於強迫消費的法律，另一條即是所謂監察法。根據第一條法律，外國商人在英國銷售商品所得之貨幣，必須全部消費在英國，購買英國商品。根據第二條法律，則有指定的監察人監察外國商人是否依法遵行。此種監察人之職務往往由外商所寄居之「寓主」執行。按當時之英國法律，外人去英經商者，均被視爲「國客」，而此等「國客」到英以後必須依法寄居於一定的「寓主」，而「寓主」則須負監察「國

(註)見前書，頁九。

客」行動之責，須令「國客」詳細登記，並注意其貨幣之運出國外。

這便是英國商業資本早期底情形。跟這一時期相適應的經濟政策是早期的重商主義。成熟的（發達的）重商主義是表示更高階段的經濟政策，後者是更高階段的經濟發展所決定的。

在晚期（即發達時期）重商主義時代，商業資本已經高度發展，工場制（亦稱作坊制）已產生，信貸亦已開始發展。這就是所謂「原始資本積聚」（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時期底開始。商業資本和高利貸這兩位「誦親兄弟」，大規模地執行它們自己的歷史使命：飛快地發展商品貨幣經濟，大規模地擴張國內外市場，日益加緊對殖民地土人的商業掠奪，努力加速國內手藝小生產大衆底破產，同時亦即不斷地實行貨幣資財底巨量積聚。這時國家要用老法子去統制和調節它們已屬勢所不能，亦且沒有必要。這時追求金銀的欲求比以前增高得多，可是人們對於金銀的態度却改變了。貨幣之爲資本之職能，業已充分地表現出來；但是貨幣之成爲資本，只有在運動中纔能夠，所以貨幣底運動就不當受過分的限制。過去的口號——多賣少買——已經不適應於這時的新條件了。

同時人們對於生產的態度也起了變化。在過去，商業底規模不大，小生產很可以做它的礎。是可到了商業大規模地高度發展的時候，小生產就不夠做它底基礎了。由此就發生大生產底需要，



發生擴大工場制底需要。跟着大生產底發展，就發生了勞工問題：大生產（工場）底所有者需要強迫工人多做些工作而少給些勞動底報酬。當時的君主政權，就得負擔起這些任務來。

重商主義所表現的形態不是商業政策而是工業政策底形態，所以好些研究家往往把重商主義解作真實的工業政策了，波格唐諾夫和史威班諾夫在他們合著的政治經濟教程中就說：『重商主義這種工業政策底體系在中世紀時期已經產生』。還有些經濟學者如李士特（List）翁肯（Oncken）之流，則連亞當·斯密所取的「重商主義」這一名稱本身都要加以反對。斯密氏寫道：『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民族中，社會幸福發展底差異，產生了兩種對立的、論國民致富方法的政治經濟學底體系。一種可以稱之為重商（商業的）體系，另一種則可稱為農業的體系』（註一）。

李士特反對斯密氏這種見解，翁肯則與李士特持同一意見。翁肯在其斯密以前之國民經濟學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die Zeit vor Adam Smith）一書中寫道：『依照李士特底公正的指示，所謂重商主義底體系，我們有權稱它為工業政策底體系比稱亞丹·斯密底體系本身更切當些』（註二）。

（註一）亞丹·斯密著，論國民財富之本性與原因卷四，二二四——二二五。

（註二）翁肯著斯密以前之國民經濟學史，頁一五三，一九〇八年版。

這裏正確的當然是斯密氏而不是近代的貿易保護主義者李士特和翁肯。波格唐諾夫和史威班諾夫則又跟着李、翁兩氏底見解走。事實上當時的所謂「工業政策」，本質上完全是重商主義的，因為國家對於工業的關心，——如設立工場頒佈勞工法之類，——所有這些措置都貫徹着重商主義。國家所獎勵和調節的正是輸出品底生產部門和能夠作為奪取國外市場和吸收貨幣到國內來的武器的那些工業部門。延長工作日和規定低度工資的勞工法，其目的亦同：這種勞工法底作用在於藉廉價勞動以加強「國民」工業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應當指出，早期重商主義時期底特徵僅僅是「商——商——商」，那時商人純粹處於中間人底地位，他們底活動只限於買進和賣出，從中取得一點利潤。可是到了成熟的重商主義時期，主要的特徵就表現在「商——商——生——商——商」這一公式上。這意思是表示商人階級此時已在執行組織生產底職能，商品底生產已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地被忽視了。然而即在這一時期，生產仍未居於首要地位，它仍被視為商品流通發展之必要的條件，因為當時大家心目中仍視商品流通為國民財富之真實的來源。

假如把重商主義作一簡單的總評估，那末可以說：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底經濟政策，它底歷史

使命在於替工業資本掃清道路並爲它未來的「霸權」造成基礎。當商業資本底使命完成的時候，重商主義就從促進經濟發展底因素轉變爲它底桎梏了。這時在政策上和理論上就開始反重商主義的潮流。

### 第三節 重商主義之理論體系

一部分研究者以爲重商主義祇是經濟政策而忽視了它底理論方面。例如翁肯就明白肯定地說：『這是經濟政策底體系而不是理論的政治經濟學，甚至那些討論國民經濟問題的重商文獻，也不能視爲經濟理論底嘗試……』(註一)俄國的經濟學者馬斯洛夫 (Maslov) 在其國民經濟史教程 (A Course of History of National Economy) 中亦發揮類似的見解，他說：『貿易保護制，人工促進爲輸出而生產的那些工業部門底發展和人工維持貿易出超底局面——這種制度都稱爲重商主義。』(註二)

這部分作者只把重商主義看作經濟政策而把它完全排拒到政治經濟學範圍以外去，但同時也有

(註一)翁肯著：斯密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史，頁一三二。

(註二)馬斯洛夫著：國民經濟史教程俄文第六版，頁一三二。

另一部分經濟思想史研究者——而且是大多數研究者——則完全抹煞了重商主義底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底區別。這種見解也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重商主義是國家政權所實施的實際政策底體系，同時又是理論底體系。關於這一點，資本論第三卷裏有以下一段話：

『現代生產方式之第一次理論的檢討——重商主義底體系——必然以流通過程底表面現象爲出發點，把它們看作商業資本運動中獨立存在着的現象來研究，而它之所以只涉及現象底表面，一部分是因爲商業資本是一般資本底第一種自由的生存形式，一部分是由於它在封建生產變革初期，在現代生產發生時期所起的那種超越一切的影響。真實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到理論的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入生產過程的時候纔算開始』。(註)這裏卡爾稱重商主義體系爲『現代生產方式之第一次理論的檢討』，但同時又聲明『真實的經濟科學只是到理論的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入生產過程的時候纔開始』。這就是說，重商主義確是一種經濟的理論，但是它還不配稱爲真實的現代經濟科學。經濟思想之成爲科學，只是到揭發現象之本質這任務被提出來和實現出來的時候纔開始。就經濟現象講，要揭發現象底本質而只限於流通研究是不可能的。而重商主義者底研究對象恰正是現象底表面。重商主義者底研究對象是流通；他們底方法是現象底描寫和部分地現象底分類；他們所認定的

(註)卡爾著：資本論卷三，上冊，第二十章。

任務是狹窄地實際主義的；他們研究底結果是各種經驗法則底確定。重商體系只是政治經濟學底「前史」形態（“pre-historical” form），正如商業資本時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史」一樣。為商業資本之理論家的重商主義，首先是以這一資本底運動——「 $C-M-C'$ 」——為出發點的。他們把資本流通過程看成僅僅由兩個流通階段「 $C-M$ 」和「 $M-C'$ 」組合而成的貨幣循環。因此他們就認流通為利潤底泉源和一般財富底泉源。由此又產生以貨幣「積儲」為財富的觀念。實際上，在商人眼界中確是如此的，商品底買賣才是增加貨幣資本底手段——由「 $C-M$ 」轉變為「 $M-C'$ 」。商人把較少的貨幣投入流通中去，便從那面取回較多的貨幣來。

可是漸漸地商業資本底勢力開始侵入生產中去了。首先商人開始控制那些在他權力之下的小生產者——手藝工人。同時，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也出現了。政治經濟學就不能再忽視生產過程。於是晚期的重商主義就代早期重商主義而起。僅僅採取「 $C-M-C'$ 」形式的資本循環，此時已不適應現實。商人底活動亦不復以現成商品底買賣為限：他也要購買原料去供給在他控制下的那些小商品生產者，他並且又常常用勞動工具去供給他們。於是他底資本環循就開始採取「 $C-M-C'$ 」—— $C-M-C'$ 」底形式了。晚期重商主義事實上確是從這一資本運動底形式出發的。

雖然資本循環已經發展到不以流通為限的階段，可是生產却尚處於從屬的地位。全部資本循環

仍完全採取貨幣資本循環底形式，以貨幣始而以貨幣終，全部資本底運動表現着貨幣自增底過程。重商主義者所注意的僅僅是資本循環底一方面，即貨幣資本底循環。這是當時（商業資本統治時代）的現實所決定的。只是到了商業資本底統治地位被工業資本所替代時，經濟研究者底注意重心才由貨幣資本轉移到生產資本底循環上來。

講到工業資本之循環的話，吾人即不能以貨幣資本運動底觀察為限，因為工業資本底循環實際上是三種資本循環形式底一致——貨幣的、生產的和商品的資本循環形式底一致。這是同一工業資本之三種不同的形式，它們互相對立，同時又互相依賴。從貨幣資本底循環出發去觀察，則全部過程似乎只是貨幣自動（貨幣自行增殖）底過程，生產只是這一過程之必要條件而已。反過來講，把生產資本底循環當作主體來觀察時，貨幣就變成簡單的流通工具或支付工具，即變成幫助生產之永常更新的必需條件了。這時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又是一種偏面的情形：彷彿資本主義生產底全部事業是生產而不是價值增殖、剩餘價值底佔有。假如把注意中心放到商品資本底循環上去的話，結果亦復如是。在商品形式底資本循環中，貨幣底運動和生產不斷的更新僅僅表現為商品運動中的必要條件、必要的輔助因素了。

然而，在商業資本底統治時代，貨幣資本循環可說是資本運動底唯一形式。因為那時工業生產

(小手工業)尙居於商業資本底附庸地位。可是卽在那時，貨幣資本底循環已極顯著地(縱然是偏面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底特徵。這種資本循環形式最明白地揭露出：第一，資本主義生產底動機——佔取利潤；第二，貨幣不單是流通工具。這也是重商主義者所預示的(縱然預示得極粗陋而淺薄)兩點，而這種預示又是使重商主義體系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第一次理論的檢討」的根源。

重商主義底發生與開展，佔着兩個世紀光景，它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不同的民族領域條件之下開展着的。根據這一點，就有人(如翁肯)以爲曾經有過幾種不同的重商學說。這類人不知道重商主義始終是商人資產集團底階級利益底表述，換言之，它有一個統一的階級基礎。除此以外，重商主義還有一個統一的方法論基礎：卽以貨幣資本循環爲惟一研究對象。在重商主義者底觀念中，

『貨——幣——貨』甚至『貨——幣……生……幣——貨』這個圖式是表示(一)貨幣就是資本，資本就是貨幣，貨幣不祇是什麼資本底貨幣形式；(二)流通駕馭於生產之上，而不是相反；(三)利潤只是商品賣買底結果；(四)利潤只表現爲貨幣餘額底形態。由於這些觀點，所以重商主義者把貨幣跟資本和財富等同起來，換言之，卽把形式跟內容、流通過程跟生產過程等同起來了。這樣，在重商主義者底心目中，貨幣便是一切。這可說是「貨幣拜物主義」之極端的表現。

卡爾說過：『重商主義者把注意底重心放在價值表現之質的方面，卽放在商品之等量形式上，

後者之完滿的表現就是貨幣。』(註)在重商主義者看來，生產商品就是生產貨幣；爲要不使貨幣成爲一瞬即逝的東西，不使它成爲只是流通工具，就必須實行「少買多賣」底原則。這樣，早期重商主義者底思想就發展到了貨幣均衡(Monetary balance)底理論，晚期重商主義者底思想則發展到貿易均衡(Trade balance)底理論，即狹義的重商學說。

貨幣均衡論(或譯貨幣餘額論)和貿易差額論(或譯貿易餘額論)是重商主義發展中的兩個階段，後者本身又反映着商業和商業政策發展底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上，重商主義者主張禁止貨幣輸出，他們認爲這是保持貨幣底手段。在第二個階段上，他們主張發展對外貿易，以爲對外貿易底發展可以吸收大量的貨幣到國內來；使對外貿易所吸收的貨幣量多於它所吐出的。在第一個階段上，實施重商政策的國家對於自己的經濟力量尙缺乏信任，所以完全恃國家底行政手段來達到上述的目的——增加貨幣。在第二階段上，對於本國的經濟力量已開始信任。但是晚期重商主義者——成熟的重商主義底代表們——距離完全商業自由底觀念、經濟能力完全解放底觀念，還遠得很呢。

商業資本底歷史使命，——創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之必要條件，——若無國家政權底積極促成，若無一定的政策，商業方面和工業方面的一定政策底幫助，那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在重商

(註)卡爾著 資本論卷一，第一章，第三節。



主義者底心目中，國家政權底幫助，甚至它底控制經濟生活，就被視為顯著的真理了。早期和晚期重商主義者底區別僅僅在於對這種國家干預底具體方式之不同的理解，在於如何使此種干預收最大效果之問題而已。

現在我們要把重商主義底兩個主要代表底代表作品，約略地說個大概，作為這一節書底結論。這兩位代表底代表作，可以說一個是早期重商主義底結晶，第二個是晚期重商主義底作品。現在先說第一位代表威廉·斯塔福特(William Stafford, 1554—1612)底著作吧。

斯塔福特底對邦人怨語之評述一著，一五八一年出現於倫敦。該書用對話體裁寫成，參加對話者有各個等級和階層的人：爵士、商人、手藝工人、農夫和神學家等。後者是對話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是表達作者本人真意的人物。

斯塔福特底作品出現的時候，正是一方面英國土地革命達到頂點，另一方面大批貴重金屬品從新發見的國家（特別是美洲各國）流入歐洲的當兒。土地革命底開展，乃由於英國農民大眾失去了土地，由於把植棉場改成了牧羊地。而這回事底直接原因是羊毛貿易底發展和羊毛價格底提高。同時又因貴金屬底流入和國皇大規模的貶劣鑄幣（註），結果使一切商品底價格都飛漲起來，於是就造成了一般的生活昂貴的局面。一切商品價格既然高漲，勞動力自然也要漲價了，這便是名義工資

提高底來由。

斯塔福特底著作中所假定的各階層、各等級的人底對話，是在那裏互相責備，把造成社會痛苦  
 的責任談諸對方，各人都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出發講話。只有神學家彷彿是一位「超階級」的人物，  
 他宣佈着「超階級的真理」，這種真理便是早期重商主義底見解。他（實際上就是斯塔福特自己）  
 底中心意念是主張保存貨幣於國內而勿使外流。他所最感不安者即貨幣外溢一事。他底觀念還沒有  
 發展到貿易差額論底地步。由於這個緣故，所以他竭力反對用虛值鑄幣（即分量不足或品質惡劣之  
 鑄幣），因為後者把實值鑄幣排拒於流通界之外，結果便往國外流出去。這樣，斯塔福特已經了解  
 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之聯繫，他看出物價騰貴底原因在於虛值鑄幣底流通和國皇劣化鑄幣底舉動。  
 鑄幣底貶劣產生了兩種結果：（一）生活昂貴和（二）實值鑄幣底流往國外。

斯塔福特底全部書中都貫徹着說明自國外輸入商品之害處的思想，因為商品底輸入便是貨幣底  
 輸出，而貨幣底輸出國外，斯氏認為國家社會之大害。斯氏特別反對羊毛自英輸出而自外國輸入由  
 此羊毛所製成的毛織品，他主張在英國國內自行製成毛織品。他底提出這種主張還有一個動機，這

（註）意即國皇使鑄幣底品質惡劣化，用劣質的金屬來鑄成貨幣，因而幣值就跌落了。國皇之所以出此是因為皇室底消費

浩大，國家機關底開支更大，國庫貧乏不足應付之故。

就是本國毛織工業發展可以使一大部分人民獲得工作做。不過他底基本動機却是另一個：在輸出羊毛和輸入毛織品的情形之下，外國商人因出賣毛織品而自英國輸出去的貨幣多於他們在英購買羊毛時所輸入的貨幣。

另一著名的重商主義者湯麥斯·孟 (Thomas Mun, 1571—1641)，是成熟的重商主義底代表。一六六四年，湯麥斯·孟底英國在對外貿易中的財富或對外貿易底差額一書出現於世。湯麥斯·孟是一個大商人，東印度公司底董事之一，亦即貿易差額論底首創人。

湯麥斯·孟並不反對貨幣底輸出，他反而主張取消貨幣輸出底禁令。他主張出超的對外貿易，主張使對外貿易之輸出超過輸入。孟氏在書中寫道：『增進吾國財富之經常的手段為對外貿易，在這種貿易中吾人應永遠堅持一種原則，即每年賣給外國人的商品底價值必須大於吾人消費他們底商品。』繼續下去他又說：『因此，假定吾帝國有多餘的織物、鉛、錫、鐵和其他本地土產而每年將此種多餘物品輸出國外，其總額達二百二十萬鎊；再假定我國每年從海外購回吾人所消費的外國貨計二百萬鎊，則吾帝國在一年間可以增加財富二十萬鎊，而這二十萬鎊必須取貨幣底形式回到我國來。』(註)

(註) 轉錄俄文版楊儲爾著英國的自由貿易卷一，頁七六。

這裏孟氏也把財富跟貨幣等同起來了。孟氏之重視對外貿易底出超，主要地是因為藉此「吾帝國在一年間可以增加財富二十萬鎊，而這二十萬鎊必須取貨幣底形式回到我國來」。但是較之斯塔福特，孟氏已具有比較遠大的眼光，他不盲目地反對商品輸入和貨幣流出，他底觀點是受大商業資本底利益、尤其是受東印度公司利益之支配的，該公司對當時英國商業之發展曾起了極大的作用。東印度公司底任務是在運出大量貨幣到印度去，然後又從印度輸入更大量的貨幣到英國來。當時英人從轉賣印度貨物中所獲得的利益，極為豐厚。英人往往把從印度收買來的廉價商品（因為英人在印度，不僅是商人而且是殖民者，故購價特廉），抬高價格轉賣到別的國家去，藉此獲得極大利潤。

這樣看來，孟氏了解貨幣底意義不在乎保存它們，而在乎把它們投入生產它們的流通界中去。他寫道：『貨幣創造商業，而商業又增加貨幣。因此，投入流通界中去的貨幣愈多愈好。』（註）湯麥斯·孟是阻止輸出商業的一切政策底反對者；他甚至主張減低出口貨底關稅。假使說，早期重商主義者是主張高價政策的，那末他却完全相反，他擁護低價政策，認為藉此可以刺激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孟氏也反對鑄幣劣化，因為他認為「人們所重視的，不是鎊、先令、辨士等名稱，而是

（註）見同書，頁二八。

鑄幣內部的價值』。關於這一點，孟氏跟斯塔福特見解完全相同：貨幣價值底降低引起商品價格底高漲。

然而孟氏底作品已比斯氏前進了一步。二人都是重商主義者，但他們却處於商業資本控制下的英國經濟底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所以他們是重商主義發展底兩個時期底代表。假使說斯氏竭力肯定保存貨幣於國內的必要性，那末孟氏却竭力主張貨幣自國內輸出底必要性，特別主張以發展轉售商業爲目的的貨幣輸出底必要性。爲着更多的貨幣輸入而作大量的貨幣輸出——這便是湯麥斯·孟底基本信念。

## 第四節 重商主義之崩潰

### 一 近代政治經濟學底首創人威廉·彼梯

#### 甲 近代經濟學說之社會經濟基礎

以上所講是關於早期重商主義和重商主義底興盛時期，現在要講到重商主義底崩潰，同時亦即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即近代經濟學說）底萌芽了。

在前面幾節書中，我們已經說過，商業資本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必要的前提，而且在最

初的時候，資本主義生產也是在商業資本控制和庇護之下發展着的。經過了好些階段之後，只在流通範圍內活動的純商人才走上工業資本主義底道路。在商業資本統治下，流通之脫離生產而獨立，表現在下面的兩種情形上：第一，流通尚未控制生產，前者祇把後者當作自己的先行條件；第二，生產過程尚未將流通包括在自身之內而把它當作自己的成素之一。相反的，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則上面兩種情形都已完成。但是在上面兩種情形均已完成之後，商業資本就失去了它底統治地位，而重商學說和政策也失去了它底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礎。

資本論著者關於由商業資本到資本主義大生產的轉變，曾作以下的寫述：

『由此看來，這種轉變是經過三種方式來完成的。第一，商人直接變成工業資本家；這是指那些以商業為基礎的工業部門底場合，特別是指生產奢侈品的那些部門底場合而言，那種奢侈品是跟原料和工人同時被商人從國外輸進來的，正像十五世紀意大利從君士坦丁堡輸入的情形一樣。第二，商人小手藝匠變成他自己的中間人 (middlemen) 或者直接從獨立生產者那裏購買商品；名義上他仍護他保持獨立性，亦不改變他底生產方式。第三，工業家變成了商人而且直接從事大量生產以供給商業。』(註)

對於商業資本統治底消滅有決定意義的是上述第二種場合。在這種場合之下，流通已變成生產

(註) 卡爾著：資本論卷三，第二十章。

底成素（即構成生產過程之一個環節），於是重商主義也就從各方面開始被修改起來了。首先重商的貨幣觀、重商的流通觀——以流通為財富之來源的觀點，——就有重新加以估定之必要；這時主要地是開始內部的經濟規律性底探索，換句話說，即開始從事物底外表形像後面去探索它們底本質。流通既變成了生產底成素，它就不復為一獨立自足之現象。於是要理解流通中所發現的諸現象，就得開始從生產中去尋求「鑰匙」。

這種客觀的局面迫着威廉·彼梯（William Petty, 1623—1687）從勞動中去找尋市場價格底基礎。正因為這一點，所以彼梯成為近代政治經濟學底開創人，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底開創人或奠基人。

唯心論修正派的經濟思想史研究者盧濱（Rubin），對於重商主義崩潰的解釋，完全跟希弗亭和馬赫持着同一立場。盧濱解釋道：『從十七世紀後半期起，在英國的文獻中重商主義發見着理論興趣。加強底傾向，這種理論興趣是在數學和經驗哲學（培根、霍布斯）之廣大的普遍性底影響之下加強起來，同時也由於為適應新的日趨繁複化的、經濟發展底需要而對重商學說作廣泛和根本的修改之必要性所促成的。』（註）這樣解釋重商主義底潰崩，顯然跟上述希弗亭、馬赫底見解：以為

（註）盧濱著：經濟思想史，一九二六年俄文版頁五二。

科學思想底發展是由於思想底互相適應和思想之適應於事實，根本上完全一致的。照盧濱底意見，數學和哲學發展起來了，經濟思想就得去適應它們（這便是「思想之互相適應」）；新的事實——經濟發展之繁複的需要——出現了，於就是發生適應這種事實的經濟思想底需要（這便是「思想之適應於事實」）。

在對勞動價值論之發生的解釋中，盧濱也仍持希弗亭和馬赫底立場。他認為這一理論發生底全部原因在於自發的價格構成（Spontaneous price-formation）這一新的事實底發生。盧氏寫道：「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之後，情形就不同了。行會的定價制日益被發賣人與購買人中間的競爭過程所代替。調節下的價格被自發的市場的價格構成所代替了。價格乃由被強迫決定的和預先確定的容量轉變為預先無從知道的複雜的競爭過程底結果。假使說十三世紀的作家所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公平底思想來規定價格，那末十七世紀經濟學者底思想却趨向於另一方面：他們想把支配着市場上實際的價格構成過程的規律性揭露出來。價值問題之板規的提法，被科學理論的問題底提法所代替了。」（註）

這裏，盧濱完全抹煞了由一種提法（即立場）到另一提法的轉變之社會經濟的本質，拋棄了這

（註）盧濱著：經濟思想史，一九二六年版頁五三。



一本質，事實上等於毫無說明。照盧氏底意見，以為在中世紀手藝制時代，作家們之所以以勞動報償為基本立場，完全是因為當時統治着公平思想的緣故。同時還可以給這樣的「解釋」：由所謂「板規」的立場過渡到理論科學的立場，這是因為有了自發的、市場的價格構成底事實，思想（科學的價值論）就得去適應這種事實！

但是我們知道實際上，價值律在資本主義誕生很久以前就統治着了。在單純商品經濟之下，即在中世紀手藝制時代，當生產手段屬於生產的勞動者所有的時代，價值律就已行使着統治的職能（function）；而且正是在那時代，價值律倒是直接地行使它底調節市場之職能的；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之後，價值律纔變相地（取生產價格律底形相）表現出來。中世紀時代的公平價格（Justum pretium），實際上無非是價值律之特殊的表現（罩着宗教外衣的一種表現）而已。行會和城市底當局恰正是根據價值律來調節價格的。當權者主觀上儘管根據所謂維持「充裕生活」底必要性來規定價格，然而客觀上他們仍然被價值律所支配的。因為他們按照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來規定價格，而他們所無法控制的勞動生產率底變動，迫着價格也不得不發生變動。可是從商業發展和商人底作用增大以後，價值律底表現就開始複雜化了。

商業資本剝削勞動，剝削獨立的小生產者底勞動，但它並不組織勞動；它對於生產中所消費的

勞動，可說毫無直接關係。它只知道買價和賣格間的差額。而事實上這兩種價格也往往不跟價格相符合。工業資本底情形就不同了：它也剝削勞動，但是它所剝削的是在它直接組織和指揮之下的工錢勞動者底勞動，勞動既是它所直接組織的，它就不能完全拋棄勞動不管。固然，在工業資本家看來，利潤是他全部資本底產物，可是他究竟不能把勞動完全撇開，因為在他底生產成本中，大部分是消費在勞動上的。這樣，隨着工業資本之發展，經濟學者就開始從勞動中去找尋價格構成底基礎了。威廉·彼梯便是從勞動中發見價值源泉的第一人。

乙 威廉·彼梯底方法和理論

威廉·彼梯確是英國近代史中一個博學的大天才。經濟學史家翁肯曾對彼梯作如下的估量：『這樣一個多方面都能的人確實難以遇到。他所受的教育是醫生，他同時又是澈底的數學家，音樂家、土地測量家、造船家等等。』（註一）就他底世界觀（die Weltanschauung）言，彼梯還是一個重商主義者，他對於一切問題，連宗教問題在內，都根據商業和獲得貨幣底觀點去處理的。但是假如把他底方法和理論拿來分析一下，我們就知道彼梯確是『現代政治經濟學底奠基人』（註二）

（註一）翁肯著：國民經濟學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 Ökonomie）

（註二）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俄文版頁十七。

彼梯雖尚不失爲一重商主義者，但是這位重商主義者底研究工作，不但促成了重商主義底崩潰（他予同時代的經濟研究者以極大的影響），而且還奠定了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基礎。在他底一般的世界觀中，貫徹着重商主義底思想，因此他底勞動價值論也是重商的勞動價值論。譬如他說水手（乃指對外貿易的商艦水手而言）勞動底生產性要比農作者勞動底生產性大三倍。然而對於重商主義者有決定意義的一個問題、貨幣問題，彼梯底見解却跟「正統的」重商主義者大相左右。他自問自答道：『要太多的鑄幣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應當把分量較重的鑄幣重行溶化，改造成爲各種奢侈的器皿或金銀盤碟之類；不然的話，可以把它們當作商品輸出到需要這類事物的地方去；再不然還可以把它們貸出去生利息，要是利息高的話。』（註）

彼梯底重商主義觀點和反重商主義觀點，其根源均在於他所處的那個轉變時代。在十七世紀的英國，一方面舊式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尚未離開歷史舞台，另一方面新式的商人和工業家却已出現，他們底財富就是大工場和大地產。在這樣一個時代，以貨幣爲唯一財富形式的觀念跟以貨幣只爲流通工具和財富的觀念交編起來，這是絲毫不足爲奇的。以下讓我們把彼梯底方法和理論約略地介紹和分析一下吧。

（註）轉譯資本論卷一，第三章末之註脚。

彼梯底對抗重商主義底理論，首先就表現在他底方法上。彼梯自己也聲明過，他底方法不是傳統的。重商主義者底傳統方法是描寫的；採取許多事實而說明它們中間的經驗性的聯繫。彼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採取的方法却是各門自然科學中所應用的方法，他廣泛地應用科學的演繹法來解釋他所考察的諸現象，即揭露他們底本質。不過彼梯所用的方法，是取數學的形式的。由於這一點，所以許多研究者往往不了解彼梯底方法底真實本性，而把彼梯看成單純的經驗派，髣髴彼梯只知用統計方法對現象作精確的攷察再用統計方法來描寫（敘述）它們。實際上這樣了解彼梯顯然是不正確的。

這樣，彼梯底方法是跟「正統」重商主義者不同的，他已知道用自然科學中的方法去探求經濟現象底本質。譬如在着手研究地租時，彼梯聲明道：『在討論到地租以前，我們首先應當嘗試說明彼稱爲利息的貨幣地租和產生於土地和房屋的地租之秘密的本性。』（註）這裏很明顯地表現出來：彼梯底眼光注射於現象底基礎而不限於現象本身。而要揭發現象底基礎（即彼梯所說的「秘密的本性」），要探究現象底本質，則非用抽象的方法（method of abstraction）不可。

在試圖揭發現象之基礎（亦即根源）時，彼梯又了解：『在這種基礎上發展着的上層建築……

（註）轉錄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俄文版頁十七。

是種類很多很複雜的』（註一）。這樣，彼梯明瞭：（一）現象底本質和現象本身不是同一的，而經驗者却把兩者看成同一；（二）科學的研究不限於現象本質之揭露，而應說明後者如何表現出來。然而我們必須着重指出，彼梯底應用這種新的科學方法，還祇是初步的嘗試，這種方法到以後重農學派和英國古典學派，特別是到李嘉圖底學說中，才大大地發展起來。

威廉·彼梯首先把他底新方法應用於價格底分析，他試圖探求出價格底基礎來。這裏要附帶地提一句，假如彼梯果真祇是一個統計學者（像翁肯所設想者），那末他底工作必定只限於平均價格（用統計的方法）底確定了。可是彼梯並不以此為限，他進一步地在探求平均價格底基礎。他在研究這樣一個問題：市場價格所環繞着變動的那個平均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對於這個問題，彼梯回答道：『假如有人把秘魯底地層中所採掘的一兩銀子運到倫敦來，而他用採掘這兩銀子所消費的這點時間也能生產出一蒲式耳（bushel）的麵粉，那末前者（指一兩銀子——沈註）就是後者（一蒲式耳麵粉——沈註）底自然價格；可是假如他到一處新的、蘊藏較富的銀礦中去工作，他能在原先採掘一兩銀子的時間內掘出二兩來的話，那末麵粉底價格現在每蒲式耳十先令就等於原先的每蒲式耳五先令了。』（註二）

（註一）同書同頁。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彼梯已能認定商品——蒲式耳麵粉——底自然價格是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所決定的，（二）這種價格與採掘銀子所消費的勞動底生產率成正比例，假使由於採掘底輕易而銀子增加了一倍，那末麵粉底自然價格也要增加一倍。現在我們把彼梯底見解跟卡爾底見解作一番比較，看他們有什麼不同之處。卡爾底見解表現於以下的說法：『在商品A底價值不變的情形之下，它底表現於商品B的相對價值（relative value）之升與降，是與B底價值底變動相反的。』（註三）在彼梯底例子中，商品A是麵粉，商品B是銀子；在銀子上所表現的麵粉底相對價值，是隨銀子價值之降低而升高。

這一比較，很明白地指示給我們看，彼梯一開始就確定的不是商品底價值，而是它底相對價值。其次，他所認定的相對價值又一開始就取貨幣的形式，而沒有研究一種商品底價值在任何別種商品上的表現（即任何兩件商品之交換關係），他只知道在貨幣上（在彼梯底時代，銀子是鑄幣的材料，即貨幣）研究商品價值底表現。彼梯不但不從交換價值中抽出價值來，他甚至還不從價格中——價值底貨幣表現——抽出價值來。在彼梯底眼界中，交換價值只是商品交換過程中所表現出來

（註二）轉譯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頁十七。

（註三）卡爾著：資本論卷一，第一章。

的那個形態，即貨幣形態；而貨幣本身，他認定是現存的商品、金和銀。

這裏就表現着彼梯底重商主義觀點。在他看來，商品底價值不外乎爲獲得這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的貨幣量。可是彼梯已注意到爲什麼某一商品可以換得到那麼多的貨幣量這個問題，這是他跟其他重商主義者不同的地方。

彼梯底重商主義不但表現在他底價值論底弱的方面，而且也表現在它底強的方面。使彼梯對商品價值不採取自然主義的觀點，不把價值看成單純的人類肉體勞動、看成生理的或心理的自然過程，這也就由於他底重商主義的觀念。我們知道，重商主義是肯定流通對於生產、形式對於內容的主導地位的，唯其如此，所以它不容許自然主義的和機械主義的簡化價值爲勞動，因爲這樣的簡化恰正忽略了流通和形式，特別不能容許的是忽略了價值底貨幣形式。但是這裏彼梯碰着了一個似乎無法解決的難題。一方面因爲他是個重商主義者，他不能把價值（即所謂「自然價格」）看成勞動；但是，依照他底新方法，他也不能從市場價格底擺動中得出價值來，因爲新方法要求抽去市場價格的。彼梯在這一難關之前，天才地找出了一條解決的途徑：他認定不是一切勞動能創造交換價值，創造價值的祇是消費在銀子生產上的勞動，即貨幣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別種勞動之創造價值，僅就它們底生產品可交換一定量的銀子這點意思而言的。

這樣，關於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底兩重性，彼梯尚無所知。從全部社會勞動中，他只認定了一種實在的勞動形態，把它跟其他一切實在的勞動形態對立起來。彼梯認定只有前一種勞動形態直接生產交換價值，其他一切勞動形態都不直接生產，而是經過與前一種勞動底生產品（指銀子）之交換才獲得交換價值的。

彼梯既不了解創造價值的勞動底本性，他當然就不會了解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底區別。依照他底見解，一切勞動生產品都應劃分為二大類：（一）一切形式底勞動生產品，（二）金和銀。前者在交換中變成了交換價值，後者一生產出來就是交換價值。照這樣說來，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底區別乃發生於生產金銀的勞動和其他形式底勞動間的區別。

但是參加金銀底生產的，不祇是勞動一件，除勞動外還有自然。因此，彼梯得出結論道：『勞動為財富之父，自然乃財富之母』。同時，在彼梯底觀念中，可以說價值底尺度（measure of value）有兩個了：勞動和自然。彼梯說：『我要說的是：對於一切事物的估價，都可以歸結到二種自然的標誌——土地和勞動——，譬如說，一艘船或一件衣服底價值等於若干量土地底價值和若干量勞動底價值，因為這兩種東西——船和衣服——都是土地和勞動所生產的呀……』（註）

（註）轉譯錄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頁二二。



還要指出一點，就是彼梯底觀念中不僅有兩個價值底尺度，而且他跟一班布爾喬亞勞動價值論者一樣，隨着研究或分析底複雜化，他便由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轉變為由勞動力（Labour power）底價值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彼梯寫道：『平常的價值尺度總是一個成年人平均一日的生活資料，而不是他一日的勞動；這一尺度似乎跟純銀底價值一樣正確和固定的……所以我用多少日口糧底數目來決定愛爾蘭茅舍底價值，這許多口糧便是這所茅舍建造時建築工人們所消費的。』（註一）卡爾在他對彼梯底價值論作評估時寫道：『在他底意念中，價值表現為互相混纏着的三種形態了：（甲）價值底大小，決定於相等的勞動時數；同時勞動被視為價值底泉源。（乙）價值為社會勞動之形式，因此貨幣被他視為真實的價值形式，雖在另一處所彼梯排斥貨幣制度底一切幻想。』

（三）為交換價值之泉源的勞動與為使用價值之泉源的勞動底混合。』（註二）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實際上彼梯把二種價值尺度歸結於一種——勞動。因為講到土地價格問題之時，他把土地價格解作資本化的地租（Capitalized rent），而地租則又被他解釋為剩餘價值了。

其次，彼梯在工資底理論中，也表現為一個非平常的經濟思想家。他在說明規定工資最高限度

（註一）轉錄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頁一七一—一八。

（註二）同前書。

之必要性時，表現着他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深刻的認識。彼梯寫道：『法律應當只保證工人以生活資料，因為假使讓工人多得一倍的話，那就等於他底工作比他所能做的工作（註一）少了一半，而這對於社會就等於損失了這麼多的勞動量。』（註二）這段話底意思是這樣的：『假使工人做了六小時工而取得六小時勞動底價值，那就等於他比現在所得的多一倍（即做工十二小時而得六小時底價值）。這樣一來，勞動價值就決定於必需的生活資料了。但是工人之所以成爲剩餘價值底生產者，或剩餘勞動底供給者，是因為他被資本家強迫去使用他底全部勞動力，而他所獲得的，却祇是生活所必需的。』

自然彼梯還不能自覺地劃分勞動時間爲必需的和剩餘的二部分，然而事實上他已把勞動時間劃分爲這二部分了。照彼梯底意見，假使工人們不在剩餘勞動時間中工作的話，那末『對於「社會」就等於損失了這麼多的勞動量』。這便是他事實上作此劃分的證據。彼梯認爲國家底調節工資，規定它底最高限度，這不是隨心所欲的調節，而是根據着一定的實在基礎的調節，這種實在基礎便是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惟其如此，所以他反對工資減低到法律規定的水平以下。在他底意念

（註一）這意思就是說：在工人所得不增加的條件之下他所能做的工作時數。

（註二）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頁十八（俄文版）。

中，規定的工資底最高限度，也就是它底最低限度。講到工資與貨幣價值底相互關係時，彼梯寫道：『假若規定工人底工資，縱在貨幣價值降落的條件之下，也絲毫不應增加的話，那末這樣的辦法簡直等於科工人以重稅，強迫他們損失一半的工資；這種辦法不但不公道，亦且不可能，因為他們只靠一半工資怎麼能夠維持生活呢？……法律應當規定確實為生活所必需的那麼多的工資。』

(註一) 由此看來，彼梯確堪稱為工資「鐵則」論 (the 'iron law' of wage) 底倡導人。

關於地租問題，彼梯認為有自然形態，亦有貨幣形態。對於自然形態底地租，他做了下面的解釋：『假定有一個人能夠用他自己的手來耕作、耨田、插秧、施肥、收割、打禾等等，再假定他自己還有充分的種子儲存來播種土地。假使他從收穫中劃出那部分為播種用的穀子，同樣地又劃出他所消費的和為交換衣服及滿足其他需要所必需的一切穀物的話，那末餘下來的那部分穀物就成為這一年底自然的和真實的地租了。』(註二) 這便是彼梯底地租觀。不過以上所說的是自然地租，至於貨幣形態底地租，那末就是體現剩餘部分穀物之自然價格的那個貨幣量。換句話說，彼梯是根據他底自然價格論來確定貨幣地租之界說的。他又寫道：『要多少英國貨幣才能在價值上等於這部分剩

(註一) 轉錄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頁二二。

(註二) 同上，頁一八。

餘穀物呢？我回答道：另有一個以生產貨幣爲業的人，在一樣的時間內（按即在前人耕種、收割、打禾等勞作底全部時間內——沈）所獲得的——扣除自己的生產成本——那些貨幣量。……假定在一樣的時間內，生產貨幣（銀子）者獲得了二十兩銀子，而生產穀物者獲得二十公担穀子，那末一兩銀子便是一担穀子底價格。」（註）

在彼梯底喻例中，我們根本看不見雇用勞動底影跡。從以上兩個喻例中可以看出，彼梯底意見以爲在不使用雇用勞動的土地經濟中也存在着地租的。但是在卡爾看來，彼梯底地租論實際上是剩餘價值論，因爲彼梯所研究的地租，事實上是資本主義農業中的地租。而在這種農業中，彼梯以爲自然地租就是除去一切生產成本以後所得的剩餘穀物，貨幣地租則是這些剩餘穀物底自然價格。

然而彼梯之簡化地租爲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這種見解還是表示着一種進步。因爲被他這麼一講，就無異替未來的剩餘價值論奠定了頭一塊基石。但這還不算數，彼梯底地租論無疑地建立在他底工資論之上，在他看來地租便是生產成本（Cost of production，或稱生產的消費）以上的那部分剩餘品。那末生產成本是什麼呢？照彼梯底意見生產成本是由種子和農作者底生計二者所組成的。把這點意見應用到資本主義的農業上去，就等於說，生產成本底一部分是工資。假若工資底大

小不一定，那末地租底大小也不一定，因為生產成本若不一定，則生產成本之上的剩餘量也變成不一定了。所以我們說彼梯底地租論建立在其工資論之上。不過依照他底工資論，工資底大小是一定的：等於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

在彼梯底觀念中，根本沒有利潤 (profit) 這一獨立的範疇；在他看來，地租便是剩餘價值之最普遍的形式。卡爾也說過，在彼梯底意念中，剩餘價值祇存在於兩種形式中——土地的租金和貨幣的租金（即利息）。他根據地租來解釋幣租。他底解釋方法如下：每一個貨幣所有者都可以用他底貨幣購買土地，因而獲得地租。所以貨幣也跟土地一樣，應當生產進益。這樣，彼梯找着了利息底自然基礎，把它跟地租等衡起來，因而他反對法律的調節（節制）利息，後者應當依貨幣之供給與需求而確定其高低。

## 二 威廉·彼梯以後經濟思想之發展

在重商主義崩潰時代，可以說替未來的政治經濟學 (politische Ökonomie) 奠了基礎、造了幾層房子，然而堅實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却尚未創建起來。第一因為所奠的基礎不鞏固，第二因為所造的幾層房子，不論是底層、中層、或上層，都沒有用多量的水泥把它們堅實地膠固起來和互相聯結

起來。彼梯曾試圖奠定這一基礎，依勞動時間來決定商品底價值。他並且試圖在這一基礎上建造起政治經濟學底整所大廈來。但是他所奠的基礎是極不鞏固的；我們知道，他底價值論還有很大的破綻。同時，他所造的整所大廈本身，也有很多的大裂隙。不說旁的，單就他把剩餘價值一律解作地租這一點來講，裂縫已經夠大了。以後詹姆斯·斯都亞特 (James Stewart, 1712—1780) 亦試圖創立一有系統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可是他底價值論恰正是他底「課程」中最大的弱點；再則，他底全部理論，可說是復辟的重商主義。

然而事實究竟是事實：在重商主義崩解時代，雖然沒有建立起真正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可是這一時代底經濟思想家却供給了這一體系底許多原素。他們搜集了大批事實的材料，貢獻了很多有價值的思想，進行了對於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問題的討論。不過應當記住，這一時代不僅替其後的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創造了很多的原素，同時且亦創造了好多俗流經濟學底原素。

現在我們先按照年代底先後，把重商主義崩解時代彼梯以後的一批經濟思想家，從陸克 (John Locke, 1632—1704) 到詹姆士·斯都亞特底理論觀點，作一番極簡略的介紹。這裏要注意到一點，這些思想家都是被視為重商主義者的，然而他們只是重商主義崩潰時代底重商主義者，也可以說，他們底理論觀點只是重商主義崩潰底表現。

先從陸克說起罷。陸克是新興資產者羣底代表，在經濟學領域內，他也表現出這一代底面目來。表現得最顯明的，便是他底利息論。他跟彼梯一樣，也認為利息是極自然的現象，因而反對任何強制規定利率的辦法。他底利息觀大體上跟彼梯底一樣，也認為貨幣具有與土地一樣的本性，它能產生每年一定的進益，這便是利息。然而在這點上陸克底觀點實比彼梯稍明確些。他把利息解作剩餘勞動底佔有，並說明了此種佔有行為發生之原因。他說：「這是由於貨幣分配底不公平，這種不公平之影響於貨幣關係是跟它影響於土地關係一樣的……假如你有多於你所要或所能耕作的土地，而別人底土地則較少，由於這一不公平，你那裏就發生你底土地底租佃者；由於貨幣分配底類似的不公平，就發生我底貨幣底借用者。我底貨幣靠借戶底勤勞而有產生利息的能力，同樣的，你底土地靠着·你·底·佃·戶·底·勞動，就有產生構成地租的那些產物的能力。」（註）

從這段引文里面可以看出，陸克不僅把利息看作剩餘勞動，而且把地租也歸結於剩餘勞動了。然則爲什麼資產集團底思想代表會貢獻正確的剩餘價值論底胚胎呢？這是因爲在那時剩餘價值論底『鎗鋒』對着封建主刺去，爲的是後者竭力地咒咀利息的緣故。於是布爾喬亞代人就出來辯說，利息是跟地租一樣地有根據的。換句話說，利息和地租是剩餘勞動佔有底兩種形式。這種理論底社

（註）卡爾著：剩餘價值論一九三二年俄文版，卷一，頁二七。

會意義是資產集團爲自衛而進攻。陸克甚至說，地租和利息都是生產手段脫離生產者的結果，這對於以後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亦是一點寶貴的貢獻。可是他底資本觀却依然是純粹重商主義的；他沒有劃分出資本和貨幣底區別來，因而他認爲利率底高度是靠國內所有的貨幣量來決定的。不僅如是，貿易差額主義在他觀念中還是絕對不成問題的真理，從這些地方看，陸克顯然還是個重商主義者。

陸克以後繼承彼梯之思想的是諾斯 (Dudley North, 1641—1692)。他和彼梯、陸克一樣，也認爲利息是跟地租一樣地有根據的。他也把貨幣所有人底出借貨幣比作土地所有人底出租土地；他說土地既有地租，那末貨幣就當有幣租。可是關於利率高度底問題的解釋，諾斯却比彼梯、陸克都進步了：後者以爲利率高度完全決定於國內所有的貨幣數量，而諾斯却認爲它是靠借貸資本底供求狀況來決定的。諾斯說：『假使貸款者多於借款者，那末利率就要降低。』(註)諾斯已能把貨幣跟資本區別開來，他說利息並不發生於貨幣，而發生於變成了資本的貨幣。這便是諾斯底功績。但是諾斯之主要的功績却在於他開始把經濟看作一個過程——按照它底內在法則而自然發展的一個過程。關於這一點，他雖然並不在何處自覺地明白說出，可是這一基本觀點却採取隱藏的形式，潛伏在他底一切論見中，作爲後者底基礎。正由於這一基本觀點底潛在作用，所以諾斯極端地反對國家

(註)轉錄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頁二八。



政權之干預經濟生活。

諾斯以後的達微·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和諾斯一樣地公開批判重商主義。休謨以數量的貨幣論出名，後者就是直接反對鑄幣制和重商制的。這個理論雖非休謨首倡，但休謨確予此理論以最大的嚴密性，並大大地推動了這理論底普遍化。更重要的是休謨把這理論做他底全部經濟思想底軸心。

數量的貨幣論也就是商品價格論。根據數量的貨幣論，商品價格乃決定於流通界中所有的貨幣數量（是金屬貨幣抑紙幣，那是無關重要的）。所以流通界中的全部貨幣量就是流通界中的全部商品底價格。由此就得出結論來說：在商品量不變動的情形之下，貨幣量底增加或減少，就會表現於商品價格底高漲或低落。休謨相信這種理論是絕對的真理。休謨認為貨幣並非別的，它祇是勞動和商品底代表，祇是勞動和商品之計算和估價手段而已。

貨幣是商品價值底尺度（同時亦即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價值底尺度），這固然對的，但是貨幣決不單單是價值底尺度。而且貨幣之成為價值底尺度，也只是因為貨幣自身也有價值。正因貨幣自身有價值，所以它才能成為一切商品價值底等量形式 (equivalent form)。然而在休謨底意念中，既無商品價值，更無貨幣價值。他從來不談商品底價值和貨幣（金和銀）底價值，而僅僅

談到二者相互交換的數量。

跟諾斯一樣，休謨也是自由貿易底主張者，不過他底主張自由貿易，又以數量的貨幣論爲其基礎。照休謨底意見，貨幣底向外流溢，絕無憂慮之必要，因爲國內貨幣減少底結果：商品價格就降落，商品價格底降落，足以促進商品底輸出和阻礙它底輸入，歸根結蒂就造成貿易出超底局面，而金銀（貨幣）仍舊大量地流回國內來了。根據同一理由，休謨認爲一個國家沒有保存過多貨幣的必要，因爲貨幣過多則物價提高，物價高則利於外貨輸入而不利於國貨底輸出。所以，照休謨底見解，富有的（即貨幣多的）國家是不能在國外市場上跟貧窮的國家競爭的，原因是富有的國家底勞動和商品要比貧窮的國家貴些。

最後還要約略說一下休謨底利息論和信貸論。我們已經知道，彼梯曾稱利息爲「幣租」，休謨則相反，他稱地租爲「土地的利息」（“ground interest”）。休謨和彼梯底共同點在於二人都在地租中找尋利息底根源。講到利息底高度（利率），休謨認係決定於借款者底需求和放款者底供給。這是跟諾斯底見解相同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休謨看出了利息高度與利潤率（rate of profit）有相互的關係，他對這種關係的解釋如下：「誰要是能夠從他底資本上獲得高度利潤，他總不願以低度利潤爲滿足的；誰要是能夠從他底資本上獲得高度利潤，他總不願以低度利息爲滿足的。」（註）

休謨所看到的利息與利潤底相互關係，祇此而已。然而他絕對不承認利潤率為利息率之基源，不承認前者對後者之主導地位。

重商主義崩潰時代最後一個著名的經濟思想家，可算詹姆斯·斯都亞特 (James Stewart 1712—1780)。在彼梯、陸克、諾斯、休謨等人底理論發表之後，重商主義這一理論體系，大體上已被克服。然而在實踐上，即重商主義的政策，却仍穩固地繼續存在。而詹姆斯·斯都亞特却企圖從理論上來再造它、復活它。在斯都亞特（以下簡稱斯氏）底基本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一七六七年出版）中，他採取有系統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底方式闡明了重商主義的理論觀點。代表重商主義理論發展中最高點的斯都亞特，對於布爾喬亞關係底歷史性，已有了大體的認識。這是因為斯氏底社會出身和社會地位是屬於封建貴族的，而他底信念是保守的。這就迫使他對布爾喬亞社會取反對和批判的態度。斯氏底歷史主義 (historism) 底思想，在他底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觀中，已經表露出來。關於這一點，卡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有這樣一段話：

『斯都亞特跟他底前人和後人的區別，在於他嚴格地劃分表現於交換價值的特殊的社會勞動和生產使用價值的實在勞動之區別。……在他看來，前者是布爾喬亞形式的勞動，它是跟古代的和

（註）轉錄卡爾著：剩餘價值論一九三二年版卷一，頁三一。

世紀的勞動形式對立的。』(註)

然而斯氏底價值論本身是「一篇糊塗賬」。他指出商品底價值是以下三大因素來決定的：(一) 某一國家底工人在一天、一星期或一個月等等期間平均能生產的商品數量；(二) 生活資料底價值和為滿足工人底個人需要和獲得必需的手藝工具所支出的一切消費；(三) 原料底價值。這樣，斯氏把許多性質完全不同的因素混合為一堆：他把商品直接生產者底勞動看作第一因素；他所指出的第二因素實際上就是工資和固定資本底積儲(amortization, 亦有譯「消積基金」者)；第三因素便是流動資本底不變部分(the constant part of circulating Ca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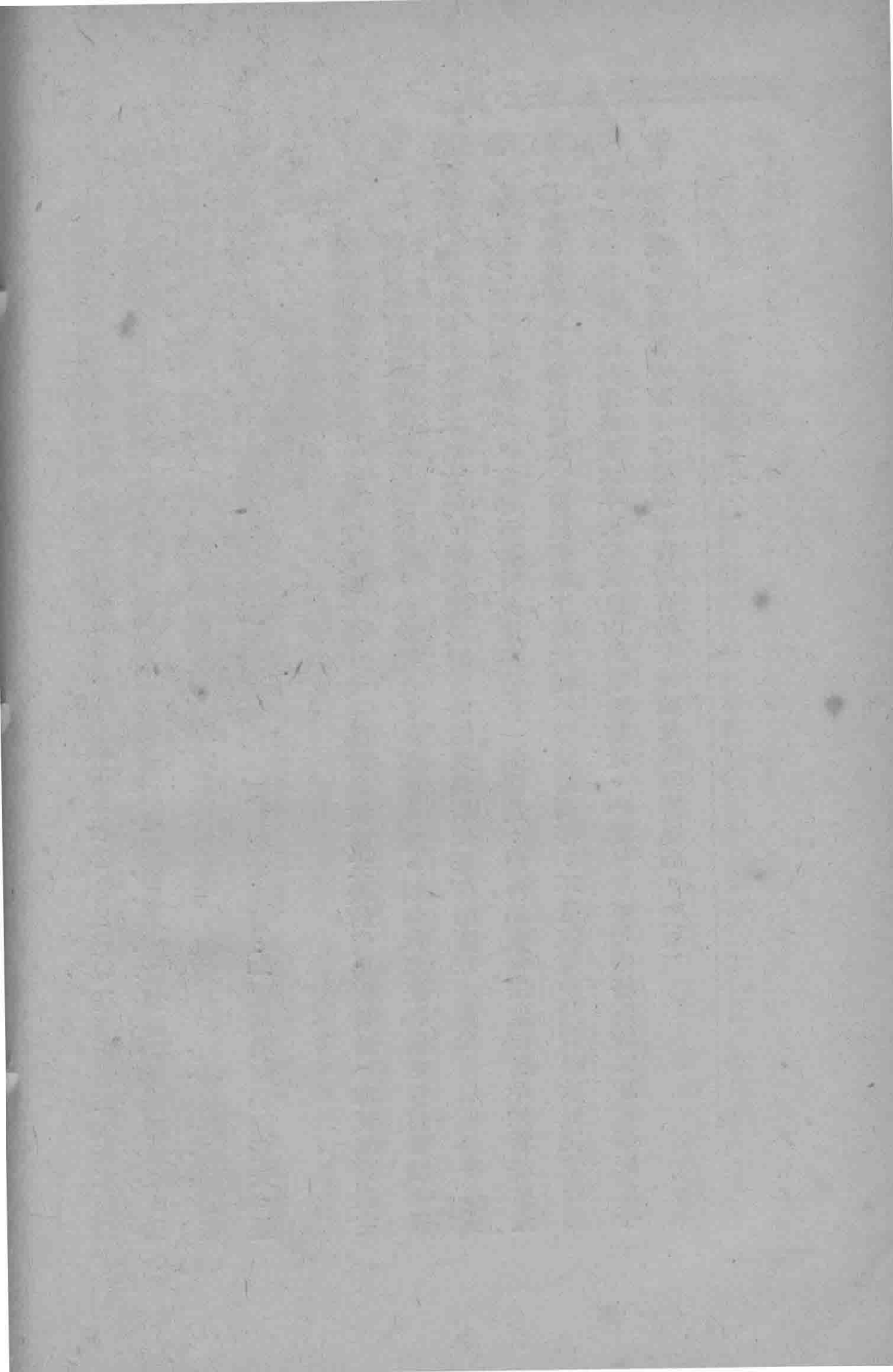
由上述三種因素所組成的價值，斯氏稱之為實在價值，它與商品出賣時所實現的價格不同，因為他說在那個價格中，已有利潤包含在內了。這樣看來，可知斯氏認為利潤是超過實在價值以上的一部分價值，它是在流通界中由於供求底關係而發生的。斯氏底利潤論，這樣看來，是純粹重商主義的理論。但是他也了解，利潤並不在流通中創造出來，而且流通過程也不能創造利潤，可是在流通中可能發生財富由一人底手流入別人底手的現象。斯氏稱這樣的利潤為相對利潤(relative profit)。

(註) 卡爾著：政治經濟學批判 一九三三年俄文版頁九。

足以增進社會財富的利潤，斯氏則稱之為積極利潤 (positive profit)。在斯氏看來，在本國內，一人獲得利潤就等於同時別人失去這麼多的財富；所以國內貿易不能成為國家財富底源泉，只有國外貿易才能成為這樣的源泉，但是要使對外貿易成為財富底源泉，則只有在維持貿易出超的條件之下纔有可能。但是對外貿易出超之成為財富底源泉，原因仍如上述：一國所得即別國所失。這種觀點，又是十足重商主義的。

斯都亞特既然堅定地站在重商主義底立場，並堅持着純重商主義的貿易出超論（即貿易差額主義），他就必得要敵視數量的貨幣論，特別要反對休謨底見解。因為休謨底各國貨幣自動調節說是跟重商的對外貿易政策不兩立的。同時數量的貨幣論又與斯氏底商品實在價值及市場價格底構成論，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斯都亞特首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由商品價格決定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呢，抑由流通中的貨幣數量決定商品價格？斯氏絕不猶疑地回答：不是流通中的貨幣數量決定商品價格，而是相反，商品價格底水平決定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商品底市場價格為需求和競爭底混合作用所決定。這種需求和競爭是與國內所有的金銀數量毫無關係的。』(註)

(註) 卡爾著：政治經濟學批判頁一七八。



### 第三章 重農學派

#### 第一節 十七世紀後半和十八世紀前半的法國

以上所講，都是關於英國經濟思想底發展。現在我們要來探討法國——重農主義底故鄉——底經濟思想了。簡單地說，就是要從重商主義轉移到重農主義底研究上來了。但是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說重農主義是一種民族的現象或法蘭西人底「民族精神」底產物。應當認定：重農主義是一般經濟學說史發展中的一派重要的思想；它是隨着資本主義關係底發展，社會經濟底支配權由商業資本轉移到工業資本手上去的時代底一種經濟思想。

假使說十七世紀的英國是一個走向議會政治的革命時期底國家，那末法國底情形就完全相反：皇帝底政權日益鞏固而變成爲專制主義。路易十四底朝代，便是法國專制主義底最高峯。由於法國經濟發展落後，貴族分子沒有能夠像英國那樣地布爾喬亞化，而工商業資產集團也沒有能夠生長成爲一個獨立的力量。在路易十四時代，大貴族們完全變成了朝廷的權貴，皇帝賜予他們掠奪百

姓之特權，然而在政治上則完全服從君主。高級的權貴，在朝廷中佔據着最尊貴和俸給最高的職位。皇帝之下又有集中的龐大的官僚機關（乃由中等貴族和甚至第三等級的人組成的），皇帝就藉此種官僚機體來統治全國。這樣的政權組織體系自然需要大宗的經費來支持；這便是迫使帝國加強發展工商業的重大原因之一。這種政策把工商業資產集團吸引到政府方面去了。那時的工商業資產集團雖尚未發展到在國家中演獨立政治作用的地步，可是它却已成爲一種強大的經濟力量，所以專制政權要拉住這一力量在自己這方面，這是專制政權存在底必要條件。以最大的堅決精神直線式地實行這種經濟政策的，便是路易十四朝代底財政總長珂爾貝（Colbert, 1619—1683），因此法國的重商主義就有珂爾貝主義底稱號。

珂爾貝主義底重要特點之一，就是輕視農村經濟。不論貴族、僧侶或朝廷御庫，都無不榨取農村經濟，然而對於它，誰也不去關心它。差不多一切賦稅都貨幣化了，可是農產品底價格却人工地被抑制得很低很低。原料和麥品底出口是被禁止的，可是它們底輸入却極自由。其所以然者，一則因爲製造出口物的工業需要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的原料，一則因爲要保證不很安穩的巴黎和皇城（凡爾賽）以必要的糧食。

雖然路易十四宣稱『朕卽國家』（L'état c'est moi），但是爲使要法國和它底各等級變爲他個人



底附庸，他就得爭取對外的勝利，藉以收服人心。所以當時法國專制政府底政綱，第一是要組織一百戰百勝的軍隊，第二要創辦一模範的出口工業。在起初時，兩項政綱都進行得相當順利，可是同時它却又暴露出了各種的內部矛盾。出口工業底發展把商業金融資產集團推上了首要的地位，他們當然決不肯把他們從國外貿易中獲得的利潤不加監督地去供官僚機關無限浪費。這是一點。可是在另一方面，那時所組織的空前的大軍，則需要大宗經費纔能維持其存在。此外，在路易十四朝代，法國又發生過四次勞民喪財的大戰，這種戰爭當然也是需要大量經費的。

於是工商業資產集團和高級貴族與僧侶中間的矛盾就日趨尖銳化了。前者是貨幣資財底社會代表，後者則是貨幣資財底消費者，前者貪於資財底儲積，後者則生活奢侈盡量消費。當矛盾開始暴露之時，專制政府尚力圖使資產集團與權貴集團雙方都得到滿足；對於前者，政府設法為國外貿易創造各種有利的條件；對於後者，則替他們建造富麗華貴的凡爾賽宮。這兩件事底進行，都是靠犧牲毫無民權的被壓迫大眾——特別是農奴大眾——底血汗來實現的。其結果，農村經濟就全部陷於衰頹狀態。賦稅和貢品之外，還要加上繁重的封建賦役，農民實在是無力負擔了。於是他們就成千成萬地脫離了他們底故鄉往外逃亡；他們天天在飢寒和奴役威脅之下，不得已而出此。

路易十四和他底大臣們所創立的制度，是沒有鞏固基礎的。恰恰相反，這種制度促使法國底社

會經濟基礎愈趨動搖了。路易和珂爾貝底繼承人雖圖繼續他們前人底政策，可是結果却一無成就。因此法國的專制政權就加速地急趨崩潰。十七世紀後半在商業政策和十八世紀前半在爭取國外市場的政策上所達到的一些成績，這時都已化爲烏有。帝制的法蘭西已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過去的一切勝利品都已喪失殆盡，所有的殖民地已被它底競敵——英國——奪去。過去對外政策上一個重大的憑藉——軍力，這時也大大地削弱了。在封建制度底狹籠中，資本主義已再無發展底可能；特別是工業，除非形成了國內市場之後，才有繼續發展底希望。但是當時國內市場偏偏沒有。

專制政權和封建制度底崩潰，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也就是表示重商主義底崩潰。於是經濟思想又在找尋新的出路了。在那時的經濟學者底意識中，農村經濟是跟商業和工業對立的。因爲工商業在當時是靠犧牲農村的經濟底利益而發展起來的。經濟學者既察覺過去的政策已行不通，於是就想換一個方向走路，——企圖把農村經濟抬高到第一位，宣佈農村經濟底意義超於商業與工業之上。

但是經濟學者已不再相信政府處置經濟底創造能力，所以他們雖指出農業意義之超過商工業，可是却不能用新的土地保護政策去代替舊的工商業保護政策。他們底思想在開始找尋新的道路。不過這種道路實際上已爲現實本身、生活本身開闢出來了。農民底貧乏和破產過程，同時也就是他們底分化過程：數量不大的富有分子，農村的殷實之戶，逐漸形成起來了。法國農村經濟中的資本主

意開始在封建制度袒護之下發展起來。而且它又進一步地改造封建制度使之適應於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它把封建的土地所有權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這種情勢，迫使經濟學者去尋找農村經濟所當循着發展的新道路，亦即以農村經濟之發展為基礎的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藉農村經濟底發展以發展資本主義。

從封建社會脫胎出布爾喬亞社會來的歷史過程在法國有着好些個特點，這些特點在法國經濟思想底發展上亦有其痕跡。重農主義就是上述世界歷史過程之法國式的反映。這一歷史過程預先決定了重農學派底理論工作，並賦予它以國際的性質。它並不要排斥某種形式底重農主義，而是一般地排斥重農主義本身，排斥重農主義底原則而拿一種新的原則去對抗它。那時法國的經濟思想家（重農主義者）由於重視農村經濟（因為法國當時是個農業國家）的緣故，他們底思想就從流通過程轉移到生產過程中去了。他們不主張從流通中而主張從生產中找出財富底泉源來，——這種立場使得他們把研究底注意力集中到農村經濟上去。

## 第二節 重農主義首創者弗朗梭亞·奎奈

### 一 概說

弗朗梭亞·奎奈 (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 是一個著名的醫生，後被皇帝 ( 路易十五 ) 召入宮中任爲御醫 ( 一七四九年 ) ；數年後又封他爲貴族。奎奈之研究經濟問題，已在晚年時期 ( 主要的是一七五三——一七五六那三年間 ) 。那時社會輿論都集中於經濟問題。假使在過去研究這類問題的往往只是少數的個人，這時却有廣大的社會羣來注意和探討這類問題了。這種社會的空氣，是直接推動奎奈去研究經濟的力量。

在重農學派底建立史中，奎奈跟侯爵米拉波 ( Marquis Mirabeau, 1715—1789 ) 底會見有着決定的作用 ( 註一 ) 。重農派學者們自己也承認這一會見是該學派建立底起點。老米拉波本來是持重商主義見解的。他底結論跟奎奈底結論極端地相反。米拉波底重商主義的論綱是：人口是國家底財富。他說人口底增長是在財富之前。奎奈底論綱却完全相反：財富創造或促進人口底增長。可是奎奈跟米拉波底會見，解決了這一爭論：米拉波被奎奈所說服，從此他就變成顯明的重農主義者了。卡爾關於奎奈戰勝米拉波這回事，有一個簡明的解釋。他說在重農主義的體系中，封建制度採取『布爾喬亞的形相』，而『布爾喬亞社會則採取封建的外貌』。『這種幻覺的外貌，欺騙了那些隸屬於貴族的奎奈底信徒們，首先欺騙了米拉波這個老怪物。』 ( 註二 ) 封建制度之將近崩潰，即特權等

( 註一 ) 這是指老米拉波說的，他是法國大革命初底著名活動人物小米拉波底父親。

級中人亦能感覺得到；他們有許多人已公然走到第三等級方面去了。但是米拉波這個「老怪物」却不能決定走這一步。他至少還需要用「幻覺的外貌」來敷衍一下面子，他需要創造這樣一種幻想，彷彿代封建制度而起的布爾喬亞，只是前者之更新的「再版」而已。他在重農主義中找到了這種「幻覺的外貌」，於是他拼命地抓住它不放手。

布爾喬亞生產關係所採取的這種「幻覺的外貌」，也就是奎奈學說底特徵。不論他底學問如何淵博，他底眼光如何遠大，他畢竟也需要這一封建的外貌。他替資產者罩上了一件封建的外衣，這是他自己所需要的外衣。受皇恩之賜而榮居於貴族之列的奎奈，他底意識形態只能如是而已。

在政治見解方面，奎奈是個開明的帝制派。他主張用自上而下的改良去阻止革命，即主張用開明的君主制所應實行的改良辦法防止革命底發生。起初他希望路易十五採行這類改良政策，後來他發覺路易絕對不是他理想中的「開明君主」了，於是又把自己的希望付託於路易十五底繼承人。但是事實上他這種幻想的希望從未實現過。

講到奎奈底宇宙觀的話，他却是唯物論底顯明的敵人。「自然秩序」是奎奈底重要觀念之一，但是這種「自然秩序」也被奎奈罩上了一件宗教的外衣：它是上帝所創造的。奎奈承認精神和物質

(註二)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一，頁四二。

這兩種實質，二者各自獨立而且沒有相互作用。這兩種實質本身是被動的。它們底運動、作用和相互作用，都是第三種積極的、創造的實質——上帝——所促成的。上帝便是精神和物質底活動底原因。由此就產生兩種認識底形態：（一）基於經驗的認識和（二）基於信仰的認識。前一種認識底對象是物理世界和社會；後一種認識底對象則是上帝，是神鬼世界。

## 二 奎奈底方法

彼梯應用於政治經濟學的自然科學方法，奎奈把它繼續發展起來了。彼梯雖曾應用這種方法，但是他還不能創造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只是到了奎奈手上，這種方法纔大大地發展起來，完成了一個體系。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彼梯和奎奈之間存在着一個經濟思想發展底一大階段，——這種發展是跟經濟本身底發展相適應的。

波阿基爾貝（Boisguillebert, 1646—1714）（註）之主張經濟組織應任其自然發展一點，亦為奎奈所擁護。他以為「自然秩序」對於物理世界和社會是有一樣作用的：兩者都被「自然秩序」所統治。奎奈既是個醫生，所以他把社會看成生物的有機體；他以為社會底生存有兩種狀態：康健的、

（註）波氏是奎奈底前人，亦法國十七、八世紀交替時期之經濟思想家。

常態的和疾病的、非常態的。因此他認為衛生學和治療學一樣地可以適用於社會；前者適用於健康時期或均衡時期底社會，後者則適用於疾病時期，即失去均衡的時期底社會。

然而「自然秩序」底觀念也有它底積極方面的意義。奎奈根據這一觀念去理解經濟生活，他把社會經濟的過程看作具有一定的內部規律性的自然過程。這也就是奎奈底重大功績。但同時他底超歷史的（實質上是反歷史的）觀點迫使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自然的（非社會的、非歷史的）生產方式。他只看見生產過程底自然方面，而完全忽略了它底社會方面。他認為生產過程也只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使用價值底生產過程。

同一方法（即自然秩序觀的方法）迫使奎奈把研究底重心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中去。因為當時流通領域底狀況極不穩固，常常處於市場底自發性（即盲目性或無政府性）控制之下，要考察它底自然秩序非常困難；而奎奈所研究的生產領域，是諸生產領域中跟市場關係最少的一種——農業的生產領域。把研究底重心轉移到生產領域中去，這是奎奈底另一個重大的科學功績。其後整個古典學派在這一點上都是遵照奎奈走的。但是把生產只解作農業的生產，這是法國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反映在方法論上，就表現於奎奈底濃厚的自然主義。在奎奈看來，生產就是物質底生長，即農村經濟中的物質底生長。

以農村經濟為研究重心，事實上始於波阿基爾貝，但是後者還缺少方法論的原則（方法論底體系）。只有奎奈纔建立了這樣的原則。波氏和奎奈雖具同一階級立場，但是波氏在理論上還沒有能夠充分地表達出他底階級的實踐的動機來，還沒有能夠把後者表達於一般的總原則（universal principle）。奎奈纔給了這樣一種總的原則——奎奈底自然秩序論。它把奎奈底一切經濟觀點聯結成爲一個統一的體系了。根據這樣的自然秩序觀的研究開拓出來的法則，是一般的普遍適用的法則，——它適用於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都哥（Turgot, 1727—1781）——法國的另一重農主義者——這點思想表達得最爲明顯。都哥雖非奎奈底正統信徒，但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却與奎奈完全持同一立場。都哥說過：『誰要是不忘記存在着互相分立的和方式不同地組織着的各個政治國家的話，他就永遠不會好好地解釋政治經濟學底任何問題。』（註）

自然秩序在奎奈底「經濟表式」(Tableau économique)中表現得極爲明顯，而這一表式底方法論上的意義，也就在此。奎奈常用「明顯性」一詞相標榜，而這種「明顯性」只有靠那個「經濟表式」纔能獲得。「經濟表式」使下列各點成爲「明顯」：（一）農業生產品分配於社會全體，（二）這種分配底發生是自然的和自由的，（三）一切經濟部門和一切人民集團互相聯繫而形成一個整體，



(四) 農業是一切基礎基礎（這是重農主義最重要的一點），因為只有它是生產純生產產品的。

這一「經濟表式」縱然只隨作者底意願證實了一些他所要證實的事實，可是它底方法的意義確是很大，因為這一「表式」是把社會全部生產和流通看作整體的第一次嘗試。奎奈對於個別的交易行為不從它們本身上去觀察。不從它們底現象表面上去觀察（從表面上看，它們是零散的、混亂的），而從社會再生產底觀點去觀察它們。因此，奎奈所注意的不是農業家們或工業家們所做的買賣，而是把農業和工業互相維繫起來的那些交換行為，因為只有這樣，農業和工業領域內的再生產才會實現。

其次，奎奈等重農主義者還指出了再生產跟一定的社會階級組織的關係，這當然也對的。他們對於社會底階級組織（結構）雖無正確的認識，但是他們把再生產跟一定的社會階級關係聯繫起來，這在方法論上講是正確的。在再生產底分析中，他們把土地所有者和別的階級間的流通（交換）關係底分析也包括在內。因此，再生產底分析就具有資本主義再生產分析之性質。從外表上看，重農學說彷彿帶着封建的色彩，但是這不會改變事情底本質的。卡爾曾說，奎奈和他底信徒們喜歡掛上一塊封建的招牌……然而實際上重農學派底體系（學說）可說是第一次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有系統的觀察（參閱資本論卷二，頁二五六）。

重農主義者所說的「自然」的（“Natural”）這一概念，具有兩重的意義：（一）它跟那受人底意志和願欲支配的「主觀」的（“Subjective”）相對抗；（二）它同時又被當作某種永遠如此的事物去跟「歷史」的（“Historical”）相對抗。前一點是對的：因為經濟的範疇和經濟的法則都是客觀的、物質的。後一點却是錯誤的：因為經濟的範疇和經濟的法則同時也是歷史的範疇和歷史的法則。它們被生產方式所規定，又隨着生產方式之消滅而消滅。但是重農主義者未曾達到這步的理法，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理解到這一步。不過他們却建立了一點功績：他們從政治經濟學中驅除了主觀主義，驅除了彷彿以為經濟發展決定於人底意志、意識或「理性」似的那種觀點。

### 三 奎奈底經濟學說

講過了奎奈和他底信徒們底方法觀點之後，我們就要討論到奎奈底經濟學說本身了。奎奈學說底中心點是他底「純生產品」論。財富底問題——財富如何生產被誰生產與何處生產的問題——在奎奈底這個理論中有着解答。他根據這個理論，試圖對資本、剩餘價值（事實上的）、生產的和生產的勞動、社會中每一人羣底作用（社會底階級結構）等等，一一給予分析。

首先奎奈劃分以下兩種現象底區別：（一）財富底倍增（multiplication），它底增長；（二）

財富底總和 (addition)。他認為前者發生於農業，後者則發生於其他的生產部門。在農業中增長着物質本身，用經濟學上的名詞來說，即發生使用價值增長底現象。在其餘的經濟部門中則只發現已存物質諸元素之總和，而幾種不同的使用價值總合起來就形成新的使用價值；不過它們底體積不但不見增加，反而往往縮小或減少（如原料之改製為工業品或半工業品）。農業和其他經濟部門間的區別就由於自然本身在農業中工作着，因而表現出「創造力」來，但在其餘的經濟部門中，在全部製造業中，自然都不參加工作的；至於在商業中，那是更不用說了。

超出已消費的生產品之上的那部分新創造的生產品，就是純生產品 (product net)。但是怎樣計算這「純生產品」呢？這實在是一件再難沒有的事。固然收穫的麥子要比播種的麥子多些，但是種子以外還有別項消費怎麼計算呢？不錯，可以把其他各項消費都用一定量的麥子來計算，事實上人們的確常常這樣做的。然而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因為要把其他各項消費等於一定量的麥子，那末必須把這些消費首先化為跟麥子可以等同的共同物。這個共同物是什麼呢？奎奈不但沒有解答這個問題，而且連提也不會提出來。

但在奎奈看來，困難是一點也沒有的，因為他認為物品底交換價值是和它們底使用價值一樣地自然的 (natural)。因此，在他底觀念中，生產品和商品是等同的。新生產的生產品和它底生產上

的消費從最初起就採取價值表現底方式；而純生產品也從最初起（意即當它以自然物出現時）取價值表現底方式。

這樣，所謂純生產品變成新創造的商品價值超過生產成本的那部分餘額了。這裏就存在着奎奈底一點功績：他把價值和剩餘價值從流通底範疇（重商主義者是這樣看法的）轉變為生產底範疇。然而他既未將價值化為勞動，亦未將剩餘價值化為剩餘勞動。在價值論上，奎奈實比彼梯落後得多。他底價值論實際上只是生產成本論。不過他所說的「純生產品」（自始就採取價值的形式），他認定是從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奎奈雖然持着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自然創造新的事物，勞動僅僅結合和改變已創造出的事物底形式；可是這更足以證明奎奈所認為跟使用價值不可分離的價值，只是生產底產物。他雖未將價值化為勞動，但在他底解釋中明明指出價值與生產相聯繫，價值產生於生產中。同時剩餘價值也跟生產相關連，亦即產生於生產中，不過他沒有明白地說出「剩餘價值」這個概念罷了。卡爾寫道：『重農學者把剩餘價值底發生問題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直接生產領域中去，這樣他們就替資本主義生產底分析奠定了基礎。』（註）初初一看，卡爾這句話似乎很成問題：重農學者所說的「純生產品」，既被解釋成自然底產

物，試問怎麼談得到什麼資本主義生產底分析呢？但是仔細考察之下，我們知道重農主義者所說的「純生產品」，實際上不是別的，它只是生產品價值超過生產品成本以上之餘額而已。所以假使生產成本是一定的量，那末純生產品也當然是一定的量。但是在農業中，生產成本主要地乃由種子與工作者底生活資料組合而成，因此純生產品要看「工資」底大小來決定：前者之一定的高度須視後者之一定的高度為定。奎奈視工資為一定的量，——將它看成工作者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

這樣說來，純生產品並不是自然底「純」生產品，而是依靠着工資的：工資提高，純生產品就減少；反之，工資減少則純生產品就增加。奎奈尚未具有李嘉圖式的利潤與工資對立底見解。在他底觀念中，純生產品和工資都是發生於自然過程的。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奎奈明確地指出純生產品祇發生於所謂大農業（“grande Culture”）而不發生於小農業（“petite Culture”）；換句話說，它祇發生於有雇用勞動的農業經營中。

這樣看來，說「重農學者替資本主義生產底分析奠定基礎」這句話實在是沒有錯的。

現在讓我們來說一說奎奈對於資本的看法吧。奎奈由純生產品底分析而分析到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底分析又促使他去劃分資本底各個組成部分。他劃分資本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常年的支出」，另一部分則為「基源的支出」（即創始時一次支出而能支持多年者）。奎奈說：『常年的支

出乃每年消費在耕作的勞動上的費用，這種費用應與「基源支出」相區別，後者乃由土地經濟組織基金所構成。」（註）每年的支出一一次即全部歸入生產底消費，基源支出則局部地變為生產底消費。

重農學者觀念中還缺乏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兩個概念；在重農學者之資本底劃分上，也反映着他們底狹窄的生產觀。因為他們所了解的生產祇是農業生產，而農業生產是一年一度的（法國和大多數國家的情形如此），所以一年迴轉一次的資本——流動資本——就常常是每年的支出了。跟這部分資本對立的另一部分資本，要在很多年時期中才完成它底全部迴轉，那就是所謂基源的支出（亦即吾人所說的固定資本）。

不論在重農學者底一般經濟學說上，或在他們底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底理論上，都表現着他們眼光底狹窄，他們還沒有除去封建的外膜。但在這狹窄的眼光底範圍內，重農學者却正確地下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底界說；他們又正確地把它們歸入生產資本之列而不把它們劃入流通界的資本中去。這便是重農學說對於政治經濟學的又一貢獻。

再則，在奎奈看來，貨幣既非流動資本又非固定資本。這也是對的。因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兩個範疇都是屬於生產資本的。在這一點上，亞丹·斯密倒反不如奎奈：斯密氏把流動資本跟流

通資本混爲一談了。不過奎奈雖正確地把貨幣排除於流動與固定資本兩個範疇之外，他却完全不了解貨幣可以成爲資本底形式——資本底貨幣形式。這是由兩種原因來促成的。第一，在奎奈底觀念中，資本祇是事物、物質；流動資本乃由種子、耕作者底食料和其他生活必需資料所構成，固定資本則由勞動工具所構成。這樣的了解資本和它底組成部分，貨幣當然不能成爲資本底形式了，因爲依照這樣的了解，資本只有事物的形式，也只有事物的內容。第二，——這也是第一原因底基礎，——奎奈既視交換價值爲自然的，跟使用價值分不開的東西，那末他就一般地不能了解貨幣底本性。他不能不一方面視貨幣爲流通工具，另一方面又把貨幣當作爲商品流轉所必需的符號品看。

奎奈把『 $\text{M} - \text{C} - \text{M}$ 』解釋成『 $\text{M} - \text{M}$ 』，所以他底論綱說：『一切出賣同時都是購買』。當然，在化『 $\text{M} - \text{C} - \text{M}$ 』爲『 $\text{M} - \text{M}$ 』，亦即在不了解貨幣作用的情形之下（貨幣使一個商品底出賣跟另一商品底購買相分離），一切出賣實際上也就是購買。

事實上奎奈把資本只了解爲生產資本，就是說，只了解爲它底形式之一。然而重農主義的錯誤的資本觀却比重商主義的錯誤的資本觀有意義些，重商主義者也把資本跟它底形式之一等同起來，認定只有貨幣形式的資本是資本。然而資本底貨幣形式是資本底生產形式底產物。貨幣只有在資本循環中才被利用作爲資本，可是在資本循環中，有決定意義的階段仍是生產。由此看來，奎奈之只

視生產資本爲資本，實抓住了資本之決定的基本形式，而重商主義者所抓住的却只是被決定的枝葉的形式。

奎奈既將資本簡化爲生產資本，他當然不能了解，並且事實上也沒有了解商業資本。在他底觀念中，商業資本是無果實的東西，而商業利潤僅僅是壟斷底結果；他認爲兩者都是表現自然秩序底破壞。奎奈底根本觀點既是只有農業生產是真實的生產，那末他就應該得出結論來說：工業資本也是「無果實的」資本，因而工業利潤也只是產業家勞動之報酬了。其次，他所說的資本，——常年支出和基源支出，——也只指農業而言。這裏充分地表現着奎奈底「純生產品」論底重農傾向。

要附帶地指出，奎奈既然那麼厲害地反對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斥商業資本爲「無果實的」，那末按照邏輯的路綫來說，他就應該同時更猛烈地反對借貸資本（放款資本），至少應該宣佈借貸資本也是「無果實的」，借貸利息是「不合法」的。然而他並不如此觀察。他甚至於跟那些認低利率爲國家福利之標徵的作者們爭論。照他底意見，應以高利率爲國家福利之標徵。這無疑地是奎奈理論體系中的矛盾之一（關於這些矛盾，當另節詳述）。從社會政治的根源上講，因爲利息是實現貨幣私有的經濟形式，它跟地租之爲實現土地私有權的經濟形式之理相同；既然這樣，那末就不能承認一種私有權底形式而否認其他一種。現代的資產者羣，由於同樣的原因而始終不敢實行土地



國有底政策，雖然土地私有權阻礙着資本主義底發展。

奎奈縱然對貨幣取仇視態度，特別是對大財主（貨幣資財所有者）取仇視態度，可是他始終不能（同時也不敢）否認貨幣所有權合法性。他之認高利率較低利率為優，因為他知道低利率是社會內貨幣資財多底標徵，而高利率則是貨幣缺乏底標徵。而貨幣資財多，在奎奈看來是一件壞事，——這是跟他底基本立場相適合的。

最後，我們要講一講闡明奎奈之經濟學說的那個「經濟表式」。經濟表式之方法論的意義，前面已經說過，此處無需再述；現在要解釋的是奎奈如何在他底「經濟表式」上闡述他底學說。卡爾曾估計該表之真實意義如下：『無數個別的流通行為，自始即被視為特種的社會的羣衆運動——具有各異的經濟職能的諸大社會階級間的流通。』（“The innumerable individual acts of circulation are at once viewed in their characteristic social mass movement——the circulation between great social classes distinguished by their economic functions”）（註）這就是說，許許多多個人之間所發生的無數次的賣買行為，在奎奈底「經濟表式」中被視為諸階級間社會生產品底流通。這裏就存在着這一表式之重大的理論意義：（一）個別的交流行為被視為『特種的社會的羣衆

（註）資本論卷二，第十九章。

運動』；（二）許許多多的個人被視爲『有各異的經濟職能的社會階級』。這樣，「經濟表式」指示吾人以全部社會資本底再生產和流通，它是整個社會資本總循環底第一次設想。

「經濟表式」有以下三個前提：（一）價格不變（因「經濟表式」所設想的是「自然秩序」，是常常相等的交換）；（二）單純再生產；（三）抽去國外市場。所有這三個前提，都是奎奈極大的科學思維上的貢獻。在我們對現代經濟作理論的檢討時，我們必須把市場價格脫離自然價格（註）的一切特殊情形抽去不管，因爲這些特殊情形不能改變事情底本質，它只能使事情（因而亦即使我們底研究）複雜化。其次，奎奈集中注意於單純再生產，這也是對的，因爲問題底重心正是在單純再生產上面。固然，依照他底見解，他不能給一擴大再生產底分析，因爲他所說的全部「純生產品」均爲土地所有者所收取了。然而奎奈以單純再生產爲前提來解決社會總資本之再生產與流通底問題，——這點意義並未因他底不能分析擴大再生產而減少。

此外，奎奈還有一點重大的貢獻，就是在他底研究過程中抽去了國外市場底條件，這也因爲國外市場或對外貿易對於社會資本總循環底分析是不能改變其本質的。奎奈抽去國外貿易的動機，大概是爲要駁斥重商主義者底觀點；他要藉此指示給重商主義者（因爲重商主義者過分重視對外貿易

（註）固然奎奈並沒有正確的價值論，因而也就是沒有正確的自然價值格論，然而他却具有價值這一概念本身。

底意義)看：沒有對外貿易，社會資本底再生產和流通也是很好地進行着的。

奎奈在其「經濟表式」中認為循環底開始就是收割底終了，收穫底完竟；這就是說，他把商品資本底循環(圖1——圖2)當作社會資本循環底基礎。下面就是奎奈底例證(illustration)。

一年的農產品之價值等於五十億利佛爾(重農時代法國底貨幣單位)，其中四十億為糧食，十億為原料。這一大堆商品是靠二十億利佛爾(現錢)之助而得流通。這二十億利佛爾的貨幣也是農業家所有的。可是每年收穫的農產品底價值，乃由以下三部分所構成：(一)二十億的流動資本(「常年支出」)底價值；(二)十億是固定資本(「基源支出」)底消耗部分底價值；(三)二十億為剩餘生產品(「純生產品」)之價值。但是除此以外，「不生產的」部門中還有值二十億利佛爾的製造品。

在流通開始以前，土地所有者手中已握有二十億利佛爾的貨幣，這些貨幣是土地所有者從農作者那裏收來的地租。流通本身，由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二者所構成的流通本身，可劃分為五次行為：(一)土地所有者從農作者(或農業家)那裏購買糧食十億利佛爾，這樣就完成了貨幣之由地主到農業家的運動及商品之由農業家到地主的運動；(二)地主(即土地所有者)從工業家那裏購買值十億利佛爾的製造品，這樣貨幣就由地主跳到工業家手上，而商品則由工業家轉移到地主手

上；（三）工業家以其售貨所得之十億向農作者購進糧食，這樣上次由地主跳到工業家手上的十億，現在又由工業家跳到農作者那裏去了；同時商品則由農作家轉移到工業家；（四）農作者又從工業家那裏購買值十億利佛爾的工業品——農具和其他勞動工具；這樣貨幣就由農作者又回到工業家手裏，商品則由工業家轉入農作者之手；（五）工業家又用這十億向農作者購買原料，於是貨幣又由工業家流回農作者，商品乃由農作者流入工業家之手。

以上五次交換行爲底結果是：（一）土地私有者獲得了他所「應得」的剩餘生產品；雖然這些剩餘生產品底一部分是工業品，可是它們是用農作者底貨幣來購買的；而這些農作者則因出賣他們底糧食而從工業家那裏取回了那些貨幣；因此，地主所得到的一部分取工業品形式的剩餘生產品，仍然等於農業中所生產的糧食品底等量；（二）工業家用他自己的製造品來交換糧食和原料，這樣他才能重新開始他底生產；這就是說，流通保證了生產底連續；（三）農作者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勞動工具，而值二十億利佛爾的糧食仍留在他們手上，它們並未參加於流通中；他們能夠更新再生產過程；除此以外，他們又取回了二十億利佛爾的貨幣，後者又得付給地主作爲地租，——這樣，一切就又要重新開始了。

## 第二節 重農學派底主要人物

奎奈及其信徒們所形成的學派，跟通常的學派有些不同；普通所謂「學派」往往只是研究和主張某種學說的學派，它們只限於理論的任務，而重農學派則除理論任務外還擔負起了實踐的任務：改變固有政策以期實現自己的理想。從這一點上講，重農學派實在有點近於一個政黨。至少應當說，重農學派是一個有團結的政治小組——它有正常的組織，徵求會員，建立各組之聯系（特別在高級組織間），藉以共同作改變國家政策之活動。重農學派底組織又竭力設法使自己的會員在政府中佔據重要的位置，藉此以造成依自己理想改變全部國策之根基。

重農學派底歷史，可以分爲下列三個時期：（一）從一七五八到一七六七；（二）從一七六七到一七七四；（三）從一七七四到一七七六。一七五八年著名的「經濟表式」出世後，奎奈底周圍就開始集合着一部分的作家，他們從事研討奎奈底思想，宣傳並整理他底思想。一七六七年奎奈底學說得到了更完滿而有系統的解釋，這就表現於杜邦（Dupont de Nemours, 1739—1817）底一部著作，該著作係一論文集，題名爲重農學說或最有益於人種的自然的政府制度（“Physiocratie”）。

或 Constitution naturelle du gouvernement le plus avantageux au genre humain”。重農學

派之定名即得自那部書底名稱。從這時起，該學派就開始形成一政治的學派以進行它底活動了，在一七六七到一七七四年間，該學派底影響已極爲普遍，並且已得到了某些實際的效果。然而它底最大的成就却在一七七四至一七七六年間。在那幾年中，都哥 (Turgeot) ——奎奈信徒中最出名的一個——在路易十六朝中任爲財政大臣。都哥利用他自己的權位，竭力實現重農主義的理想。從一七七六年都哥倒了以後，重農學派和全部重農主義的學說就開始潰解了。固然，在革命底頭幾年重農學派底某些理想確曾實現過，可是隨着革命底繼續發展，重農主義却被人拋棄而終於完全被人忘記了。

重農學派中有好些著名的大作家，這些大作家不僅抵抗敵派底攻擊，而且自己還對敵派進攻。現在我們要把重農學派中幾位最聞名的代表提出來簡單地分別介紹一下。

第一位重農派代表，便是我們前面談到過的老米拉波。老米拉波不祇是奎奈底信徒而且跟奎奈還有極密切的友誼。他是重農學派底靈魂，是它底主要組織者。從這點意思上講，他也可以算是重農學派底主腦，而奎奈則爲重農學派之理論的和思想的首領。米拉波是重農主義之「封建外貌」之活的象徵。米拉波底出身和地位都是貴族，所以他不但不能單獨創建一個進步的理論體系，而且連奎奈體系中之資本主義的本質，他都完全不予接受。

奎奈袒護大農經濟，即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他認為小農經濟是不生產的。從資本主義的眼光來看，這是完全對的，因為在小生產的農民經濟中根本沒有剩餘價值這件東西（按照奎奈底術語即沒有「純生產品」）。米拉波却維護小農經濟，因為後者是封建時代之普遍流行的經濟體系，同時它又和米氏底族長制的幻想相適合的。

重農學派底第二位著名的人物是杜邦。他是該學派之重要的政論家和新聞記者；他出版過重農學派底許多重要的作品和文件。杜氏曾主編政府所創辦（一七六五年創辦）的農商金融雜誌。參加雜誌工作的，雖有非正統重農學派的人（如古爾奈 [Gournay] 這一派人），可是編輯底主導權却在奎奈派手裏。杜邦曾撰文於該雜誌，對奎奈底「經濟表式」作詳盡的闡述；那篇文章曾引起了熱烈的辯論。工商業資產階級底代言人竭力反對「經濟表式」確定工商業者為「沒出息的」（或「不生產的」）階級，——「無果實的階級」（“*Classe sterile*”）。雖經奎奈本人出來申辯，說「沒出息」或「無果實」這個字眼絕無絲毫侮蔑工商業者之用意，這個術語僅僅表明一點事實：商業和工業是不會生產「純生產品」的；可是工商業資產集團底社會本能（階級的）却不能被幾句安慰的言語所消彌，他們十分明瞭：關於工商業「不生產果實」這一個論綱，明明是在向他們進攻。問題底重要性不在於侮蔑不侮蔑，而在於這種新學說追求着一種新的方針，袒護農村資產者利益的新方

針。這顯然是不利於工商業資產者的。

由於該雜誌上的辯論愈來愈烈，後來連政府中人也牽涉在內，結果杜邦終於被迫辭去主編之職，這是一七六六年的事情。但翌年重農學派自己創辦了一個雜誌，定名為「蜉蝣」(Ephémérides)，仍由杜邦主編。在這個雜誌中，他們大事宣傳本派的學說和主張，並根據自己的觀點來討論各種實際的政治問題。這種宣傳方式，大大地推廣了重農學派底影響，使它成爲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力量了。同時以這個雜誌爲中心，重農學派跟一切敵對派別做了不屈不撓的劇烈的鬥爭。在這種宣傳學說和進行思想鬥爭底工作中，杜邦底功勞是最大的。

重農學派底第三位代表是邁爾西愛·利維埃(Mercier de la Rivière, 1720—1793)。利維埃是奎奈底思想底整理者和通俗化者。他底自然秩序與政治聯盟之本質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一書，於一六六七年問世。利維埃在這部書中，給奎奈底學說以充分完滿而有系統的說明。

在政治主張上，利維埃是專制政體底擁護者。照他底意見，人生來就得參加社會生活，因而他生來也就必須在專制主義之下過活。他認爲專制主義(或專制政制)是「自然秩序」底產物，是順應自然法則的。由此亦可見重農學派保守性之一斑了。



最後一位重要的重農主義者是勒特羅斯納 (Le Trosne, 1718—1780)，他是奎奈信徒中一個最大的理論家。他因跟反重農派的思想家康帝拉克 (Condillac, 1715—1780) 做激烈的論戰而聞名。康帝拉克本來也是重農學派研究班裏的聽講生，可是到一七七六年他突然刊了一部大著，定名為商業與政府之相互關係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Considerés relativement l'un à l'autre")；在那部大著中，他對重農主義底二大基本論綱給了周密的批判。這二大論綱是：(一)關於交換底相等性的論綱，(二)關於祇農業有生產性的論綱。康帝拉克拿他底主觀價值論做出發點，說交換永遠是不相等的。他底結論是這樣：『說商品底交換是相等的兩個價值底互相交換，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相反的，兩件商品交換時，常常是一件商品以較少的價值去跟另一件價值較大的交換……但是實際上則雙方都得到——至少是應當得到——利益。何以如此呢？因為事物底價值只是它們對於我人需要的關係而已。一件事物底價值往往對於這種人大些而對於那種人則小些；另一事物底價值對於這種人小些，對於後一種人則大些。』(註)

關於第二點論綱底駁論，康氏底見解確要比重農派深入得多。他同意土地是財富底泉源，但他認為沒有勞動這種財富即無從獲得。所以勞動也是生產的，而既然勞動在農業中有生產性，勞動是

(註)轉錄資本論卷一，第四章，第二節。

居於第一位的。

康帝拉克底主要論敵便是重農派的大理論家勒特羅斯納。他對康氏進行猛烈的反攻。康氏把發達的商品經濟看成只出賣多餘生產品（即生產者自己消費之後所餘下來的一部分生產品）的那種經濟。勒特羅斯納正確地指斥康氏之不了解商品經濟底本性；他說，『在完全發達的（意即在商品資本主義的）社會內，一般地沒有多餘生產品的』（註）。連帶地他又立即駁斥康氏底另一重要論綱：工商業也有生產性的論綱。勒特羅斯納說：『假使交換的雙方都得到超過他們所給的同等餘額的話，那末他倆所得俱是一樣』（註）。由此看來，利潤是沒有的，那末工商業當然是不生產的了。

關於價值和利潤的問題，勒特羅斯納在某一點上是正確的，就是他確定兩者都不能發生於不同的使用價值底交換。然而他底正確點亦祇此而已。他跟他底先生（奎奈）一樣，始終不能給一個正確的價值論，而對於工商業利潤則一味予以否認，斥它為不合法的現象。這樣，重農派也就不能解釋農業中的勞動底作用：因為既然一切都只是自然底產物，只是自然底創造力和它增加物質的能力，那末農業中的勞動也變成不生產的了。照這樣說來，農作者這個階級，也跟其他的社會階級一

（註一）同上。

（註二）同上。

樣地是不生產的階級了。

最後，還得附帶地把重農學派底另一個重要的敵人，加里亞尼(Galiani)提出來說一說。加氏於一七五〇年刊行論鑄幣一書，在該書中，作者描述着一個工業國家底狀況而與奎奈底農業國家底理想相對抗。加里亞尼把工業資產階級底作用放在第一位，而奎奈則認定農村資產階級應在社會中居首屈一指的地位。一七七〇年他又發表一篇著名的論文關於糧食商業的談話(“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尖銳地諷刺着重農學派並批判了政府容許糧食輸出的法令。加里亞尼底論綱是：『既是相等，即無利益。』他跟康帝拉克底觀點相似，跟重農學派底「交換底相等性」底論綱相對抗的。

#### 第四節 都哥底經濟學說

都哥(Turgot, 1727—1781)在基本觀點上固然是個重農主義者，但是我們却有把他單獨提出來介紹的必要。爲什麼呢？第一，因爲都哥並不是重農學派（指他們底組織而言）裏面的人，他在基本見解上雖跟奎奈差不多，但他並非奎奈底純正的信徒，他差不多絕對沒有參加重農學派團體底工作。都哥底思想和學說是自己獨創的。講到個人關係的話，他跟米拉波所領導的重農學團底反對

者集團的友誼關係反而比較接近些。第二，都哥比其他任何重農學派底人物，特別是比那些貴族出身的重農派人物，都要少存些對於重農學說封建外貌的幻想。由於這個緣故，所以都哥底思想實比奎奈爲進步，他改進了奎奈底學說，並將重農學說發展到較高的階段。這也就是我們所以把都哥單獨提出來介紹的根據。

卡爾說：『都哥底學說，我們認定是重農學說之最發展的形態。』無疑的，奎奈學說底眞精神是封建貴族的重農派人物（如老米拉波等人）所不理解和不會理解的。他們只重視奎奈底學說體系之封建的外貌，而這一體系之實質却從來沒有被他們領悟過。然而都哥却完全相反。都哥底功勞正在於他從這種學說底封建外表之下，大大地揭露和發揚（但尙未全部揭露）了它底資本主義的實質、布爾喬亞的精神。

都哥底出發點跟奎奈的一樣，也是所謂「自然秩序」的觀點。但他底「自然秩序」觀却亦有和奎奈底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底觀點比較少受神幻之外表底影響。都哥底「自然秩序論」比較得更「透明」些、更布爾喬亞化些。唯其如此，所以他可能做出比奎奈更急進的結論來，並更澈底地在全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這一基本原則。都哥直接了當地、不加絲毫掩飾地把自然秩序解釋爲建立在個人的自動性、個人的自利性和自由競爭之上的一種秩序。他極不猶豫地着重指明：一切跟這些

原則相衝突的社會制度，都是誤入歧途的制度。在他研究個別的現象時，他所着眼的不是它們底歷史而是它們所遵循的法則，亦即所謂「自然的秩序」。

都哥並不像米拉波、奎奈等重農派貴族那樣，把資本主義關係硬解作封建制度底「新版」，以保全封建統治底子；唯其如此，所以他對於布爾喬亞社會底階級結構，了解得更透澈些。假如奎奈把當時的社會劃分為三個階級，——農業家、封建貴族與僧侶和從事其他經濟部門的工作者（主要的是工商業者和勞動者），那末都哥却看出除這三階級外還有資本家和工人二階級。他並且把自由競爭底原則應用到工人和產業家中間的關係上去，因而他能給一個較好的工資法則底解釋。他不限於確定工資為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而且還要說明這一最低限度是如何確定下來的。都哥寫道：

「在大批的勞動者當中，產業家可以選定一些願意接受最低價格（即工錢——沈）而工作的人來替他做工。於是勞動者們就要互相競爭以降低他們底勞動代價。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在一切勞動部門中就應規定、而且實際上也已經規定下了一種制度，即勞動者底工資只限於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註）這樣，都哥根據他底自由競爭底原則，把工資如何變成最低限度生活的過程揭露出來了。

（註）都哥著：關於財富之創造與分配之考察（"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其次，都哥關於「何謂雇用工人？」底問題，也給了一個確當的界說。他在同書中寫道：「一個單純的勞動者，他祇有自己的一雙手和手藝業，假如他能達到出賣他自己的勞力的話，那末他所有的即祇此而已。」在該書底另一處所，他又解釋到這些「祇有自己的一雙手和手藝業」的人們從何而來這一點。他說：「許多人不能再保持他們底土地所有權，除了將自己的勞力供給別人使用而做一個不生產的階級藉以換取土地所有者底多餘生產品以外，便沒有別的出路。」（註）照這樣看來，雇用勞動發生底條件是生產者與土地——這個最重要的生產手段——相分離這一事實。所可惜的是，都哥對於這一正確的立場給了不正確的解釋，這還是他底重農主義的觀點使然的。照他底意見，土地並不是重要的生產手段而是唯一的財富泉源，因此，在都氏看來，真正的資本家只是領有這種財富泉源的人——土地所有者。別的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僅僅就他們得能從土地所有者手上掠取一部分「純生產品」那點意思來講的。

對於布爾亞喬諸關係的分析，都哥很正確地從它們底發生上去開始研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了解這些關係。可是都哥本人底布爾喬亞眼光（而且是重農主義式的布爾喬亞眼光）不允許他正確地理解布爾喬亞社會發生底歷史過程。第一，在他看來布爾喬亞諸關係底發生是跟一般的社

（註）都哥著：書同上。

會諸關係之發生同時的；換句話說，社會諸關係底發生，一開始就是布爾喬亞諸關係。第二，他解釋造成這些關係的條件是：（一）不同的土地出產不同的生產品，因而亦即出產不同的純生產品；（二）整個地講，土地是有限制的，因為這樣，所以它只能被一部分人佔為私產。由於前一點，他得出了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的結論；由於後一點，他又演繹出了生產品與勞動相交換的結論。

都哥描述此種過程如下：最初，人們散居在地面上，各人佔有土地一方；他們同時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土地耕作者。凡佔有土地而在土地上耕作者，得享受全部純生產品。然而因為前面已經確定，不同的土地上出產不同的生產品，所以生產品與生產品之間，就必須進行交換。這便是過程底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我們只看見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的現象。

第二個階段乃開始於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之分工。這二部分人中間的交換乃是勞動與生產品底交換了：非農業者供給勞動，農業者則供給生產品；前者是靠後者底薪俸來過活的。換句話說，都哥把非農業人口看成被農業人口僱用着做工的人了。

過程底第三個階段是開始於土地佔有與土地使用底分離，由於這一分離，土地耕作者，就不能不將自己的土地生產品底一部分，分給土地所有人了。可是現在連土地耕作者（或農作者）所獲得

的，也不比其他經濟部門中的工作者多得些，因為土地佔有者把必需生活資料以上的全部剩餘品都估爲已有了。

爲什麼人口分成了農業的和非農業的兩部分；爲什麼農業人口又分成爲農作者和土地佔有者兩部分？這當中交換底發展是否盡了某種作用？對於這些問題都哥雖然企圖予以解答，可是他始終沒有給一個確當而明白的答案。他舉出了許多的原因，其中有如一部分人節儉而勤奮，另一部分人則浪費而怠惰；同時又提到借貸關係，認爲由於借貸的結果，土地乃由借款人讓渡給放款人了。

但是實際上這些都不是原因，關於這些我們用不着去討論它。比較重要而值得探討的是另一問題。都哥正確地解答了「什麼是僱用勞動者？」這一問題，可是由於他底重農主義的布爾喬亞社會關係發生觀底阻梗，使他不能堅持這一正確的解說到底。他下了「僱用勞動者」之正確的定義以後，接着把「僱用勞動者」這一範疇看成無邊際的東西了。他把全部非農業人口和一切農作者都看成僱用勞動者；因此只有土地所有者一種人是資本家了。照這樣說來，社會全體理應分爲兩個階級：資本家（即土地所有者）和僱用勞動者；然而都哥却仍持奎奈底見解，把社會劃分爲三個階級：真正的僱用勞動者，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這便是都哥觀念模糊和思想矛盾的證據。

雖然他犯了這種觀念模糊的弊病，可是在基本上他畢竟還給了一個正確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底



理解。都哥一分鐘也未曾忘記僱用勞動是生產者跟生產手段脫離的結果；而土地既為最重要的生產手段，所以他把注意集中在它上面。這是他底第一個優點。第二他認定只有生產純生產品的那種工人（意即替別個階級生產剩餘生產品的工人）才是生產者。純生產品論是奎奈所倡導的理論；可是純生產品底階級本質，却到了都哥底手上才被大大地揭露出來。

都哥關於土地耕作人和土地所有人底作用，有着明確的決定：前者將自己的勞動供奉給後者，後者則享受法律所賦予的私有權。都哥顯然是袒護這種權利的，因為他說現今的土地所有者底祖先們從前自己也耕種過土地的；然而都哥却又鄭重地指出，純生產品之交付給土地所有者，是一階級佔取另一階級之勞動的行爲。這一點又是都哥見解底獨到之處，而為奎奈與其他重農主義者所見不到的。

那末，除土地所有者以外，別的資本家從何處來的呢？當然他們底存在都氏並不加以否認，不過他是依照「主要的資本家」（即土地所有者）底發生過程來解釋其他「附屬的資本家」——工商業家和信貸資本家——之發生過程的。照都氏底解釋，土地所有者是把不動產（不可移動之財富）掌握在自己手裏，而非土地的私有者則掌握着可移動的財富，其中有決定意義的是生產手段、消費資料底積儲及貨幣。

但是照重農主義底基本觀點，一切非農業者都只得與生活必需品價值相等的工資，他們都被都哥歸入「僱用勞動者」底範疇中去的；那末工商業家和信貸資本家（非農業者）底利潤從何而來的呢？按照都哥底理論路線，應當答復說：剩餘生產品（即利潤底「原形」）是發生於凡是生產手段跟生產者分離的地方；換句話說，在工業部門內，工廠工人也在替工廠主創造剩餘生產品的。但是重農主義者的都哥却故意規避這一個答案，這在他當然是無可如何的，因為不然的話，全部重農學說就根本站不住了。假如工業中也創造剩餘生產品的話，假使工業中的工人不但再生產他們底勞動代價、工資，而且還替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話，那末試問全部重農學說還有立足的餘地嗎？

都哥始終是忠於重農主義立場的，所以他得用另一種說法來解釋工商業利潤。他事實上把利潤解作了利息，而把利息又解作跟地租同樣的東西。交換發展底結果是：（一）貨幣底發生及其積累；（二）土地亦被捲入商品流通圈子中去，土地變成了自由賣買底對象。因此都哥就把一定量的貨幣看成一定大小的土地；把一定大小的土地看成一定量的貨幣。唯其如此，所以一定量的貨幣也應該像一方土地（即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得到的一方土地）一樣地產生進益，而且不少於土地上所產生的進益。都哥認為利息應當高於地租，因為放款者所冒的險要比土地所有人所冒的險大些。可是既已證實貨幣能產生進益，那末這一來也就證實了工商業也能產生進益的，因為工商業中是投放着

一定量的貨幣（資本）的啊。

照都哥底意見，這種進益應當等於所投資本底利息加上產業家勞動底報酬、工資，再加上他冒險報償之總和。都哥跟他底前人們一樣，也知道地租和利息，利潤這一個獨立的範疇，在他底觀念中是不存在的。在都氏看來，利潤只是利息加產業家底勞動報酬兩者之和而已。利息和它底變形、利潤（注意：照都哥底意見，利潤還是自利息產出的一種量），都是從純生產品中劃出來的。資本之功用在於促進純生產品之增長，因而它也有瓜分一部分純生產品的權利。這樣，都哥不但是個禁止利息底反對者，而且還對於一切立法上節制利息的辦法表示反對。當作貸款之價格看的利息，應當在自由競爭底過程中確定下來，像任何商品底價格一樣；而且事實上也是這樣確定下來的。這裏很顯然地表明：都哥對於布爾喬亞諸關係的認識確較奎奈更明確而深刻了。我們知道奎奈對於貨幣資本只是取勉強容忍的態度，因為他既擁護土地這一種私有權底形式，他就沒有方法否認另一形式的私有權——貨幣的所有權。但是他心裏畢竟是討厭貨幣資本的，所以他認為高利率（他以為這是貨幣資本缺乏底標徵）究竟比為貨幣資本過多之標徵的低利率強些。

都哥則不然，他對於利息的態度是主張維護低利率。貨幣資本底豐裕，在他看來是不可慮的；相反的，他倒認為這是國民經濟繁榮底表現。這種觀點雖然跟重農主義的立場不大調協，可是它却

是表示對資本主義現實之更確切的認識。

最後，關於都哥底價值論和貨幣論還得約略地說一個大概。在價值論上，都哥受康帝拉克和加里亞尼底影響極大。他主張劃分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前者是表現出讓事物的人自己對該事物的估價。後者（客觀價值）才是客觀的價值，亦即他所說的市場上所確定的市場價格。關於這兩種價值，都哥作了以下的解釋：『既然交換的雙方，都是他們預備拿去交換的那個事物底主人，那末他們各人就應決定自己對於該事物的愛好程度……並跟自己要求獲得另一事物的願欲作一比較……』

（註一）——這是解釋事物之主觀價值的。接着又說：『麵包和白酒底價值在這種場合（意即有很多購買者和出賣者的時候——沈），是決定於從事交換的兩個人底相互的需要和資金；它決定於全體麵包出賣人底需要和資金跟全體白酒出賣人底需要和資金之平均。』（註二）簡單地說，市場價格是依供求關係來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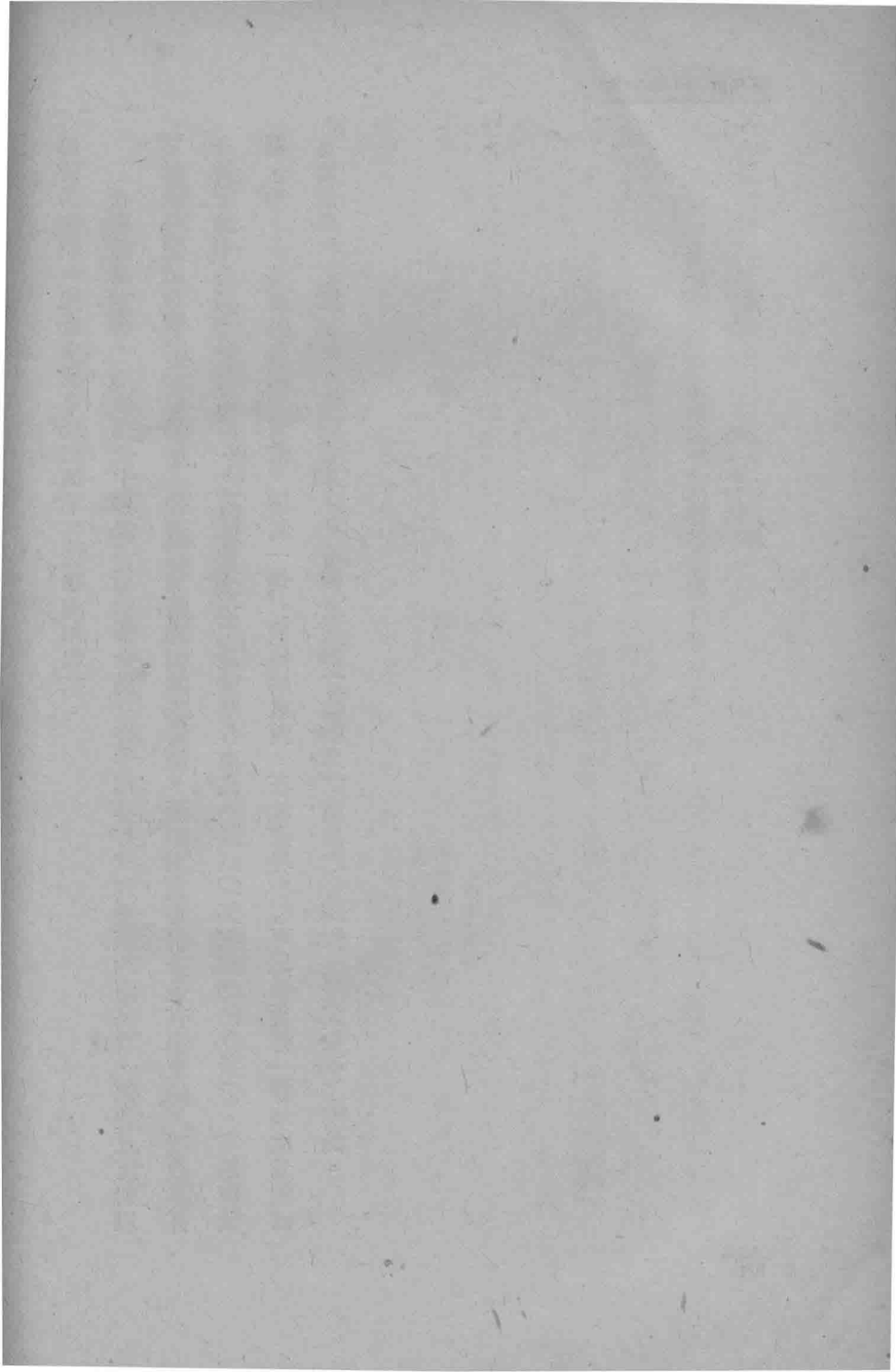
都哥的價值論不僅不發生於他底重農主義體系，而且還是這一體系中的一個贅瘤。至少可以說，這是表示都哥想把不可調和的東西調和起來的一種嘗試，他想把重農主義的論綱（關於交換相

（註一）都哥著：「財富之創造與分配論」，頁十七。

（註二）都哥著：「書同上」。

等性的論綱）跟康帝拉克底交換不等性論調和起來。

在貨幣論方面，都哥把金子和銀子這兩種金屬貨幣當作具有真實價值的商品看，他並且反對以貨幣祇是價值符號的那種見解。他否認貨幣爲價值底符號，而指出貨幣自身是有價值的。所以都哥在貨幣論中是個「金屬論派」。可是他不但把貨幣解作商品，同時却又把商品解作貨幣。在都哥底觀念中，一切商品也就是貨幣，因爲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在流通界中都可以像貨幣一樣地成爲別種有價值事物之度量的。這樣看來，都哥對於貨幣之爲特殊的商品之特殊性，是完全不了解的。



## 第四章 亞丹·斯密

### 第一節 亞丹·斯密底時代背景

首先應當指明，亞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英國資本主義童年時代底經濟學家，具體些講，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由手工工場制過渡到大機器生產制的時期底經濟學家。所以我們底研究應當從十八世紀後半英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狀況底分析開始。

當斯密氏在學術界中初露頭角的時候，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相當地強固，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發達些。被英國人稱爲「榮譽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一六八八年革命（註一）底結果，英國的政權遂爲貴族（註二）和金融商業資本所分掌。從這時起，英國的內外政策底任務，都是要造成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最優良的條件。過去貴族們用掠奪的手段來實現的「圈地」政

（註一）就是推翻橫暴的詹姆士二世的那次不流血的革命。

（註二）是指斯都亞特皇朝底反對派貴族而言。

策（即強力剝奪農民底土地，改麥田爲牧場），現在開始用合法的手續——根據國會的法令——來實施了。從一七〇〇到一七六〇年，這樣的法令總共頒佈了二百零八道，被圈的土地共達三十一萬二千英畝。其後，圈地底速度更快了：從一七六〇到一八〇一年，總共頒佈了二千道法令，三百萬以上英畝的農民土地被圈去（即被剝奪）了。農民大衆底失地過程跟大農經濟底形成過程（即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的過程）相並進行着。這樣，重農學派所日夜渴想其實現於法國的理想，在英國却被幾千道法令輕輕地實現出來了。

土地所有者變成了地租底收取者，並且用種種方法以提高土地上的進益。於是富裕的農業家這一階級日益長大起來了。當時首要的工業部門是毛織工業，它對於「圈地」政策起着強大的「刺激」作用，大大地加速了化麥田爲牧場（草原）的過程，這樣就不斷地擴大了毛織工業底原料基礎。同時，雷厲風行的圈地政策又造成了大批的農村人口過剩，因而亦即替工業創造了廉價勞動底來源。當時對於毛織工業底繁榮，除工業資本家外，土地所有者，農業家和商人們都無不渴望的；而最吃虧的只有廣大的農民羣衆（自然被資本家榨取的工場工人和家庭工業者從這當中所領受到的也只是貧乏和困苦）。

另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棉織業。在最初，棉織業受到了一些障礙，因爲它被毛織業家嫉視爲競



敵了。可是不久棉織業仍得很快地發展起來。毛織業所給它的障礙客觀上倒反促進了它底發展：因為棉織業是「後進」的緣故，所以它特別要表現它底努力，它底巨大的創造力（initiative）和進取性。唯其如此，所以工業革命史上第一批偉大的發明就出現在這一部門中。棉織業後來一躍而為英國工業中的「佼佼者」，而一般人乃咸視此部門生產之發展為擁護工商業自由競爭之不可推翻的證據。棉織工業之躍上霸權地位，適應着國內階級關係底一大轉變：工業資產階級擢升到首要的地位上來了。在亞丹·斯密底時代這一過程雖未完成，然已很快地在開展着了。

除了手工工場和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以外，當時各種小手工行業和家庭小手藝在英國還仍很普遍而有勢力，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制並沒有而且不能把它們排擠掉去。

但是在那個時候英國却已失去了它原來的農業性而大體上變成一個工業國家了。這可以從英國人口成份底變動上得到證明：城市和工業人口底增長與農村人口底縮減。根據湯貝（Townby）在英國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一書中的統計材料，一六九六年倫敦有居民五十三萬人，其他城市和商業區域共有人口八十七萬，而鄉村居民則總計約四百一十萬人，這就是說，倫敦底居民佔全國人口約十分之一。而全部城市居民則佔三分之一。可是經過七年之後，據楊格（Arthur Young）底統計，倫敦底居民已達全國人口六分之一，城市居民則佔全國人口之

半。可是到亞丹·斯密出世的時代，英國城市人口底增長更加速了。湯貝告訴我們，從十七世紀末到斯密底時代，塞非爾德（Sheffield）底人口增加了七倍；利物浦（Liverpool）底人口增加了十倍；孟却斯德（Manchester）底人口增加了五倍；貝明漢（Birmingham）底人口增加了七倍。這些便是大工業城市人口激增的狀況。至於農村人口，在絕對數量上雖亦增加，但相對地却不斷地減少。

講到商業的話，英國在國內商業上雖已大致解除了重商主義底束縛，而在對外貿易上，重商主義的政策却仍十分穩固而毫不動搖。克朗威爾（Cromwell）底航業法令一方面給英國造船業和航業發展以強有力的推動，另一方面則給荷蘭底海上貿易以重大的打擊。同時該法令底實施又促進了英國海上霸權底發展。唯其有這樣大的功效，所以連十分嚴酷地排斥重商主義的亞丹·斯密，也不得不承認航業法令底功效和益處。

對於與殖民地的貿易，英國予以特別的保護。這種貿易為英國幾個大公司所壟斷，這些公司對於殖民地既是商業機關又是統治機關。在斯密氏出世之時，英國已經是一個龐大的殖民地帝國。英國對於殖民地民族發展自國工商業的一切嘗試，一概加以壓制；它只許殖民地做宗主國底原料和糧食底供給地。這一政策激起了北美諸州（即今美國）反抗英人的暴動。美洲的資產者羣決定自己

起來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了。

所謂「原始資本積累」底過程，在英國是最標本式的。農民底失地，生產者跟生產手段相分離，生產者（包括小手工業者和農民）之轉變為勞動力底出賣者和生活資料底購買者，——這便是「原始積累」過程底一方面。這個過程底另一方面是：農民底失去土地和轉變為雇用勞動者。同時也就是工業跟農業底分離，家庭工業與農業底聯系底消滅。從前由小農經濟直接供給的原料，現在得從市場上去購買了。手工工場便是這種原料底大顧主。從前手藝工匠為自己消費而織的布，現在變成工場的出產品了；而這種紡織品底發售市場恰正是農業區域。

此外，跟「原始積累」有密切聯繫的，就是殖民地的掠奪。靠着對殖民地的統治權，英國商人（因而亦即英國的統治集團）從殖民地方面掠奪了無量數的貴金屬品；這種統治，使英國努力地發展了它底航業，大規模地擴張了殖民地商品底貿易，並且把奴隸買賣的貿易當做了致富底最大來源；此外，殖民地的統治又替正在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開闢了廣大的世界市場。

這樣，「所謂原始積累」已經完成了它底事業，那末就輪到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了。然而有許多障礙擺在面前，最重要的障礙就是生產基礎太狹窄——手工工場制底生產基礎。由於巨量資本積累和狹窄的手工工場底生產基礎間的矛盾，產業革命底必要性就日益成熟起來。在另一方面，工場

制本身，因勞動過程之分解為許多單純的動作（Operations），勞動工具底專門化，分工合作的生產機體底形成，——這樣，就創造了產業革命之組織的、和技術的前提。

同時在大資本發展底道路上，却還有別種障礙存在着。貿易保護政策之任務，因在於「製造製造家」（卡爾語），意即在於發展本國的工廠生產；可是執行了這個任務，保護政策却又在阻礙它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製造家底活動，束縛他們底自動的創造性和奮鬥性（進取性）。

就國內的情形論，促進由行會制到工場制之轉變過程和小手藝業與舊式商業資本所緊緊抱住的那種舊立法，已經深深地感覺得太陳舊了。就國外的情形論，貿易保護主義阻礙跟別的國家建立「健全的」、「正常的」商業關係。當時的英國，或是已經消滅了它底競敵（例如西班牙），或是把它底競敵排擠到後面去了（如荷蘭和法國），它在對外貿易上對於自由競爭已經毫無忌憚。可是對於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強大力量的英國資本主義而言，自由競爭却是跟發展較弱的競敵們競爭的最好工具，亦即促進它自身加速長大的最好利器。

同時，英國跟殖民地的關係也需要改變了；至少對於不同的殖民地應採取不同的辦法；對於印度和對於有英國和歐洲各國移民的其他殖民地不能施行同一方法。北美諸州底暴動（一七七六年）便是一個可怕的警告（註）。在過去，原始積累底方法是掠奪殖民地，把殖民地方面多年聚積起來

的財富奪過來送到宗主國去；但是掠奪固然可以，終究不能單靠暴力去實現經濟的征服殖民地底目的。惟其如此，所以過去的，前資本主義式的勝利是不穩固的。用前資本主義的方法去掠奪和克服殖民地（如印度），始終不能改變後者底原始的社會經濟機構（如印度的農村公社）。要破壞和消滅殖民地底舊式經濟組織，除了採取新的經濟方法——產業革命和根本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法外，便無他道。

從上述種種方面看來，十八世紀後半的英國，確實絕對地有改變經濟政策和實行產業革命的必要了。當斯密氏開始其學術活動的時候，英國還沒有蒸汽機，也沒有真實的貿易自由。然而蒸汽機和貿易完全自由底必要，已為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底事實所決定；那時的英國資本主義業已成為一個世界的強大的力量，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斯密氏底傑作（亦即古典學派底代表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出世，尚在產業革命以前，但在斯密氏著作那部書的時候，產業革命底種種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註）亞丹·斯密底國富論可說是這一暴動之思想上的「象徵」，它和北美的暴動恰巧同時出現，它是反重商主義的暴動之理論的旗幟。國富論底出世，正在北美諸州反抗英國野蠻的重商政策之戰爭爆發之初。不過美國人底行動當然比斯密氏更徹底些：他們不但掃除了英人底重商政策，而且完全消滅了英人在北美的統治。

## 第二節 「國富論」評估

要研究古典學派底政治經濟學，要研究亞丹·斯密底經濟理論體系，必須從國富論底評估開始，因為國富論是亞丹·斯密全部經濟理論底結晶，同時又是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之完整的偉大的代表作。在這一節書中，我們所要做的工作，便是給國富論一個概括的估量，俾讀者對於斯密氏底理論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輪廓概念。

國富論是由五卷書集成的大著；第一、二兩卷所討論的就是平常吾人所稱的政治經濟學，亦即所謂狹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科學。第一卷書底研究，開始於勞動分工底分析：說明分工對於國民財富的意義，分工發生底原因，並分析決定分工的諸因素。斯密氏從分工出發來解釋貨幣發生底原因，然後再說到根本問題，商品底交換價值問題上來。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後，他馬上就講到分配問題，研究社會三種主要的進益（收入）：工資、利潤和地租。這樣看來，第一卷書中闡解底程序如下：『分工——貨幣——商品底交換價值』——後者劃分為三大社會集團底三種主要的收入。關於這一研究程序底意義，我們後面再說。這裏要指出的，只是斯密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結構底理解，已經比重農學者進了一大步。他解釋社會之劃分為階級，乃決定它們跟生產手段的

關係和獲得進益底性質：土地所有者領有土地而獲得地租；資本家爲資本底所有人，因而獲得利潤；兩者都沒有的工人則獲得工資。

國富論底第二卷是研究資本的。這裏研究底出發點是資財底積儲；從這一積儲中，斯密氏劃出一部分來，他便稱之爲資本。在探討資本時，他把資本劃分爲兩部分，固定資本（Fixed Capital）和流動資本（Circulating Capital）；他說明了資本底作用和資本積累底條件；指出了資本底各種形態，借貸資本跟工商業資本的區別；最後又說到各種資本投放底形式，特別是工業中的資本和農業中的資本。在這一卷中，斯密氏又回復到貨幣問題上來，但是這裏所討論的方面不同了：這裏他所注意的是爲資財積儲之一的貨幣和當作資本看的貨幣。他又把資本底積累跟生產的和不生長的勞動問題聯繫起來。而在生產勞動和生產勞動底解釋中，雖仍免不了缺點，可是斯密氏却又較重農主義者底觀點進步得多。在斯密氏看來，一切勞動，不論它施於何處，施於農業或工業，只要它是生產商品或資本的，就都是生產的。

假如說斯密在前兩卷書裏所闡明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那末第三卷書可以說是他底經濟史；斯密敘述這一歷史，係從羅馬帝國之覆亡開始的。在這卷書底開首，他寫了一章類似導言的東西，該章標題爲論福利之自然發展。在這一章中，他又提到分工底問題，可是他提這個問題的方式又跟

第一卷中的提法不同了。這裏他所論到的是城市與鄉村底分工。在第二卷書底後面各章中，他就根據這種分工底觀點來敘述經濟發展史；他在這裏指出了前後接續的兩個過程來：起初是城市底衰落過程，然後是城市繁榮底過程。

第四卷中所敘述的是經濟學說史。其中大部分是講的重商主義，對於這一學說，斯密氏給了周密的、粉碎的批判。關於他所稱爲農業理論的重農學說，只有一章是討論它的；斯密氏對重農學說的批判較輕而較客氣。

在第五卷中，斯密氏探討了財政、賦稅的政策。該卷共分爲三篇：第一篇論國家底支出，第二篇論國庫收入，第三篇則論國家底債務。

現在我們要來考察，上述五卷書底內部聯系究竟如何。初初一看，這五卷書髣髴是一部經濟知識底百科全書，它們中間的聯系，只是在它們都是屬於經濟領域的知識這一點。然而仔細考察之下，我們却不難看出國富論五卷書中間的內部聯系，它把五卷書連結成爲一個整個的體系。這種一致性或整個性是在於：（一）研究底對象；（二）斯密氏貫徹於全五卷書的那個總觀念。

全部著作底研究對象便是國民底財富。斯密氏認定研究底任務在於揭發那些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發展的諸原因和因素。他認爲促進勞動生產率之發展（因而亦即促進國民財富國民之增長）的首



要的和決定的因素便是勞動底分工。可是照斯密氏見解，分工之成爲財富增長之因素，只有在進行分工的社會內存在着正常的交換，即按照「自然價格」的交換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此，爲財富增長之因素的勞動分工問題中，就包括着「自然價格」底問題。而「自然價格」問題本身則又有賴於進益分配問題，因爲照斯密底意見，商品底交換價值只在它底原始狀態中是被勞動決定的，以後它就由進益（收入）來決定了。這樣看來，所有這三類問題，內部都是相互聯繫着的。這便是第一卷裏所研究的問題，而它底核心却是勞動分工。

斯密氏認爲促使財富增長的第二個因素是資本。斯密說：「有用的和生產的工人，其數目到處都要靠給他們工作做的事業上所消費的資本量及其特殊的使用方式來決定的。」這是第二卷裏所研究的問題。

在第三卷中，雖然研究底性質已有改變，而所採用的材料也完全不一樣（自經濟史中採取材料），可是研究底對象還是跟前兩卷中一樣。斯密所感興趣的，不是經濟史本身，他所注意的是另一回事：從羅馬帝國覆亡到斯密底時代爲止這一歷史時期中，分工——城市與鄉村底分工形式——怎樣地發展起來；正確的政策如何促進這一過程（分工底發展過程），不正確的政策又如何阻礙這一過程。於此，斯密就提到了盡發展國民財富之作用的第三個因素——政策。在斯密看來，認爲最

好的政策是沒有政策，這就是說，政府不干與經濟生活便是最好的政策。

第四卷實爲第三卷之直接的繼續。像第三卷底情形一樣，斯密所感興趣的，也不是經濟學說史本身；他所要說明的，祇是：一種不正確的經濟政策，特別是統治了幾世紀的重商主義政策，如何阻礙着分工之自由的發展（照斯密底見解，自由的發展便是最好的發展）這一點。假使在前兩卷中斯密研究了財富之積極因素，那末在第三和第四兩卷中他却研究了財富之消極因素。

第五卷之研究課題（對象）仍爲國民財富，因爲國家底歲入和歲出及債務等，斯密根本上也依據財富發展底觀點去觀察它們的。所以這一卷又跟前四卷有着內部邏輯的聯系：以國民財富爲研究對象底唯一重心。

國富論底另一個內在聯繫的原則，便是經濟自由底觀念，從第一卷到第五卷都貫徹着這一觀念。可是這一觀念却並非亞丹·斯密發明的。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發展，人們底頭腦（意識）中就逐漸地成熟着這一發展底反映。但是斯密氏却有下列三大功績：（一）他替這一觀念奠定了理論基礎；（二）他以此觀念爲他以前諸經濟學說之研究與批判之基礎；（三）他在這一觀念上建築他底完整的經濟政策和所謂國家經濟底理論，即研討國家收入、支出和債務的經濟理論。

同時，斯密氏又把經濟自由底觀念建立在自然秩序底觀念上，——不過這也不是國富論著者所

發明的。我們在前章中業經再三指出，自然秩序觀是重農學說底一塊基石（基本的方法論觀點），是整個十八世紀底方法觀點，可是這也只是布爾喬亞社會經濟發展之反映而已。斯密氏底功績就在他澈底地解除了這一觀念底一切封建、宗教的成份，肅清了這一觀念底一切跟它自身不相容的成份與色彩。

照斯密底解釋，自然秩序是建立在個人自動的創造性、建立在個人的興趣上、建立在自利主義上的一種秩序。國富論前兩卷中所發揮的經濟理論，就不外乎自然秩序在經濟範疇上的表現而已。分工，貨幣，自然價格，自然工資，利潤和地租，資本及其組織部分，資本積聚及其不同的應用，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自然秩序底表現。第三、四兩卷中所說明的，是自然秩序跟人工秩序如何鬥爭，如何排除各種經濟政策體系所給它的種種障礙以開闢它底前程。在第五卷中則確定了國家經濟底界限，國家收入和支出底基礎，後者則仍發生於正確理解下的自然秩序。

亞丹·斯密能夠把他那時代底一切經濟知識都結合在一個研究對象周圍，並用一個統一的觀念去貫徹它；這便是他底國富論底巨大成功，亦即使此書成爲科學發展史中劃時代的作品之原因。然而斯密勞作之思想結構底緊密性和觀念統一性却並非表示它底理論上和方法上的純一性。事實是相反的，在斯密氏那個時代，差不多難以找得到像國富論那樣多的矛盾了。斯密氏對於同一經濟現

象，往往給以不同的、甚至互不相容的解釋；前後應用不同的方法，建立了完全相反的理論。

在斯密氏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的價值論，利潤論和地租論等等。可是作者建立了這些互相矛盾的理論，自己却覺察不到這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留在以後幾節中再來說明。不過這裏要指出，斯密氏底創造能力、他底天才，却並不因這些矛盾而稍減；他終究配稱為近代政治經濟學底始祖。就社會本質論，斯密氏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經濟矛盾之理論上的反映，這些矛盾主要地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斯密時代資本主義底發展不充分性所產生的諸矛盾所決定的；另一類（比較更深刻的）則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性質本身底諸矛盾。前一類矛盾隨着這一生產方式之向前發展而被布爾喬亞經濟學者自己所克服（首先是李嘉圖）；第二類矛盾則在布爾喬亞制度和跟它相應的形而上方法論底界限以內，不但不會克服，而且也不能被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所理解的。以斯密氏為首的古典學派底理論及其種種根本矛盾，只有到科學社會主義倡導人底手裏才被克服下去。

## 第二節 亞丹·斯密底方法論

亞丹·斯密在他底著作中往往根據一定的原則去解釋各種個別的現象（即採用演繹的方法），但同時他也於解釋個別的現象之後，從中建立起現象底法則來（即應用歸納的方法）。正因爲這樣，

所以許多經濟學者，對於斯密氏底方法觀念的估量，往往殊多分歧：一部分人估量斯密底方法為演繹法（如卜克爾和克恩斯），又有一部分人則認為他是個歸納法家（如應格蘭姆 Ingram及其他接近歷史學派的經濟學者），事實上這兩種人的估量都曲解了斯密氏本人底真見解。他是兩種方法兼施並用的。

『斯密氏本人非常直率地在經常的矛盾中繞着圈子。一方面他研究諸經濟範疇之內在的聯系，或者說，他研究布爾喬亞經濟體系之暗藏的結構。在另一方面，他又研究到在競爭現象上所看得見的那種聯系，即為一般毫無科學知識的人所見得到，亦即為實際參加和有興趣於布爾喬亞生產過程的人所見得到的那種表面現象底聯系。這兩種觀察方法，——一種是深入內部聯系的方法，即觀察所謂布爾喬亞體系之「生理」的方法；另一種方法只是把在生活過程中暴露於外表的現象，依照外表上所暴露的形態，給它們描寫、歸類、敘述和歸納於有系統的概念中。這兩種研究方法在斯密氏底著作中，不但互相並立而存，而且還互相交編着和經常地互相矛盾着。』（註）

布爾喬亞研究家對於研究方法問題本身的提法是錯誤的。須知科學的演繹法和歸納法決不能互

（註）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二。

相對立，因為這兩種方法實在是一種方法底兩方面。問題並不在斯密氏既應用演繹法又應用歸納法這一點，問題是在：（一）他應用了這兩種方法，可是不明瞭它們底效用上的區別，因此他就把它們應用錯了；（二）這是跟前一點有密切聯系的，這兩種方法被斯密氏弄成互相矛盾並且得出互不相容的結論來了。歸納法被他曲解成爲「公開的」（*'exterior'*）方法，即描寫和彙集現象的方法，而演繹法則被他曲解爲「秘傳的」（*'esoteric'*）方法，即揭露「布爾喬亞體系之內部聯系和生理機構」的方法。而第一種研究方法所得的結果是跟第二種研究方法所得的結果發生極明顯的矛盾的。眼光祇及於現象底表面和描寫這種表面的觀察者——斯密氏，和從現象中抓住最重要的並揭露現象之本質爲己任的理論家——斯密氏，——這「兩個斯密氏」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是互相排拒的！

事物底外觀（形像）和本質總是不相符合的，假如外觀和本質果真是相符合的話，那末就根本不需要科學的研究了。不過外觀與本質雖不符合，外觀却爲本質所規定，經過「從抽象達到具體」的思考法，揭發出了由本質達到外觀的全部鎖鏈。然而在斯密氏底觀念中，本質和外觀中間却存在着「一條極大的鴻溝」，所以它兩者是互相排拒的。對於他的經濟理論的分析，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斯密氏同時本着他底理論家和經驗主義觀察家這兩重本能，並行地進行了兩種研究，並解決了兩種任務。他用一種方法來說明布爾喬亞經濟之內部的聯系（本質），同時他又用另一種方法來單獨地描寫它底外表的聯系（形像）。

由此看來，毫無疑義地，理論家的斯密，政治經濟學始祖的斯密，是應用了演繹法的。現在要問：（一）他根據那些總原則做出發點？（二）他從何處得到這些總原則，它們如何發生？（三）他得到了那些結論而且應當得到那些結論？

斯密氏的總原則跟重農主義者的一樣：自然秩序觀和自然權利觀。但是斯密氏從這些觀念上解除了封建的外表，剝去了封建的外殼。自然秩序和自然權利，是發生於人類本性並與此本性相適應的那種秩序和權利。可是人類都是利己的，這便是他底本性（或天性）。他特別靠經濟的活動以追求自己個人的利益。而既然追求個人利益是人類底天性，那末這樣的追求就是合法的，它因而就有存在之權。但是一個人底個人利益須以別人底個人利益爲限；除了這個限制以外，便沒有別的限制，而且也不能有別的限制。

一個人底個人利益受別人底個人利益之限制，——這種本身也是自然的。因爲每人都需要別人底幫助；只有當幫助的人樂於幫助的時候，我們才能好好地得到別人底幫助。由於這個緣故，一

個利己者就不得不顧到別的利己者底利益。於是相互的公共利益就告成立了。依照這種見解，社會係由個別的諸個體組合而成，而社會底利益便由社會諸成員底利益所構成。因此這種見解底特點就是個人主義。斯密氏並不否認社會和社會利益，但他根據個人底本性和個人利益來解釋社會底利益。由此就得出一個方法論的原則來：社會和社會關係底分析應當以個人底分析、個人本性和個人利益底分析為基礎。斯密氏所做的第一次演繹（推論），即他底以後許多演繹底出發點，這是：

（一）人類需要互相幫助；（二）但是人類是利己主義者，他們底互相幫助是以雙方的利益為基礎的；（三）互助之唯一合理的形式，即人們能藉以達到最好的互助目的的那種形式，便是交換。因此，交換也是自然的現象，因為它是由人類本性所決定的。而交換本身又引起了勞動的分工。

斯密的出發點和根據這些出發點的演繹，都是最一般的，即最抽象的布爾喬亞關係底反映；這種布爾喬亞關係之發生係採取簡單的商品關係底形式，而它底發展底完成形式則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布爾喬亞思想家的斯密底觀念中，資本家並不是一件歷史底產物，他是一般的人，是具有永遠不變之本性的人。

這樣，斯密氏觀念中的「自然秩序」是沒有歷史性的；他不把「自然秩序」看作歷史底產物，而把它解作創造歷史的力量。這顯然是形而上的觀點。同時他底全部方法也統統是形而上的。斯密



氏把一個歷史時代底特性看成絕對性了，而布爾喬亞經濟底範疇則被了解為超歷史的範疇。固然斯密氏是知道歷史的；而且他還研究歷史，形而上地解釋歷史。照他底意見，認為歷史一方面是許多錯誤和脫離自然大道的許多歪曲傾向底集成，另一方面它又是人類本性跟一切在它道路上阻梗着的障礙進行鬥爭的歷史。只有在自由競爭中，人類底本性才得到了正常發展底條件。

斯密氏認定資本主義社會諸關係為絕對的。他不研究它們底本性，也不研究它們底發生、發展和表現底形式。他把這些關係看成永遠如此的東西，他所研究的只是這些關係內部所發生的現象。舉例來說，研究商品諸關係時，他不注意、而且不了解價值是這些關係底現形式；他只研究到一個商品跟另一商品交換的數量比例。所以他常常把人的關係跟物的關係混淆起來（俟後面介紹他底交換價值論時再行詳述此點）。這樣，他底分析主要是量的；他完全忽略了質的分析。利潤、工資、地租、及其他範疇，他都不把它們看作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一定的形式，他僅僅從量的方面去考察它們：它們底量的關係是怎樣和由什麼來決定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斯密在本質與形像（外觀）之間掘開了一條極大的鴻溝，這歸根結蒂當然是他底形而上的觀點所造成的。形而上地了解下的現象之本質，是一種靜止的東西；因而他就不能從本質中演繹出形像來了。而本質與形像底分裂促成了方法底一致性底分裂：他把前者（本質）了解為

演繹的研究對象，後者（形像）了解為歸納的研究對象。

然而「自然秩序」底觀念，被斯密剝除了封建外殼之後，却在經濟科學底發展中盡了極大的積極作用。斯密底經濟勞作首先就證明了這一點。由於應用「自然秩序」觀這一種方法論的原則，所以斯密和他底真實信徒們都不從人們自覺的行爲中、不從政治家、理論家底創造的活動中去尋找經濟現象發生底根源，他們是從不自覺的大衆行動中去尋找這種根源的。斯密底見解，經濟的現象都是自然地、自發地、由於同一動作之無數次的反復而發生的。只是斯密不知道，人的本性是在人類發展底一定階段上所發生的一定的生產方式底產物。但是這種觀念本身在那個時代却是一大進步。

根據新經濟學底理解，資本家是資本底「人化」（personification），資本家底本性為資本底本性所決定，——這是唯一科學的人性觀，亦即辯證法唯物論的人性觀；在階級社會內，任何人都是一個階級底代表。斯密氏底布爾喬亞的狹窄的眼界不容許他有這樣一個人性觀。在斯密底解釋中，一切都被頭脚倒置了：他認為資本主義諸關係乃由人性（人底本性）所決定，——實際上就是說由資產者底本性所決定。但是縱然這樣的了解經濟關係在當時也是一大進步，因為他終究把它們看成客觀的關係——離人類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關係了。

由此看來，斯密完全確定了政治經濟學中的因果觀（Causality）而驅除了目的論（teleology）。

他所探求的不是經濟諸關係底目的而是它們底客觀原因。

## 第四節 亞丹·斯密底經濟理論

### 一 分工與交換

在第二節中已經指出國富論底研究是從分工開始的。爲什麼斯密拿分工做出發點呢？對於這個問題，原著人在其導言中寫道：「每一國民底一年勞動，就是供給他以一年中所要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原始基金；這些生活必需品總常常或是由這一勞動底直接生產品所構成，或是由用這些生產品去跟別的國民交換所得的生產品所構成。」（註）

照斯密底意見，每年的勞動是供給任何國民以生活必需品的原始基金。這類必需品底數量，乃決定於：（一）參加生產的勞動量和（二）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條件具有決定的作用。斯密用下面一個事實來證明這一點。他說原始民族要比文明民族窮得多，可是在原始民族中，參加勞動的人在全體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要比文明民族中的勞動者大得多。文明民族所以比較富裕，因爲他們底勞動生產率比較得大。而勞動生產率首先就當賴勞動者底技藝、熟練程度等等來決定，而技藝、熟

（註）斯密著：國富論（詳細的書名爲：國民財富之原因與本性底研究）頁五。

練程度等則又由勞動底分工來決定。

所以斯密得出結論來說：國民底財富及其增殖當賴分工底發展來決定。因而在國民財富底研究中，即在經濟的理論中，出發點也應當是分工。

初初看來，這樣的解說是有甚麼可以非難的。但是這裏却有一個重大的缺痕：斯密完全抽象地觀察國民財富和分工，他丟開了具體歷史的社會形式，丟開了產生財富和發生分工的那些具體歷史的社會條件去考察這種財富和分工。而事實上他研究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所以他從最初就把資本主義諸關係看成自然的關係，髣髴財富底生產和分工，永遠只是在、而必須在這些關係中發生的。因此斯密並不離開交換去考察分工。當他說到「國民一年的勞動為一年的生活必需生產品」時，他一開始就認定這些生產品一部分是「這一勞動底直接生產品」，一部分則「由用這些生產品去跟別的國民交換所得的生產品所構成」。這裏，就很明白地顯示着：斯密所說的分工，是跟交換（因而即商品經濟）離不開的。

可是由此可以看出，在斯密之研究底出發點中，就已經種下了矛盾，這一矛盾又註定了其餘許多矛盾。一方面他把布爾喬亞社會所特有的分工解作一般的分工，解作國民財富發展之超歷史的法則；另一方面這一法則事實上充實着具體的內容——取自一定的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

的具體內容。

這一矛盾又表現於斯密之混同社會分工與工場中的分工；他不看見、並且也不會看見兩種分工中間的重大區別。他根據工場分工底觀點去觀察社會，於是把社會看成一個大工場了。這種觀點，把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分工底自發性、無政府性完全抹煞了。

斯密既不了解各個不同的經濟形態（*economic formations*）中的分工底殊異性，又不了解同一經濟形態內部、布爾喬亞社會內部各種分工形式底殊異性。他估計分工底意義，純粹根據下面這兩點：（一）將許多人聯合成為一個生產的集體，成為一個「大工場」；（二）提高社會勞動底生產率，而以國民財富之增長為其表現。依照這樣的觀點說，「小規模工場」（意即真正的工場）是「大工場」（意即社會）底個別場合；這「大工場」是由許多經濟部門所組成的，它們共同參加社會生產，各自成為這「大工場」分工體系中的一員。

卡爾曾劃定了社會內的分工和工場內的分工之本質上的區別（註），並揭破了斯密底錯誤觀念。在這兩種形式底分工中間，確實有很多的類似之點；並且有密切的相互聯繫。首先，這兩種分工之物質的前提是一樣的：工場內的分工須以一定數量的同時參加生產工作的工人為前提，而社會分工

（註）在哲學之貧困一書中即已劃定此種區別，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則揭破了斯密底錯誤觀念。

之前提亦爲許多人共同參加勞作這一事實。這兩種分工形式中間還存在着一種極重要的相互作用：只有在社會分工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時，工場才會發生，而同時工場的生產反過來則更促進社會分工底發展。『但是社會分工和工場分工中間雖有許多的類似點和聯系，這兩種分工形式不僅互有程度上的區別，而且還有實質上的區別。』（卡爾語）

實質上的區別何在呢？『畜牧人、製革人和皮鞋匠這幾種獨立的工作中間的聯系是由什麼造成的呢？造成這種聯系的是下面這一事態：他們底生產品都以商品底資格存在着。反之，工場內分工之特點何在呢？其特點就表現於這麼一個事實：這裏局部的工人一概不生產品獨立的商品；祇是許多的局部工人之綜合的生產物，才成爲商品。社會內部的分工，以各個勞動部門底生產物之買賣爲前提；工場中諸局部工作間的聯系，則藉各種不同的勞動力之出賣給一個資本家和資本家把它們當作一個聯合的勞動力來使用的這一場合而成立起來。工場的分工以生產手段之集中於一個資本家之手爲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手段之分散於許多各自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爲前提。在工場中，一定的嚴格的比和關係之鐵則，分配工人羣衆以各種不同的職能；相反的，各個社會勞動部門間商品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底分配則爲一種盲目的、自發的力量所決定。

現在我們再回過來講斯密底觀點吧。斯密氏研究底出發點是勞動底分工；可是他對於分工的理

解，第一，不分出社會分工和工場分工之區別；第二，他把分工看成自然現象；第三，但同時他也不離開交換去理解分工。斯密本人却看不見這裏有甚麼矛盾。第一，因為他根本把交換也看成自然現象；他認為人類本性中天生有交換的心向；第二，交換的心向促成和產生分工。說得確實些，照斯密底意見，分工不外乎人類交換心向之表現形式而已。此外，分工這一事實本身，他就把它看成交換——勞動與勞動之交換：甲替乙勞動，乙又替甲勞動。

復次，斯密把工場分工解作技術分工 (technical division of labour)，這種觀點當然是非常模糊的。因為把工場分工解作技術分工，其弊病在於：第一，抹煞了工場分工底特質，抹煞了我們前面所指明的那些特點。須知在技術分工底範圍之內，可以有各種形式底分工：手藝作坊內的分工，資本主義工場和工廠內的分工，以及像印度公社內的分工等。第二，這樣的見解又抹煞了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的分工底特殊性。第三，「分工」這一範疇，由社會歷史的範疇被曲解為技術的範疇了。這樣一來，工場中或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分工之社會的內容，就完全被斯密所持的這類分工觀所勾銷了。

站在布爾喬亞交換觀的立場上的盧濱，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把斯密底混同社會分工與工場分工，解作社會分工跟技術分工底混同。『我們看到斯密混同了社會分工和工場分工或技術分工。』

(註一) 這裏，盧濱把工場分工跟技術分工等同起來了。盧氏解釋兩種分工底原則上的區別在於社會分工只發生於交換，而生產中則只有技術一種。既然——照盧濱底意見——工場的分工係發生於生產中，那末它祇是技術分工。可是實際上社會的關係乃發生於生產中，且為生產所規定；在流通（即商品買賣）中，它們找着了相適應的表現形式。而斯密底根本錯誤並不在混同社會和技術的分工，而在於丟開歷史，在歷史過程以外去理解社會分工；他把歷史過程曲解成自然過程了。

斯密特別着重地指出交換和分工祇存在於生活於社會中的人類；動物界中既無交換，亦無分工。動物因為缺乏交換和做買賣的能力或心向，所以牠們雖有各種能力和特性，即不能為公共的目的所用，亦不能促進整個族類（例如犬類、鳥類、蟲類等）底幸福。每一動物，只知顧到自己，各自單獨地謀自己的利益，所以各種動物所具備的各種不同的能力，不能夠互相集合而成為一整個的、促進全體利益的能力。人類却不然；他們有各種不同的技能和貢獻；靠着他們底交換和做買賣的心向，他們各種不同的勞動生產品就集成為一個物品底總匯；從這個總匯中，每個人都可以購買他所需要的任何別人底生產品（註二）。

（註一）盧濱著：《經濟思想史》，原本頁一六八。

（註二）參閱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



盧濱根據類似的交換觀，確定說：髣髴照斯密底意見，「商品社會……一方面建立在分工之基礎上，另一方面建立在各個經濟單位間之交換上的一個社會；換句話說，它是一個勞動的集合體，同時又是一個交換的集合體。」（註）這種「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見解，是很拙笨的形而上的商品社會觀。依照這種觀點說來，勞動是技術的因素，交換纔是社會的因素。盧濱以為這便是斯密底見解底兩重性。但是事實上斯密底觀念中並沒有這種兩重性，這只是盧濱自己所發明的兩重性罷了。斯密所講的「商業的集合體」就是人們互相交換勞動的一個集合體，因為斯密認為分工本身就是交換。

斯密底缺點是在另一方面：他把交換解釋得太廣泛，把分工也歸入交換之範疇中，他把生產與流通之一致，事實上解成兩者之等同；這樣就抹煞了流通底特殊性。這仍然由於他非歷史地了解交換和分工，把它們看成超歷史的範疇的緣故，這樣他就不能說明流通在商品經濟中的作用和跟流通相聯繫的諸現象之本性。同時他因此也不能給重商主義一個正確的批判（關於這些，以後再論）。

然而這裏必須指出，在生產和流通底相互關係之理解中，斯密究竟比他底前人們進了一大步了。重商主義者把流通提到第一位，重農學派則以農業生產為主體。斯密却把勞動，全體國民底勞

（註）盧濱著：經濟思想史，原文版，頁一六七。

動，提到首屈一指的地位上來。不過他觀念中的勞動是分配於生產者全體大眾間，因而就包括交換在內的勞動。縱然斯密對分工和交換的解釋如何錯誤，可是他却髣髴本能地了解商品生產者社會底財富不發生於流通，同時却也不在流通之外發生。所以被他當作研究底出發點的勞動，並不是簡單的勞動而是包括交換在內的勞動，亦即是許許多多商品生產者之綜合的勞動，它表現着生產和流通底一致。

固然斯密因不了解商品生產者底勞動底本性，所以也就不了解生產與流通之一致底本性，但事實上他底出發點却二者兼而有之。在他看來，勞動是在分工條件之下的財富底泉源，分工產生於交換的心向，而實在的交換規模（即交換範圍與數量之大小）即市場底規模——則決定着分工底界限：——這便是斯密在國富論前三章中的研究骨幹。

斯密關於市場規模限制分工這一情形的解釋，實頗饒興趣。國富論第三章全部討論這個問題，其中充滿着很多採自各個民族史的有價值的事實材料。這裏，斯密闡明了運輸在流通發展中的作用，因而亦即在分工發展中的作用。市場愈廣大，分工就愈發展。而市場底廣大性則有賴於：

（一）特定地域之人口密度，（二）連結各地為一市場的交通路線底發達程度。所有這些在目前是人人周知的事情；可是在當時這些道理却盡是新的，固然也有好些是斯密從他前人手上接受下來的

「遺產」。斯密接受了前人底「遺產」，加上了自己的新理論和從歷史中搜集來的各種新事實，——把所有這些用一個總的觀念貫徹起來，結果就形成了他底新的經濟系統。

## 二 貨幣論

在未講斯密底貨幣論本身以前，我們得把他底研究程序再提出來背誦一遍：（一）交換的心向（心的傾向或要求），這是產生分工的人類天性之特質；（二）由交換的心向所產生的分工，本身又實現了這一心向，把交換的傾向轉變為日常發生的交換過程了；（三）賴人口底密度和交通底設備來決定的交換規模，本身又反過來決定分工底界限。

可是既有分工和交換，就當有交換底工具、貨幣。貨幣怎樣發生的呢？斯密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如下。

在尚未說明何謂商品，何謂價值這些問題以前，斯密就已提到貨幣問題了。他認為貨幣像分工一樣，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現象。吾人之任務在於：（一）揭發那些使貨幣成為必需的自然原因，（二）描寫貨幣之發生與發展底過程。

交換的心向和實現此心向之分工，所造成的局面是這樣：「每個人都藉交換而生活，或都變成

某程度內的商人，而社會本身則可說變成商業的集合體了。」（註一）但是這個過程是要遇到困難的。斯密描寫這種困難如下。

「假定一個人所有的特定物品數量，大於他自己所需要的數量，而別個人却感覺到此物品底缺乏；因此第一個人就很願意把他底一部分多餘品交出，而第二個人則很願意獲得這些物品。但是假如這時第二人恰巧沒有第一人所需要的東西，那末他們二人中間就不能發生任何的交換。屠夫底肉舖中有着多於他自己所能消費的肉，製啤酒者和烤麵包者很想購買這多餘的一部分肉，可是他們除了自己的本行物品以外再沒有別的物品可以拿去向屠夫交換了；然而這時屠夫恰巧有着他在最近期內所需要的啤酒和麵包。在這樣的場合之下，他們中間就不能發生交換了。」（註二）

斯密如何解決這個困難呢？他又寫道：

『爲避免這種不方便的情形起見，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在分工發生以後，社會發展底任何一個階段上，自然而然地要力圖如此理值他底事業，要使得他除本行的各種物品外必須經常地有一些誰都在交換自己物品時不會拒絕接受的商品才行。』（註三）

（註一）斯密著：國富論，原文版，頁二九。

（註二）及（註三）見前書，同頁。

這樣，照斯密看來，貨幣底發生是自發的、自然而然的。雖然斯密也提到理性（如說：『每一個有理性的人……』），但是他距離「貨幣爲人類理性協同之結果」的思想，距離所謂「人類的集體理性」之結果的思想，還遠得很。相反的，他確定地指出，貨幣之發生乃各個人活動之結果，因爲各個人都在努力於克服各種阻礙他們互相交換生產品的困難。每一個人都是單獨地活動着，誰都跟誰無關，貨幣就成爲這一切單獨活動底結果，因爲所有這一切單獨的活動，都以克服同一困難爲歸趨的。這便是貨幣發生之自發性、自然而然性底意義。每一單獨的個人都不想創造、而且也不會創造過貨幣；貨幣並不是某一天才底發明。斯密着重地指出促成貨幣產生之大衆活動底性質。照他底意見，單獨的個人只企圖獲得一些爲任何人所不至於拒絕收受的商品，以便交換別人底生產品。可是因爲人人都這樣活動着（即企圖獲得一些爲任何人所願意收受的商品），久而久之，於是那個商品就被視爲共同交換工具——貨幣了。

斯密所說『有理性的人』是指追求個人利益的人而言，他底一切活動，都跟那爲這種個人利益所支配的各種要求相適合的。可是斯密底貨幣觀中，和他底別種觀念中一樣，却也包含着很大的理性成份。他不像別的布爾喬亞貨幣論者那樣，把產生貨幣的原因歸之於所謂「集體的理性」，特別是歸之於國家；這當然對的。但是他認定促成貨幣發生之決定的作用是屬於許許多多箇人活動底理

知性。他完全沒有注意到產生於生產底性質和予人類活動以一定的界限的那些一般的經濟條件。他所指出的原因只是「每個人都企圖獲得一些爲任何人所願意收受的商品」。但是試問這是甚麼商品呢？爲甚麼人人願意收受它呢？斯密只告訴我們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物品當作此種商品：例如在古希臘，以牲畜（特別是牛）當作貨幣。但是爲什麼一定要牲畜當作貨幣呢？斯密對於這些重要的問題都規避不談。

復次，斯密底理論，不論在方法論上，或在實質上，還有一個重大的缺陷。他底分析沒有從應當開始的地方開始。這件人人願意拿自己的生產品跟它交換的商品，因而人人企圖獲得一些數量的那個商品，從何發生的呢？斯密並沒有明白說出。但是這個商品既已從總的商品堆中劃了出來，那末這就是說貨幣已經發生；這樣看來，斯密事實上無異以貨幣爲產生貨幣的原因。而貨幣發生底根本原因，始終不曾被斯密注意到。斯密不能發見貨幣發生之真實根源，主要的原因在於他沒有從商品底矛盾中去探求貨幣底根源，他不知道在跟偶然交換相適應的簡單價值形態中，已經潛藏着貨幣底「胚胎」。斯密所看見的不是貨幣發生底過程而只是它底結果。斯密底研究，事實上開始於價值底共通形態 (general form of value)，這就是說，他底研究是從某一商品業已變成一般共通等量 (general equivalent) 而這職能却尚未完全固定在此商品上的時候開始的；在那個時候，這一職能

尚在那裏由一商品轉到另一商品，隨時發生變動，而不一定由某一特定的商品經常地擔負這一職能，因而金屬品也就尚未成爲固定的共通等量。

使斯密不能理解貨幣產生之過程的，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他底理性主義；從交換發生之初，他就把它當作理性的行動看，可是事實上最初的交換却是帶着偶然性的。斯密底理性主義排除了偶然性，因此他底貨幣發生日自發觀並沒有貫徹到底，而且歸根結蒂還是以理性主義爲基礎的。可是事實上不論是交換本身或交換工具底確定，在最初都不是理性的行動，而是帶有偶然性的行動；到後來某一特定的事物固定地成爲共通的等量，那還是生產條件和全部經濟組織所決定的。斯密氏所說「有理性的人底活動」實際上也決定於社會底生產條件。斯密底錯誤，不在於他指出了這種理性活動，而在於他把這種活動當作出發點、當作基本原因看了。

斯密以「有理性的人」底活動爲產生貨幣之根源，這樣他從頭就限制了貨幣意義；他只把它看作適當的交換工具。不知道而且也不會知道貨幣是那些隨交換和商品生產底發生和發展而發生和發展的生產諸關係之表現形態。斯密只把貨幣當作「巨大的流通輪子，巨大的流通工具」(註)。同時，他也辨認不出金屬貨幣和紙幣底區別。他認爲紙幣比金幣好，因爲紙幣底消費省些。

(註)前書卷二，頁二九五。

假如貨幣果真只是流通和商業底輪子，是以追求各自的利益爲目的的人類底理性活動之產物的話，那末第一，紙幣也能成爲這樣的輪子；第二，以紙幣代替金幣執行流通工具之職能，自然更爲合理，因爲紙幣比金幣便宜得多啊。在斯密那個時代，這種貨幣觀並不是新的或特創的。前幾章中已經提到過，很多經濟思想者都把貨幣單單當作流通工具看的；不過斯密把這種貨幣觀連繫到他底一般觀念，連繫到他底分工觀、交換觀、尤其是他底經濟發展動力觀，經濟現象發生底自發性觀念上去了。

然而斯密跟他底前人們一樣，也竭力反對偽造鑄幣或劣質鑄幣。他主張只有國家有權鑄造，因爲只有它能嚴格地規定鑄幣底重量和成色。這一主張是跟他底貨幣論抵觸的，因爲既然貨幣祇是流通工具而且可以用紙符號來代替的，那末重量和成色不足有什麼關係呢？但是斯密本人沒有覺察到這一矛盾，因爲他視貨幣爲流通工具，亦爲商品，說得確當些，他視貨幣爲執行流通工具之職能的物品。當作流通工具看時，貨幣固可用紙符號來代替；但當作商品看時，它却不應偽造，不應以劣質冒充。

斯密在其關於貨幣發生之論述中，指示了貨幣即商品這一點意思；而這個商品，由於它底特殊的自然性，使它成爲最適宜於做交換底工具，它本身還是從總的商品堆中被提劃出來的。但因不了



解商品、價值、價值形式之真實的本性，他就不會了解：為何這一商品從總商品堆中被提劃了出來之後就具有一種新的質地？他不能了解這個商品跟一般的普通商品不同的本質——它是「一般的共通的商品」，是「價值底存在」（the Being of value）。同時，他也不能了解流通工具底職能僅僅是被提劃出來的那個商品底新質地底表現形式之一，因為不了解這些，所以斯密機械地（即自外地）把流通工具底職能結合於諸種商品之一，他認為這一職能也可以同樣機械地加到紙符號頭上去。

固然斯密也會說到貨幣亦可當作價值尺度（measure of value）、又可當作支付工具（means of payment）、又可當作積蓄工具（means of hoarding）、同時還可以當作世界貨幣（註），但是因為他不了解貨幣底本質，所以他不能了解這些貨幣底職能是這個本質底特殊的表現形式。而且實際上斯密還把上述諸種職能都看成流通工具這一職能底化身了。因此，凡是需要給貨幣以一個完整的估量時，斯密總常常依據貨幣為交換工具、為流通和商業底輪子這一界說作為他底基本論點。最後，我們必須指出，斯密實際上並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嚴密的貨幣論。他只是片斷地、無系統地分析到許多有關於貨幣問題的個別的原素。可是即在分析這些原素，他也沒有從它們底內部

（註）關於這些貨幣職能，在國富論前兩卷中都提到過的。

聯繫上去考察它們。例如在第一卷中（第四章），因為考察分工和交換底發生，同時也就講到了貨幣底發生；而且這裏他把貨幣解作了普通的商品。在第二卷（第二章）中，則因考察資本周轉和分析資本底各個部分而討論到貨幣問題；這裏所闡發的思想是說貨幣只是流通工具，紙幣是跟金幣完全一樣的貨幣。在第四卷中（第一章），當他批判到重商主義時，他重新又講到貨幣問題上來了：這裏重要的是在說明貨幣跟財富是不相同的。同時他又連帶地講到了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問題。

關於流通界內的貨幣數量問題，斯密底立場是跟休謨底「數量的貨幣論」相反的。斯密認定並非貨幣底數量決定商品價格，而是商品價格決定流通界所必需的貨幣量。他說商品流轉提出了對於貨幣的數量上一定的需求，而多餘的貨幣或是流往國外，或則變為寶藏品，或則被溶化而製成各種的金屬品。所以，斯密雖猛力攻擊重商主義，然在這個問題上他却跟晚期重商主義者詹姆斯·斯都亞特持同一立場的。

### 三 交換價值與勞動

斯密從貨幣起源底研究轉到了商品交換價值底研究。他結束前一問題之研究時寫道：「這樣看

來，在一切文明民族中，貨幣都變成公共的交易工具了；任何商品都靠它底幫助來賣買或互相交換。』(註一)

前面斯密所研究的是如何自然地發生分工、自然地發展交換和產生貨幣的問題，現在他要研究到如何自然地發生交換，有那些法則決定着交換的問題上來了。斯密接着說：『現在我要來說明人們互相交換商品或以商品交換貨幣時所依據的那些法則。這些法則決定着所謂商品底相對價值或交換價值。』(註二)

在研究貨幣的時候，斯密並不注意到貨幣之爲價值底形式(價值底貨幣形式)這一事實；同樣的，研究商品底交換價值時，他也不注意到商品之爲勞動生產品底形式和交換價值(或價值)之爲商品底因素這兩點。他認爲它們只是自然現象；他只想說明決定諸商品互相交換、即決定它們底交換價值的那些法則(這些法則，他當然又認爲是自然的)。

照斯密底見解，甚麼是交換價值呢？

他回答道：『應當指明，價值這一個名辭具有兩種不同的意義：有時它解說某一事物底效用

(註一)見斯密著：國富論頁三四。

(註二)同前。

性，有時則解說某事物之領有即有獲得他種事物之可能性。前者可稱之爲使用價值 (use value)，後者則爲交換價值 (exchange value) 』(註)。這樣，照斯密氏底意見，(一)商品底交換價值就是「獲得他種事物之可能性」，(二)此可能性產生於「某事物之領有」，這就是說，它產生於某種特權或權利，而產生於一定事物之佔有。所以在斯密底理解中，交換價值不成爲商品底因素，同樣的，使用價值也不是商品底因素了。

斯密既不了解商品之爲勞動生產品之歷史的形式這一性質，他又了解商品是對立底一致體，是互相排拒同時又互相維繫的兩因素底一致體。他只指出了事物之直接的效用性和佔有此事物所給予的獲得他種事物之可能性中間的區別。這一區別他認爲就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區別。而且他又只見區別而看不見它們底一致性。

因爲他所留心的只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一些法則，所以使用價值就完全被拋棄在他底注意範圍以外了，——它對於這些法則是不發生什麼影響的呵。他指示說：『具有極大使用價值的事物，往往只有很少的交換價值，或甚至完全沒有交換價值。反之，具有極大交換價值的事物，却往往只有很小的使用價值，或完全沒有使用價值。』(註)假如事物真真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話，試問那裏來的

交換價值呢？這裏就由於斯密底唯理論（或理性主義）在作怪。斯密氏是用唯理論的觀點去解釋使用價值的：他認為只有適合人類之自然要求的東西，才算是有用的；不適合的，便是無用的，亦即無使用價值的。他舉金鋼鑽為例，認為金鋼鑽是『幾乎沒有絲毫使用價值的』。他不知道人類底需求是產生於腸胃的也好，產生於好奇心或虛榮心的也好，其為需要則一。金鋼鑽底需求雖產生於好奇心或虛榮心，它確是一樣地具有真實的使用價值。

然而斯密所說，交換價值不依賴於使用價值這一論點，却是正確的。但因他只注意於交換價值，所以使用價值便被棄置在道旁了。斯密底拋棄使用價值而注意交換價值，——這樣的分裂和隔絕這兩個商品底因素，是由於他不了解商品底本性：為對立體底一致和為「布爾喬亞社會之經濟細胞底形式」。他不了解商品中所包含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一致中的矛盾，是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一切矛盾萌芽狀態。

現在讓我們回過來解釋斯密所說的『人們互相交換商品或以商品交換貨幣時所依據的那些法則吧。斯密氏寫道：『為說明決定商品之交換價值的諸基本法則起見，我想解答以下各點？第一，這種交換價值之真實尺度是什麼，或一切商品之實在價格是什麼？第二，這種實在價格由那些部分所

（註）同前，頁三四——三五；字旁之着重點，乃作者所加。

構成？第三，有時提高這種價格底某些部分或全部在它底自然水平或尋常水平以上的，是那些原因；或那些原因有時阻止市場價格（即商品底實際價格）與自然價格之符合？」（註）

這樣，斯密的交換價值論底任務，可以分爲三部分：（一）決定商品之真實價格；（二）這種真實價格由那些部分所構成；（三）說明市場價格與真實價格不符合之原因。我們來看，斯密氏怎樣解答這三個問題。

先從第一個問題說起。我們知道，在斯密以前（從彼梯起，就有人區別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而且認定自然價格是由勞動決定的。不過彼梯底重商主義立場不容許他從價格中抽出交換價值來，即從交換價值之貨幣的表現中抽出交換價值來。斯密才能從商品價格中抽出它們底交換價值，可是他底這一觀點是跟他一般的經濟思想、特別跟他底貨幣論（他一方面把貨幣只解作流通工具，另一方面則把它看成商品）聯結成一個系統的。根據他底貨幣論，不但有從價值抽取交換價值之必要，而且簡直就把價格看成交換價值了。假如照斯密底見解來說，貨幣是尋常的商品的話，那末「錢——銀——銅」實際上祇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這樣，賣買行爲和商品直接交換之間的差別就消失了。反之，把貨幣只解作流通工具，其所產生之結果亦如是。固然依據這一觀點，「錢

——「賣」和「買」——「賣」隔離地觀察時，並不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行為；因為「賣」——「買」這一行爲只是表示用商品換得了流通工具（即獲得他種商品的手段），而在「賣」——「買」這一式子中則表示以已獲得的流通工具購買商品。然而在把貨幣只解作流通工具時，「賣」——「買」——「賣」——「買」這兩次動作底殊異性就消失了：在第一次動作中價值從商品的形式轉變爲貨幣的形式；在第二次動作中，則由貨幣的轉變爲商品的形式。全部的注意都祇集中在所獲得的結果上，——全部的轉形 (metamorphose) 結果仍歸結於「賣」——「買」了。

這樣，斯密底貨幣論產生了：（一）每一賣買行為本身就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行為；或（二）全部轉形祇是商品與商品底交換。正因這樣，所以斯密有時稱交換價值爲價格（自然價格），有時則相反，稱價格爲交換價值。

假如彼梯因爲被重商主義底觀念所支配而把交換價值只歸結於價格（以爲商品底交換價格只是它底貨幣的等量，——一定的貨幣量），那末跟重商主義鬥爭的斯密却相反，他把價格歸結於交換價值了（單把它看成普通的交換價值，而忽略了此價值之貨幣的表現底意義）。在彼梯底觀念中，假如交換價值不體現於金子或銀子的話，交換價值就根本不存在。斯密氏則完全忽視了這一體現形式底意義，以爲商品價值之貨幣的表現（即價格），其意義也無非是商品與商品之直接交換而已。

彼梯所探求的，是決定商品跟金或銀的關係的那些法則；而斯密則探求決定商品與商品之關係的諸法則。前者不了解，在貨幣上僅僅表現和實現着商品底價值；後者則不了解商品價值只能在貨幣上表現和實現出來。簡括地說，提到商品底交換價值時，彼梯把它了解為自然價格；斯密則提到商品底自然價格時，把它了解為交換價值了。

他二人均以勞動決定交換價值或自然價格，他們認為勞動便是決定數量關係的一個尺度：彼梯認為它是決定商品跟貨幣底數量關係的尺度，斯密則認是決定商品與商品之數量關係的尺度。這便是彼梯與斯密之間的繼承關係：勞動價值論底始基為彼梯所奠，斯密則繼續發揮之，把它跟他底別種理論聯繫起來，藉此企圖建設一個統一的體系。可是他雖繼續發展着勞動價值論，同時却又暴露着他底觀念模糊之處和他所無能解決的困難。

請看他在解說交換價值時所表現的模糊觀念吧。斯密先說，每一個人底『富或貧乃決定於他能支配的或他能購買的那些勞動量』；後又繼續說：『因此任何商品底價值，對於佔有此商品而不想利用它或自己消費它，而是準備拿去交換別種事物的那個人，等於他拿這商品所能購得的或所能獲得其支配權的那些勞動量。這樣看來，勞動便是一切商品底交換價值之真實尺度了。』（註一）

在這段引文中，明白地指示着，斯密底意見以為商品底交換價值乃由拿這商品所能買到的那個



勞動量來決定。可是他接着又補充說：『任何物品底真實價格，即每一物品對於願意得着它的那個人的真實價值，便是爲獲得此物品所需要的勞動和精力。』（註二）這顯然是另一種意思了；即商品底交換價值乃由在獲得商品時所消費的勞動（和精力）來決定。這樣，斯密把拿商品去購得的勞動和在商品上所消費的勞動混同起來了。

何以會發生這樣的模糊觀念，把所消費的勞動跟所購買的勞動混爲一談呢？

這是發生於斯密底全部觀念系統，首先就發生於他底分工論。照斯密底意見，社會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集合體，在這個集合體中，各個成員都互相交換他們底勞動。他既不了解商品之爲勞動生產產品之歷史地一定的社會形式這一性質，他因而把商品與商品底交換解作勞動與勞動底交換。這就是促成他底勞動價值論的根源：既然商品與商品底交換，其意義不外乎勞動與勞動底交換，那末這種交換當然跟所消費的勞動相適應了。但同時這又是促成他底以活的勞動與事物化的勞動（即勞動生產產品）相混同的那種觀念的原因。在商品交換中，人與人底關係是在物與物底關係上表現出來，這一點是斯密所完全不了解的。活的勞動跟事物化的勞動之混同爲一，使斯密不得不把所消費

（註一）斯密著：國富論百三六，字旁之着點重，係作者所加。

（註二）同前。

的勞動和所購買的勞動也混爲一談了。而這一混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又因勞動力 (labour power, 斯密亦稱之爲勞動) 跟勞動生產品一樣地成爲商品這一事實而更形鞏固了。

現在我們要來考察斯密所提出的第二個任務 (問題)，即解答商品底真實價格由那些部分構成的問題。初看起來，這個問題底提出，——價格由那些部分構成的問題——本身就令人莫解，既然上文業經肯定價格是由勞動決定的。這個問題底提出，似乎表示斯密已放棄了勞動價值論底立場。

實際上他並不會放棄勞動價值論，不過因爲他混淆了不同的問題，致使他發揮出另一個不同的價值論來。這裏又暴露着斯密理論中的重大的矛盾。他事實上混淆了商品底交換價值問題和分配問題，縱然表面上他始終在研究前一個問題。斯密底思想途徑如下：勞動 (活的勞動) 是跟勞動生產品一樣的商品。這一商品底特殊性，是斯密氏所看不見的。然而他畢竟還知道，僱用勞動底採取在被實現的商品交換價值底分配上引起了若干變化：這一價值已非全部留在商品生產者手裏，它應劃分爲若干部分了。而這幾部分商品價值，照斯密底意見，歸根結蒂就成爲各部分的社會收入 (進益)。因此，他得出結論來說，商品交換價值已不表現在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而表現着幾部分社會收入。

斯密把價值論問題跟分配問題混淆起來，歸根結蒂還是由於他不了解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力

(或勞動力)。當他由商品交換底分析過渡到商品(資本)與勞動交換底分析時，他就開始碰着不可解決的矛盾了：假使商品底交換價值乃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所創造的話，那末他將如何解釋各個社會羣間之分配此價值呢？須知斯密底見解，全部交換價值都應該為工人所有的。這樣的分配，顯然是表示破壞勞動價值論了。於是斯密為自圓其說計，不得不做出這樣一個結論來：價值律只支配着「原始狀況」，即在資本和土地私有權尚未存在的那個時代。

這樣看來，我們知道斯密底總見解雖促使他主張勞動價值論，可是因為他一般地不了解商品底性質，特別是不了解一種特殊商品——勞動力——底性質，同時又認定在一切交換中都是勞動和勞動底交換；這樣一來，他底價值論和分配論就衝突起來了。依照他底價值論來說，工人勞動底全部生產品(或全部交換價值)都應為工人所有；可是依照他底分配論來說，工人却只應佔有他自己的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

斯密底意見，分配律出現之後，價值律就被破壞了。自從資本和土地私有權出現(因而亦即分配律出現)以後，勞動時間即不復為商品交換價值之內在的尺度，此時交換價值當由各部分收入來決定了。商品底交換價值決定於各部分的收入，這一理論是一個新的理論，它也就是生產成本論(theory of cost of production)。斯密本人也這樣稱呼它；他說明，在生產成本中包含着一切收

入，資本上的利潤也在內（註）。與生產成本相適合的那個價格，他稱之爲自然價格，即上述之「真實價格」而高於或低於此價格的價格，則稱爲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這樣，斯密氏就解釋到他底價值論中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商品底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底關係問題了。

由此可知，斯密底研究途徑如下：先由勞動到收入，然後再由收入到生產成本，在這條道路上，他底價值論根本改變了；從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論點爲基礎的科學的價值論，一變而爲以生產成本決定價值的庸俗理論了。

#### 四 國民收入分配論

前面已指出，照斯密底意見，商品底自然價格乃由諸種收入所組成的。斯密如何劃分這些收入呢？照他底意思，國民收入當劃分爲三大類：工資、利潤和地租。他稱這三種收入爲本始的或基本的，而其他的收入則是由此基本收入所產出的次要收入。上列三種基本收入便是形成商品價值的大原素。換句話說，商品總是按照那保證這三種收入的自然價格而出賣的。

不言而喻的，在這樣的設題之下，就必然要發生一個問題來：收入是什麼決定的呢？假使說收

入是本始的 (primary) ，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基本原素，那末試問收入本身是什麼決定的呢？斯密把三種收入分別開來作單獨的研究。他首先研究工資，說明工資如何決定的問題。

甲 工資論

斯密氏有兩種工資論：一種是適用於原始社會的，另一種是適用於布爾喬亞社會的工資論。適用於原始社會的工資定義如下：『勞動生產品形成勞動底自然報償或它底工資』(註一)。自從資本和土地私有權發生以來，工資就祇佔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因為其中須扣除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了。關於布爾喬亞社會底情形，斯密說：『在工人和使用資本於產業的資本所有者是兩種不同的場合之下，吾人總以尋常的工資觀念去理解工資。』(註二)

在原始狀態的社會內，工資是完全不成為問題的。因為它就等於勞動生產品，所以它底大小便由後者底大小來決定。歸根結蒂地講，它還得賴勞動生產率來決定。一到了布爾喬亞社會，工資立即成為問題，因為這時它祇是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了。問題是在：構成工資的是那一部分勞動生產品？它底大小如何？

(註一)同前，卷一，頁七二。

(註二)同前，頁七四。

可是斯密這兩種工資論中間却也有一個共同點：即兩者均視工資爲勞動底報償。斯密在這個問題上的強點和弱點就都在這裏。強的方面在於他一開始就把工資跟別種收入劃分開來，指出它跟利潤、地租有區別，它是勞動的收入。斯密跟他底許多前人相反，他主張昂高的工資，因爲這是有利於大多數國民——勞動民衆的。斯密在工資問題上的弱點在於他不知道工資這一範疇底特殊性，不知道它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爲此生產方式之特徵。在考察交換價值時，斯密根本忽視了商品和價值底歷史性；同樣的，在這裏他又忽視了工資底歷史性。他把工資這一個歷史的範疇錯看成自然的範疇了。他只知道工資是工作者底勞動報償；這種報償採取什麼形式，——這他認爲是無關重要的。在他底觀念中所注意的只是量的方面：在資本和土地私有權發生以前，工資是勞動生產品底全部；以後，則僅僅是一部分。這樣，勞動報償之質的區別，他完全沒有覺察到。這便是他底工資論中的根本缺點。

斯密既將工資從歷史的範疇轉變爲自然的範疇，他這樣就把它從生產領域轉移到分配領域中去了。然而斯密所稱爲工資（或自然的勞動報償）的那個生產品，事實上確是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這又表明他底觀念與事實相背離。再則，僱用勞動者並不取回他自己的全部生產品。斯密對於這一點的解釋是說：從資本和土地私有權出現以後，工人底勞動生產品就必須經過特殊的分配，而

這一分配底結果，工資只能等於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了。因此，吾人必須說明：工資是佔勞動生產品底那一部分？這是斯密氏工資論底一方面。

但是還有跟這方面並存的另一方面。工人和資本家中間的賣買，本來就與商品底賣買相類似。

而照斯密底說法，則變成勞動是和一切其他商品一樣的商品。因此，勞動應該有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那末勞動底自然價格是什麼呢？斯密實際上却沒有解答這個問題。而「勞動底自然價格」或「勞動價值」這一概念，事實上却被他轉變為勞動力底價值了。「因此，——卡爾說，——它（古典派政治經濟學——沈）所稱為勞動價值的，實際上是勞動力底價值。」（註）

這樣，由於將工資與勞動生產品相等同，使斯密接觸到分配問題，但同時由於視勞動為商品，又使他接觸到「勞動價值」底問題——與商品交換價值問題類同的問題。這兩條不同的思路，這兩個不同的出發點，使斯密底工資論成為「二元」的、自相矛盾的理論。在「工資」這一名辭底使用上，也表現着這種「二元性」：一方面他理解工資為雇用工人底工錢，另一方面他却把工資解作一般勞動者底工作報償。當他講到各種職業中的工資不一樣的時候，他提到了各種不同的勞動者來：短工，手藝匠，學徒，自由職業者（如律師、醫生等）甚至牧師。這樣看來，斯密觀念中的工資，

（註）卡爾著：資本論卷一，第十七章。

實際上是指一般從事於體力或心力勞動和服務於任何職業的人底工價而言的。在考察各國工資水平之高低時，他也把工資了解爲一般勞動者底收入，——凡是不屬於利潤或地租的收入都在內。

可是當他解釋爲何在富裕的國家中工資會增高這一點時，他却把工資了解爲雇用工人底收入，即真正的工資了。斯密氏把國家分爲三大類：（一）富裕的，（二）貧乏的，和（三）處於停滯狀態中的。第一類國家底工資向上高漲；第二類的向下降跌；第三類則不動。這是由於國民財富運動中的變化引起了對雇用勞動的需求底變化。但是他不明白，國民財富底增長伴行着國民貧乏化底增長，更不明白這兩者是同一資本主義積累過程底兩方面。他只知道國富底增長引起工資底提高和大眾福祉底增進。這樣一來，他就變成資本主義制度底辯護人了。

復次，在斯密底工資論中，已經有了工資基金論底萌芽。他底論綱，工資隨國富之增長而增長這個論綱，就是這一萌芽底表現；他認爲國富底增加就是工資基金底增加。他寫道：『很明顯的，對於靠工資生活的人的需求，只能按照那些被劃定作爲支付工資之用的基金底增加而有比例地增加起來……』（註）。

依據同一論綱，又產生了斯密底人口論。他底人口論底基點是：國富增長引起工資和勞動大眾

（註）斯密著：國富論，俄譯版，頁七七。



福祉提高，而後者又引起勞動人口底繁殖。反之：國富衰落，則工資和民衆福祉降低，因而人口就減少下去。『因此，——斯密總結起來說，——高度的勞動報償既爲國富增長之結果，同時又是人口增長底原因。』(註一) 人口底增長有賴於國富底增長，則後者當爲前者之界限。假使人口底增長超過了財富底增長，照斯密底解釋，就是超過了工資基金底增長，那時工人中間的競爭就促使工人收入底降低，因而又促成工人生殖底減少。斯密做出結論來說：『這樣看來，對人的需求，和對一切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必然支配着人底生產；當生產太慢的時候，它(對人的需求——沈)要加速它，生產太快的時候，便要阻止它。』(註二)

斯密底人口論跟他底別種理論一樣，仍逃不掉一個根本缺陷：即非歷史地解釋人口增減底法則；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之下的人口法則底特殊性。但他能將人口底生產和對勞動的市場需求聯繫起來，這却也不能不算是他底一點功績。

乙 利潤論

斯密底工資論底「二元性」(或「兩重性」)連帶地造成了他底利潤論底「二元性」。以勞動

(註一)同前書，頁八九。

(註二)同前書，頁八八。

生產品爲自然的勞動報償——工資——的那個見解，使斯密走到了「利潤爲自工人生產品中扣出的一部分」這個結論。斯密指出一切作坊和工場中的工人，大多數都需要一個東家；因爲東家能供給他們工作底材料，預支給他們工資等等。東家既下了本，他就有權獲得他們底勞動生產品中的一份，這一份就是東家底利潤。斯密以工資爲勞動底自然價格這一觀點，產生了他底自然利潤論。勞動底報償是自然的，資本底報償也一樣地自然的。

然在另一方面，斯密有時却把利潤看成生產成本底一部分。爲了這一點，他提出了兩點理由來。第一，『假使投資者按照價格出賣商品而不得着在他底地方視爲平常的利潤率的話，那末很明顯的，他就決不願做這樣的賣買了。事實上，他若把資本消費到別方面去，他就可穩得利潤的。』

(註一) 第二，『他底利潤，就是他底收入，他藉以獲得生活資料的那個真實基金。當他製造……商品的時候，他預支給工人以工資或工人底生活資料，同樣地他也對自己預支生活資料，後者尋常總適合着他在出賣商品時所能得到的那個利潤的。』(註二) 這樣，他把利潤解釋成「預支給他自己的生活資料」，亦即生產成本之一部分了。

(註一)同前書，頁六二。

(註二)同前書，頁六二——六三。

斯密把利潤解作勞動生產品之一份，事實上就等於把它解作剩餘價值；這一來，斯密在解剖布爾喬亞社會之「生理」、揭露利潤之秘密這一工作上，確實做了一次極有意義的嘗試。在這點上，他比他底前人們也進了一大步。重農學派（和以前的彼梯）把地租看成剩餘勞動底產物；斯密則視利潤為剩餘勞動，並以利潤為剩餘價值底基本形態。這樣，他就大大地接近於資本主義現實之正確的理解了。固然，斯密還不知道從利潤中抽出地租來（地租亦為利潤之一部分），他不知道地租是超額利潤底特殊形式。然而這並沒有減少他在創建科學的利潤論這種工作中的意義。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指示出來的，就是斯密已知從利潤中抽出利息來，即把利息看成利潤底一部分，它是工商業資本金讓渡給信貸資本金的一部分。因此斯密認定利率（rate of interest）底運動有賴於利潤率（rate of profit）底運動。

但是他底工資論告訴我們：勞動生產品為自然的勞動報償——工資。這是他用理論的演繹法所得來的結論。而他底利潤論則確定利潤是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那末所謂自然的勞動報償事實上也只是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了。為要說明這一點，他不得不採用描寫的歸納法（即所謂「常用法」*exoteric method*）——亦即攔開理論的分析而就現象底表面狀態來描寫了。於是他說工資是勞動底價格，利潤則是資本所產生的東西，是跟資本自然聯繫着的東西。

關於利潤率發展底傾向問題，斯密指出它是隨着工商業底發展而下降的。因爲工商業一發達（即國富增進），互相競爭的資本就多；資本既多，利潤率自然下降。而利潤率底下降立即要影響到利率底變動，使之隨着下降。因此，在斯密看來，利率或利潤率底下降是社會財富發達底徵象，同時又是工資和國民福祉提高底徵象。唯其如此，所以他讚揚低利率而反對它底高漲。

此外，斯密還發揮了利潤平均化底見解。他認爲在勞動和資本能自由移動的條件之下，部門不同的資本必然產生相等的利潤率；在性質不同的諸種勞動間，同等勞動亦必然獲得同等報酬。他認定這種傾向是自然的。利潤率平均化和勞動報酬平均化底傾向底肯定，也是斯密理論底貢獻之一。

### 丙 地租論

斯密底地租論中的矛盾，比他底工資論和利潤論中的矛盾更大些。他底地租論也有兩個不同的出發點，因而有兩條不同的、矛盾的理論路線和兩個完全相反的結論。一條路線是以他底勞動價值論爲出發點，另一條則以生產成本論爲出發點。

關於從勞動價值論出發的那條路線，他寫道：「一旦土地變成了私有財產，土地所有者就要求從勞動者在這塊土地上所能生產的全部生產品中取得一份……」。他底地租就是從耕種這塊土地時所消費的勞動底生產品中第一批被扣除的部分。」（註）這是斯密底第一種地租論；它斷定地租是剩餘

生產品或剩餘勞動底特殊形態之一。這裏揭露了地租底剝削性；這種理解當然是有科學價值的。

但是除這一種地租論以外，斯密還有一種以其生產成本論為根據的地租論。依照這種地租論，地租是利用土地之自然的報償，猶如利潤之為資本底自然報償，工資之為勞動底自然價格一樣。

這兩種地租論跟前面所述及的兩種工資論和利潤論完全相適應；它們都是從兩種不同的觀念發生的。這兩種觀念可簡括地表達於以下二點：

(一) 商品價值決定於它們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即是說，視勞動生產品為勞動之自然的報償，後者即是工資；利潤與地租俱為工人勞動生產品之一部分。

(二) 商品價值決定於它們底生產成本：劃生產成本為下列三種收入：工資、利潤、地租；把這些收入底每一種都看成自然的和尋常的（即習慣上的）。

第一種觀念是科學的，它是「解剖布爾喬亞社會之生理」底一種嘗試。第二種觀念是庸俗的，它只限於社會表面現象底描寫。前者開拓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底發展之路，後者則替以後的俗流經濟學說奠定了始基。

復次，斯密底地租觀除上述兩種外，他還有一種新的見解。他看出農業中有好些個工業中所沒

(註)同前書，頁七三。

有的特點。首先，土地壟斷在一定的社會羣手裏，給予後者以一定的收入。收地租的地主完全不參加生產和流通。除此以外，他又和放款資本家不同，他不冒絲毫的險。照這些特點看來，地租當然不能歸入生產成本費中去了。這樣就產生了第三種地租論。斯密寫道：『這樣說來，當作利用土地之報酬看的地租，自然而然地成爲壟斷價格了。』（註一）他由此而得出一個完全合乎邏輯的結論來：『因此，地租之成爲生產品價格底組成部分，其原因由與工資和利潤不同。工資和資本利潤之高低，乃生產品價格高或低之原因；但地租之大或小則爲後者（即生產品價格之高或低——沈）之結果。』（註二）

這樣，根據斯密底第三種地租論，則地租爲農產品壟斷價格之產物。這是跟前面兩種地租觀完全衝突的。假如地租是壟斷價格之產物的話，那末，第一，它發生於流通界中；第二，它是由農產品購買者所償付的。因此，它既非工人勞動生產品之一部或這種生產品底價值之一部（與第一種理論相衝突），亦非商品自然價格之組成部分（與第二種觀點衝突）。

但是這還不算數。斯密還有第四種地租論呢。這第四種理論是帶着重農主義色彩的。斯密雖反

（註一）同前書，頁一五九。

（註二）同前書，頁一六〇。

對重農學說，自己却也逃避不掉一種幻想：以爲在農業中，自然也參加生產的；或以爲農業中的勞動比工業中的更有生產性些（即生產率更大些）。斯密寫道：「此外，在農村經濟中，自然也和人類共同工作的；雖然它底工作不需要任何消費，可是它底生產品却也和所值很貴的工人底生產品一樣地具有價值的。」（註一）斯密由此而做出以下一個結論來：「可以把這種地租看成自然力量底產物，這種自然力量底利用權是地主拿出供給農作家的。地租之高低，有賴於此種力量之固有的大小，換句話說，有賴於固有的、自然的或人工創造的土地生產性（即肥瘠程度——沈）。」（註二）簡單地說，這裏斯密把地租解作自然（土地生產性）底產物了。

## 五 資本之組成及其他形態

斯密對於資本的理解，正同他對利潤、地租等的理解一樣，完全不注意到它是一定的社會關係之物的表現。他不從資本中（正像他不從雇用勞動中一樣）去找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根源；他不了解在工資、利潤、地租等等上就表現着那些關係。他只把它們看作商品底交換價值之組成部分。

（註一）同前書，頁三七三。

（註二）同前書，頁三七八。

他觀念中的資本，不是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而祇是「國民財富」底決定要素——它賦予勞動以生產性而為勞動之「發動機」。這裏，他把資本底意義列在勞動之前了。同時，他又把資本跟生產手段等同起來，以為資本就是生產手段，生產手段就是資本。照他底意見，資本就是歸作繼續生產之用的積聚起的勞動 (accumulated labour)。而積聚起的勞動底具體形式，斯密認為祇有生產手段，因為它是過去的勞動底產物(註)。所以他在資本問題上，確定自己的任務在於說明：(一)資本及其積聚之作用，(二)資本之組成，(三)資本之各種形態及其不同的應用。斯密底資本論，就適應着這三個任務而劃分為以下的三個組成部分：(一)資本總論；(二)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論；(三)資本底各種形態及其不同的應用論。下面讓我們約略地分別闡述吧。

#### 甲 資本總論

首先要指出，斯密底資本論實際上是積蓄論。他說在原始時代，人類直接從自然界取得食物，現取現吃，毫無積蓄可言。祇是隨着分工和交換底發達，纔有積蓄出現。這時人們不單靠自己勞動底生產品，亦且靠別人勞動底生產品來維持生活：用自己的勞動生產品去跟別人的勞動生產品相交換。因此，積蓄就成為必要了。

(註)由於這樣的見解，所以他看不見貨幣之為資本底貨幣形態，勞動力之為生產底資本一部分。



·斯密把積蓄分爲兩部分：一部分作爲直接消費之用，另一部分則爲繼續生產之用。後者能產生特殊的收入，它就是資本。這樣，斯密給資本下了兩重的定義：一方面資本是指定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那部分積蓄；另一方面資本是給予新收入或增加舊收入的一部分積蓄。

這裏要指出，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積蓄不一定能給予新收入的；反過來說，不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積蓄（如出租給人的房屋），有時倒能夠給予新收入。這是一。其二，依據上列的定義——，資本作爲繼續生產之用的財富積蓄，——則在這種積蓄爲直接生產者所有的時候，它們就已成爲資本了。可是根據「資本爲給予收入（利潤）之積蓄」這一定義，則財富積蓄之成爲資本，只有當它們爲非生產者所有並藉生產者以吸取進益的時候。

資本之是否爲直接生產者所有的積蓄，抑只是與直接生產者分離而爲非生產者所有的積蓄？——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可以決定資本之物質的組成。假如說，屬於直接生產者的積蓄就是資本，那末資本底物質成份只是由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條件——簡言之，由生產手段——所構成的那些財富積蓄。反之，假如資本只是與生產者分離而爲非生產者所有的積蓄，那末資本底物質成份除生產手段外還有雇用勞動者維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費費料了。斯密雖亦承認雇用勞動者底消費是生產的，但他不知道這一承認就根本破壞了他自己的資本和積蓄論。因爲這裏斯密底劃分那作爲生產

用的積蓄和作爲消費用的積蓄兩者之區別，已無存在的餘地；進一步說，資本和收入底區別也必歸消滅。於是斯密就不能不走到十分庸俗的結論上去：對於供給工人以消費資料的資本家，這些消費資料是資本，而對於工人則是收入！

斯密不知道劃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兩部分，這當然由於他缺乏剩餘價值論（他祇有化利潤爲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的企圖）的緣故。因爲爲剩餘價值之變態形式的利潤，其所表現之現象爲全部資本之「產物」，利潤率就是利潤對全部資本之關係底表現。就現象上看，利潤是和資本底大小成正比例的。因此斯密很堅定地保持自己的立場說，資本底各部分都同程度地產生利潤。斯密所劃分的資本部分，祇是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兩部分；作爲工人消費資料的那部分資本，被斯密歸入流動資本中去了。

由於同樣的原因，斯密又不知道劃分、且不能劃分三種的資本形態：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因爲三種資本形態之區別在於它們各自在資本循環過程中（因而亦即在剩餘價值底再生產過程中）所演的作用：生產資本之作用爲生產剩餘價值，貨幣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生產之必要的物質前提，商品資本——實現已生產出的剩餘價值；而斯密既無剩餘價值論，他自然沒有可能劃分諸資本形態之區別了。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就是斯密在資本底生產性問題底理解上，實比重農學派落後了一大步。固然他反對重農學派之否認工業資本底生產性這一點是對的；但是他以為商業資本也是生產利潤的資本，流通跟生產一樣的是利潤底源泉。這顯然表示斯密比重農學派落後的地方了。

### 乙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

斯密確定資本之最主要的特徵是生產利潤。他並以此作為劃分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根據。

斯密給固定資本下定義道：『資本可使用於改良土地，購買有用的機器和工具或別種類似的事物，這些事物可不經過由一個所有者到別個所有者讓渡，或不經過流通而產生收入或利潤的。這樣的資本，吾人就有全權稱之為固定資本。』（註一）流動資本是什麼呢？『它（資本——沈）可以用之於生產，用之於商品底改製或購買而以轉售與獲利為目的。被人這樣去使用的資本，當它尙留在它底領主手裏或保持着它底固有形態的時候，它不給予其領主以收入或利潤。……』（註二）

這樣看來，斯密認定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底區別僅僅在於它們產生收入（利潤）底方式上的區別：流動資本是藉流通，藉由一手過渡到另一手的運動而產生利潤；固定資本則無需參加流通而產

（註一）斯密著：國富論卷一，頁二八一。

（註二）同前書，頁二八〇——二八一。

生利潤。這裏顯然存在着一個極大的費解：既然固定資本不參加任何的流通，而利潤又說是從流通中吸取來的，那末試問它如何能給予利潤呢？斯密也彷彿自己感覺到這樣的費解的模樣，於是解釋道：『若不靠流動資本底幫助，任何固定資本都不能產生絲毫利潤。那怕最有用的機器和生產工具，要是沒有供給它們所改造的材料和使用它們的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那種流動資本的話，便什麼生產不出來。』（註）

所以在斯密看來，流動資本不但藉流通而「自行」產生利潤，而且還「幫助」固定資本產生利潤，因為它既供給生產所需的原料，又供給工人生活所需的物品。

斯密將流動與固定兩種資本均分為四部分積蓄。流動資本之四部分如下：（一）作為流動資本一部分之流通工具用的貨幣；（二）工商業家手中之糧食儲積；（三）原料和半製成品之儲積；（四）商店中、貨棧中所存之製成品儲積。固定資本亦分為四部分如下：（一）機器及其他必需的勞動工具；（二）不作為個人消費而以工商業之用途為目的的房屋與其建築；店房，工場等等之建築；（三）以提高土地上之收入為目的的一切土地改良，及除害，施肥，改良灌溉等等；（四）一切居民或社會成員之已獲得的和有用的能力。……

至於講到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底關係，那末除了上面所指出的的一點（固定資本靠流動資本之助而產生利潤）外，還有以下的：『任何固定資本最初總發生於流動資本而且要求從這一泉源（指流動資本——沈）中得到經常的補充。一切有用的機器和生產工具，最初都發生於流動資本，後者供給它們所由製成的材料和製造它們的那些工人底生活資料。』（註）

斯密因爲不了解資本爲階級關係之表現，不了解資本本身是一種運動，所以他不可能理解資本底結構，即一方面劃分資本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另一方面劃分爲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前一種劃分他完全沒有，後一種劃分則被解釋錯誤了。

斯密認爲祇有流動資本在流通着（照斯密底解釋，資本流通就是它脫離它底主人之手的意思）；固定資本則永遠留在主人底所有權中。這樣的理解顯然錯誤的。依照這樣的解釋，則資本底流通被簡化爲事物底運動，即簡化爲一個技術的過程了。這是一。其二，它又被簡化爲所有權之由一人之手讓渡到另一主人之手的法律上的讓渡行爲了。在這樣的了解之下，固定資本確實是不流通的了。然而我們知道，它底價值却是在流通着；斯密既不了解資本是一種運動，當然不會了解固定資本底流通了。它跟流動資本之不同點，僅僅在於它底價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着（即被轉移到新

（註）卡爾著：資本論卷二，第十九章，第二節。

的生產品中去），而流動資本則經過一度生產之後，全部價值即盡被轉移於新生產品中去。斯密既是用自然的和法律的觀點去理解流通，他當然看不見價值底運動，看不見價值形式底更替；這就是說，他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資本流通。

復次，斯密對於兩部分資本底構成原素的了解，也是很糊塗的。首先要指出，他彷彿是根據這些原素底自然性而不根據它們在資本循環（Circulation or rotation of Capital）中的職能來確定上述兩部分資本之含義似的，要不然他為什麼斷言有用的機器、工具、房屋等常常是固定資本呢（但在某幾處地方他是解釋得對的）？實際上只有當這些東西處於生產階段時，即它們作為生產手段用時，它們才成為固定資本——生產資本底一部分；處在流通階段上時，它們祇是商品資本。

其次，斯密沒有把勞動力本身歸入資本底範疇中去。這是自然的，因為在他看來勞動力並不是「積聚起來的積蓄」，它當然不能成為資本。可以成為資本的，祇是工人底積聚起來的知識技巧。然而我們知道，實際上勞動力一與資本交換之後，就變成生產資本底一部分了。斯密因不認勞動力為資本，所以他把工人底生活資料歸入流動資本之內。這樣，他在確定流動資本之原素時，又犯了同樣的錯誤——不根據它們在資本循環中的職能。須知工人底生活資料並不屬於生產資本，因而它也就不是流動資本。工人底生活資料並非由資本家買去給養工人，而是工人自己從資本家那裏去購

買的。因此這些貨料，當它們留在資本家手裏的時候，它們只是商品資本；在『資本——貨幣』這個階段上它們乃轉變為貨幣形態。

對於流動資本底其他諸原素，斯密底了解也同樣地不確當。例如他以爲凡是操在商人或工業家手裏的糧食、原料、半製造品以及儲藏在貨棧裏的商品，一概都是流動資本，這種觀念是十分糊塗的。同樣，把貨幣看成流動資本，也是他不理解資本三形態之劃分的緣故。

丙 資本的應用

上面說過，斯密對於商業資本本質的了解，比重農學派還落後一步，因爲他認爲商業資本是跟工業資本一樣地產生利潤的。這裏我們就要把斯密所寫述的各種資本底應用（用途）提出來簡單地評述一下。

斯密寫道：『資本可由四種方式來消費：第一，消費於原料品底獲得，這種原料是社會每年所要消費的；第二，消費於這類原料底製造和改製俾作爲直接利用和消費之用；第三，消費於原料品或製成品之由有多餘的地方輸送到缺少它們的地方去；第四，消費於各種生產品之分爲小件（按即包裝，分類等等上之費用——沈）以適應消費者之需要。依第一種方式消費的是一切從事土地改良或耕作的人、開礦或從事漁業的人底資本；依第二種方式消費的是一切產業家底資本——消費在

工場裏的；依第三種方式的是一切批發商人底資本；依第四種方式的則是一切零售商人底資本。」

(註一)

這裏斯密把批發商和零售商都看成單獨的、跟他種企業並立的平等的資本底，應用方式，這就表示他以爲商業是和工業一樣地有生產的。雖然斯密十分激烈地批判了重商主義，可是由於他不能了解生產和流通底一致（以生產爲基源的），他就不能完全克服重商主義；承認商業有生產性，仍脫不了重商主義臭味。

講到農業中資本底應用時，斯密又發出了一些重農主義底臭味。由於不了解商品爲使用價值和價值之對立底一致，斯密把農業底生產性估量太高了。他形式上雖區別使用價值和價值，事實上却把它們混淆起來了。他說：『沒有一種資本運用生產的勞動有像農業中的資本所運用的那樣多。因爲這裏不但農業雇工而且還有耕畜，都是生產的勞動者。此外，在農業中，自然也在與人共同工作；自然底生產品亦具有一定的價值，正和價值昂貴的工人底生產品一樣。……因此參加農業生產的工人和工作的牲畜，不但再生產那等於他們消費或等於資本價值的價值（包含資本家底利潤在內），而且還生產了更大的價值。在農業家底資本和他底全部利潤以上，他們還經常地再生產土地所



有者底地租。』(註)

這裏，除了重農主義底臭味外，還充分地表現着庸俗氣味；說什麼自然和工作的牲畜跟人一樣地生產價值！他底理論簡括起來說是：因為農業中生產的勞動量（注意：包括自然和牲畜底勞力在內！）比任何部門大得多，所以農業中所生產的使用價值也比別的部門大得多，因而交換價值也大得多，其中一部分就作為地租交給地主了。由此得出結論來：投於農業中的資本，其生產性為最大；『這是現存一切資本應用方式中最有利於社會的一種』。

## 第六節 社會資本、再生產與積累

奎奈之設想社會資本底再生產過程之天才的嘗試，斯密並未加以繼續發揮，這是首先應當指出的。相反的斯密底定理 (Smith's dogma) 幾乎使他沒有可能繼續發展奎奈底嘗試。

斯密底定理 (或信條) 就是斷定一切商品底價格可劃分為三種收入：工資、利潤、地租。斯密還會加以申述道，這不僅適用於說明個別商品底價格，亦且適用於說明社會全部商品集堆、一年的全部生產品之價格。但是這裏就有一個問題發生了：假如商品價格祇是由幾種收入所組成的，那末

(註) 同前書，頁三六九。

試問再生產、甚至單純再生產，如何可能呢？須知再生產過程是包括着流通的；一年生產品底諸組成部分都必須帶到商品市場上去出賣；那裏資本的價值，除了它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又重新開始它資本循環過程。可是照斯密底見解，商品在市場上實現出來後，就變成各種收入了。既然都變為收入，作為繼續生產用的資本就落了空；因此，任何再生產都沒有可能了。

斯密費盡心血，從這重難關中找到了一條似是而非的出路。這條出路就是他把收入分為總收入和純收入兩種。他所謂總收入是指『國民每年全部土地和勞動底生產品』，而所謂純收入是指『他們……歸入自己的消費積蓄或消費在自己生活上、快樂上和享受上的那部分收入』。可是這麼一說，他無異偷偷地把資本歸入了商品價格底構成中去，因而也就自己打破自己的「定理」或「信條」。既然所消費的祇是純收入，而不是全部收入，那末再生產就有可能。但是這無異於承認商品價格事實上不祇包括工資、利潤和地租而且還有原先所投的資本價值。總結地說，斯密雖牢牢地堅持他底「定理」，肯定商品價格僅由收入所構成，換言之即僅等於  $A + B$ ，然而同時他又「暗渡陳倉」地把資本歸併於商品價格構成中，換言之即事實上承認後者為  $C + A + B$  之和。

邱梁諾夫說：『亞丹·斯密落到這個錯誤中去，是因為他把生產品底價值跟新的價值創造混同起來了：後者才真是由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構成的；而前者則除此以外還有不變資本。』（註）這

樣看來，斯密想從難關中找尋出路，但是他自以為出路的出路，實際上却是「此路不通」！

但是第一重難關沒有打破，第二重難關又來了。

你把社會一年的生產品看作價值之總和時，固然或許還可以抽象地把它分解為幾種收入（自然祇是抽象的設想），可是假如把一年的社會生產品從它們底實物形態上去觀察時（要分析整個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必須作如是觀），那末只把它分解為幾種收入是無論怎樣都不行（那怕只是抽象地）的了。因為在一年中的社會生產品中，常常有個人所不能消費的部分，——不變資本底實物原素（如機器、原料等），特別是固定資本底實物原素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從這重難關中，斯密也企圖打開一條出路來。第一，他把表現於價值的收入跟表現於生產品的收入區別開來；第二，又把從各個人底觀點來看收入跟從整個社會着眼的收入分出區別來。他看出了生產手段底生產和消費資料底生產這兩大社會生產門類底區別，因而又看到了社會全部生產品之分解為幾種實物的收入底不可能，於是他就不得不劃出上述兩種區別來。照他底解釋，社會底純收入，——即它所能消費的生產品，——祇有在生產消費資料的社會生產門類（即「第二門類」）中生產的。在生產生產手段的門類（即「第一門類」）中，則生產社會資本（這裏斯密又把資本跟

（註）耶梁諾夫全集卷三，頁二五。

生產手段等同看待了)。可是工人是在兩大門類中都獲得收入的，——這又迫着他從貨幣的表現上去觀察工人底收入，把它看成勞動底價格。

生活資料和製成品，是斯密視為流動資本的。可是這裏新的困難又發生了：一方面，他認定這些東西是社會底純收入，另一方面又說它們是流動資本。斯密又申述道：「在這一點上，社會底流動資本和個人底流動資本，是有區別的。個人底流動資本完全排除在他底純收入之外而且永遠不能成爲純收入之一部分；個人底純收入乃完全由他底利潤所構成的。但每個人底流動資本雖爲社會流動資本之一部分，然而它並非絕對地被排除在社會純收入之外，它可以成爲這種收入之一部分的……。」(註)

這樣，斯密實際上除去了收入和資本底界線，他沒有能夠從個人資本過渡到社會資本，把兩者底關係正確地溝通起來。實際上，由於他底「定理」——把商品價格只分解爲幾種收入，——他始終沒有給、而且不能給一個社會生產或社會資本底分析。

最後，我們要簡單地講一講斯密底積聚論，作爲我們探討他底經濟學說的結尾。

斯密底積聚論，是跟他底生產勞動論合併起來談的。他認爲生產的勞動是積聚底最重要的因

(註)轉錄卡爾著：資本論卷二，頁二六一——二六二。

素；反過來說，積累則被他看成應用和發展生產勞動底條件。資本積累和生產勞動二者互相爲用、互相依賴的。那末照斯密底意見，究竟什麼是生產勞動，什麼是不生產勞動呢？

對於這個問題，也像對於別的問題一樣：他指出了好些特徵來，事實上則無異下了幾個互相抵觸的定義。斯密首先解釋生產勞動道：『一種勞動底形態增加事物之價值；另一種形態則不發生這樣的的作用。前者……可以稱爲生產勞動；後者則爲不生產勞動。』（註一）這樣，創造價值與否，便是生產，或不生產勞動底決定指標。可是斯密認爲流通中的勞動、商業中的勞動也創造價值的，所以也是生產勞動。

可是斯密又繼續解釋道：『工場工人底勞動在任何個別的事物或商品中凝結着和實現着。』（註二）這就是說，生產勞動底另一特徵是「凝結於商品中」。這裏表示出斯密認爲價值只有在生產使用價值的地方才被創造出來。這是對的。但是這一解釋却不適用於商業中的勞動，——斯密也看作生產勞動的勞動。因爲依照斯密底第二個解釋，只有生產事物的勞動是生產的，那末流通（商業）中的勞動當然是不生產的了。

（註一）斯密著：國富論卷一，頁三三八。

（註二）同前書，同頁。

斯密定底第三個定義又來了。他接着寫道：「這種事物（指工場工人所生產的事物而言——沈）底價格往後能夠，假使需要的話，促成一定的勞動量底運動，完全像頭一次促成它的情形一樣。」（註一）這段話表示，生產勞動不祇是單純地生產商品的動勞而是生產資本的勞動。因為所謂「促成勞動底運動」一語，意即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並將後者投入生產過程；而購買勞動力的那種「事物」，捨資本無他。這一定義顯然又將前兩個定義完全推翻了。因此卡爾評估斯密底生產勞動觀時指出道：「在給生產勞動下定義以示其與不生產動之區別時，斯密又表現着他底兩重性，正如他在其他一切問題上所表現的一樣。我們看到他時常把他稱為生產勞動底兩種定義混淆起來……」。卡爾又認為這兩種定義中，一種是正確的，——即確定生產勞動之意念為產生資本和剩餘價值的勞動。另一種定義是不正確的，——即認流通中、商業中的勞動為生產勞動的那種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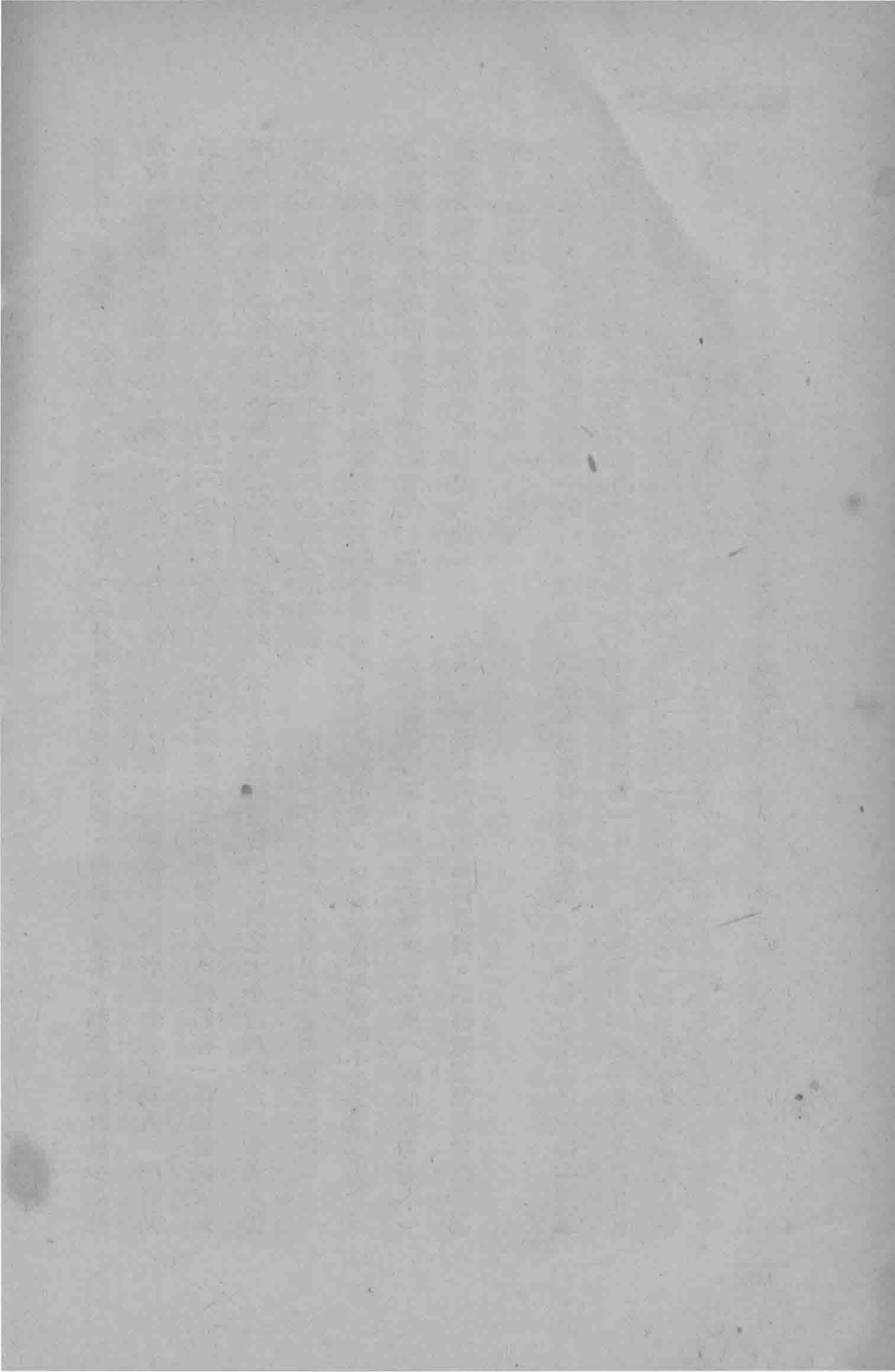
斯密認定資本積累和生產勞動是互相為用的：生產勞動為積累之重要因素；積累為運用和發展生產勞動之條件。這是前面已經指明了的。斯密認為只有把積蓄用之於維持生產工人之生活時，這樣的消費才算是生產的消費，其任務就在於實行積累。反之，用於維持不生產工人之生活的積蓄，則為不生產的消費，是減少國家資本的消費。屬於不生產的消費的，斯密指出有家庭中的一切役侍

（註一）同前書，頁三三八——三三九。

底消費，有官吏、公務員、軍隊、教士、以及凡是不生產價值、商品、資本、利潤等而反減少這些東西的消費。他說明所有這一切人不但自己都不生產，而且還因他們底消費而剝奪了別人（生產的工人）生產底機會。生產的和不生生產的勞動者，以及那些完全不勞動的人，他們都一樣地從國家每年的土地和勞動底生產總量中取得生活資料的。不生生產者所消費的份額之大小乃與生產勞動者之份額成反比；因而次年底生產量亦必隨之而增減，——因為一年的總生產量是生產勞動底產物啊。

根據這種理由，所以斯密竭力主張必需縮減不生生產的消費。只有盡量地縮減不生生產的消費，才會盡量地增加生產勞動者底消費；生產的消費既盡量增加，就等於國家底生產（因而亦即資本）盡量地擴大。這就是斯密所主張的資本積累方法。而資本積累底直接原因，則他確定為節儉而非勤勞。這又是一個帶着庸俗氣味的觀點。

最後，要指出他底積累觀中的另一錯誤，就是依照他前面的意見——「只有用之於維持生產工人之生活的消費，才是生產的消費；它底任務在於實行積累」，——則利潤中的積累部分全是用於支付工資的了。這裏，斯密又把不變資本底積累「忘記」了。他「忘掉」了：為要增添工人，必需要同時增添生產手段。





## 第五章 達微·李嘉圖

### 第一節 李嘉圖底時代背景

亞丹·斯密之直接的繼承人達微·李嘉圖 (David Ricardo, 1772—1823), 是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發展底最高點; 也可以說, 是這派政治經濟學底完成者。在討論李嘉圖學說本身以前, 照例先得把李氏底時代條件——經濟、政治、社會諸條件——提出來作一番概略的考察。

李嘉圖底時代, 包括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 這是一個極顯赫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內, 發生過許多決定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 如英國的工業革命, 法蘭西大革命, 以後變為拿破崙戰爭的反甲可賓戰爭, 英國底大陸封鎖以及由這些大事變所派生的許多別的事件。

假使亞丹·斯密底時代還是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制過渡到機器生產制的時代, 那末李嘉圖底時代, 便是這一過程底完成時代, 而完成這一過程(過渡的過程)的, 不是別的, 正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完成之日, 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勝之時。弗里德列赫 (Friedrich Engels) 在其

名著英國工人階級之境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 一書中，對工業革命給了一個正確的科學的分析和估計。其後鄧梁諾夫特別重視這一估計之重大的科學意義。他曾從英國工人階級之境况中引用了下列一段：「近六十年來英國的工業發展史，在人類底編年史中是沒有能同它比擬的。在六十、八十年以前，英國跟別的任何國家一樣：只有些小的城市，小規模的和簡單的工業，相對地大量的農業人口……工業革命對於英國的意義，猶如政治革命之對於法國和哲學革命之對於德國。而一七六〇年的英國和一八四四年的英國之區別，至少有像舊制度下的法國和七月革命（註一）時的法國之區別那麼大。」（註二）

講到工業革命本身，它最初發生於紡紗工業，就是一七六四年詹姆斯·哈格里斯所發明的多軸紡紗機（jenny）。紡紗技術底革新很快地引起了織布機底改革。紡織工業革命底完成，其他重工業部門和運輸事業底技術也都隨之而很快地革新。至一七八一年瓦特（Watt）底革新的蒸汽發動機（瓦特最初發明的蒸汽機是抽水機，在一七六九年），澈底地改變了一切工業部門底發動力技術。這樣，生產工作底動力，乃由人和動物底力量（甚至還有自然底力量——如風和水）過渡到蒸汽底

（註一）『七月革命』即法國一八三〇年七月之革命，結果成立路易·菲立潑之『七月帝制』（July Monarchy）。

（註二）鄧氏全集三版，卷二，頁九二。

力量了。其所以發生這個轉變，當然還是由於勞動工具之由手工的過渡到自動的 (automatic) 緣故。再則，新的發動力底出現又有可能把個別的工作機轉變為整個機器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原素。一個發動機能同時轉動許多的工作機。發動機不斷地發展，它所能同時轉動的工作機數量，即隨之而增加，而同時傳達機也就跟着發展成爲一個複雜的機體了。

這樣，從技術方面講，工業革命底實質就是發明自動機以代替人工，但同時這種自動機又須受人底管理和駕駛。可是技術是跟經濟分不開的；技術底內容、它底運動法則是決定於經濟的。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機器祇是『剩餘價值底生產手段』而已。所以工業的技術革命底完成，就經濟的意義言，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完全勝利。

隨着技術革命底發展，新的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就逐漸地建立和普及起來了。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特點在於這裏生產的勞動者變成客體，而生產工具——機器倒變成主體：前者爲後者所支配了。『在工廠中，死的機器是離開他們（工人們——沈）而獨立存在的；他們則成爲機器底活的附屬品。』（註）

同時，工人底成份也改變了。機器的生產，使大量地採用女工和童工這回事，在技術上成爲可

（註）卡爾著：資本論卷一，第十三章，第四節。

能而在經濟上成爲必然。採用婦女和兒童勞動之技術的可能性，發生於新式自動機底設置，使勞動者底工作的動作大大地簡單化，而他們底熟練的技巧幾乎變成不需要了。而且，在機器生產底條件之下，一切繁重的工作大都由機器來擔任，於是工人體力底需要也大大地減少了。因此，體力薄弱而無甚熟練程度的婦女和兒童，也可充當工廠工人了。至於採用女工和童工之經濟的必然性，則由於工業革命大大地惡化了勞動大衆底境况，以致工人家庭中家長一人所得的工資不足以維持全家庭生活。

從另一方面講，女工和童工底採用，反過來又更加惡化工人底生活：勞動底報酬不斷地降低下去。由於勞動市場上競爭底激化，工資逐漸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去了。

不但這樣，工人階級生活境况底惡化，又因工業革命所引起的勞動強度和長度底增進而更甚。機器底改進不讓工人在全部工作時間內有片刻休止或鬆懈底機會。資本家就藉此種靈敏的機器底幫助以增加剩餘價值底榨取。不但如此，資本家爲了這個目的，還要把勞動日延長到最大限度以上，以增加所謂絕對的剩餘價值。這種延長勞動日的榨取方法，在李嘉圖底時代是比較很流行的。此外，工人階級境况底惡化，由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所促成的，還有龐大的產業後備軍底形成和擴大。

這樣，新的工廠制度，加強了對勞動階級的榨取，不斷地、加速地惡化勞動大眾底境况，使之日益趨於破產。但是對於資本家，它却給予極大的利益：在工廠制度之下，資本家底財富積聚隨着勞動階級底貧乏化而不斷地、加速地增長起來。資本主義運動法則底特點就在於資本底積聚是藉勞動者底貧乏化，而不能不藉勞動者底貧乏化以實現的。所以工業革命造成了這樣的局面：在一個極端上是財富底激增；在另一極端上則為貧乏底擴大。這種形勢在工業革命底過程中就已暴露出來。

此外還有一點要指出，即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上已經佔有統治的地位。工業革命把英國轉變為「世界底工廠」了。

工業革命底完成和資本主義底勝利的發展，不能不引起社會底階級結構底重大變動。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個社會羣，當然在工業革命以前已經存在的。可是工業革命却把這三個社會羣底界限劃得很清楚，而把布爾喬亞社會底階級結構底輪廓，異常鮮明地描繪出來了：每一個社會羣底特點都表現得很明顯了。

例如英國的紡織勞動者，在工業革命以前還是「兼任」農作者的，然而到工業革命以後，他們變成純粹的紡織者，紡織的無產者了。因為隨着機器的紡織工業底發生，由於機械物價廉物美，社會對它的需求激增，因而生產就不斷地擴張。對於紡織勞動者的需求日增，他們底工資自然就高漲

起來（當然是一時的）。這樣一來，紡織機給紡織勞動者以更大的收入，其結果是他們完全拋棄了農業而專務紡織業了。這便是由「兼任」農民的半無產者變為全無產者的過程底一方面。

但同時在農業人口中，也發生了階級結構底變動。弗里德列赫說：「這第一次的，尙十分完善的機器底出現，却已引起了不僅工業的、而且農業的無產集團底產生。在以前，存在着大批的小土地所有者羣……。他們各自耕種着一小方土地，耕種的方法是從他們老祖宗傳下來的舊方法；他們底成見和傳統非常深，根本反對一切革新……。在他們當中，還有許多的小佃農，但並非現代意義上的佃農（即農業家——沈）；由於契約上規定的租佃承繼制，或由於習俗底關係，他們租佃着祖先遺留下來的一小方土地；他們跟這些小塊土地的關係是那樣的牢固，以致看起來彷彿它們是他們底私產似的。現在，自從工業的勞動者丟棄了他們底土地之後，許多的土地解放出來了；於是新的大佃農階級（即資本主義的農業家——沈）便在它們上面築起巢來，這些大佃農都是租五十、一百、二百，甚至更多的英畝的農業家，即所謂自由的租佃人（*Tenants-at-will*）……。他們能以低於小農生產者的價格出賣他們底生產品，而這批小農生產者則因他們底土地已不能養活自己，所以除了出賣這小塊土地而買進紡車或織機或被僱於大佃農充當農村僱工以外，便無別的路。」（註）

（註）卡爾和弗里德列赫全集卷三，頁三〇四——三〇五（俄文版）

不但在工業中，亦且在農村經濟中，小生產都遭受了粉碎的打擊。麥麵和其他農產品底高價，刺激着農村經濟底深耕和擴大。大農業底發展就一日千里地加速起來；它並以同樣的速度把小農經濟排擠掉去。大規模「圈地」底實行，便澈底地破壞了農民的小生產。

這樣，英國的社會就已接近於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由無產者、資本家和地主三大社會羣所組成的社會。中間階層被淘汰了；它們底經濟基礎被摧毀了。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說過，斯密對於僱用工人和小商品生產者底區別，還沒有明確的理解；他往往把二者歸入「勞動者」這一集團中去。可是李嘉圖對於僱用工人這一特定的社會羣已經有了明確的理解；在他底觀念中，「勞動者」這一廣泛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事實上確實如此：在工業革命以後，僱用工人（無產者羣）、資本家和地主確已明白地成爲英國社會底三種基本人物型了。

英國的工業資產者羣已經充分成長和強大，他們不但不再懼怕自由競爭，而且認定自由競爭爲奪取和擴大世界市場的唯一手段了。爲着在外國市場上可以自由出賣本國的商品，他們不得不讓外國商人自由走入英國市場去的機會。並讓外國的英貨購買者能有所出賣，能擴張他們底生產。因此當時英國的資產者就力主糧食（麵麥）底自由輸入，並竭力抨擊麵麥底入口稅。一八二二年，孟却斯特商會在其向國會的呈請書中寫道：『若不廢除麵麥底入口稅，工廠企業底崩潰是不可避免』

的；惟有廣大地實施自由貿易底原則，英國工業底繼續發展和國家底安甯，才能得到保障。」（註）倫敦商人也提過類似的呈請書，他們不單要求麵麥貿易自由，而是要求全盤的貿易自由。很明顯地，這全是因為英國這時經濟上已有充分的力量，自由貿易對於它是比壟斷更有利益的。

這時英國底社會政治的鬥爭狀況怎樣呢？

英國底工業資產集團，其懼怕革命的程度並不亞於地主集團。他們對於法國革命的仇視，也跟地主集團一樣。可是他們時常依靠着民衆和利用後者底運動來達到他們所需要的各種政治的改良。他們當中的急進派，跟大衆的關係更爲密切，甚至時常在產業工人中尋找自己的支柱。

當時的工人還是比較散漫的，他們底「階級自在」底意味要比「階級自爲」底意味濃厚得多。唯其如此，所以他們底運動，在頭一個時期大都是帶着自發性的。工人底反抗現制度，首先開始於那批被剝奪了生計的、被社會遺棄的可憐人；他們被新式的機器，被新的生產方式摧殘得一無所有；於是他們不顧一切地反對社會底現存秩序，反對關於私產制的法律。不久，工人階級也起來響應了。工人階級因親身直接感受機器生產底苦痛（卽境况日益惡化，上面已說明），所以也仇恨新的生產方式。但是這時他們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大體上還是所謂「階級自在」）：還不知道資本主

（註）參閱羅森貝格著：政治經濟學史上冊，頁二三五。



義生產方式本身是他們苦痛底根源，而只看見機器在破壞他們底生計，惡化他們底境況。因此，在第一個時期，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是採取破壞機器和搗毀工廠底方式的。

但是工人們不久就覺悟到他們的痛苦底根源不在於機器本身，乃在於此種機器之資本主義的應用。於是工人底鬥爭就開始改變性質了。工人們開始組織起來，並實行罷工作為鬥爭底手段。在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也更殘酷地跟工人底這種新的鬥爭形式作鬥爭，因為他們感覺到工人羣這一個階級已經強固起來了。工人團體、工聯會，在最初是秘密存在的；參加工會的，就要被政府當作盜匪辦罪。直到一八二四年，因工人羣長期堅決鬥爭底結果，遂把原來的法案撕破，而承認工會底合法性。

在統治者底營壘中，政治鬥爭底「題目」是爲了改變憲法，主要的是改變選舉權。舊憲法在當時已不適應於英國的經濟。就選舉法言，一些「破爛的地區」可以派兩個代表到國會裏去，而很多新興的工業中心却一個代表不能派到那邊去。僅就這一端說，已可明瞭舊憲法之如何不適應新興資產者羣底利益了。除了憲法問題外，統治者羣內部的政治鬥爭底對象，還有如麵麥法問題和自由貿易問題等。

當時爲這些問題的鬥爭，是在自由主義、甚至急進主義底旗幟之下進行的。資產者羣提拔出了

好些個思想家和理論家——李嘉圖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們把資產階級底要求理論化起來，並創造出一些普遍的原則來，作為資產者鬥爭底理論基礎。在急進的知識分子中，負有特殊盛名的哲學家兼倫理家便是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哲學底創導人邊沁 (Bentham, 1748—1832)。照邊沁底哲學，社會是許多個人底總和；各個人各自追求着自己的利益，他們各個人利益之總和便形成公眾的幸福。所謂公眾幸福，邊沁解釋為最大多數人底最大幸運。在政治方面，他就以此原則為根據，主張自由、平等和博愛；在經濟方面則主張無限制的自由競爭。他並主張應把後者應用到勞動市場上去：在勞動市場上亦應實行自由競爭底原則。由此，他底結論就主張反對工人們底任何團體及其行動。因為這是妨礙個人自由的。

再則，在李嘉圖底時代，英國思想界內還有一位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勞貝特·渦文 (Robert Owen, 1771—1858)。他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內，深深地感受到這種生產方式所產生的矛盾；於是他就草擬了好些消除階級區別的方案；他底思想體系是直接跟法國唯物論相融合的。特別值得我們紀念的，是渦文底「實驗」。渦文是從一個貧乏的手工業者家庭出身的。可是他却是一個「幸運兒」；他底努力竟使在青年時代就爬上了社會底上層而變成一個富人了。但這個富人跟一般的富人不同：他是一個資產者羣中稀有例外，——他拿他自己的工廠做實驗場，企圖實行他理想

中的社會主義，藉此以消除社會階級底區別。他在自己的工廠中實行縮短勞動日，提高工資，設立各種工人的文化機關——學校、幼稚園、育嬰院、俱樂部等等。但是渦文從自己的實驗中得出了與他原意相反的結論，他後來相信，人剝削人的現象不能藉局部的改良——那怕是社會主義的改良——來消滅；要做到這步，必先毀去布爾喬亞社會底基礎——私有財產制。

## 第二節 李嘉圖底社會經濟思想與政治思想

跟斯密一樣，李嘉圖也肯認布爾喬亞關係爲人類社會中惟一可能的關係。不但如此，斯密尙知將社會底原始狀態與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作一對照，而李嘉圖則連這樣的對照都不知道。他認定原始的漁夫、獵人都是資本家。歷史的觀點是他所完全缺乏的。

斯密的原則說，社會底根本動力是個人的利益，而個人的利益則在於享有完全的行動自由。李嘉圖不但接受這個原則，而且還把它繼續發展起來。李嘉圖認定布爾喬亞社會關係是自然的，他不像邊沁那樣地將這些關係故事修飾並把它描寫得非常理想化。因而李氏也就沒有邊沁所有的那種樂觀主義，在他底思想中恰恰充滿着悲觀主義的成份（在他底分配論上，表現得最顯明；此點詳後）。不過我們却也不能否認邊沁對於李嘉圖的影響；它主要地表現於李氏底社會觀：以社會爲許多個人

底總和，以社會利益爲許多個人利益底總和。亞丹·斯密會以其同情哲學對抗邊沁底功利主義，藉此以圖減輕他底自利主義的理論。李嘉圖則絕不作這樣的減輕自利主義的嘗試。他底思想和理論完全爲自利主義所支配的。

但在李嘉圖看來，不是一切利己主義都有同等價值的：他把工業資產者羣底利益置在別的社會羣利益之上。他之所以特別重視資產者羣底利益，因爲他認定資產者羣是進歩底負持者。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由於工場制時期的布爾喬亞關係尙未充分發展，所以亞丹·斯密還免不了受重農學說底影響；而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則完全脫離了這種影響。在他底時代，布爾喬亞關係業已發展而且純粹化了；這種關係底純粹的負持者便只是工業資產者羣。

在工業資產者跟地主的鬥爭中，李嘉圖是無條件地站在資產者方面的。他底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便是資產階級底理論武器。他在國會中所發的言論，總竭力在政治上擁護資產者底要求和利益。在當時的英國，資產者集團底刃鋒正是準對着封建集團的；在這一鬥爭中，資產者乃以領導全社會的一個階級行動着。李嘉圖對於工業資產者羣，正是把它當作一個前進的階級來擁護的；他幫助它跟阻礙資產社會發展的一切做鬥爭。

可是要從阻礙社會發展的封建階級手裏奪取政權，就必須靠國家制度底民主化，靠各種「自由」

底實現。於是李嘉圖便主張政府須對人民負責；政府底自由應有限制，因它有被人民推翻的可能，假如它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話。

已經出現於歷史舞台的資產者羣，曾依賴民衆底力量，以與封建的壓迫者做鬥爭。他底歷史使命在於替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肅清封建的殘渣。但是這並不是說，每一個資產者或每一個別的資產者集團，覺悟到這種歷史的使命並且自覺地提出執行這一使命的任務。相反的，某一集團底資產者已經獲得了很好的政治地位；另一集團底資產者企圖在封建制度下與封建分子妥協；在另一方面則很大一部分封建分子也布爾喬亞化了，他們準備跟布爾喬亞階級底溫和主張相妥協。因此，保守黨人 (Tories) 和自由黨人 (Whigs) 中間的界綫就逐漸地被擦去了。

所以在政治立場上，李嘉圖並不與自由黨人一致；他大體上跟急進派持同一的政治立場，他始終是爲實現資產階級底歷史使命而鬥爭。他認爲善良政府底保障在於組織和制度本身而不在於握政者當中的幾個善良分子；所以要政治清明，惟有根本改造現政制而重新建立一個能夠代表全民利益（實際上是資產者羣底利益）的政府。

李嘉圖認定社會進步底決定因素是資本底積聚，而資本積聚只有在一定的利潤率水準底條件下才有可能。由於這一觀點，所以他對於麵麥稅法取反對態度。因麵麥稅法底作用是抬高麵麥價格，

而麵麥價格一抬高，工資（名義工資）就高漲，工資一高漲，利潤率就要下降了。對於土地所有權，李氏並不表示反對態度，他從未主張過土地私有權底取消；可是他把資本底利益置諸土地私有權利之上。凡遇兩者相衝突的時候，他總是站在資本方面的。因為他視資本底利益（非指個別的資本家底利益）即全社會底利益，而土地所有權底利益，在他看來是跟社會利益相抵觸的。李氏寫道：『很明顯的，土地所有者底利益是永遠跟一切其他社會階級利益直接相衝突的。他們底境况從來沒有比糧食缺乏，因而糧價飛漲那時更繁榮的，可是一切其他的人則以糧價低廉為最大的幸福。』

（註）

再要講一講李氏對於社會主義及其英國的代表渦文的態度。衆院會指定一專門委員會來審查渦文底社會改革方案。李嘉圖亦被指定為該委員會委員，然而他是反對渦文底方案的。在他看來渦文底方案是與「歷史底經驗」相抵觸的（實際上不是與「歷史底經驗」而是與布爾喬亞社會底經驗）。他反對渦文底意見道：『在潑列斯頓和渦文以為除土地外，彷彿什麼也不需要，就可以進行生產和謀人民幸福似的。我們不能相信渦文底理想：以為這樣的社會必將繁榮並將生產比從前用同樣多的人所能生產的更多，而他們底私人利益又與社會利益共同刺激着他們底努力的？難道歷史底經驗

不跟這種理想抵觸嗎？」（註）他又指斥馮文這種理想是表示他「不信任未來的生活」。他在某次國會的演說中，發表意見說「有人可能對於一切社會問題持很誠摯的態度……而不信任未來的生活。例如馮文這種人，他對於社會施與了極大的恩惠，可是依據他底某些見解，表示他是不信任未來生活的。」

### 第三節 古典派方法底集成者——李嘉圖

論到方法，李嘉圖也是古典學派底集大成者。

李嘉圖底方法，實際上是自然科學和數學底方法；然而在政治經濟學中，這種方法底應用方式却不同；因為這裏既不能利用顯微鏡，又不能用化學上的分解和化合底手續，於是就不得不訴諸抽象法底力量了。抽象法當然自然科學家也採用的；在將所研究的現象拿到實驗室裏去作隔離的（孤獨的）研究以前，自然科學家先得在自己腦子中把它作一度隔離的思考。然而他底抽象觀念必須在一定的、具體地可接觸的實驗中獲得證實的。理論的經濟學家則以其頭腦為惟一的實驗室。他在思想中把一個複雜的現象分解為它底許多簡單的組成部分，藉此以達到它底本質——隱藏在現象內部

（註）參閱威爾尼塞夫著：李嘉圖與馬克思，或羅森貝格著：政治經濟學史上冊，頁二七。

深處的本質。

在方法上最初走上這條道路的是威廉·彼梯；重農學者，尤其是奎奈（他底「經濟表式」便是應用這一方法底標本），仍繼續走這條道路。其後斯密也應用過抽象法，他底不朽著作底價值，即藉此種方法而獲得。李嘉圖比他底前人們要進步得多，他把他們所應用的方法，發揮到最高的完善程度。

在李氏以前經濟思想家已曾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事實材料，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發見。到亞丹·斯密時，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已經建築起了一座堅實的大廈。但是那座大廈底基石尚非單一的，因為斯密胡亂地把所謂「通用的」和「秘奧的」兩種方法混用起來了。李嘉圖出來之後，便從科學方法上洗刷去了一切與它不相容的雜渣而把那座大廈重新改建了一下。於是一切都顯得有光彩，它底建築也更堅實了。

這樣，李嘉圖底方法是全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方法之最高點。可是他底方法跟他底前人們一樣（甚至更甚於他底前人們底方法，這正是因為他比他們一切都深一層的緣故），也犯了片面性的毛病。他底毛病自然不在他應用抽象法，而在他底抽象法是不動的、形而上的。在他底觀念中，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不變動的，表現這些關係的諸範疇也不變動的。在他看來，生產力在發展着，而生



產關係則永遠不動：向來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永遠如此。李嘉圖不知道商品、貨幣、資本等等之由來，但這並不像英格蘭姆 (Ingram, J. K. 係現代英國的經濟學博士，著有政治經濟學史等書) 所解釋，以為他底方法不宜於作動態底分析；相反的，他底研究事實上從頭到尾是研究動態的。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之公開的擁護者，他正因為見利潤率下降傾向而生產力發展有停滯之勢而且夕憂慮。再則，李嘉圖底地租論亦以社會發展為其出發點，正由於社會底發展，所以墾種才不得不用優良的土地擴張到較劣的土地。

然而他觀念中的動態僅僅是量的而不是質的；他以為發展的只是生產力而不是生產關係。因此，第一，李嘉圖就缺乏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底一致與矛盾底觀念。『李嘉圖視布爾喬亞生產（說得明確些，即資本主義的生產）為生產底絕對形式；因而它底一定的生產關係底形式就在任何地方都不應發生矛盾或束縛生產底目的——富饒；它表現於使用價值底量及其種類之多。』（註）

第二，李嘉圖始終看不見生產關係之隨資本主義體系之發展而變化和複雜化的過程，因而也看不見表現生產關係的諸範疇之變化和複雜化的過程。所以李嘉圖在其分析和探討中沒有從最簡單的範疇擡升到較複雜的範疇，他跳越過必經的中間階段，而武斷地做出結論來，說某範疇（低級的）

（註）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三，頁三八——三九。

與某範疇（高級的）是直接符合的——例如他斷定生產價格與價值，利潤與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率與利潤率等都是直接符合的。

第三，李嘉圖底全部分析大體上都帶着量的而非質的性質。他不注意到價值、工資、利潤、地租等等之爲表現一定生產關係的一定的經濟形式，而只把它們看作一定的量——他只注意到它們底量的變化，因社會發展而起的量的變化。固然，他也揭露了工資、利潤和地租中間的對立性，因而事實上似乎他已把它們看作階級關係底表現了。然而這些對立性，他只把它們看成自然的、存在於一切社會的現象。這樣，在他看來，這些對立性底實質不是階級的相互矛盾而是爭取國民生產中的份額。這樣，說來說去又祇是一些量的關係。

最後，第四，李氏既把布爾喬亞關係看成不變的、絕對的，他既看不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他又把階級矛盾轉移到分配範圍中去了。李氏生活在劇烈的鬥爭環境中，他當然不能越過階級矛盾不談。他底科學的功績在於他將這一矛盾帶入政治經濟學中去；但是他沒有在生產領域中看出這一矛盾，因爲他不看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他便不能不將階級矛盾轉移到分配領域中去。

重農學派和亞丹·斯密都分析過社會底階級結構，且實際上視財富問題爲社會問題。在這方

面，李嘉圖表現得更爲顯明而澈底，而主要的是他把這問題聯繫到布爾喬亞經濟之統一基礎上去——按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法則上去了。唯其如此，所以李嘉圖雖以分配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註）可是他畢竟還是個生產底經濟學者，因爲不論是租地、利潤、或工資，都被他解作勞動所決定的價值底各部分。他將研究底對象轉移於分配領域中，這一來事實上他把生產也看作社會現象了。不過從他底觀點看來，只有通過分配才能把生產看作社會現象。

這樣，李嘉圖不像俗流經濟學者那樣，把分配跟生產分裂開來——他畢竟是個卓越的生產經濟學者；這是他底科學方法（當然有布爾喬亞限制性的）底作用和這種科學方法所產生的勞動價值論——他底全部研究底基礎——使然的。俗流經濟學者將生產跟分配分裂開來，宣布生產爲技術的現象；社會的現象，他們以爲只存在於分配領域中；這樣，他便把歷史驅入分配領域中去了！

李嘉圖底狹窄的布爾喬亞眼界，使他不可能採取科學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底觀點；但是俗流的「歷史主義」（即歷史學派底「歷史主義」），他却也不予接受。對於李嘉圖只有一條路——純理論的道路。李氏既跟真實的科學的歷史主義絕緣，他就犯了過分抽象和不夠抽象的兩種弊病。

（註）不僅如此，他並且認爲分配是政治經濟學底主要對象。李氏在其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第一版序言中寫道：「確定指揮這種分配（劃分爲地租、利潤、與工資的那種分配——沈）的諸法則——這便是政治經濟學底主要任務。」

所謂過分抽象，意思就是他抽去了某一生產方式底歷史的一定性。布爾喬亞經濟諸範疇被他看成絕對物了；在他看來，這些範疇都是超空間和時間而事實上並不表現生產關係的。生產關係僅僅是永遠如此的「前提」(premise)。李嘉圖當然了解，商品不單是有用的事物，而是作為買賣之用的有用的事物。他雖將資本與生產手段等同起來，但是他很明白，生產手段必須能產生利潤，才得算為資本；而利潤本身，事實上又被他解作剩餘價值。然而因為商品資本主義諸關係始終不在李嘉圖眼界以內，亦不是他底研究對象，——這樣事實上他就把商品、資本都看成假設人與人底關係的事物了。因此，他時常混淆事物底關係和在這些關係上所表現的人與人底關係。因此，他又彷彿一隻手揭露布爾喬亞社會底「生理機構」，而另一隻手又把它掩蓋起來；因為依照他底解釋，布爾喬亞社會底「生理機構」彷彿就是一切社會底「生理機構」。李嘉圖底描繪布爾喬亞社會底階級結構，比他底所有前人都描繪得明確些；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常以階級利益底差異為出發點的；可是由於他底形而上的方法，布爾喬亞社會底階級結構就失去了歷史的確定性和歷史的具體性。在李氏底見解中，抽象和具體是互相排斥的，不能共存的。

同一形而上的抽象性，又促成了他底不夠抽象。他把諸經濟形式跟它們底內容合併起來了：形式與內容之辯證的一致，被他看成了二者之絕對的等同。他不把、並且不能把商品當作勞動生產品

底形式來分析，貨幣當作價值底貨幣形式來分析，資本當作階級關係底形式來分析等等。這樣，李嘉圖完全抹煞了某一經濟現象之社會的形式，把經濟的內容跟形式合併爲一了。在李氏底學說中，根本就沒有經濟形式底分析，這無疑地是他底方法論上一個重大的缺點。

可是李嘉圖方法論上基本的和決定的缺點，却是他把布爾喬亞關係看成絕對的永遠的關係了。這就是他底方法論底階級本質。由此就產生它底一切質素：它底形而上性，跳越中間階段，忽略經濟形式，「將歷史驅入分配領域中去」等等。以後我們要講到李氏在個別問題上的許多錯誤及其所由產生的矛盾性，——那些也還是他底方法論底根本缺點底產物。年輕的工業資產集團既在與封建殘餘戰鬥，自不能忽略社會鬥爭，不能越過社會底階級結構，因爲祇有對階級結構的分析，才能決定資產集團社會鬥爭底地位，才能指示它以戰鬥底前途，指示它以行動底方針。但同時階級底分析也不應當（實際上是資產者不需要）太深刻和十二分澈底，不應當揭露到一切階級統治底根源。李嘉圖底方法論確實充滿着許多的社會元素，但是它底社會觀只是布爾喬亞的社會觀。這也就決定了它底歷史意義和科學性底程度。

#### 第四節 李嘉圖底經濟學說

一 價值論

甲 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

李嘉圖完全接受斯密對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表面的劃分。但他開首批判斯密底混合所消費勞動與所購買的勞動這一見地。關於這一點，李氏寫道：

『亞丹·斯密雖說那樣正確地規定了交換價值底根本泉源，然而他是不澈底的。他沒有嚴格地堅持物品價值底增減有賴於它們當中所消費的勞動底增減這一原則，而另外又提出了一個單位——價值度量——來，說物品之值多或值少須視它們所交換的這個單位——度量——數量底大或小。有時他拿麪包底度量作為這種單位，有時則拿勞動作為這種單位，但不是某一物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而是用這一物品在市場上所能購買到的那許多勞動量；彷彿這是一件事情，彷彿當工人底勞動生產率增加一倍、因而它能生產多一倍的商品的時候，工人就必能獲得比以前多一倍的勞動報酬似的。』(註)

李嘉圖自己確實『嚴格地堅持物品價值底增減有賴於它們當中所消費的勞動底增減這一原則』。由此他得出結論道：『假如商品底交換價值決定於它們當中所包藏的勞動量的，那末這種量底任

(註) 李嘉圖著：政治經濟學……原理，俄譯本，頁三，以下仿此。

何增加，自必增加商品底價值；任何減少，亦必減低商品底價值。』(註一) 換句話說，他確定了這樣一條價值律：商品底交換價值與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成正比例，而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例。

這一法則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效的。而且李嘉圖還拋棄了所謂社會底原始狀態與現代社會之斯密式的劃分。但是他拋棄這種劃分所根據的論據，却是他底方法論所特有的。他寫道：『即使在斯密所說的那種社會底原始狀態中，獵人對於他自己的行業亦需要一點資本，固然後者是他自己所創造和積累起來的。沒有某種武器，就殺不了狸，也打不了鹿；因此這些野獸底價值不祇決定於打殺它們時所必需的時間和勞動，亦且決定於供給獵人所必需的資本——武器——所消費的時間和勞動……』(註二)

將資本與生產手段相等同，李嘉圖已經達到所謂邏輯的終點了。雖然亞丹·斯密也將兩者等同起來，但是他畢竟還不會把原始社會獵人用以打擊野獸的那塊石頭或木棍看做資本；而李嘉圖却竟這樣斷定了。斯密底現實感覺歸根究竟超過邏輯以上，他最後只得妥協了：照他底意見，資本只存

(註一)同前書，頁三。

(註二)同前書，頁九——十。

在於現代社會中，在社會底原始狀態中並無資本。李嘉圖則將邏輯置於現實感覺以上，——既然資本與生產手段相同，那末凡是有生產手段的地方，就都有資本了。

現實底感覺迫使斯密斷言價值律在現代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跟在原始社會中一樣的；但接着他又發揮道，從資本和私有財產權出現以來，價值已不復為勞動時間所決定，而為收入所決定了。李嘉圖只知一貫地遵照他底鐵的邏輯去推論，他得出結論道，價值律底作用從前和現在永遠是一樣的。這自然是錯誤的。可是他却有比斯密正確的地方；他肯定說，在現代社會中價值還是（而且祇是）由勞動決定的。此外，他在價值論中還加添了一個極重要的元素進去，這個元素就是：商品底價值不祇為直接消費在該商品生產上的勞動所決定，而且還有賴於生產手段上所消費的勞動。他並且把這一見解發揮起來。他認為勞動工具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主要的工具價值既大，效用亦經久；因此，這部分勞動工具把較大的價值轉移到新的生產品上去，另一部分價值小而效用期短的勞動工具，則只能轉移較小的價值到新生產品上去。

在李嘉圖批判斯密時，他說明商品價值之劃分為工資和利潤（當資本和勞動屬於不同的人的時候）仍不變更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一法則。照李氏底意見，價值是基源因素，收入是派生因素；價值可劃分為各種收入，而並非價值由收入所形成的。



乙 價值與交換價值

李嘉圖不會區別價值與交換價值：他平常往往把它們當作同一範疇去使用。但是他又常常用「相對價值」、「比較價值」這類術語。因而有些經濟學者以為李嘉圖只承認相對價值，而不知道有絕對價值。這是不對的。李嘉圖所說的「實在價值」便是指一定的勞動時間底表現而言。而他底「相對價值」才是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在別的商品底使用價值上的表現（註）。所以李嘉圖並非不承認有所謂絕對價值（即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本身）和相對價值（即交換價值——商品價值之表現於另一商品者）。問題並不在他承認不承認，而在他不知道劃分兩者底區別，他把它們合併為一了。其所以不作這樣的區別，原因是他祇注意於價值底量的方面而忽略了它底質的方面。

我們前面已經指明，李嘉圖認定政治經濟學底研究任務只是量的分析而非質的。而根據量的分析底觀點，價值和交換價值底區別就失去其重要性了。卡爾在其巨著剩餘價值論中寫道：『相對價值底意思：第一、是表示價值底大小，這與一般地成為價值這一質（the quality of being value in general）不相同。因此後者也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了。第二、它表示在別種商品底使用價值上所

（註）可參閱剩餘價值論卷三，頁一〇八。

表現的商品價值。這祇是商品價值底相對的表現，即對於表現它的那個商品而言的。一磅咖啡底價值祇是相對地表現於茶葉；爲要絕對地表現商品底價值，甚至取相對的形式，即不表現於勞動時間而表現於它對別種商品的關係，——它就得以跟一切其他商品作無窮次的比較中表現出來。」

李嘉圖正確地了解，價值底大小（量）並不直接地表現於勞動時間，因而他不知道把爲勞動時間之表現的商品價值和這價值在別的商品上的表現二者區別開來。在卡爾看來，二者都是相對的，固然這是相對性底兩種不同的概念；但是由於李嘉圖只注意於量的分析，所以他始終看不出這種區別。

李嘉圖的價值論底主要缺點，乃在他不了解價值底形式。關於這一點卡爾指示道：『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基本缺點之一，在於他從來不曾從商品底分析，特別從商品價值底分析，引伸出價值形式來；而後者正是予商品價值以交換價值之性質的。古典學派之優良的代表亞丹·斯密和李嘉圖，視價值形式爲完全無關重要的，而且甚至於在商品本性以外的。原因不祇在價值之量的分析抓住了他們底全部注意。這裏的原因還要深刻些。勞動生產品底價值形式是布爾喬亞生產方式之最抽象的、同時又最普遍的形式；這種生產方式正藉此種形式以表現其爲社會生產底特種類型，同時又是歷史地表現出來的。假如把布爾喬亞生產方式看成永久的、自然的社會生產形式的話，那末就不可

避免地會注意到價值形式底特殊性，因而也看不見商品形式……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底特殊性。』(註)

丙 價值與勞動

李嘉圖既把布爾喬亞生產方式絕對化，視之爲自然的和永久的生產方式，他便和他底前人們一樣，也不研究爲何所消費的勞動要採取價值底形式這一問題，並且他也不能提出這個問題來。所以他雖然把一切勞動形態都簡化爲量的表現——勞動時間，——可是他沒有看出，而且也不能看出那『包含於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這正與他看不見商品之爲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對立底一致體是一樣的。

和亞丹·斯密一樣，李嘉圖也知道有單純勞動和複雜勞動；但是他認爲這仍不改變按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法則。他寫道：『可是假使我認爲勞動是一切價值底基礎，而它底相對數量差不多單獨地决定着商品底相對價值的話，那末這還不能說我忽略了勞動之質的區別和一個工業部門裏的勞動時數或日數跟別個部門裏的同樣時間的勞動之比較底困難。質地不同的勞動底估計是在市場上很

(註) 卡爾著：資本論卷一，頁三八——三九(腳註三十二)。

快地、對於一切實用的目的已夠充分精確地規定下來的，而大半還得依賴工人底比較技巧和他所担任的勞動底緊張性。』(註一)

李嘉圖也知道必要勞動這一概念。雖然對於這個問題他並未特別提出來加以說明，可是他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無須解釋的。我們這裏必須指明，李嘉圖雖有必要勞動底概念，但並無社會必要勞動底概念。依照他底純數量觀，這沒有原則性的意義的，也就是說，對於他底量的分析，他並不需要確定必要勞動就是社會的必要勞動。他所以不理解這一點，根本原因仍然在他底總的方法論中。

鄔梁諾夫發揮卡爾底社會必要勞動底學說時寫道：『只有根據一個一定的和歷史的社會形態之社會生產關係體系底觀點，而且是根據在大批的、幾千萬次重複着的交換現象上表現出來的諸關係底觀點，我們才能了解價值是什麼。』(註二)

然而，李嘉圖却持着另一個觀點。『一個一定的和歷史的社會形態之社會生產關係體系底觀點』，是李嘉圖所缺少的。價值之爲具有歷史的規定性的範疇，其意義如何？——這是李嘉圖所不了解的。他祇曉得根據事實：價值底大小不決定於事實上所消費的勞動而決定於必要勞動。然則這

(註一) 李嘉圖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八；這一段話差不多跟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見，連字句上亦如出一轍。

(註二) 鄔氏全集卷十八，頁十六。

事實背後所隱藏的是什麼呢？——這點他不研究。他底個人主義的、邊沁式的社會觀，——視社會為許多個體底總和的那種社會觀，——也阻止他去研究這個問題。因此在他看來，社會勞動也不過是諸個人勞動之總和。然而實際上每一個人底勞動，並非綜合的社會勞動底一部分。

李嘉圖只知根據實際的情形，根據不按實際的而按必要的勞動消費計算商品底交換價值這種情形，這樣他實際上就犯了錯誤了：他按照在最壞的生產條件下的必要勞動去決定價值底大小了。依照他底理論，商品價值底大小乃決定於在最劣的（而不是中等的）條件下生產某一商品所消費的勞動量。李氏底地租論亦即以此為根據。

#### 丁 價值與生產價值

前面已提到過，李嘉圖認為價值和生產價格是直接相符合的二範疇。從價值到生產價格的中間環節，李嘉圖沒有見到；他跳過了這些中間環節（或階段）。市場價格，不論是原始狀態下的或現代社會中的，也在價值周圍擺動着；在他看來，價值就是生產價格。說得明確些，李氏雖使用生產價格這個名稱，事實上他並不了解這一範疇。

可是把價值和生產價格看成一體，他就替自己造成了自己所克服不了的困難。他不能解釋同等

資本產生同等利潤這一情況。李嘉圖完全依據着他底勞動價值論而斷言道，工資底升和降引起利潤之相應的落和漲。但是在當作工資用的資本和投在生產手段上的資本之不同的比率，簡言之，在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s——李嘉圖不知道這個）之下和在不同資本之不同的流轉速度之下，爲什麼工資之升或降不能引起利潤之相應的落或漲，——這一點李嘉圖就不能解釋了。因此，在工人多的部門裏，工資底增加理應比工人少的部門裏把利潤更降得低些。於是在商品平均按照價值出賣的原則之下，利潤率就不能一樣了。可是平均利潤率底存在却證明了商品並不按照價值出賣的。這裏李嘉圖就碰着了不可解決的困難，因爲他一面斷定商品永遠按照價值出賣而同時又承認不同部門中的同等資本產生同等利潤的事實。雖然他宣佈平均價格（即生產價格）和價值底不符合是例外的場合（事實上這却是經常的場合），可是這仍不能解除上述的困難。

李嘉圖既將價值和生產價格等同起來，他不但不能解釋同等資本之利潤平均化的傾向，他亦且不能解釋平均利潤底形成。他既不明白價值轉變爲生產價格底過程，因而也就不了解剩餘價值轉變爲利潤和利潤轉變爲平均利潤底過程。他認定平均利潤是本來如此的：任何資本都產生平均利潤。他把商品價值分解爲平均利潤加工資，殊不知這裏所講的已非價值這範疇而是生產價格底範疇了。而且李氏把商品價值只分解爲  $A+B$ ，而丟掉了不變資本  $C$ ，這是重複了亞丹·斯密底錯誤。

將價值與生產價格看成一體，李嘉圖就沒有可能探究由利潤到平均利潤的轉變過程，而他既將平均利潤當作出發點而不當作結果看，這一來平均利潤就變成和勞動並列的獨立因素；而李嘉圖底勞動價值論，縱然比斯密的要進步而深刻些，而結果則仍不免自陷於破壞之悲局！

## 二 資本與利潤

### 甲 關於資本的理解

對於資本的理解，李嘉圖跟比斯密比較起來，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所不同的祇是李嘉圖把資本解說得比斯密更絕對化了：他認為原始漁獵時代的漁夫和獵人已經有了資本。視資本為運動和階級關係之表現的那種觀念，他跟比斯密一樣地缺乏，他又和比斯密一樣地只知道資本底一種劃分法：劃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既不了解資本是一種運動，關於資本底形式他自然也不知道和不研究了。

雖然這樣，李嘉圖關於資本底作用，關於價值底形成過程的概念却比斯密明確得多。他肯定說，資本之參加商品生產，並不改變價值決定於勞動時間這一事實。價值當由直接消費於某商品之生產的勞動，加上此商品生產時所消耗的那部分資本所包含的勞動來決定。這在勞動價值論底發展中，在對資本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的理解底發展中，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資本不創造新的價

值，但是它底被消耗的一部分價值却被轉移到新生產品上去了。

但是這一正確的論點，——即資本不創造新價值而只是它底一部分價值被轉移到新生產品上去，——被李嘉圖所完全不正確地利用了。因為他根據這一論點而斷定說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沒有任何的區別；這就是說，事實上他否認了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底區別。他忽略了下面這一點：『對於資本家，商品底所值是決定於資本底消耗；而商品底實際價值則由勞動底消耗所決定』（註）。這一點既被他忽略了，所以他不能了解資本主義所生產的商品底價值要採取生產成本與利潤之和底形式，更不能了解它要採取生產價格（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底形式了。

這一個重要的關鍵，當李嘉圖把價值和生產價格等同起來的時候，就被他忽略過去了。因為他視資本為單祇轉移一部分價值於新生產品中去的事物（勞動工具），所以他不知道正是這一事物在遮蔽價值而強迫它採取另一種形式。這並不是幻覺而是一件為資本主義生產所規定的事實。

由於不了解資本底社會本質及其結構，就不會了解資本在形成價值表現形式中的作用，也不會了解勞動消耗為資本消耗所替代的過程。我們知道資本底消耗不祇遮蔽了勞動底消耗，而且它們還小於價值（由勞動消耗所決定的價值）。『商品對於資本家的所值和商品生產本身的所值——這是

（註）卡爾著，資本論卷三，第一章。



兩個完全不同的量。』(註)因為這樣，所以商品底出賣纔有低於價值和高於生產成本的可能，亦即有低於價值出賣商品而獲得利潤的可能。

再進一步去分析資本時，我們發見：由於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由於不同的資本流轉速度，以及由於等量資本產生等量利潤，所以通常的情形總是一種商品常常高於價值出賣，另一種商品常常低於價值出賣；可是勞動價值律却並不因此而遭破壞。李嘉圖沒有能夠分析到這一點，他於是陷於下列兩個絕端間而無以自解：(一)他底出發點是商品價值決定於直接消耗於此商品生產中的勞動與被消耗的一部分資本中所包含的勞動之總和；(二)他底歸宿點却是將商品價值分解為生產成本(而且他為簡便計而把生產成本簡化為工資了)和平均利潤(average profit)兩部分了。李嘉圖沒有能夠把這兩個絕端聯繫起來，這正是他底經濟學說(特別是他底價值論)底一個最重大的缺點。

關於資本底劃分，他跟斯密一樣，也只知道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兩部分。我們知道，斯密有兩個不同的資本定義：一個定義說資本是被劃定作為繼續生產之用的一部分積蓄；另一定義說資本是產生利潤的那部分積蓄。李嘉圖更澈底地堅持着前一定義。依照他底見解，資本是在生產手段中所積聚的勞動，因此，在給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下定義時，他不根據某部分資本怎樣產生利潤(像

(註)同前。

斯密那樣)，而根據各部分資本底久長程度來確定它們底界說。李嘉圖總結他底意見道：『視資本之是否很快地消耗和經常地需要恢復，抑或很慢地消耗，就斷定它是流動資本或固定資本。』（註一）正因為李嘉圖根據這種純相對性的標準去下定義，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要得出以下的結論來：『這種劃分（即劃分資本為固定與流動兩部分）是不重要的，在這種劃分中，不能夠明確地劃出分界線來的。』（註二）

他祇將作為給養工人用的那些費用（即工資）歸屬於流動資本。因此，事實上他把資本劃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了。實在地說，依照他底價值論和利潤論，應當把資本作這樣的劃分。因為他既然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商品底價值也祇決定於勞動，而認定利潤祇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一部分，那末他就自然而地應當把資本劃分為償付勞動的一部分和作為購買生產手段之用的一部分。須知依照他底理論，只有前一部分資本在增長着，後一部分資本是不增長的，後者祇是局部地被轉移到新生產品中去。

然而李嘉圖却不曾作這樣的劃分，而祇在斯密的劃分之下添了一點他自己認為「不重要」的標

（註一）李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十五。

（註二）同前。

微。這位大經濟學家在這問題上持這樣奇特的觀點，除了他底布爾喬亞眼光底狹窄性外，我們找不到旁的解釋了。布爾喬亞理論代表的李嘉圖，只知道資本僅僅是靜止的事物（而不是運動，不是階級關係之物的表現），僅僅是勞動工具本身和作為給養工人之用的消費資料本身，因此他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兩部分資本間之原則上的區別——當然不能把一種事物看作不變資本，而把另一種事物看作可變資本。因為當做事物看時，兩者底大小（量），不論在其物體本身抑或在其價值上，都是不變的啊。但是我們知道，能自動增大其價值的，是以勞動力為體現的那部分資本（在資本家手裏，勞動力是生產資本底一部分，而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却不能成為這樣的資本）。然而李嘉圖却把與勞動交換的那部分資本看成工人們底消費資料本身，因而他當然不能把它看作可變的資本；因而他只能從它們生存底久長程度上去區別這兩部分資本了。

### 乙 剩餘價值與利潤

李嘉圖不曾給一個完全科學的利潤論和剩餘價值論，而且事實上他也不能做到這一步。可是他卻把這個問題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因為他大大地發展了勞動價值論。

李嘉圖雖然沒有像斯密那樣明白地稱利潤為工人生產品中的一部分，然而他却認定利潤和工資

是勞動所新創造的兩部分價值。因此他得出結論道，利潤或工資底變動可以不改變商品底價值，但二者之一發生了變化，必然促使另一個發生相反的變化。所以李氏認為工資底增加是利潤率下降底原因。可是李嘉圖却沒有給一個正確而完整的利潤論——即建立在價值律和剩餘價值律上的利潤論。他事實上把利潤看作了剩餘價值，雖然在理論上他並沒有提出將利潤歸化為剩餘價值的任務來。他認定決定利潤高度的原因是勞動生產率，並將利潤底增長直接歸因於勞動生產率底提高；這樣，李嘉圖事實上把利潤和剩餘價值等同起來了。

李嘉圖斷定工資底增或減是利潤率降或升底原因，——這一論斷就以利潤與剩餘價值之等同和利潤率與剩餘價值率之等同為前提的。因為這一論斷對於後者（剩餘價值率）是適用的，對於前者却不適用：工資一減少，剩餘價值率就提高，但是利潤率却不一定提高，假使同時增加了不變資本（因而亦即增加了全部資本）的話。實際上利潤率底高低有賴於兩個條件（兩個量）：一個是剩餘價值量（ $M$ ），一個是資本底大小（ $K$ ）；利潤率隨 $M$ 之增而升，隨 $K$ 之增而降。因此，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利潤總有下降之傾向；那怕因加強榨取和縮減工資而 $M$ 增加，可是由於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得更快，結果利潤率仍然下降了。李嘉圖以為工資之增減與利潤率之大小成直接的反比例，——這種錯誤完全發生於他將利潤與剩餘價值等同之觀點。

可是在另一方面，李嘉圖又將利潤跟剩餘價值脫離開來了。他只就利潤在表面上所呈現着的狀態去考察它，即只就與全部作用資本成定比的平均利潤去研究它。在李嘉圖底觀念中，平均利潤不是結果而是起點。他把它看作原來如此的東西，而只想說明它底變化法則。爲了要堅持勞動價值論底立場，李嘉圖不得不肯定利潤爲商品價值之一部分，是資本家不費分文而獲得的；這就是說，他將利潤歸化爲剩餘價值。而用剩餘價值律去解釋它。然而同時他却又不能抹煞一個事實：存在着同等資本給予同等利潤——平均利潤——的事實。

這樣，李嘉圖就碰到了他所不能解決的矛盾了。一方面利潤升降底原因在於勞動生產率，這就是說，利潤就是剩餘價值；可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任何資本都產生平均利潤而與生產中使用多少勞動量無關。但在李嘉圖底觀念中，這個矛盾並不採取這麼一種形式存在着；他所感覺到的矛盾，在形式上還要模糊和繁複一點。他一方面確定工資高度底改變引起利潤相反的改變但可以不改變商品底價值；同時他又指出事實並不常常如此，在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之下，縱然在一切生產部門中工資均按同一百分數增減，亦必引起各部門生產品價值之不同的變化（注意：這裏李氏所說的生產品價值實際上是生產價格）。這麼一來，矛盾就比較前面我們所提出的模糊和繁複了。可是本質上却就是那個矛盾：由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和按生產價格（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計算商品價值之矛

盾。

李嘉圖所以看不見這種矛盾底純潔形式，這還是因為他對剩餘價值本身不加研究的緣故；而之所以對它不加研究，仍是因為他認為『剩餘價值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後者却是一切社會生產底自然形式』。這樣，說來說去仍然由於他底布爾喬亞見解底狹窄性在那裏作怪。

### 三 分配論

#### 甲 李氏分配論概要

李嘉圖全部學說之重心就是他底分配論。在分配論中，他研究到工資、利潤和地租間的關係。當然，布爾喬亞學者的他跟斯密氏一樣，並不把這些範疇當作特殊的社會關係之形式看，這是他完全不注意的。他所注意的，一方面是它們底量的定性，而另一方面（這對於他是特別重要的）則是它們中間的相互關係。

首先他確定工資是工人和他底家屬底生活資料（事實上即勞動力再生產底價值）；其次，他肯定利潤為商品價值超過工資之部分；而地租則因投資於優良的和中等的土地而獲得的超過工資與利潤之上的多餘部分。由此就得出以下幾點李嘉圖理論的結語來：（一）工資和利潤是互相對立的，

二者之一發生變化，就要引起另一個底相反的變化；（二）地租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內都不觸犯利潤和工資的（照李氏底見解，地租不是形成價格的因素）；（三）可是地租隨着社會底發展，隨着人口底增長而抬高起來，實際工資停滯着不變動，而利潤則隨之而下降。最後這一個論綱，既不直接產生於李嘉圖底價值論，亦不產生於他底利潤、工資和地租論，而是產生於一些跟他底基本理論相異的觀點的。茲特略述如下。

首先要指出，李嘉圖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土地肥沃遞減律底擁護者；其次，他認為土地墾種之程序乃由優良的土地到劣質的土地；先種好土地，後種較劣的土地。他由此得出結論道，土地生產物底價值是永遠在增長着的，因為照李氏底意見，商品底價值乃決定於最惡劣的條件下所消費的勞動（就土地生產言，則決定於最劣的土地上所消費的農作勞動）；隨着人口底增加，耕種的土地愈擴大質愈劣，因之農產底價值就愈高漲。但是農產品底價值一高漲，工人底名義工資亦就隨之而高漲，然實際工資却無變化，因為李嘉圖認為工人底生活資料是永遠固定的。名義工資一增長，利潤就下跌了。

假使把他底馬爾薩斯的人口觀和土地肥沃遞減律底觀點丟開，同時又把他關於社會不斷地由好土地擴張到壞土地的那種錯誤觀念丟開，那末我們就發見李嘉圖底分配論中確有有價值的成分存在

着。第一，他底分配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上的；第二，它揭露了勞動與資本底對立性；第三，他視地租（註）不僅爲無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收入，而且簡直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收入。這幾點都是他底分配論中的科學要素，是對於以後政治經濟學底發展有積極意義的。

然而他底分配論所根據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有着很多的缺點，因而它就不能成爲分配論底堅實基礎。而李氏價值論底所有缺點，正在他底分配論上暴露得最爲顯著。同時，李嘉圖這裏又跳越了由價值到工資、利潤、地租的一些重要的環節。李氏事實上把工資等同於勞動力的價值了；而勞動力和勞動底區別他又劃分不出來，因此他就不知道勞動力這一特別商品（這商品底特殊性他自然也不會了解）底價值和使用價值之區別，也沒有而且不能對剩餘價值底生產加以分析。很明白的，在他底觀念中工資也不是勞動力價值和價格之變形了。

李嘉圖極明確地判定了勞動與資本底對立，這當然是一點功績；可是他只把這一對立聯繫到分配上去，彷彿跟生產無關似的（而實際上這種對立底根源却存在於生產過程中），這就替以後那些將分配與生產脫離開來的俗流理論造成了某種「基礎」。

（註）李嘉圖所談論的地租實際上祇是差額地租，他不承認絕對地租底存在。



乙 利潤和利潤率

在李嘉圖底分配論中，他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底分配法則如下：隨着社會底發展，實際工資停滯不變，利潤下降，地租上漲。根據這一見地，他預斷社會（實際上祇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底發展是有一定限度的，因為社會必須保證一定的利潤。很明顯的，這裏李氏又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社會一般了。布爾喬亞的經濟思想家，無意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基本矛盾：社會生產與利潤率（私人佔有之尺度）之矛盾。李嘉圖所引為不安的是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而他所得出來的結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必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實際上社會生產力底發展是無限度的，有限度的祇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力。我們底結論是：正由於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利潤底佔有）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經濟形態才成爲歷史的、過渡性的。

前面已經說到，李嘉圖認定利潤率底下降乃由於土地生產品價值底增漲，而土地生產品價值底增漲，則由於人口底增加和耕種的土地愈趨愈劣的必然性。李嘉圖甚至於不懷疑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是決定於資本有機構成底提高；不變資本底增加和可變資本相對的減少必定要在於利潤率下降上表現出來。

在李嘉圖看來，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是一種自然的法則，因為這一法則底前提是人口底增加和土地肥沃遞減律，李氏說：『這樣看來，利潤有下降底傾向，因為隨着社會和財富底發展，所需要補充的食物量，祇有靠愈趨愈多的勞動消耗才能獲得。』對於這點，卡爾曾公允地指出道：『因此那些像李嘉圖那樣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爲絕對的的經濟學者們，在這裏感覺到這種生產方式自己替自己造成了發展底界限，因而他們不將這種界限底根源歸之於生產（指資本主義的生產——沈）而將它歸之於自然（地租學說）。』所以李嘉圖始終不能理解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殊法則，它暴露了這一生產方式之歷史的過渡性。

李嘉圖因爲歪曲地解釋了利潤率下降傾向底法則，所以他不能揭露這一法則之真實本質：它是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上所表現的那個事實底另一表現。這兩個法則上所表現的共同事實就是生產力底增長，亦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的勞動生產率底增進。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生產率底發展促成在一極端上財富大量的增長，在另一極端上大衆貧困底增長；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底發展則促成利潤率底下降（但絕非利潤量底下降）。前一場合，是表現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後一場合則表現利潤率下降傾向之法則。

李氏既不了解利潤率下降傾向律之本質，他當然就不能揭露這一法則底內部矛盾。他不能了

解，那促成利潤率低落的原因本身，同時又引起了阻止利潤率下降的一些因素。勞動生產率底提高，加強了榨取，增加了絕對和相對的剩餘價值，——這些也就是阻止利潤率下降的諸因素。

李嘉圖底理論沒有能夠揭露出布爾喬亞社會底基本矛盾來。固然他明確地指出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間的矛盾性（對立性），可是第一，他把這種對立性限制在分配領域以內；在發生一階級佔有另一階級剩餘勞動的生產領域內，他却看不見這種對立性。第二，這是從第一點裏產生出來的，就是對於上述的對立性，他也未能澈底予以揭露。因為工人與資本家這兩大社會羣底矛盾，決不能祇歸結於工資和利潤之對立。而且李嘉圖斷論道——「隨着社會底發展，實際工資停滯無變動，而利潤則下降，——這麼說來，事實上已把上述的矛盾化為烏有，而只有資本家是「可憐虫」了。固然，李嘉圖也承認實際工資跌落底事實，但是在他看來，這祇發生於名義工資底增漲尚未趕上生活資料價值增漲的時候，可是到最後工資底增漲終於要趕上生活資料之價值而與它相適應的。這樣說來，工資和利潤底對立是暫時的。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彷彿這種對立性不存在於調節工資和利潤的諸法則中，不存在於這些法則底實質中，而只存在於脫離這些法則的一些暫時的例外場合中。

同樣的，李氏對於利潤和地租底對立，亦作如是觀：彷彿這一對立性不存在於調節利潤和地租

的那種法則中似的。固然地租底增加同時就跟着利潤底減少，但是前者却並不是後者底原因，實際上兩者都決定於一個原因，即土地底墾種由較好的擴大到較壞的土地。我們還必須記住，差額地租（李嘉圖祇承認這一種地租）並非因土地私有權而發生的。李嘉圖底抹煞絕對地租及其作用，無異於替土地所有者階級遮蔽了他們促使物價騰貴和利潤下降的「罪孽」。李嘉圖說：『不是因爲要支付地租所以糧食昂貴，而是因爲糧食昂貴所以支付地租。因此，若說縱然地主放棄了全部地租，麵食價格也絲毫不會降跌的話，那是說得很公允的。』（註）在他看來，地主和工業資產者之矛盾，祇發生於經濟政策範圍內：即當地主和土地經營者要求和實施對農產品的高度關稅，或擁護現存關稅而反對降低麵麥關稅或麵麥貿易自由的時候。這一說，地主與工業資產者底矛盾又不存在經濟法則本身，而只存在於脫離這些法則的一些暫時的例外場合中了。

### 丙 工資律

李嘉圖底工資律，——他底分配論底組成部分之一，——把工人能夠在布爾喬亞社會內改善自己境况的那種幻想永遠剷除了。照李嘉圖底意見，爲提高工資而做的鬥爭，只能或者暫時提高一

（註）見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三八。

下，或者加速它底適應於已高漲的生活資料底價值，布爾喬亞的李嘉圖批判家，總竭力想推翻李氏底這一工資律，而拉薩爾則反稱之爲「鐵則」而拿它來當作自己鼓動工作底理論根據。然而擁護和宣揚李嘉圖的工資律的拉薩爾，却不了解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階級底境况不是固定不變而是不斷惡化的（相對地和絕對地惡化）。

可是照李嘉圖底工資論，他把工資看作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而認爲工資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情形只是例外的場合；它保持着勞動力價值底水平，才是正常的場合。然而實際上我們知道不是那樣的；實際上工資是隨資本主義之發展而降低到這一水平之下的。

工資爲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的理論，在李嘉圖以前就有人發揮過：威廉·彼梯大體上就持這樣的觀點。斯密在這理論和供求論中間動搖着。李嘉圖則完全拋棄了一切動搖：他把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論跟他底全部思想聯繫起來並澈底地打定了它底理論基礎。可是這一理論基礎底打定，就種下了他底最低限度生活資料論底根本病源。李嘉圖根據兩個腐朽的「定律」作爲出發點：一個是土地肥沃遞減律，又一個是馬爾薩斯的人口律。這便是上述理論底理論基礎（根據）。根據前一法則，他做出結論來說隨着社會底發展，農產品價值漲高了；根據後一法則，則謂實際工資不能提高到最低限度生活資料以上。假若果真發生這樣的現象（即工資超過最低限度生活資料以上），那末工人

人口必因生活改善而增加，而人口增加底結果，自然而然地又促成工資底退落。

李嘉圖理論上的主要錯誤是在他忽略了工業勞動後備軍底存在，而這種勞動後備軍却是資本主義發展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隨伴。勞動底供過於求不是因為工人底生殖率超過了對工人的需要，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積累日益增加地製造着過剩的人口。工業的勞動後備軍經常地打擊着工資，把它往下拉；甚至在市面繁榮和產業猛烈活躍的時候，這種後備軍雖然是減少了，可是它仍並未絕跡。當市場處於蕭條和沉悶狀態時（更不用說在經濟恐慌時期了），過剩的勞工人口就激烈地增加起來，同時加於工資的壓力也跟着增加起來。

這樣看來，工資底擺動不決定於勞工人口自然增長之擺動；勞工人口是經常地過剩着，經常地有後備隊的，不過這種後備隊底狀況，則隨着工業發展底週期律而發生變動。假使由於某些原因而工資底增長「威脅」到資本積累時，試問資本家何必等待勞工人口之自然的增長和由此促成工資底低降呢？他們絕對不需要這樣等待，有一種實在的（而非幻想的）手段經常地在被他們使用：他們利用着技術的進步，或者採用新機器，或者改進舊工具。這一來就改變了資本底有機構成，即增加了不變資本，減少了可變資本；而同時對於勞動的需求也減少了。其結果是勞動底供給不但跟它底需求適合起來，而且還大大地超過需求了。

上述李嘉圖底理論，在方法論上是把工資律由一種歷史的法則轉變為自然法則了。他所以犯這樣的錯誤，第一是因為他以為社會在農產品底獲得中必須要消耗愈趨愈多的勞動；第二，他認為人類固有着無限制繁殖的天性；他們底物質境況剛才改善，但是他們又不可阻擋地繁殖起來了。

李氏底見解以為彷彿隨着資本積累而起的，不是工人階級境況底惡化而是它底改善，這一見解是跟他底另外兩種錯誤思想關聯的。第一，他以為全部追加資本都消費於工資，因而得出結論道：資本積累底增加引起勞動需求同等的增加。李嘉圖這一謬見是承襲亞丹·斯密的，因為後者認定一年生產品底價值當只劃分為  $V + M$ 。第二，他確定說機器不排擠工人，確切一點說，它們縱然排擠工人，也只是暫時的。在一八二〇年以前，李嘉圖向來堅持着這樣的見解（他在國會裏發表演說時特別堅持這一見解），可是後來他自知錯誤，並且表現了他底公開承認錯誤的勇氣。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三十一章中（論機器的一章），李嘉圖寫道：『……我曾經持這樣的觀點，以為機器之應用於某一生產部門，因為它能節省勞動，所以對於一切人都是有利的，但是它伴行着這樣的困難，即在多數的場合內由資本與勞動之從一種行業流入另一種行業的移動所引起的那些困難。』

（註）後來他察覺了這一觀點底錯誤之後，他就得出結論來說，『工人階級所持的那種意見，以為機

（註）見李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二九四（該書第一版中無此一章）。

器底使用往往使他們底利益蒙受極大的損失，這種意見並非基於偏見和謬誤，而是跟政治經濟學之正確的原則相適合的。」在他致麥克·庫羅赫的書函中，他表述這一結論的方式更為堅決而銳利。他寫道：『但是我曾說，握有流動資本的廠主能夠給更多的人以工作。假使拿同等價值的固定資本去代替這些流動資本在他是有利的話，那末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底被排除，因為固定資本不能給他所要代替的全部勞動以工作。我承認，這一真理我覺得是跟任何幾何定理一樣正確的，而我這樣長久沒有察覺它，這我簡直頗為驚訝。』(註)

但是李嘉圖雖發見了這一個「跟任何幾何定理一樣正確的」真理，他却沒有從這一真理做出應該做的結論來。話然機器是排擠工人的，那末第一，機器生產底發展，必然引起失業後備軍底形成；第二，必然要降低工人底實際工資；第三，工人和資本家中間的矛盾就要比李嘉圖所設想的深刻得多。

#### 丁 地租論

李嘉圖底地租論(差額地租論)在當時是很聞名的。然而這一理論底真正的首創人却是安德遜

(註)見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三五(附錄)。



(Anderson)。李嘉圖底功勞只是在他最完滿地發揮了這一理論；他底地租論是他底勞動價值論底完成。在土地經濟中，除工資和利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收入，——地租；這一事實，看起來彷彿把勞動價值論推翻了；可是李嘉圖却能很精敏地證明這事實不但不跟勞動價值論衝突，而且正應根據勞動價值論去解釋它。

李嘉圖底地租論包括下列四個論點：(一)不同的幾方土地，其肥沃程度互不一致，因而同等資本投入肥瘠不同的土地得到不同的結果；(二)土地生產品底價值是按照最劣等的土地上的生產品底價值來確定的；(三)其他任何一方比較好的土地，由於按照那塊最劣等的土地上的生產品價值所確定的普遍價值與較好的和最優等的土地上的生產品底個別價值間的差異，就能給與額外利潤；(四)這種利潤，由於農業家們互相競爭的結果，就全部落到土地所有人的荷包中去了。

上述四論點中，第一點只是指出了一件大衆知曉的事實：不同的土地上自然條件不相一致的事實。不過李嘉圖把這一事實跟他底地租論完全不相干的一個錯誤論見聯繫起來：彷彿社會在其歷史的發展中，是由較好的土地墾種到較劣的土地的。有了這一論見，他就予論敵們以攻擊他底地租論的機會。李氏底論敵們駁斥了他這一不正確的論見（社會必由好土地到壞土地而耕種），就造成人們這樣一種印象：彷彿他底地租論本身就此被推翻了。但是實際上社會怎樣由一塊土地耕種到另

一塊的問題，對於李嘉圖底地租論是毫無關係的；重要的祇是因為好土地不夠，於是不得不墾種其他的土地。

實際上這一點李嘉圖是很了解的，因為他底地租論是用以反對重農學派和部分地反對亞丹·斯密的。那些人確定說地租是自然「富饒性」之產物——農業勞動之特殊的生產率。李嘉圖却提出了相反的論調來：地租是自然貧乏之結果——好土地不足之結果。但是他底基本缺點之一是他以社會由好土地墾種到壞土地這一論點當做社會發展底法則。

李嘉圖地租論中另一更重大的缺點是他把地租論跟土地肥沃遞減律聯繫起來；這一「法則」（即土地肥沃遞減律）幾乎成爲現代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底「公理」了。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這樣解釋這一「法則」：假使同一土地上後幾次投資所獲得的結果跟前幾次投資底結果完全一樣的話，那末社會就沒有從較好的土地轉移到較劣的土地去墾種之必要了。只要單單墾種優良的土地就夠，一切增長着的需求（不論由人口底增加所引起或由國民境况底改善所引起都無關），只要繼續不斷地投資於這些優良的土地就可以滿足了。由好土地底墾種轉移到壞土地，這證明在好土地上的增補投資（即以後幾次的投資）底功效不如壞土地上的頭幾次投資之大。這就是說，「土地肥沃遞減律」是存在的。假如沒有這一「法則」的話，土地生產品底社會價值就變成優良土地上的生產品價值

了，因為只要在這些土地上繼續多投幾次資，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獲得任何的生產量。這樣，「土地肥沃遞減律」就確定了劣等土地也須墾種的必然性，因而劣等土地上的生產成本就變成社會必需的生產成本了。

鄔梁諾夫給予這種理論以週密的批判。他寫道：「只要稍稍思索一番，任何人都會明白這種論調是無內容的抽象論調，它把最重要的東西拋棄了：技術底水平，生產力底發展狀況。就實質上說，所謂「增補的投資」和勞動亦當以生產方法之改變、以技術條件之變化為前提的。土地中投資大量的增加，必然要採用新的機器，實施新的農業制度，新的耕畜培養方法……等等。當然，比較少量的增補投資和勞動，也可以在現有的不變的技術水平之基礎上發生的；在這樣的場合，「土地肥沃遞減律」在某種程度內是適用的，即是說，在不變的技術水平給予增補資本和勞動以極狹窄的限度這點涵意上是適用的。這樣，我們所見到的不是什麼萬般的 (universal) 法則，而只是極其相對的法則（指土地肥沃遞減法則言——沈）——其相對性有如此之大，以致它簡直不配被稱為法則，甚至連農業底任何重要的特點都談不到。」

鄔氏底結論是這樣：「由此看來，「土地肥沃遞減律」並不適用於技術在進步、生產方法在改變的那些場合。它底適用性是很相對的，很有條件的，即只有在技術停滯着不變化的場合內是適用

的。」

最後我們要指出，「土地肥沃遞減律」是跟馬爾薩斯的人口「律」有密切的聯繫的。說得更確實些，前者鞏固着後者，並且說明了後者：照馬爾薩斯的人口「律」說，食物底增加落後於人口底增加，因為土地底肥沃程度在遞減着。這兩種「法則」底社會政治的意義是一樣的：即將大衆貧乏化底責任諉諸自然，而不諉諸社會組織，不諉諸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 四 工業危機論

李嘉圖否認一般的危機。他寫道：「生產品永遠是和生產品或服務相交換的，貨幣只當做促成這種交換的工具而已。某一種個別的商品可能生產得過多，因而市場上這種商品就要過剩到這樣的地步，以致連消耗在這種商品上的資本都不能償付了。但是一切商品同時都發生這樣的情形是不可能的。」（註）

這樣，李嘉圖首先否認了一般危機底可能性。但是這種見解是跟現實相衝突的。固然人們可以用下面的理由來替李嘉圖和整個古典學派辯護，就是說，定期的工業危機事實上肇端於一八二五年

（註）同書，頁二二三。

的危機，也就是說，工業危機之成爲定期地重復的現象，在李嘉圖死後才開始的（李氏死於一八二三年）。最初的幾次危機，——一八一五年的和一八一八至一八一九年的工業危機，——還可以用偶然的原因去解釋它們的。但是我們却不能根據李嘉圖未曾親眼看到一般的工業危機這一事實，而就說李氏底理論是對的。須知這裏最重要的還是李氏底理論啊。李嘉圖既然說『生產品永遠是和生產品或服務相交換的』，而貨幣只是完成這種交換的工具而已，那末在他底觀念中彷彿通過貨幣的交換跟商品直接交換（即所謂物物交換）本質上是一樣的，甚至商品資本主義的交換跟商品直接交換本質上也是一樣的了。於是他得出結論來說，一切商品底生產過剩是不可能的，因爲照他底意見以爲一件商品底購買必然同時就是別一件商品底出賣， $C = M$ 的公式就等於 $M = C$ 的公式。但是我們要問：可不可能發生生產過分地超過需要呢？對於這個問題李嘉圖回答道，需要是無限的。

資本論底作者早經證明在 $C = M$ —— $M = C$ 這一商品流通的公式中，已經潛伏着危機底可能性。李嘉圖底否認危機，證明了他沒有了解 $C = M$ —— $M = C$ 這一公式底意義，亦即不了解布爾喬亞社會之最簡單的關係。李氏既然看不見潛伏於 $C = M$ —— $M = C$ 中的危機底可能性，當然也就根本不知道危機之由可能變爲現實的這一轉變了。照他底意見說來，不論是在單純商品生產中

抑或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一樣地是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貨幣只是充當流通工具而已。但是假設每一次「 $\text{A} \rightarrow \text{B}$ 」之後均立即跟着「 $\text{B} \rightarrow \text{A}$ 」，每一次出賣之後均立即跟着購買的話，那末就得首先承認一個前提，即資本主義的生產不是價值和剩餘價值底生產而只是使用價值底生產。

資本論作者評論到這種否認一般危機的「理論」時寫道：『假如有人說，資本家所要的只是他們各種商品底相互交換和消費這些商品，那末這就表示這些人忘記了資本主義生產底一般性，忘記了資本主義生產是資本價值增加而不是它底消費。總而言之，對於生產過剩這種顯著現象的一切反對意見……都歸結於資本主義生產底界限不是一般生產底界限，因而對於這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就變成沒有界限了。可是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矛盾，恰在於它底生產力趨向於絕對發展的傾向，這種發展則經常地跟那些特殊的生產條件（資本就在這些條件中，而且只能在這些條件中運動着）起着衝突。』（註）

李嘉圖正跟古典學派底一切代表一樣，他完全不了解商品底矛盾和貨幣底本質，因而他底全部經濟學說就結束於一般危機底否認，這就證明他不了解『資本是在那些條件中，而且只有在那些條件中運動着』的這個問題。他只看見資本主義生產底一方面，即生產力絕對發展之傾向底這方面，

（註）卡爾著：資本論卷三，第十五章。

而不看見另一方面，即生產力發展之傾向『經常地跟那些資本運動底特殊條件起衝突』的那一方面；而且後一方面又為前一方面所確定同時又否定。

李嘉圖底思想要點（在這個問題上）有三：第一，需要無限；第二，需要能夠靠生產，而且事實上是靠生產來滿足的；第三，因此生產永遠不會超過消費。固然李嘉圖也深知這裏所談的需要不是需要本身，而是購買力或支付力所及的需要（或需求），然而這仍未能動搖李氏底立場，因為他底意思正是說支付力所及的需求是生產造成的（他說：『生產品永遠是用生產品去購買的』）。可能發生的只是一種生產品底生產超過另一種生產品底生產，可是在那種場合內，也只是局部的危機而已。這正和以後俗流經濟學者賽依底論調相吻合：『某種生產品太多，是因為別種生產品不足的緣故。』（註）

一般的生產過剩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切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所肯認的「公理」。根據這一「公理」，就得出「應盡力刺激生產」的結論來。可是因為惟一的刺激是高度的利潤，所以難怪李嘉圖一看到利潤率下降的傾向就大大地憂慮起來了。卡爾評及李嘉圖時寫道：『李嘉圖所憂慮的是利潤率隨着生產本身之發展而感受到下降的危險，而這種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底刺激，同時又是資本

（註）賽依 (Jean Baptiste Say) 著：政治經濟學 (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積累底條件，又是它底刺激。」（註）李嘉圖自己也說，「當資本底利潤還高的時候，對於積累的刺激仍然存在着的」。那末反過來說，當利潤率日益下降的時候，這樣的刺激就日趨消失了。但是李嘉圖却樂觀地斷言積累不會受到任何的威脅，因為他繼續說道：「在人類尚遠未完全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的時候，他對於商品的需求將日益增加起來。」

在李嘉圖底全部論見中（在他底全部「公理」中），值得注意的特點是：他一方面了解利潤對於資本主義生產「同時是資本積累底條件，又是它底刺激」，而另一方面他又把資本主義生產看作爲滿足需要的生產。這一不可調協的矛盾從頭到尾貫徹於李嘉圖底全部理論結構。他雖視資本主義生產爲利潤的生產，同時又把它看作爲滿足需要的生產，但是他却毫不猶豫地，十分堅定地袒護利潤和積累，因爲照他底意見說來，利潤和積累是全社會所關心的。



## 第六章 古典學派之沒落(一)：俗流經濟學說

### 第一節 賽依底學說

在前幾章中，我們探討了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發生和發展：它底奠基人是威廉·彼梯，它底建築者是亞丹·斯密，它底完成者則是達微·李嘉圖。現在要講到它底沒落時期的經濟思想了。具體地說，就是講到俗流經濟學說和所謂「經濟浪漫主義」(“Economic Romanticism”)亦即西斯蒙蒂主義“Sismondism”)。這裏先講俗流經濟學派底思想：它底內容，它底方法和跟古典學派的關係。

俗流經濟學的成分，實際上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中已經有了根芽。不過在當時這種成份跟古典派經濟學中的科學成份「和平共居」着。可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底一定階段上和相應地在政治經濟學本身發展底一定階段上，這兩種成份底「和平共居」就成爲不可能的事了。結果，俗流成份就脫離古典學說而獨樹旗幟，政治經濟學底一個新學派就被建立起來了。這個新學派底首創者便是法國的經濟學家賽依(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因此，我們底研究就從賽依開始。

賽依，就其對斯密的關係而言，是與李嘉圖處於對立地位的；李氏發展了斯密學說中的科學成份，賽氏則繼承和發揮了它底俗流成份。斯密學說中的一切弱點，都結晶於賽依底學說中了。雖然，研究和評論賽依底學說，却至今仍甚重要。因為這種俗流學說已成爲今日大部分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底思想根據，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中有許多理論——如利潤論、工資論、及其他各種理論——都是跟賽依底類似理論有密切聯繫的。所以研究和批判賽依實在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這是第一。第二，俗流經濟學底發生和開展是一種很合歷史規律性的現象：它底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麼某個理論家底幻想底產物；我們知道它是爲資本主義底發展所規定的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階段。所以要了解俗流經濟學所由來的基本原因，就必須考察它底創建人賽依所處的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特別是法國的）發展底狀況。

### 一 賽依底時代

曾經我們講過重農學派時代的法國，現在要講到賽依時代的法國了。自然，這兩個時代的法國是大不相同的，它們中間隔了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

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準備工作中，法國的經濟思想家（重農學派）是參加過的。可是一到古

典派經濟學業已形成而且發展的時候，它却不能在法國的土地裏生起根來。第一因爲一七八九年的革命雖大大地推動了法國的發展，可是跟英國比較起來它還是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第二，革命本身底發展和社會矛盾底尖銳化，使得資產集團的思想家沒有發展科學的經濟思想的可能。大革命給予法蘭西貴族階層以致命的打擊，而同時又引起了法國資產集團極大的憂慮。由於這些原因，所以古典派經濟理論在法國就大半被利用去作爲袒護布爾喬亞關係的工具，而經濟學底庸俗化過程也就發展起來了。

固然在賽依底時代——包括法國革命底一切階段，拿破崙時期和復辟時期——法國的工人尙未成爲「自爲階級」，可是他們底堅決的戰鬥精神，却比任何國家都早迫得資產集團「警惕」起來。正因爲這樣，所以俗流經濟成份之形成爲一種特殊的獨立的經濟學說，在法國就比在英國早得多了。

現在我們要把賽依時代法國的經濟和政治的狀況，作一番概括的觀察。

當時的法國大體上是一個農業國家；二千七百萬人口中，十分之九是農村居民，在十餘個大城市中，只巴黎有居民六十萬，絲織業中心的里昂有十三萬五千人；其他的大城市裏，居民都只有五、六萬人。

在產業領域內，法國當時盛行着資本主義的工場制。勞動過程之過渡到大機器工業的那種轉變，在革命以前已經開始，但是工業制度之統治的方式却是手工工場制。手工業已大半為資本所控制，所以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制在當時法國的工業生產中已經演着決定的作用了。同時，在法國的工場制內，創立大機器工業的預備工作已快完成。工業革命底時期已經十分迫近，大革命替它清道，因而亦即決定了它底誕生。

大革命毀滅了城市和鄉村的中世紀制度，剷除了工業的束縛和行會制度；打破了區域與區域間的封建的屏障；改革了賦稅的制度（即改革從前賦稅祇向「第三等級」的人徵收的那種制度）。簡言之，革命替法國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道路。但是資產集團未曾能立時利用革命底一切賜予，只到拿破崙一世底時代，他們才開始享受自己勝利底成果。

拿破崙大規模地實施其關稅保護政策，以保證法國在歐洲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保證法國工業底銷售市場和原料市場。這樣，他就大大地促進了法國工業底發展。例如煤底生產，一七八九年法國僅採得二十五萬噸，至一八一二年已增加了四倍，即採得一百萬噸。在同一時期內，生鐵底產量則由六萬噸增加到九萬九千噸。用機器紡紗的工廠，僅巴德下爾一省，在一八一〇年已達一二六家。到拿破崙政權倒台以後，法國工業底規模擴張得更快，生產底型態也改變得更快了。在一八三

○年初，法國已有六二五架蒸汽機，共有馬力一萬匹；煤底產額亦已增加到一、八六三、〇〇〇噸了。鍊鐵工業亦於同時猛烈發展，一八二八年此部門中已有工人七萬五千人；而只巴黎一地所有工業企業中的工人總數，已達二十四萬五千人，即佔巴黎全市人口百分之三十四。由於工業生產技術底猛進，交通運輸工具也開始加速發展。法國已處於激變的工業革命時期中。

講到社會政治狀況的話，也是跟賽依所建立的俗流經濟學不無直接關係的。

舊制度下的法國社會，主要地由三個等級所組成：其中一個是特權等級，即貴族與僧侶（教士），第三個等級便是其餘的一切被統治的百姓。第三等級中，雖包含着各種利害不同的階級成爲（如資產者、商人、農民、手工業者、工人等等），但是由於同處於封建壓迫之下，他們形式上就出現爲一個「整個體」。革命剝去了社會階級之封建的外衣，因而這一「整個體」就被打散了。勞工集團雖尚未成爲一個獨立的力量，但在一般的勞動大眾中，它所持的立場對於資產集團却是最不利的。同時小資產者羣（以甲可賓黨人爲其政治代表）也激烈地騷動起來了。他們利用勞工夫衆底鬥爭以壯聲勢，亦給法國底新統治者以莫大的威脅。而農民運動底怒潮又在法蘭西全國境內廣大地發展着。這樣，舊的統治等級失去了經濟的支配和政治的特權，而第三等級亦由一形式上的整體分解爲各自獨立的社會集團了。每個集團都各自提出了本身的階級要求。

民衆武裝、街市巷戰、巴黎暴動，——這些都是法國布爾喬亞革命底肇端；但同時又是決定它以後的「命運」的要因。從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手工業者和工人羣衆底暴動取得了第一次巨大的勝利起，直到一七九四年以羅貝斯比爾（Robespierre）爲首的革命的甲可賓政權覆滅（即「梯密多」九日“9th. of Thermidor”之反動政變）後一年爲止，法國全境內——不論是城市或鄉村，都彌漫着下層民衆之革命的火燄：暴動、巷戰、恐怖、工農的武裝戰鬥，甚至於規模更大的國內戰爭，——這些便是當時法國的革命陣營對付反革命陣營的主要手段。

靠下層民衆底力量而取得勝利的資產集團，對於鄉村中的封建義務並未加以觸犯，封建的所有權事實上還是被保持着。工人底生活也未曾加以改善。資產集團只顧爲自己的經濟利益（解除一切資本主義發展底束縛）和政治的統治權打算而全不顧到下層民衆底利益。經濟恐慌、飢餓、城市和鄉村大衆底困苦境况，——這些現象都急迫地要求立憲會議採取堅決的經濟政策。然而握權的資產集團偏偏缺乏這種堅決性。城市底食物供給制被破壞了，接着就發生一般的經濟混亂，因而貨幣流通底常態也全被破壞。革命政府財政底主要來源是濫發紙幣；結果工人底名義工資祇增五、六倍，而生活資料底物價却激漲到三十四倍之多。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工人底暴動推翻了皇帝（路易十六）並且把他送上了斷頭台，建立了

以「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 爲首的民主共和國。從這時起，革命底領導權就落到革命的小資產者羣手中去了。他們底政治代表便是山岳黨(The Mountain) 及其首領羅貝斯比爾。從此資產集團已不復領導革命，而反成爲革命底阻力了。

「國民會議」內部的鬥爭——代表工商業資產者的自由主義的基朗特黨人(Girondists) 和代表小資產者羣與全體勞動大眾的山岳黨人之間的鬥爭，——反映着法國國內階級力量對比關係底轉變。第二度「社會變革」(貧者對富者的革命) 底威脅，迫使基朗特黨人在革命底半路上停止前進，而山岳黨人則繼續堅決地革命。前者在八月十日的勝利中是後者底盟友，此後却很快地轉變爲革命底敵人了。到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當革命的小資產集團領導着巴黎底全體貧民和工人大眾舉行起新的暴動來時，那次運動底「槍鋒」，已不祇向着一切舊勢力，而主要地是向着工商業資產集團刺過去了。國民會議中基朗特黨的代表被驅除出去了；他們底領袖但頓(Danton) 亦被斬首了；國民會議就變成可賓左派獨佔的政權機關了。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集團專政底局面。這種小資產者的革命專政，一直維持到翌年(一七九四年)「梯密多」九日(即七月二十七日)的反革命政變把它推倒爲止。

可是羅貝斯比爾底政權雖被反革命勢力所推倒，但他所代表的巴黎的勞工和貧民大眾却重新大

舉接連地暴動，表示對反動勢力捕殺山岳黨領袖的答復。其中有一次暴動（一七九五年五月）所提的口號是『麪包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那次暴動竟被反革命軍隊底大炮炸彈所壓服。資產階級的「行政會議」（The Directory）對付民衆暴動的工具是炮兵隊，對付工人的羣衆大會則用騎兵隊底衝鋒。但是在「行政會議」統治時期內，工人羣衆底集會結社與罷工運動不但沒有消沉下去，而且反而更形高漲。

所以法國的工人在革命底開端階段上還是一個無組織的羣衆，他們還不知道有跟資產集團底利益不相同的自己特殊的利益；可是在革命底最後階段上，他們却已經有了自己的先鋒隊伍，有了自己的組織。這便是從革命的羣衆運動底訓練和經驗中生長成的巴保夫主義者（Baboeuists）底集團。社會主義的理想，已開始在法國工人羣底意識領域內散佈它底種子了。

以上所述，就是關於法國革命時期底經濟和政治的概況。法國的資產集團，既處在這樣尖銳的社會衝突局勢之下，他們底懼怕下層，實已大大超過了他們底仇恨舊勢力，所以在經濟學領域內，他們不能夠提出自己的亞丹·斯密來，更提不出自己底達微·李嘉圖來。他們所能提出來的，只是像賽依那樣的經濟學者，而且事實上也正提出了賽依。

## 二 賽依底經濟學說



甲 生產論

我們知道，賽依底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從生產底分析開始的。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賽依如何解答他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什麼是生產？

我們不妨先把解答這個問題的歷史拿來回顧一下。重農學派是狹窄地、自然主義地了解着生產，說生產便是物質本身底增長，因此他們認為只在農業中有生產，工業中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亞丹·斯密在這個問題上前進了一大步，他擴大了生產這一概念。在斯密看來，一切勞動，只要是生產事物（商品）的，都是生產的勞動，而這種勞動底應用便稱為生產。可是斯密關於生產和流通底區別問題，却尚無明確的觀念，因而對於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底區別的理解，他也一樣地缺乏明確性了。他有時往往把二者都看作生產資本。

在這個問題上，賽依也賦予了一些「明確性」。他宣佈一切形態底生產和流通都是同樣程度地成為財富底泉源：商業是跟工業一樣地為財富底泉源，工業則又跟農業一樣地為財富底泉源。賽依自以為這一來他把重商主義者和重農主義者底偏見都糾正過來了。

賽依底「糾正」前人們底偏見，是以他底生產觀為依據的。在他與重農學派論戰時，他確定

說，『構成世界的那些物質材料，既不能增加，亦不能減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論綱：『生產不創造物質，但創造效用。』這論綱底前半段——生產不創造物質，——是完全對的；但是它底後半段——生產創造效用，——却含義模糊了。而且後來賽依更明白地把「效用」這一概念解釋成「服役」了；因而生產也就等於「提供服役」，因而商業（也是一種「服役」）也和工業農業一樣地具有生產性了。

賽依無限度地擴大了生產底概念，因而他底思想不但跟重農學派衝突，而且也跟亞丹·斯密不一樣。亞丹·斯密雖亦知道生產並不創造新的物質，可是他認為只有『凝固和實現於某一事物或商品』的勞動是生產的。然在賽依看來，一切有用的勞動，說得確當些，一切提供服役的勞動，不論它是否凝固於事物或商品，都是生產的勞動。賽氏把法官、律師、醫生、學者等等底勞動都看做生產的勞動了。

既然這樣，那末生產的勞動就不只是工廠或工場工人（以及一切物質價值底生產者）底勞動，而且應當承認企業家（工廠主）底「勞動」為最富於生產性的了。由於這種生產觀，賽依又得出了「非物質的資本」這一範疇來。這是俗流經濟學特創的範疇。但是所謂「非物質的資本」，是什麼東西可以充當的，而且各人有各人底解說的：有些俗流經濟學者說信貸就是「非物質的資本」，另

外一批經濟學者則指知識、才幹、各種技能，總而言之，『凡能促進生產或獲得的一切精神的和個人的要素』，(菲里波維契 Filippovich 語)，都屬於這一範疇。這裏必須指出，以工人底技巧爲其資本的觀念，亞丹·斯密已有之。但是賽依把它加深起來，而定其名爲「非物質的資本」。

## 乙 價值論

賽依底價值論跟他底生產論有密切的聯繫。他總結他自己的生產觀如下：『因此，這裏（指在生產內——沈）是有創造的，但所創造的不是物質而是效用；而當這種效用賦予事物以價值時，這就成爲財富底生產了。』

這樣，賽依是從生產中所創造的商品底效用性得出商品價值來的。生產諸要素創造了物品底效用，同時也就創造了它們底價值。這麼一來，賽依就把價值跟使用價值等同起來，同時就推翻了古典學派底勞動價值論。

賽依責備斯密道：『他（指斯密——沈）把生產價值的能力祇歸屬於人類勞動一種。經過一番精確的分析，我們就知道價值底發生乃由於勞動（或人類底辛勤）、自然力量和資本三者之聯合的作用。斯密不認識這一點原理，使他不能建立起機器對於財富生產之影響的真實理論來。』（見賽

著的政治經濟學第四章)。李嘉圖會引用過上面一段文字，他接着評道：『賽依跟亞丹·斯密底見解相反，他在第四章中討論到價值問題時，認為價值是由日光、空氣、氣壓等等自然因素所賦予商品的，這些因素有時代替着人類底勞動……。但是這些自然因素所賦予商品的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像賽依所說的一樣。』(註)

賽依不但把價值跟使用價值等同起來，亦且又把它跟價格等同起來。根據他底價值與使用價值(效用性)之等同觀，應當說價值也和效用性一樣地是在生產中創造出來的；那末根據他底價值和價格底等同觀，就應當說價值是發生於交換的。所以賽依底結論說商品底價值是它底所值和購買它時所支付的。這樣，照賽依底定義說來，問題變成異常地簡單而明白了。價值是什麼？回答道：『是某事物之所值』。價格是什麼？回答道：『某事物之價值在貨幣上的表現』。那末為什麼土地底「勞動」有價值呢？回答道：『因為購買它時要付給一定的價格』。這樣的解釋問題當然是很簡單明瞭而且不費力的！

丙 分配論

(註)李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頁二〇九。

賽依認定生產底三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適應着社會底三種收入，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一理論和他底市場論構成了他底全部理論思想底骨幹。

假使說古典學派往往把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跟事物間的關係混淆起來，那末賽依底觀念中則根本沒有人與人的生產關係；政治經濟學被他解釋成研究事物的科學了。他認為勞動本身 (Labour as such) 生產工資，資本本身 (賽依認為資本就是生產手段) 生產利潤，土地本身生產地租。這樣，他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完全簡化 (即庸俗化) 為事物固有之自然關係，因而亦即把政治經濟學簡化為像物理、生物學一樣的自然科學了。

講到工資的話，賽依堅決地否定工人取得自己勞動底全部生產產品的權利。他所依據的就是他底「生產三要素論」，因為每一生產要素各有其自身的所有人，而每一要素底所有人都一樣地參加生產，因之每一所有人都有享受一定的勞動報酬 (收入) 之權利。既然企業主和地主都跟工人一樣地參加生產，那末工人當然只能享受生產品底一部分，而企業主和地主所收入的，也只是他們自己「勞役」底自然報酬而已。這一來，他把資本主義之剝削的本質完全抹煞了。

再講到工資和利潤之關係的話，賽依跟李嘉圖底見解 (註) 相反，他確定說工資下降之結果不是利潤底提高而是物品價值底降落。這一來他就否定了工資和利潤 (因而亦即勞動和資本) 底對立

性，這是跟他底「生產三要素論」完全相適應的。同時，這裏又奠定了「階級和諧論」底基礎。從另一方面講，賽氏既云工資下降促成價值下降，這無異拋棄了他自己先前的效用價值論（即以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依據這種價值論無論如何也得不出工資下降促成價值降跌的結論來的。須知工資下降並不減少物品底效用，因而也就不至於降低此物品之價值。但是這位「科學思想家」底行頭箱裏却還有另一套價值論——俗流的生產成本論；遇到頭一種理論碰壁的時候，他就把這一套拿出來「補救」。賽依說：「一切生產性的服役底價值形成物品底生產成本」。因此假使這些服役之一（指勞動底「服役」）底價值降低了，則全部物品價值當然隨之而相應地下降。

現在再要簡單地講一講他底利潤觀。我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古典學派又陷於自相矛盾的見地中：他們一方面事實上把利潤解作爲剩餘價值，而另一方面則又視利潤爲資本本身之自然的產物，是日常生活中自來就有的現象。正與在別的問題上一樣，賽依這裏又是藉消除二者之一的辦法去「克服」古典學派底矛盾的：賽氏拋棄了古典派底前一種見解，而發展了後一種觀點，他只知道現象底外表。他知道存在着平均利潤，後者可分爲利息和企業家的收入兩部分。除此以外還有一點

（註）前一章中講過，李嘉圖根據他底勞動價值論，得出相反的結論來：他認爲工資下降只提高利潤而改變商品價值。李氏藉此證實了勞資底對立。

「新」發見，就是照賽氏底三要素論，利息只是資本「服役」底產物，而企業利潤則為企業家經營事業、他底才幹、他冒的險等等底報酬而已。賽氏始終認定資本家和企業家不是同一種人，固然他同時又承認企業家是富人。企業家是社會生產底中心人物。

古典學派視利息為利潤之一部分，而利潤則為與工資有極大區別的一個特殊的範疇（註）。可是在賽氏看來，利潤這一特殊的範疇事實上是沒有的。前面已經說過，賽氏認為利息是資本執行職能底結果，而企業家的收入（企業利潤）則被他解作高級熟練勞動底報酬，企業家自己底工資。拿利息去代替利潤，這是俗流經濟學者底慣技。在他們看來，資本直接生產利息，而不生產利潤。

最後賽氏，對於地租的見解，也是根據一貫的「生產三要素論」和「服役報酬論」。他把地主（土地所有人）也看成企業家了。在他底觀念中，土地所有人和土地經營人（農業家）是沒有分別的。這一來他就替地租做了辯解，他確定地租為土地所有者底經營和辛勤底報酬。然而賽氏既將土地所有人看成企業家，那末地租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為地主既變成企業家，地租也就變成企業利潤，而後者又是「高級熟練勞動者底工資」！

（註）斯密就已確定地說過，利潤無論如何不能被解作工資的。

丁 市場論

市場論（或銷售論）是賽依全部經濟理論中最主要的部分，也可以說是他底獨特的「發見」。讓我們先把它簡單地介紹在下面，然後再加以評估。

賽依底市場論底要點可歸納到以下幾點。商品底出賣，就是商品與商品相交換，或者，說得更適應賽依底見解些，是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這個論綱還可以這樣表述：每一出賣人同時就是購買人；每一購買人同時就是出賣人。由此就形成「出賣人和購買人之形而上的均衡觀」。

從這一個被賽依所視為重要的「真理」，他得出了四點結論來。

第一·個·結·論：『每一國家內，生產者愈多、生產底數量愈大，則生產品底銷售愈容易、種類愈多樣和範圍愈廣大。』（註一）其後賽氏又把這一結論發展成爲一般生產過剩不可能論，即一般的工業危機不可能論。對於工業危機這一事實（在賽依底時代，曾經發生過二次工業危機——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二五年），他底解釋是：『某些生產品太多，是因爲別種生產品不足之故。』（註二）這

（註一）見賽著，政治經濟學百四〇。

（註二）同上，頁四二。



樣，在他看來，只有生產不足而沒有生產過剩那回事。

第二個結論：『每一個人總希冀一切人都幸福的，一個工業部門底繁榮常常有利於其他一切工業部門底繁榮。』(註一)賽依把城市與鄉村底關係，把省與縣底關係以及整個國家與國家底關係，都建立在這種互相關心幸福的觀念上去了。簡括地說，假如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基本矛盾被賽依底生產三要素論和服役論所消滅。則城市與鄉村底矛盾和其他各種矛盾就被他底市場論所消滅了。

第三個結論：『外國貨底輸入有利於本國貨底出售，因為假若不是我國的工業品、農產品和資本底生產品(又是生產三要素，這裏的「工業品」，作者底意思是指勞動——沈)藉貿易來出售的話，我們就不能購買外國貨物。』(註二)這一論點實際上祇是第二個結論底另一說法，其意義是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反對拿破崙的貿易保護主義。

第四個結論：『僅僅以引起新物品之生產的純粹和簡單的消費，毫無助於國家底財富。它從一方面毀滅了另一方面所引起的。』(註三)這一論點是用來反對那些擁護奢侈、擁護貴族階層底消費

(註一)，見賽著，政治經濟學頁四二——四三。

(註二)同上，頁四五。

(註三)同上，頁四五。

的人（如馬爾薩斯）的。照賽依底意見，生產本身替自己創造市場，它無需乎所謂「第三者」。固然賽依也擁護地租的，他不把地租看做土地服役底結果，也不把它看做土地所有者經營底結果。然而他也不能走上馬爾薩斯底立場。他底見解可以分爲兩方面的：以資產者的身份，他應當擁護一切形式的私有財產，連土地也在內；以工業資產的身份，則他就企圖盡可能地限制土地所有者集團底只消費不生產的特權。

這第四個結論，同時又含有反對過大的國家消費（特別是官僚機關底消費）之用意。

假使把賽依底這一切結論總合起來，那末我們就得到整個的自由主義的和辯護派的（即替資本主義辯護的）思想系統。爲這一思想體系之基礎的「重要真理」是闡去了全部資本主義現實的抽象空談。賽氏把資本主義生產解釋成簡單的商品生產，並把商品交換解釋成生產品交換，——這就是這一「重要真理」底方法論。

在資本論裏有一段話：『在這方面，經濟的辯護主義（對現制度的袒護和修飾）底方法有兩個特點。第一，藉簡單的抽去商品流通和生產品直接交換之區別，而把二者等同看待。第二，企圖否定資本主義過程所固有的矛盾；這是這樣來達到的：即將資本主義生產者之間的關係解釋成直接發生於商品流通的那些簡單關係了。然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很多種的生產方式所有的現象，雖然

範圍容有不同。既然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切生產方式所共通的商品流通底抽象範疇，那末就等於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生產方式，不知道它們各異的特點，我們也不能造成關於它們的任何概念。」(註)

生產品底直接交換，只存在於商品生產底發生時期；隨着商品流通底發展，生產品底交換就表現為商品變形底公式：『 $\text{C} \rightarrow \text{M} \rightarrow \text{C}$ 』。可是賽依完全附和斯密、李嘉圖等人底見解，認為貨幣只是流通工具，他甚至更簡化了這一貨幣觀，把『 $\text{C} \rightarrow \text{M} \rightarrow \text{C}$ 』完全看成『 $\text{C} \rightarrow \text{C}$ 』了。在他底意見，以為重要的只是結果，兩種使用價值底交換。賽氏從最後的結果出發，即從最後為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這一結局出發，他又把生產品當做貨幣了。在他看來，商品本身，在它們直接的自然形態上，已經是貨幣了。一種生產品是對於別種生產品的購買手段、貨幣，而真正的貨幣，則只是減少生產品與生產品交換時的困難的一種手段而已。

賽依既不了解商品、貨幣和商品變形底特性，他就不了解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底特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祇是生產品底生產，在這種生產中，一種生產品是購買手段，是對於別種生產品的貨幣。既然是這樣（在賽依看來，正是這樣的），那末生產過剩就完全不可能了。實際上說，購買手段底生產過剩怎麼會有可能呢？只是由於某種生產品不足而形成另一種生產品過多時，才有

(註)資本論卷一，第一章。

可能；即在國民經濟底一端上購買手段底生產過剩，只是在別端上沒有充分的供給時，才有可能。簡言之，任何的生產過剩都只是生產不足而已。

## 第二節 馬爾薩斯

### 一 概論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俗流經濟學底另一支派；可是他有跟賽依相同的一點，就是他也從亞丹·斯密學說中吸取了庸俗的成份而把它們構成爲獨特的經濟學說。許多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之所以把馬爾薩斯歸入斯密學派，大概就根據這一點。

但是馬爾薩斯底意義，却不只限於他庸俗化斯密，「建立」俗流經濟學。因爲第一，馬爾薩斯不祇是個經濟學者，而且還是個社會學者。他因他的人口論而出名，而人口論不是政治經濟學一種所能包括的。第二，馬氏跟絕對大多數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不同，他是布爾喬亞化的土地貴族底顯著的代表，這派土地貴族是跟布爾喬亞生產方式完全妥協了的。因此馬爾薩斯不是單純的俗流經濟學者，而是特種俗流經濟學者。他不但跟李嘉圖底思想大相分歧，而且還跟賽依和別的俗流學者們進行了論戰。

馬爾薩斯又是英國的學者；在他那個時代的英國底社會經濟狀況，我們已在論李嘉圖那一章中說明，此處無需重複。這裏所要說的是關於馬氏底學術活動的大概情形。

講到馬爾薩斯底學問和他在政治經濟學裏的地位與意義，大多數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都把他崇揚為劃時代的頭等學者。這種過分的估量是完全依據於他所著的人口論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底成功的。該書底出版 (一七九八年)，彷彿在思想中投下了一粒巨彈，它底激動思想界是很有力的：它一方面引起了熱情的擁護者，同時也引起了熱情的反對者。所謂「成功」，當然不是指人口論一書底科學價值，而是指它解釋了布爾喬亞社會底最重大的一個問題，它對於這個問題解答得簡單而「明瞭」，而且對於統治的布爾喬亞集團又是十分方便的。這個問題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失業問題、貧困問題，也就是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口過剩」問題。評估這一觀點時，卡爾說道，『不言而喻的，馬爾薩斯把這種「人口過剩」底現象，解釋成爲永久的自然法則，而不把它當做純歷史的自然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這樣解釋當然簡便得多，而且更能適應統治階級底利益，對於這種利益，馬爾薩斯是以純牧師的熱情去崇揚它的。』(註)

一八一七年馬爾薩斯底政治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出版了。馬爾薩斯

(註) 卡爾著，資本論卷一，第二十章。

用這一部著作，與賽依共同奠定了俗流經濟學之堅實的基礎。不過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馬爾薩斯的庸俗化與賽依的庸俗化有別，他的庸俗化是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的。

馬爾薩斯不僅在英國，即在國外，也是頗孚衆望的。但是他的名字只受統治集團底尊重，而且只受統治集團中最反動的分子底尊重；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勤勞羣衆，對他只有仇恨和輕視。

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把資產階級捧上了政權舞台，但同時又提出了許多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圈子內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其中最主導的一個，是一部分人財富增長和另一部分日益貧困的問題。社會底生產力飛躍地發展，大大地增加了有產者集團底財富，但同時又以同樣的速度發生着大衆底破產和赤貧化。資本主義積累底法則，在英國當時表現得最爲明顯，最典型式。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羣雖在組織上和理論上都還稚弱得很，但是客觀的情勢已迫着好些思想家出來替他們說話，或說關於他們的話。例如渦文及其信徒們曾經替他們說過話：哥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和其他許多急進作家，也替他們說過話；同時，馬爾薩斯也說過關於他們的話，只是說法不同罷了。

關於渦文的思想，前面已約略說過，以後在討論空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時還要詳加評述，這裏

所要說的，只是馬爾薩斯首先向它攻擊的哥德溫底思想，——被馬爾薩斯視為「危險思想」的思想。

威廉·德哥溫是無政府主義底第一個大理論家。他在盧騷和法國唯物論者底積極影響之下，由一個宣教師轉變為急進的思想家了。在思想上，他是個唯理論者（理性主義者）。他不承認一切外來的威權。他對於宗教和現存的社會、經濟和國家制度，都給予無情的批判，認為這一切都應該受理性底裁判。哥德溫並指認布爾喬亞制度亦在被裁判之列，而在理性裁判之下，這種制度底存在是沒有根據的。同時他又主張廢除私有財產權。

哥德溫是個和平的（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反對任何的暴力和強迫。唯理論者的他，相信社會底改造只有到社會貫徹着他的理想的時候，才能實現。可是這樣溫和的思想，在當時那種動亂時代的統治者羣看來還是有危險的，極可怕的。而最可怕的倒不是他的和平的無政府主義底積極主張，而是他的消除貧困、罪惡、以及一切由現存社會制度所決定的種種苦難的消極主張。

這些也就是布爾喬亞思想者馬爾薩斯所要攻擊的「危險思想」。馬氏所提出的論綱是跟哥德溫底論綱針鋒相對的。他用一切謬說來「證實」社會底貧困和苦難（飢餓、失業等等）不決定於社會制度而決定於人類底天性——無限繁殖的天性。馬爾薩斯確說人類有無限繁殖的趨勢，而食物底增

長却不能無限。由此就產生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增長間的「剪刀口」，於是人類社會底貧困就愈來愈擴大了。

根據這一基本論綱，馬爾薩斯得出了下列幾點反對勤勞大衆的實際結論來。第一點，他說勞動者底貧困和苦難是勞動者自己造成的，因為他們對於聖經裏所載的「天意」（即繁殖生育）執行得太努力了；第二點是主張打倒慈善行動（如濟貧、救災以及一切改善勞動者境况的行動），因為它只是更促進了多餘的貧人之繁殖；第三點，他認為自然底作用是合理的：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消滅多餘的人口。

這樣，馬爾薩斯確是資產階級一個最肯賣力的辯護士，也是一個最鄙陋、最惡劣和最粗魯的資產階級顧問。然而，資產階級並沒有全部接受他底「勸告」，因為他們不能：實踐的資本家對於資本主義的現實要比這位鄙劣的學者明瞭些；他們知道後備的失業者羣對於他們是需要的，沒有失業後備軍，他們在行市活躍時就沒法加速發展他們底生產，所以他們不贊成消除救濟貧民的那些慈善機關。

馬爾薩斯對於資產者的主要的「功勞」，在於他理論上武裝了資產者去與一般的急進思想，特別是與社會主義思想做鬥爭。假使說李嘉圖在理論上武裝資產者羣去與土地貴族做鬥爭，那末馬爾



薩斯則武裝他們去與一個「更可怕的」敵人——勞工集團做鬥爭。隨着資本主義底發達，李嘉圖這副理論武器漸見失效，甚至有害（因為他底學說具有揭露資本主義秘密的意味），而馬爾薩斯則愈到後來反而愈「薰香」了。

## 二 馬氏底人口論

馬爾薩斯人口論底理論，大概可以歸納爲下列三要點：

- (一) 人口多寡必然爲生活資料所限制；
- (二) 凡在生活資料增長之處，人口必一直向前繁殖，只要沒有任何非常的和顯著的障礙去阻止它就行；
- (三) 這些特殊的障礙和一切阻止繁殖力的原因，使人口仍舊回到與生活資料相適合的水平；

這樣的障礙有三種：節慾、罪惡和災禍。

第一個論點彷彿是異常地簡單而明瞭，用不着再加說明似的；當然要生活，就得要吃穿住，要吃穿住，就必須有生活資料，沒有生活資料就沒有方法生活。試問誰能推翻這一個「瞭如指掌」的「真理」呢？馬爾薩斯企圖拿這個「不容懷疑的」「絕對真理」作爲他變戲法的張本，以騙

過觀衆們的眼睛。實際上這個「真理」究竟「真」到如何程度呢？它是不是真正「不容懷疑」呢？

其實這個「真理」底真實程度是跟賽依底「生產品與生產品相交換」的市場論一樣的。當然的，要是人口多於食料的話，就要發生人口過剩。但是這裏的全部問題却在於這一過剩如何造成，這是一點。

其二，所謂生活資料，實際上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範疇。野蠻人底生活資料和現代文明人底生活資料是有極大的區別的。假如令現代人處於野蠻人底生活條件中去，他決不能生活下去的。再則在同一社會內，不同的社會羣亦有不同的生活資料：一個社會羣所需要的是最低限度的生理上的需求，而別個社會羣則需山珍海味，華衣大廈。馬爾薩斯的談論人口和食料，是沒有絲毫內容的抽象的空談。他拿抽象的人口和抽象的食料做出發點，接着又同樣抽象地說到他們如何增長的問題，說到人口底增長如何超過食料底增長。

爲要證明他自己理論底正確，他就舉出了一件事實來作爲證據。據他調查所得，北美洲在二十五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他把這一事實擴大起來當做定則看待了：「因此，假使人口底繁殖不遇到任何障礙的話，那末我們認爲下面的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就是每二十五年人口增加一倍，他是按

照幾何級數增加的。』(註一)

至於食料底增加，馬爾薩斯自己也承認沒有任何數字可稽；於是他就訴諸常識的判斷——說食料總不能按幾何級數增加的；他說我們假定它按照算學級數增加已經很夠了。根據這樣一種「堅實可靠」的論據，馬爾薩斯就洋洋得意地做他的結論道：『生活資料縱然在最優良的勞動條件之下，也決不會增長得比算學級數快些。』(註二) 『假定現時全世界人口爲十億，而人類生育底繁殖是按照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二八、二五六的級數進行的；生活資料底增加則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級數而進行。二百年後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例是二五六比九，三百年後是四、〇九六比一三；到二千年後，這個數目將大得無限度而無可勝計了。』(註三)

在這種可怕的「慘局」之前，馬爾薩斯認爲救濟之道，惟有靠上述第三條論綱中的幾種阻止人口繁殖的障礙。前面已經指出此類障礙有三：禁慾、罪惡和天災人禍。所謂「禁慾」是包括獨身主義、節制性生活之類；這不過是馬牧師應有之虛僞口吻而已，他自己就不相信做得到。而所謂罪惡的行爲，(如謀殺、自殺、虐殺等等)，也不見得對人口底繁殖有多大阻力。所以馬爾薩斯認爲有決定作

(註一)馬爾薩斯著：人口論卷一。

(註二)及(註三)同前書。

用的障礙是戰爭、時疫、水災、旱災、摧殘身體的勞役、以及貧困和飢餓。這些都屬於第三種障礙的。只有靠這些天災人禍，人口底繁殖纔受到極大的阻礙；縮減或停止人口底增加而使之與生活資料相適應或建立均衡。然而因這種均衡不斷地要被破壞，因之這類天災人禍就經常地成爲必要了！

這便是馬牧師公開擁護貧困、飢饉、戰爭、天災等的理論根據。這也就是馬牧師的人口論底真銓。可是這種見解（主要地指他底第三個論綱）却引起了大部分自由資產者和一切慈善主義者（資產者也在內）底猛烈反對，因爲在他們看來，馬爾薩斯的「理論」是幸災樂禍的「理論」，是主張社會紛亂的「理論」。於是馬牧師不得不見風駛帆，把自己的大作底重心從「理論」轉移到「事實的材料」上去；在他後來的幾版中，他增引了許多的統計數字和事實材料來證明天災人禍底頻繁。他底意思是在用數字和事實來證明自己的論綱而避免多談這類「理論」，以減少自己的罪惡。

然而馬爾薩斯所引用來證實他自己的空洞的抽象思想的一些事實，他所進行的各種歷史的考察，不但沒有證實他底「理論」，反而駁斥了他底見解。馬爾薩斯所說的是絕對的人口過剩，而歷史的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却是相對的人口過剩，即在現代社會關係之下的人口過剩。關於這一點，弗列德里赫曾從資本主義的現實中舉出下面的例子來作爲例證。他說，「假定一個工廠主每天能僱工十人，每人作工九小時；在這一場合，假使工人們每人每日都工作十小時的話，那末他只需僱九個

工人就夠，而那第十個工人就變成失業了……。假如我們拿整個國度底情形來代替這種個別的場合，情形也不會改變的。』(註一) 拿整個國度來說，由延長勞動時間所引起的不是一個工人失業，而是大隊的失業軍；也就是說，一部分工人底超額工作使得另一部分人沒有工作。不但這樣，沒有工作的工人『從市場裏跑了出來；他們不能再有所購買；他們原先所需求的那些商品數量，現在不再被需求，因而這些商品就不用再生產了；於是生產這些商品的工人們又沒有工作了，他們也從市場裏跑出來了……』(註二)

卡爾從他的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底分析中，顯示出在資本主義之下如何造成過剩人口和這種過剩人口如何變態地呈現出來的情形。他寫道：『這種資本底可變部分之相對的減少，隨着全部資本之增大而加速，而且它減少底速度比全部資本增大底速度更快；而在另一方面，這一相對的減少看起來又似乎是相反的：彷彿工人人口絕對的增加快於可變資本底增加或給養這種人口的生活資料底增加。可是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積累經常地在生產（而且是與積累本身底能力和量的大小成比例的）相對的過剩人口，即與自己增長中的資本底平均需要比較上的過剩人口，亦即多餘的勞工人口

(註一) 見弗氏著：英國工人階級之境况一書。

(註二) 同前書。

或人口過剩。』但是資本積累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却呈現為絕對的人口過剩底現象，即彷彿是勞工人口過分繁殖底結果。

一部分人底過分勞動造成別部分人底失業（即過剩的人口），這種現象當然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在前資本主義的諸階級社會中也有這種現象的。可是每一階級社會各有其特殊的人口律。在古代社會（如羅馬帝國時代）內，奴隸制生產出來大量的過剩人口；奴隸勞動排擠自由勞動；自由的手藝匠人、自由的土地耕作者轉變為無產者遊民了。無論在田莊上、在礦穴中，抑或在製造場中，奴隸都在從事非人的勞動；在聚集着失去生產手段的、因奴隸勞動底盛行而找不着自己勞動力底應用場所的那批自由勞動者的城市中，則盛行着怠惰、閒游、武士底角鬥和其他類似的消遣。

封建時代的大批門人食客，一切地主、封建貴族們所豢養的有閑分子；這類過剩的人口，是封建關係底產物，是賦役制底產物。

在馬爾薩斯看來，貧困和飢饉是人口過剩之最真實的標誌：既然有人貧困和飢餓，那末這些人便是多餘的。這便是剝削者羣及其擁護者底邏輯！然而歷史所告訴我人的，却是另一種情形；它告訴我人，人口底過剩並非食品絕對缺乏的結果，而是被生產出來的食品從生產者手上，被不生產者所佔有去了。一個社會羣被另一社會羣所剝削，——這就是人口過剩底根源；因為在這種剝削的條

件之下，一種人底過分勞動，使得別一種人底勞動成爲多餘（不必要）了。所以我們說，在每一階級社會內，各有其特殊的人口法則。古羅馬的「無產者」，中世紀城市和鄉村的貧困的飢餓羣和充滿着貴族門庭的門人食客，以及資本主義下的產業後備隊——這些都是歷史上有過的具體的過剩人口；然而他們不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不相同的。

馬爾薩斯却完全沒有這樣的觀念。在他底見解中，以爲重要的只須證明一件就行：人口底多餘是自然趨勢所造成的，這種自然趨勢就在於全人類之趨向於無限繁殖和生活資料之增加有限。這樣，他把人口過剩看做對於一切歷史時代都一樣的而且是永遠存在的天生的自然現象了。資本主義剝削關係底辯護人，絕對地需要這樣的蒙蔽手法的。因爲只有這樣解說，才能叫人們（特別是剝削者羣）把製造貧困、飢寒、失業、破產等等的罪惡諉之於天，而把剝削制度底罪惡洗刷得乾乾淨淨！

最後還有一點要指出來的，它也有很大的意義的，那便是馬爾薩斯的人口問題觀是純粹從消費着眼而不是根據生產的。他只認沒有食物（以及一般的生活資料）的人口是多餘的或過剩的；有閑階級、寄生階級、門人食客之類，他不算作爲多餘的人口，因爲他們有食物，而且特權階級的寄生者還有過分的生活資料呢。因此，馬氏又擁護不生產的消費（這表明他是土地貴族底代言人）；收

地租的地主、收什一稅的教士，他認為都不是人口底多餘部分，因為他們有的是食物，而且不但是食物，他們是什麼都有的啊！

### 三 馬氏在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馬爾薩斯也有一些聞名的著作，其中最要者是一八二〇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假如說在人口論中馬氏底筆鋒是反對一切急進思想，特別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他底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則主要地在反對李嘉圖。但是他底基本立場始終是一貫的——他始終是代表布爾喬亞社會之最反動的寄生分子底立場來說話的。他的攻擊李嘉圖，首先攻擊他的價值論，正是從這種立場出發的。

馬爾薩斯的批判李嘉圖，是抓住了後者底弱點來開始的。李嘉圖底第一個弱點是他沒有根據他底價值論去說明、而且也不能說明勞動與資本交換之發生（由來），他迴避了這個問題。他只是很一般、很抽象地談勞動決定價值，而從這一抽象的勞動價值觀直接地走到資本主義下的商品價值底分析上去，即把一般的勞動價值底基本原理，直接應用到特殊的資本主義商品價值底分析底場合上去。這樣一來，他就跳越了貨幣之轉變為資本的過程。馬爾薩斯則把注意點恰恰集中於勞動與資本



交換的問題，並且指示着這一種不平等的交換：較多的活的勞動與包含於資本中的較少的勞動（即工資上所體現的勞動）之交換。因此，勞動與資本底交換是跟李嘉圖底價值論相衝突的。

復次，李氏底價值論又與商品價格劃分為利潤和工資這一論點相衝突（馬爾薩斯跟李嘉圖一樣地從斯密學說中繼承了價值劃分為諸種收入的「定理」），而同等資本又產生同等利潤，不管這些資本所僱用的勞動量底多或少，也不管它們流轉底速度快或慢。前一矛盾李嘉圖簡直沒有注意到，而馬爾薩斯却注意和指出了那個矛盾；而這裏第二個矛盾則已被李氏本人所注意到而且還有過解決它的嘗試。李氏既不分析剩餘價值之轉變為利潤，亦不考察利潤之轉變為平均利潤，他就陷於兩個極端底矛盾中了：依據他底價值論，商品是應當按照它生產時所消費的勞動量去交換的，然而事實上他們却按照價格出賣，而價格則等於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之和。李嘉圖想從這一矛盾中找尋解決的途徑，他申說生產價格和價值底不相符合只是例外，而並不破壞總規律的。然而這一申說，却被馬爾薩斯捉住了李嘉圖底漏洞。馬氏毫不費力地證明了李嘉圖所說的例外，實際上是一個常例，反之，生產價格與價值相符合，倒是例外的場合。

這樣，馬爾薩斯從上述兩方面向李嘉圖進攻，然而他却不因這種進攻而把科學向前推進一步；他所做到的，僅僅是利用李氏底弱點、矛盾，而加以駁斥，藉此替俗流經濟學掃清道路，並且自己

發展了這派經濟學說。馬爾薩斯跟賽依一樣，從亞丹·斯密的學說中吸收和發展了庸俗的成份，而形成了「特種的經濟學說」。

馬爾薩斯一方面拒絕斯密底「所消費的勞動決定價值」這個定義，另一方面却擁護斯密底一個價值底定義：由所購買的勞動決定價值。他寫道：「價格底一切不同的組成部分之實在價值，是由每一組成部分可以購買到的勞動量，或由每一組成部分可以支配的勞動量來度量的。勞動之成爲價值底尺度，不僅是指表現於勞動的那部分價格，而且也是指表現於地租和利潤的那幾部分價格而言。」（註一）還有下面一個論點，馬爾薩斯也是重複斯密底口吻的。他說：「假若勞動底需求提高了，那末高度工資底獲得不是由於勞動價值底提高，而是由於勞動所交換的那種生產品價值下降之故。在勞動多餘的時候，低度的工資亦是由於生產品價值底高漲，而不是由於勞動價值底下降。」

（註二）

斯密將所購買的勞動與所消費的勞動混爲一談，馬爾薩斯則把它們對立起來。馬氏底優點是在他了解兩者底差異，但在其對爲價值之尺度的所購買的勞動的解釋中，他却比斯密差得多了。斯密

（註一）摘錄剩餘價值論卷三，頁十六。此處所說的「所購買的勞動」是指體現於成本（不變資本和工資）的那部分勞動而言。

（註二）同前。

認定所購買的勞動是價值底尺度，因為他看不到這種勞動和所消費的勞動之間的差別。斯密底思想要點如下：（一）勞動是價值之源泉，（二）因而勞動也就是價值之尺度，（三）所購買的勞動與所消費的勞動相等同，（四）所以所購買的勞動也是價值底尺度。這樣看來，在斯密底理論中，宣佈所購買的勞動為價值尺度乃以其勞動價值論為根據的。馬爾薩斯則根本推翻勞動價值論底原則，他就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所購買的勞動是價值底尺度，因為照馬爾薩斯底見解來說，勞動是跟一切其他商品完全一樣的商品，假如勞動可以成為商品價值之尺度，那末相反的，任何商品也可以成為勞動底價值尺度了。而且在任何兩件商品交換中，其中的任何一件商品也都可以成為另一件商品底價值尺度了！

馬爾薩斯雖亦承認勞動是價值底尺度，但是他不能明白地對下列問題給一正確的解答：即商品和勞動中間的量的關係由何決定？為何這種商品可以購買到這些勞動量，另一種商品可以購買到另一些勞動量呢？馬爾薩斯回答道，這是要看這種或那種商品底生產成本的。那末生產成本是什麼呢？馬氏回答道：『一部分直接在商品生產上所消費的勞動量，一部分在商品生產時所消費的生產工具中所包含的勞動量，再加上跟所投資本上的平常利潤相應的那部分勞動量。』（註）這樣看來，

（註）轉錄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三，俄文版頁十九。

馬爾薩斯認為生產成本中包含着活的和死的勞動（體現為生產手段的勞動）加上全部投出資本所產生之利潤，他得意洋洋地申述道：「從來沒有人確定，尋常商品所領有的勞動量，應當表現為和決定於商品生產中所消費的勞動量加上利潤。」（註）這裏，馬爾薩斯把商品生產中直接所消費的勞動等同於它底「價值」、工資了。而生產手段底價值則被他看做積累的勞動。馬氏底惟一發見是：既然拿商品可以購買到一定的勞動量，那末勞動量就等於商品底生產成本，因而它也就變成生產成本底尺度了（馬氏所說的「生產成本」，實際上是商品底價值或生產價格）。這一發見對於俗流經濟學當然是很重要的。

這裏要附帶地提一筆，即李嘉圖底重大缺點之一是他完全忽略了變貨幣為資本的過程；馬爾薩斯則無意中接觸到了這一問題而未予以確當的說明，並且也不能說明。實際上他底「偉大的」發見不外乎斯密底見解之含糊的重複而已。我們知道，亞丹·斯密認為隨着土地私有制和資本積累底發生，商品價值決定於幾種收入，後者則為它們所能購買到的勞動所度量。馬爾薩斯所肯定的，事實上也就是這一論點。在他底觀念中，所謂活的勞動不外乎工資底同義辭，亦即工人底收入；利潤是資本家底收入；而生產手段（確實些說，生產手段底價值），自然又只有靠馬爾薩斯式的生產成本

（註）同上，頁七。

觀才能確定它們；這就是說，它們歸根結底仍得歸結到幾種收入上去。然而即在這裏，即在簡化價值爲諸種收入的見解中（首先是把它簡化爲生產成本），馬爾薩斯也庸俗化了亞丹·斯密底觀點。因爲我們前面已經說明，斯密曾視利潤爲從工人生產品中扣除出來一份；因此，即在以收入決定價值的解說中，斯密仍能堅持他底勞動價值論底原則；他只認爲在現代社會中跟原始社會不同，這種原則變了相了。

還要指出一點，就是馬爾薩斯拿生產成本去代替收入。而在生產成本中完全消去了不變和可變資本底區別；而且把利潤包括在生產成本中，這就又消去了利潤和工資底區別。二者均爲勞動所度量的支出項。但實際上我們知道，工人對於工資的報價是供給了大於工資中所包含的勞動量；而利潤則第一是工人未償勞動底結果，第二當利潤被資本化時，又予資本家以吸取新的剩餘勞動之可能。可是馬爾薩斯正企圖拿他底「生產成本」論來抹煞這些真理。

其次，斯密首先離開資本和利潤而下價值決定於勞動的定義，這在方法論上是完全對的。到後來他和李嘉圖才陷於一切複雜的亂絲中而不能自解；他們把生產價格直接等同於價值了。馬爾薩斯則把生產價格簡單地稱之爲「生產成本」，而他底分析一開始就是這一「生產成本」；換句話說，在他底意念中，商品價值一開始，就以資本與利潤之存在爲前提的。這樣，他把商品跟資本等同看

待了：任何商品，在實現時都應給予利潤。

馬爾薩斯將商品與資本相等同，是從另一觀點出發的。馬氏視所購買的勞動為價值之尺度時，他心目中指的是僱用勞動；而他常把商品當作與僱用勞動對立的資本看，因為商品（或其貨幣的等量）與勞動交換，已經是資本了。古典學派雖亦認資本主義諸關係為自然的和永遠的，可是他們却不知道應當從最簡單的範疇，商品和價值（這些至少在理論上是先於資本、利潤和生產價格等範疇而存在的）開始分析，這是古典學派底科學精神之所在。馬爾薩斯則一點兒這樣的科學氣味也沒有，他一開始馬上就是最複雜的範疇，這就使他完全沒有可能揭露所謂「布爾喬亞社會底形相」。

再則，假使說李嘉圖不能根據依價值律以進行的商品流通來說明商品（及其貨幣的等量）之如何轉變為資本的過程，因而他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那末馬爾薩斯就看不見這一困難，因為他痛痛快快地把這個問題根本撤消了：在他看來，商品和貨幣從最初起就是資本啊。卡爾說得好，他說「馬爾薩斯把商品底購買（交換）轉變為資本和僱用勞動底交換了。馬爾薩斯所不了解的，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全部勞動和它裏面所包含的償付勞動量之間的差數。這一差數也就是利潤底來源。」（註）既然不了解這一點，於是馬氏不得不從別的方面去尋找利潤底來源。卡爾繼續寫道：

（註）卡爾著，剩餘價值論卷三，頁一〇。

「馬爾薩斯必須拿出賣者不但以高於對他所值的商品價格、而且以高於商品本身之所值以出賣商品，——必須拿這種說法去解釋利潤；因此他就回復到庸俗的利潤觀，即由出賣而獲得的利潤觀……。」(註)

以上所述，是關於馬爾薩斯與古典學派代表理解上的比較，以下要講到馬氏底實現論和他與賽依見解的不同了。

馬氏運用一個正確的論綱，即在資本與勞動的交換中是少量的勞動與較多的勞動相交換，——他運用這個論綱，不是爲了要揭露利潤底來源；相反的，他拿這一論綱來推翻李嘉圖的價值論，而自己建立了特種的「生產成本」論，藉此完全蒙蔽了利潤底本性和實質。將利潤包括在生產成本中，它就被視爲資本底產物了：照他的意思，企業家預墊了資本，同時也就「預墊了」利潤。這樣說來，利潤底來源就是利潤自身！

但是利潤底來源問題雖已「解決」，那末利潤又如何實現呢？就算利潤已經包含在生產成本中，可是它總得實現才行呀。它怎樣實現呢？換句話說，誰來支付利潤呢？馬氏底階級立場迫得他提出這個問題來。卡爾曾說過，『馬爾薩斯並不想隱蔽資本主義生產底矛盾；相反的，他是要着重

(註)同前書。

指出這些矛盾來，一方面爲的是要證明勞動階級貧困底必然性，……另一方面爲的是要證明給資本家看，養得肥肥的教士羣和國家的官員是需要的，因爲他們能創造必要的需求。」（註）

最後這一句話就是他用以解答「誰來支付利潤？」或「誰是償付資本家利潤的購買者？」這個問題的「理論根據」。

資本家與資本家的相互買賣當然得不到利潤的，因爲他以出賣者的資格所獲得的，在他做購買者的時候就失去了，其結果等於沒有利潤。但從出賣商品給工人的活動中，利潤却是有保障的，因爲工人只購買商品而不出賣商品。然而，這樣還不能找到困難底出路，因爲工人所能用以購買的，充其量而言，只是他底全部工資，而後者底價值只等於社會生產品價值底一部分。因此他們就沒有可能購買社會全部生產，這也就說明了工人不能成爲支付資本家利潤的那種購買者。馬爾薩斯完全沒有夢想到生產者的工人就是利潤（亦即剩餘價值）的創造者；而購買者的工人，當他們購買自己的勞動生產品時，他們可能多支付一點，但是這一點決不能成爲利潤底主要來源。這種論見可以簡述如下：照馬氏底見解，利潤和工資同爲生產成本底構成部分，因而在工資中不能實現全部生產成本（這裏我們把不變資本擱置一邊，因爲對於這個問題，不變資本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市場上除日用必需品外，還有很多奢侈品，是工人所不購買的東西。然而社會內存在着羣人，他們只購買而不出賣。這些人便是各種的地租收取者。馬爾薩斯就緊緊地抓住了他們，拿他們當作解決利潤實現問題的「機密」所在了。地主們、教士們（或僧侶們）和其他類似的人，經常地在那裏支付着資本家底利潤而使全部社會生產品底實現成爲可能。沒有這類人，不但利潤不能實現，而且市場上將經常地存在着生產過剩。

這種觀點使得馬爾薩斯不僅跟李嘉圖底意見相反，而且和賽依底見解衝突。照賽依底見解，在前一節中已經說過，一般的生產過剩是不可能的，他認爲只有生產不足，而不會有生產過剩；某部門的生產過剩，實際上只是別部門的生產不足。然而照馬爾薩斯底分析，則一般的生產過剩，假如沒有地主、教士及一切寄生者階層的話，不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若說賽依底實際主張在於反對一切不生產的消費，則馬爾薩斯底主張却在於擁護這類消費。賽依底理論是代表工業資產者羣底利益而反對封建貴族階層等寄生者，馬爾薩斯底觀點則特別代表土地貴族和教士階層（自然同時又是布爾喬亞制度底狂妄的辯護者）底要求。這便是賽依和馬爾薩斯針鋒相對的地方。當然這並不排除他們二人底主要鬥爭對象底共同性：反對勞動民衆和替資本制度辯護；他們底分歧之處僅僅在賽氏擁護資產者羣而不但反對勞工，亦且反對封建階層；馬氏雖亦擁護資產者和反對勞工，但他企圖叫資

產集團去服從封建階層底利益。站在賽依底立場，只要說明利潤為資本所創造而並非剩餘勞動之產物就完事。馬爾薩斯則認為僅僅這樣說還不夠；他還要證明沒有所謂「第三者」，利潤是不可能實現，即不可能獲得的。賽依底任務在於證實資本主義有無限發展的可能，而無需乎任何外來的幫助；這樣他是在竭力蒙蔽資本主義社會底矛盾。馬爾薩斯底見解則在證實沒有土地貴族，沒有教士階層和強有力的國家政權，被各種矛盾所分裂的布爾喬亞社會就要崩潰。

### 第三節 西尼歐

#### 一 概論

在俗流經濟學派中佔有特殊地位的，要算英國的西尼歐（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了。西尼歐不但參加了古典學派底解體過程，而且他還企圖發表一新的系統，創造一俗流經濟學底新類型。我們知道，俗流經濟學，在其發生之初，是與古典派經濟學說有着密切的聯繫，它僅僅對於古典學派加以修改和補充而已。西尼歐則以俗流經濟學底一種完全新的姿態出現，他變成了當時英國社會一個最負時望的經濟學家了。

歷史所賦予西尼歐的社會使命，要求他從理論上去證實縮短工人勞動日（即一日內規定的勞動

時數)的不可能和政府干預(採取工廠法之類的方式)勞資間「自由」合同的不適當。這位「最後一小時論」(詳後)底創作者西尼歐，恰恰很完滿地執行了這種使命。

西尼歐又「發見」了一種新的財富底泉源。我們還記得，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底泉源是流通，古典學派認定是勞動。重商主義的解說，不能為經濟自由主義底代表(西尼歐即其一人)所接受，因為重商主義的全部觀念是跟經濟自由的思想相衝突的。但是古典學派對於財富來源的解答，在勞資兩大社會羣衝突激化的十九世紀上葉的英國，又成爲一種「危險」的思想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西尼歐底新「發見」——節欲論——就成爲解決一切困難和替「愛自由的」資產集團開闢新道路的「不二法門」了。依照西尼底節欲論來說，財富底泉源是產業資本家底節欲；世界是靠資本家節欲的「偉舉」支撐着的；任何勞動者底剝削都是談不到的。

企業家底「節省」或「忍欲」這類觀念，在西尼歐以前雖然已有過(如馬爾薩斯亦談到此)，可是只有西尼歐把「節欲」當做全部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的和中心的「範疇」，而且，他的集中注意於這一「範疇」，正當後者對於資產集團特別需要的時候，這當然是西尼歐底重大「功績」。

## 二 西尼底「四原則」

對於西尼歐作了一番大概的估量之後，我們還得把他底經濟理論底各個部分，比較接近地考察一下。

首先要講一講西尼歐底四原則。西氏底經濟學包括四個原則，就是：（一）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的原則；（二）關於人口的原則；（三）工業生產率增長的原則；（四）農業利得遞減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西尼歐的享樂論，是邊沁（Bentham, 1748—1832）底功利主義底「嫡親兄弟」。依照享樂論來說，人類活動底最高標準是享受快樂，而消極地要避免一切足以招致苦痛的原因。在經濟的活動中，享樂主義的原則表現為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消費對於經濟主體是一種犧牲，所以從事經濟活動者總盡力要把這種消費減少到最低限度而從這種消費吸取最大利益。

這種經濟原則底意義是在抹煞各種現象底差異性，它對於辯護是最適當的。因為，譬如說，工人為縮短勞動日與增加工資而奮鬥，資本家則為延長勞動日與減少工資而努力；這兩種現象，在西尼歐看來是完全一樣的：都是為希圖達到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的具體表現。這樣，他就把資本家為着加強對工人的榨取，而工人則為減輕這種榨取這兩種現象底區別抹煞了。簡言之，他是在蒙蔽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

以最少消費獲得最大利益的原則，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切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底基本經濟原則。

不過西尼歐把它跟他獨創一格的節欲論聯繫起來而當作經濟學底中心原理罷了。照他底意見，投資於生產，是表示資本家暫時放棄他自己的快樂（即節制欲望），因為他若將這些資本直接作為自己享樂之用，他就可獲得很大的快樂。他既犧牲於前，當然應獲利（享樂）於後。所以利潤是資本家節欲的結果。

第二原則是關於人口論的原則。西尼歐底人口論跟馬爾薩斯的不同。西氏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繁殖律，只適用於動植物和人類社會底最初階段，而對於文明社會（意即資本主義社會）則絕對不適用。經濟的人類（“homo oeconomicus”）並無無限繁殖之本性，相反的，他實有節制繁殖之本性。換言之，人類底經濟的本性壓到了他底生物的本性。

西尼歐底人口論仍以享樂主義為基礎，所以他斷說，經濟的人類總力圖增進他自己的境况或幸福，至少是要設法不使自己的境况退步；而家庭人口太多則境况必然惡化，所以人類就有不讓自己生育過多的傾向，這就是人類追求幸福的天性。

但是在現代社會內存在着大量的工業後備軍，這該怎樣解釋呢？馬爾薩斯肯定人口過剩底原因在於人類無限繁殖的天性；西尼歐雖正確地推翻了這種荒謬的解釋，但是沒有能夠給一個比較正確的解答，而僅僅盲目地否認在布爾喬亞社會內有過分繁殖的可能，彷彿布爾喬亞社會諸關係本身就

是避免人口多餘的保障似的。

第三個原則是說，因社會致力於以最少消費換得最大利益的原則，它就不斷地發展着勞動生產率而減少生產上的消費。這一來，工業底生產率不斷地提高，資本積累就不斷地擴大了。西尼歐說：『創造財富的勞動力和勞動工具，能夠無限地增加起來，因為生產品是用於繼續生產的。』這便是西氏底工業生產率增長的原則。這個原則底用意在於「說明」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是和諧地進行的，它有利於全社會，特別有利於工人階層，因為照西氏底見解，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補充資本都消費在工資上的。這裏，他完全抄襲了古典學派底庸俗成份，而把補充資本中的不變資本丟開了。

最後第四個原則說，勞動生產率累進地增長的現象，只見於工業而不會見於農業。在農業中，他認為只有土地肥沃遞減律。這裏他又把古典學派底庸俗成份當做俗流經濟學和辯護學說底基本原則了。西尼歐藉這一原則企圖「證明」現代社會只有社會對自然的矛盾而沒有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同時，他又用土地肥沃遞減「律」當做他底工資論底基礎，即藉此以「證明」工資沒有增加的可能。在實際政策上，他又利用這一「法則」作為經濟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底根據。

### 三 財富與價值

西尼歐底經濟學，是從財富底研究開始的。在他底財富底定義中，包括以下三特徵：(一)有用的，(二)數量非無限的(故空氣、日光等物被排除在財富範圍以外)，和(三)能夠被人買賣的。

參加財富之生產的要素有三：即勞動、資本和自然；這是賽依底基本論綱。西尼歐也持此種見解，但在對這三個要素的估量和理解中，他和賽依却有分歧之處。第一，凡不被人所壟斷的自然事物，西尼歐認為不能歸入生產成本中去，因而從經濟上說，它就不成其為生產底要素；第二，對於勞動和資本，西尼歐又是根據享樂主義的精神去解釋的。例如，他認定勞動與資本同是一種犧牲，資本便是資本家犧牲自己享受(即他節省自己的享樂，而將資財投入產業作為資本)的結果。

西尼歐將財富底生產成本劃分為二部分：勞動和節欲。這樣，他就「解答」了價值的問題。照他底意思，價值依賴於生產成本，即依賴於勞動和節欲。但是價值底高度又如何決定呢？勞動可拿時間去度量，試問節欲又如何度量呢？西尼歐根本就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來。他解說價值是一種事物與事物的關係，他把價值與交換價值(因而亦即與價格)混同起來。而價格是被競爭、被需求與供給的關係確定下來的。在市場上有各種不同的商品，它們都是勞動和節欲底產物。商品底出賣人和購買人各抱着以最少消費換取最大代價的基本原則；於是出賣人要求較高的價格，購買人要求較低的價格。但競爭迫着兩者都不得不放棄過分的要求，而自然而然地確定了等於實在的生產成本的公

道價格，即爲所出賣的商品底再生產所必需的那些生產成本。可是我們知道，競爭（供求律）所能影響的只是價格的擺動於價值底周圍，而決不能沒有價值而創造價格。事實上，前面已經提及，西尼歐根本就沒有價值底概念，而只有價格和生產成本。

#### 四 資本利潤和工資

西尼歐解說資本爲財富底一部分，是當做繼續生產之用的一部分。照西氏底意思，這部分財富之消費於生產，乃表示個人消費之節省；所以資本是節省（或節欲）底結果。西氏藉這統一的節欲論，「解決了」兩個問題：資本底發生問題及其不斷增長的問題。在很久遠的時代，節儉的人就藉節省而創造了他們底積蓄，這種積蓄曾被用於生產而成爲資本了。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內，資本家實行節約，同時又由於前述第三個原則而不斷增加其資本。

由於資本家底節儉，他便該獲得節儉的報酬——利潤。『所謂節欲，意思是指跟勞動和自然力有區別的东西；它跟利潤的關係，正如勞動跟工資的關係一樣。』（註）西氏又說：『節欲是一種拒絕資本之生產消費的行爲……凡是這樣做的人（即實行節欲以從事生產者——沈），就是資本

（註）見西尼歐著，政治經濟學大綱，頁一五五（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6年出版）。



家，而對於他底行動的報酬，就是利潤。』(註一) 但西尼歐尚不以此為滿足，因為資本家不僅節制自己的消費，而且還積極地從事各種生產的活動：組織企業、計劃和指揮生產，簡言之，他們也是在勞作着的。於是西尼歐便把資本家底所得劃分為兩部分：企業利潤和利息。利息是節欲的報酬；企業利潤便是企業家勞作的報酬。

實際上西尼歐底見解也並不是「新發明」；卡爾在資本論中寫道：「……西尼歐駁斥李嘉圖底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定義，而「發見」利潤發生於資本家底勞動（係指企業所得——沈），利息則發生於他底「節欲」。這種虛構本是舊的，然而「節欲」(Abstinence) 這個字倒是新的。』(註二) 斯密和李嘉圖也曾說到資本家底節省和利潤為積蓄之刺激。古典派代表底這些見解是跟他們底勞動價值論相抵觸的，而在俗流經濟學者看來，却成為寶貴的「理論遺產」了。

總結起來說，照西氏底理論，不論企業利潤或利息，都不是剝削他人勞動的結果。然而在日常生活，却不斷地見到企業家與工人為着勞動日底長短和工資底多寡而鬥爭的現象。事實究屬事實，西氏如何解釋這種事實呢？這裏，西尼歐又來了這套新「發明」，但是跟前一套「發明」相衝

(註一) 同前，頁一六六。

(註二) 資本論卷一，第七章。

突的。因爲這套新「發明」告訴我們，利潤實爲工人所創造，只不過並非全部勞動日中所創造而只「在最後一小時內」創造出來的。於是他認定假如從現行的勞動日中減少一小時，資本家就無利可圖了。這樣，爲什麼勞資間爲勞動日的鬥爭如此劇烈，便很「明瞭」了。但同時前一種利潤論跟這種利潤論的矛盾，也再明瞭也沒有了（註一）！

至於工資，前面已經提及，西氏認係工人犧牲（勞苦）底報酬。但是這種報酬額底大小如何決定呢？按照以最少消費換得最大利益的原則，工人當然要想以較少的勞作換得較多的報酬。然在另一方面，資本家也依據同一原則而企圖以自己的「節欲」換得最大的報酬。因而發生出兩個問題來：（一）如何決定資本家報酬底大小？（二）工人和資本家兩方面底企圖是否衝突？

首先，西尼歐申言道：『爲維持工人人口底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底總量，很明白的，成爲工資底最低限度。』（註二）這種生活資料最低限度論，就是後來被拉薩爾（Lassalle, 1825—1864）稱爲「工資鐵則」的理論。一講到工資底高度，西尼歐就連帶地談到利潤底高度。因爲他既像古典派代表們一樣地把不變資本擱置不談，則工資或工人必需的生活資料與利潤就成爲反比例的兩部分價

（註一）關於「最後一小時論」底例證及其批判，可參閱拙著新經濟學大綱三版，頁一九三——一九六。

（註二）西尼歐著，政治經濟學大綱，頁一八七。

值，即利潤成爲生產品價格超過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以上之多餘部分了。可是這種最低限度生活資料論，不甚合於辯護派底目的，不甚適應資產階層底利益，於是西尼歐就把最低限度生活資料論跟工資基金論：前者決定工資底最低限度，後者則決定它底最高限度。

工資基金論底要點如下：(一)在每一段時間和每一國家內，預定作爲僱用工人之用的那部分資本，是一個不變的數量；(二)每個工人底工資等於工人數目除這部分資本所得的結果；(三)工資底擺動，或由於劃作僱工之用的那部分資本大小底變動，或由於工人數量底變動。這種理論底中心觀念表現於第一個論點，其餘的兩點祇是第一論點之「派生物」而已。它底意義是叫工人不要爲工資而鬥爭，縱然鬥爭也沒有用，因爲劃作支付工資之用的那部分資本是固定不變的。這是一般的俗流經濟學者底工資基金論底用意。可是西尼歐在這方面又加上了一點特殊的色彩；因爲他說資本是節欲底結果，而工資又是資本底一部分，那末工資也變成資本家節欲底產物，換言之，即資本家藉節欲以創造工人底生活資料。這便是西尼歐在工資基金論上所着的色彩。

#### 第四節 巴師夏

##### 一 概論

現在我們又要回過頭來講一講法國的俗流經濟學說了。我們知道，在法國，勝利的資產集團沒有，而且他不能有他們自己的斯密和李嘉圖，他們所能推出的經濟思想代表，只能像賽依這類學者。在甲可賓黨所領導的革命壓迫之下，法國的資產集團只能歡迎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庸俗成份。亞丹·斯密，尤其李嘉圖，都不否認布爾喬亞社會內利害的矛盾，這對於辯護是不適當的。賽依則藉其庸俗化的服務論和生產三要素論，根本否認這種利害矛盾。這樣他就替自己未來的繼承人巴師 (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 開闢了道路。巴師是有名的社會經濟利益調和論底歌頌者，同是又是反社會主義的癡狂的戰鬥者。這兩點就是巴師夏全部經濟學說底中心意義。

首先，巴氏確認現存的社會機體是自然的、又是和諧的。自然的，因為在這社會內，誰也不能強迫誰去替別人勞作或對別人服役。每一個人都被自己的自然願欲和利益所激動，所以願為自己工作，同時亦為別人工作。和諧的，因為一個人底利益和別人底利益相適合的。第一，因一個人只貢獻一種服務，他就希冀別人貢獻別種服務——可以作為他底服務底報償的。第二，每人都希冀着業已貢獻給人的服務能夠得到報償，——不論在何處，也不論被誰所報償，惟有如此，才能造成一種公衆的信念：大家知道任何一次服務都不至落空的。

這種自然的與和諧的社會機構，受着內部的自然法則底指揮和調節，而那些自然法則則又決定

於人類的天性。關於人類天性的見解，巴師夏所根據的，是斯密底兩部大著：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根據國富論，他知道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是利主義者，支配人類經濟活動的，只有個人利益；根據道德情操論，他却肯定人類固有着一種同情的情感，人類是利他主義者。亞丹·斯密底這兩種觀點，顯然是表現他底二元論。邊沁和他底信徒們拒絕了斯密底這種二元論，而把倫理觀建立在自利主義上。巴師夏却無決心拿自利主義當做倫理學底基礎，因為這跟他底和諧觀不甚相合的。所以他雖採取斯密底觀點，但是他企圖把自利和利他這兩種觀念調協起來。他肯定人類有兩種互相補充的特性：自利主義者底特性和利他主義者底特性。這兩種特性不但互相衝突，而且互相補充。『因為在勞動和交換的問題中，「各人爲自己打算」這一原則必當不可避免地成爲主要的發動力，而吾人引爲驚異的，是世界底創造者利用這一原則，去在社會制度底胎胞中實現博愛的公理——「各人爲一切人打算」。』（註）

這樣看來，可知巴師夏底方法論（亦即世界觀）底中心精神是和諧、調協。他藉助於「世界底創造者」，把不可聯合的聯合起來了。這也就是他底全部經濟學說底中心思想。

（註）見巴師夏著，經濟和協論（“*Harmonies économiques*”，Paris 1860）

## 二 交換與價值

巴師夏所說「和諧的社會機構」，是他在交換中所「發見」的。交換便是他底「經濟和協」論所賴以維持的基本關鍵。他寫道：『我要說：依據經濟的觀點來說，社會就是交換。』（註）我們知道，亞丹·斯密亦曾將布爾喬亞社會看做勞動和交換的組合，可是他底重點却放在勞動分工上：在他看來，交換不過是生產領域中的勞動分工之在流通領域中的另一表現而已。俗流經濟學者巴師夏，却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完全看成一種商品流通底三稜鏡，看成一種玄幻的平等、自由與公道之域了。

依照巴師夏底見解，各個人在交換中互相貢獻服務；所以交換不外乎諸種服務之交換而已。「服務」這一概念，是巴氏抄襲裴依的；但是巴氏底服務觀具有一種新的意義，他把它當做「經濟和協」底認識手段看了。爲了解和估量巴師夏底這種理論見解，我們就得拿他底價值論來說一說。巴師夏不滿意他底前人們底價值論。他要想找出一種合於公道底主張而可以當作「和協論」之基礎的價值論來。不但古典派底價值論不夠這種「資格」，即賽依底理論也不適合於這種條件。因

爲古典學派底理論揭露了階級的對立性；賽依雖然拋棄了勞動價值論，但認價值爲事物底本性，他把它置於倫理範圍以外去了。從價值爲事物效用性之表現這一定義中，就得出關於人類社會和諧的任何結論來。

所以巴師夏既不將價值歸結於勞動，亦不將它歸結於事物底本性；他把它解作人與人互相貢獻的服務了。照賽依底見解，事物——資本、土地這些生產要素，——也貢獻服務的。巴師夏却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爲在他看來，事物所貢獻的服務是無償的，只有人們所供給的服務才有報償。而所謂報償，恰正表現於服務底交換：一種服務成爲另一種服務底報償，反之亦然。因此，巴師夏說，『價值或價格是兩種相交換的服務中間的關係』(註一)。他又說：『爲着正確地確定價值底意念，不應單憑人類的勞作，而應以被交換的或作爲交換的那些勞作爲憑據。』『交換不但表露和度量價值，而且又給價值以生存的可能。我並不想說，交換賦予被交換的行動與事物以生命，然而交換却產生了價值這一概念……』(註二) 當兩人互相讓渡他們各自的勞役或勞役之結果時，這就表示他們在互相服務。

這樣，『價值是兩種相交換的服務中間的關係』。

(註一)及(註二)同前，頁一二九。

那末服務如何度量呢？巴師夏認定有兩種尺度，而在他看來，這兩種尺度是等同的：（一）對於貢獻服務的人所要求的勞苦與奮力，（二）接受服務的人所解除的勞苦與奮力。『我人每一次勞苦，不外乎我人對自己所貢獻的一種服務；假如根據自願的原則，別人——局部或全盤地——使我免除這些勞苦，這就表示我獲得了這麼許多服務。』

然則如何保障交換底一方底勞苦和奮力與交換底對方底勞苦和奮力相適合呢？巴師夏說保障就在自由，因為在經濟自由局面之下，誰也不強迫，什麼也不強迫人們做不利的買賣；而交換雙方底利益告訴吾人說，交換是成立於均等上的。均等的（或等價的）交換才是公道的交換，這是表明人類社會利益底和諧性。

這樣，巴師夏把創造價值的勞動這一概念，解作勞苦和奮力，亦即將這一概念擴充到任何的人類行動以至於精神活動上去了。同時，商品則被他解作一切形式的服務了。他又確定說，表現一定價值的服務，並非事物所提供，而是人所提供的。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巴師夏觀念中的價值，是與物質的事物相脫離的。在他看來，商品底生產並不是物質的勞動生產過程，而只是貢獻服務；反過來也可以說，一切服務底貢獻都是生產。價值則為諸種服務間的關係，凡發生服務交換之處，都有價值底存在。因此，價值乃流通中所發生者。價值既是諸種相交換的服務中間的一種含混不可捉



摸的關係，它當中自然沒有一點點物質的原素。人與人的經濟關係，主要的、甚至於惟一的，就是互相提供服務，服務的互相交換。生產的概念，特別是物質生產的概念，人與人在社會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諸關係的概念，——這些都是巴師夏連做夢也不會做到的。

根據這種庸俗的價值論，於是巴氏又得出他庸俗的政治經濟學對象觀來。照巴師夏底意思，社會之「經濟的和諧」是靠服務底交換來實現的；因此，政治經濟學底任務就在於剖解這種「經濟的和諧」；換句話說，巴師夏把經濟學當作專門研究交換的科學看了。

### 三 利息與資本問題

在利潤問題上，巴師夏跟別的俗流經濟學者一樣，所談的實際上不是利潤問題而是利息問題。

站在俗流經濟學的見地，現象只是照它表面上所呈現着的樣子；而從表面上看，利潤呈現為資本利息和企業家收入之和。關於企業家收入，巴氏跟別的俗流經濟學家一樣，也認為是企業家底勞動

——勞苦和奮力——底報酬。然而對於利息這個範疇，巴氏却須特別加以思致了；因為依照他底見解，服務僅僅是指人的，而不是指物的；服務底報酬也僅僅指對人底服務的報酬；可是從表面上看去，利息却明明是資本服務底報酬，試問巴師夏將如何解釋它呢？

在沒有辦法中，巴師夏就只得求助於西尼歐底節欲論了。依據這個理論來解釋，問題就十分明白：利息亦是一種服務底報酬，它是資本家所提供的因節欲（或節儉）而形成資本的那種服務底報酬。簡單地說，資本家實行節欲而形成資本，資本家底積蓄行為，便是一種服務。利息便是對這種服務的報酬。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巴氏跟西尼歐也有不同之處，即他不用「節欲」這名詞，而代之以自己特創的「延緩」(délai)一字。他說資本家投出資本，等於他延緩了自己的消費或享受，這在他是一種犧牲。有了犧牲自然就有代價——利息（報酬）。不但名詞上有不同，巴師夏對於資本報酬論，在解釋上也有跟西尼歐底節欲論不同之處。西尼歐視資本家之「節欲」為「生產成本」底一部分；巴師夏則根本沒有生產成本論，他底價值論只是「相互服務」論。所以他所要解釋的，是資本家藉「延緩享受」以提供的那種服務底實質。

照他說來，飄流於孤島的魯濱遜 (Robinson) 也有資本的：魯濱遜在孤島上不但生產消費物品，而且也生產生產工具。既然生產生產工具，那末——照巴氏底意見，——第一，他就「延緩」了自己個人的消費（或減少這種消費）；第二，在個人消費品底生產中增加了勞動生產率。因此，資本具有兩個特點：（一）它底生產必須以取「延緩」個人消費之方式的犧牲為前提，（二）它底

任務是促進工作效率或提高勞動生產率。於是巴師夏下結論道：資本應當產生收入，但這種收入是資本家「犧牲」底報酬。

但是，照巴師夏底意見，魯濱遜不可能創造許多的資本；他說「在隔絕的經濟中，我們底需求要超過我們底力量的。」大量的資本，只有在社會內才能創造出來；由於交換底作用，一部分人所創造的資本，乃能被別部分人所享受。因此，以交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和諧（或和協）與公道底樂園！

照這樣的「理論」說起來，資本底利息當然是極公正、極合法則的。孤島上的魯濱遜，自己創造資本，又自己享用資本；這樣他就得到了「延緩」的報酬，提高了自己勞動底生產率，後者也就是利息，是資本給與這位孤島飄泊者的。在交換社會中，這種利息就應歸屬於資本底供給者。其他各種收入，巴師夏認為只是利息底各種別名而已。「因此，在「延緩」個人消費時，總有一種特殊的報酬，否則就違背了最高的社會法則：服務換服務。這種報酬又隨不同的場合而採取各種不同的別名：僱用工錢，租金，地租等；可是它們底母名却只有一個——利息。」（註）

照巴師夏底見解，魯濱遜底資本僅是生產工具，而在交換社會中則資本又是貨幣，又是其他任

（註）巴師夏文集卷五（Oeuvres Complètes de Frederic Bastiat）頁二一四。

何貴重物品。因為貨幣和一切貴重物品，都是一定的人在一定的地方靠「延緩」個人消費而獲得的，這是第一。第二，因為用它們（指貨幣及其他貴重物品）可獲得生產工具。但是在交換社會中，資本又是消費資料；不過不是消費資料本身，而是因為它們是供給工人的，因而它們就提供着一種「服務」，即創造了生產的可能。簡單地說，巴師夏把勞動力底購買也看做最高社會法則——服務換服務——之表現了。在巴氏看來，資本家底服務是供給工人以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生活資料；工人底服務是替資本家做工。資本家既替工人服了務，他自然可以從工人方面取得另一種服務，因而他就得到一種報酬，——自己的資本上的利息。這樣，資本和勞動底關係，是絕對和諧、絕對平等的關係，是互相服務的關係。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麼資本主義的矛盾或勞資利害的衝突。

不但如此，尤其有趣的是巴氏憑着自己玄想的「統計」，武斷地確定，隨着社會底發展不但不會發生貧富兩極化，而且勞動底份額是永遠隨之而增大，資本底份額倒反隨之而不斷地縮小。巴師夏宣稱這是『偉大的、令人快慰的、必然的和嚴酷的資本法則！』他並且用下列一數字來作為說明的「例證」：

社會全部生產品

第一期

1,000

資本底份額

500(50%)

勞動底份額

500(50%)

第二期	二、〇〇〇	八〇〇(四〇%)	一、二〇〇(六〇%)
第三期	三、〇〇〇	一、〇五〇(三五%)	一、九五〇(六五%)
第四期	四、〇〇〇	一、一〇〇(二七%)	二、八〇〇(七〇%)

這裏我們首先要問：這些數目字是那裏來的？它們是根據那種可靠的統計得來的？顯然這種「可靠」的統計不是別的，就是巴師夏底幾隻手指頭！這裏巴氏所要「證明」的是利息水平底下下降傾向。在巴氏想來，既然利息，——即他所指的「資本底份額」，——不斷地下降，則工資（勞動底份額）自然不斷地上升。因此工人們用不着憂愁和氣忿，你們靠着「偉大的、令人快慰的……資本法則」，還怕生活不日趨富裕嗎？

## 第五節 約翰·密爾——古典學派之沒落

### 一 概論

約翰·斯都亞特·密爾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是古典學派沒落時代最後的一位代表，他底政治經濟學原理（原名全部為“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1848年版），便是結束古典學派的一部著作。約翰·密爾底

全部學說，不論是哲學思想抑或經濟理論，都充滿着不可調解的矛盾。在這些矛盾上，反映着十九世紀中葉布爾喬亞階層本身所持立場底矛盾。

## 二 社會哲學思想

約翰·密爾在童年時代所受的經濟政治的自由主義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已經陳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能為全體社會謀福利的那種信條，已被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日益劇烈的矛盾，勞動大衆底貧乏化和勞資間的衝突等等鐵的事實所打破了。約翰·密爾親眼見到這些事實，並且熱烈地同情於愛爾蘭農民底處境，他又同情於勞工運動底成功。同時他很注意到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他拒絕了自己童年時代所走的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思想路徑。在晚年時代，他甚至漸漸傾向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布爾喬亞思想者的他，究竟沒有勇氣完全站到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上去。他底立場始終處於模稜兩可的疑難中，滯留在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半路上。

約翰·密爾不僅對亞丹·斯密底全民利益和諧論，甚至對李嘉圖底資本主義「能增加一切生產品總量，能擴展全民幸福」的那種說法，都不表示滿意。密爾指出資本主義雖能予生產力發展以強大的推動，但許多人不能從它當中獲得快樂。他說：「一切機械的發明能否減輕一人每日的勞動，

至今還是一個疑問。機械給大多數人的，只是苦痛和生活自由底被剝奪，而為許多工廠主造福。」

受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之影響的約翰·密爾，就不怕提出「從根本上統盤籌算」的問題，即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之可能性的問題。密爾拋棄了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不可能的那種偏見。雖然，他却不曾堅決地主張社會主義；他只說最高的社會主義比之現狀下的私有財產制好些；而社會主義是否比經過深切的社會改良後的私有制好些？——這個問題他就不能解答了。密爾自己坦白地承認：「較優良的私人經營與社會主義，究竟何者較優，何者最適宜於人類經濟發展之終極形式；這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他底主張是「在社會發展底現階段上，一切努力之主要目的，不在乎廢除私有制，而在乎改良私有制，使社會上每個分子都能享受他底利益。」他主張用社會改良的方法去改良下層大衆底境况；主張組織工人底生產組合及其他會社，限制財產承繼權，提高土地的錢糧。密爾又隨西斯蒙蒂之後，竭力擁護小農經濟，並主張把土地貴族所霸佔的土地，轉交給勞苦農民。他駁斥愛爾蘭底農民法律；反對英國在殖民地內的強暴行爲；熱烈地袒護婦女的平權。密爾對於勞工運動之勝利，曾予以極大的同情。然而他同時却又害怕社會鬥爭之激化，且以「應憑理性做人」一語去告誡工人們。

這樣看來，在社會哲學領域內，密爾和他底父親及其他自由主義者底觀念遠不相同；前面已經

指出，他站在由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半途中。密爾是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他曾提出了改造現代社會的問題，可是他底社會主義思想，跟一切初期社會主義的思想一樣，也是烏托邦的。他憑空想出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這制度內部是最完善的，所以應當努力實現之。約翰·密爾雖然接受了康德底人類社會之史的發展的觀念，可是他却不會把社會主義理解爲人類社會發展之必然的階段，不會把它理解爲資本主義發展和勞動階層爭鬥之必然的結果。在密爾看來，問題不在社會主義之是否必然，而在吾人之是否願意與之是否能夠實現它。

### 三 生產與分配論

站在這樣的立場，所以他反對古典學派之自然主義的經濟法則永久不變的觀點。因爲假如遵照古典學派底見解，說經濟領域是受永久不變的自然法則支配的話，那末社會主義制度底實現，根本的社會改革底實施，就成爲完全不可能的事了。爲貫徹他自己的主張計，他不得不拒絕古典學派底這種經濟法則觀。可是在這裏，他又半途而止了。他並且得出了這樣一種奇異的結論來：把經濟規律劃分爲兩種——生產律和分配律。照密爾底意見，生產底條件和規律，頗接近於自然科學之真理；它完全不受我人意志之支配，而我們對它，亦不能有任何意志底表現。關於財富底分配，在密



爾看來，情形却完全不同。分配是人爲的事情；人類既有了一定的事物，他們就可以隨着自己的便利以處理之。所以他底結論裏說：統治生產領域的是永久不變的自然法；統治分配領域的，則爲人類的意志。自由的人類意志，可以規定生產品分配底任何形式，在這個領域內，就可以施行社會改良。

這樣，約翰·密爾把生產和分配看成互相隔絕和完全對立的兩個領域；生產和分配之統一觀，是他所不能夢想到的。但是實際上假如生產是自然現象的話，我們就沒有方法了解歷史上各個不同的（甚至完全相衝突的）生產方式；原始公社內所實行的共勞共享的生產原則，跟資本主義社會以僱用勞動之榨取爲基礎的生產法則，我們能用同一自然法則去解釋嗎？再則，假如承認財富底分配係受社會法則（密爾用「人類意志」來代替社會法則）之支配的，那末試問生產手段底分配是不是算財富底分配呢？而生產手段底分配却是任何社會生產底必要前提，也可以說是生產底起點。在這種情形之下，說生產是受自然法則之支配有可能嗎？反過來講，一定的分配關係是決定於一定的生產方式的，那末，假如說分配關係已是社會主義的（各人按照他底勞動從社會總生產品中取得平等的一份）而生產方式却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之私有和剩餘勞動之榨取），這樣說法有可能嗎？

密爾底觀點顯然是生產和分配底二元論觀點。一切的二元論都是表現思想底不澈底性、動搖性

和「半途性」；密爾的亦然。他底分割生產和分配兩領域，不是偶然的：因為他一方面感覺現社會底矛盾而傾向於社會主義，但同時又沒有勇氣站到徹底社會主義底立場上去，而企圖就現狀改良。由於他底社會主義的傾向，就產生他拒絕古典學派底經濟法則底自然觀（永久不變觀）；由於他底改良觀，所以他還局部地保存古典學派底那種經濟法則觀，——把後者限制在生產領域內。在密爾底矛盾思想上，把古典學派理論底根本矛盾暴露出來了。

#### 四 商品與價值

在經濟學說中，約翰·密爾並沒有開闢新的道路；在他底大著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他僅僅給以前的古典派經濟學說以完整的、明白的和有系統的解釋而已。他底理論基礎是採取李嘉圖底體系的。但同時他也多少採取一些李嘉圖時代及其後的各個經濟學家底學說。例如在人口論上，他採取馬爾薩斯底觀點；在工業危機論上，他採取賽依底觀點。此外，他把勞動價值論變成生產成本論，却又很像韜倫斯(Torrens, 1780—1864)。西尼歐底節欲論，也為他所採納。對於完整的古典學派底思想體系，密爾從古典學派底論敵方面引取了一些批評的思想來加以「補充」。他仿做西斯蒙蒂底見解，主張庇護小農經濟；同時他又效法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制度，做了相當的批判。

所以在經濟理論範圍內，約翰·密爾毫無一點新的創見，他只是把前人們（古典學派代表和俗流學者）底學說湊合起來而已。不但這樣，密爾還顯然參加了經濟學底庸俗化過程。譬如對於商品價值和利潤的問題，他底理解就是很庸俗的。

首先，密爾把商品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數量絕對有限的物品，它底供給不能隨意增加的，例如古畫、古玩；第二類是在生產品單位上的生產成本不增加而其數量可以無限增加者，例如工業生產品；第三類是隨着商品單位上的生產成本之提高而增加其數量者，即如農產品是。

照密爾底意思，第一類商品底價值是決定於供求關係的。密爾說：『某一商品帶到任何市場上去的那個價值，不外乎在市場上使需求恰恰足夠移去現存的或所希望的供給的那一價值。』（註一）實際上，這裏密爾所談的是價格而不是價值。關於供求的法則，密爾寫道：『……對某一商品的需求，乃隨着它底價值而同時變化的，而商品價值是如此的適應着，務使其需求等於其供給爲止。』（註二）這意思是說，不僅商品底「價值」決定於供給與需求的關係，而且它又能使商品底需求去與

（註一）約翰·密爾著，政治經濟學原理卷三，第二章，或參閱韓訥著，經濟思想史（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McMillan, N. York）頁四一〇。

（註二）同上，第九章。

它底供給相等。即是說，不僅商品「價值」依賴着供求關係，而同時供求關係也隨商品「價值」之變化而變化。

但照密爾底意見，上述的解說只適用於第一類商品，一旦商品發生生產成本問題時，則規定價值高低的，就是另一種法則了。因為在商品可以隨意生產的場合，商品「價值」却有一個以生產成本為限度的最低點了。由供求關係所引起的「價值」底變動，其最低點為生產成本；然因商品底數量可以任意增加的，所以「價值」底最低點也就是它底最高點。這便是商品「價值」底正常水準。

(註一) 因此，生產成本相等的諸商品，它們底交換價值也相等。這樣，在第二類商品中，價值底大小，乃直接決定於生產成本底大小；講得乾脆些，價值就是生產成本。

密爾說：『商品底生產成本是生產者在商品生產中所消耗的勞動量所組成的。』所以『商品底價值，主要地是依賴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這裏看起來彷彿密爾是李嘉圖勞動價值論底繼承人；可是他又繼續說：『假如我們認定資本家對於生產者有所消費的話，那麼我們很可以用工資一辭去代替勞動；在這種場合，生產品對於資本家所值多少，即應由資本家所支付的工資多少來決定。』(註二) 這樣一來，密爾就輕輕地把勞動拿「勞動價值」或工資去代替了。這是亞丹·斯密

(註一)同上，第三章，或韓訥著經濟思想史頁四一一。

拿「所購買的勞動」去與「所消費的勞動」相混同的老辦法；這種混同早就被李嘉圖所駁斥，可是現在又被約翰·密爾復活起來了。密爾底觀點是：以所支付的工資之大小（或生產成本之大小，這裏密爾跟斯密氏一樣地從生產成本中抽去了不變資本）決定價值。這種定則，去代替以勞動量決定價值的定則。

顯然，密爾這樣的價值論是很錯誤的。首先，就算價值即生產成本的話，但生產成本中不祇包含工資一種，商品價值中顯然還包含着不變資本底價值，即從生產手段方面被轉移到商品上去的那部分價值。所以單單工資一項不能決定價值或生產成本底大小。再則，商品底價值還不能等於生產成本，因為假如這樣的話，資本家底利潤就落了空。關於這一點，密爾有這樣的意見：『除勞動外，另有一種生產所必需的因素，就是資本。因為資本是節省底結果，生產品底價值不但要為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提供報價，而且要為一切人底節省提供報價，……這種節省底報價，便是利潤。』因此，商品底價值是由在商品生產時所支付的工資總額加平均利潤之總額所決定的。這樣，勞動價值論就被庸俗的生產成本論（而非科學的生產成本論）所代替了。

關於第三類商品，密爾發表的意見很少。他只確認農產品底價值乃決定於生產必要的供給量底

（註二）參閱盧賓著，經濟思想史（Istoriya Ekonomicheskukh Mysli）第三十九章。

最大消費之水平。這裏，他底立場是站在前二種法則之間的：供求律與生產成本律共同規定農產品底價值。

最後還要指出一點，即密爾底理論沒有解答關於利潤源泉的問題及利潤高度的問題。李嘉圖曾正確地確認利潤爲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一部分，這顯然是剩餘價值底觀點；而密爾不學李嘉圖，偏偏學了俗流學者西尼歐這等人，以爲利潤是節省底報酬，是在「勞動價值」（指工資）以上的增加價值。試問這種報酬本身從何而來的呢？他始終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他有時說，「利潤底來源，勞動所生產的要比節省所生產的大些」，可是事實上他却完全站在西尼歐節欲論底立場上的。

約翰·密爾在其著作中，雖表示他底學說應當替經濟思想發展史開闢一新紀元，可是實際上他底著作却恰證實了古典派學說之最後的沒落。他底著作底社會哲學部分，顯然不過是古典學派所發揮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之延續，它於社會制度底根本改造毫無裨益。至於他底著作底經濟學說部分，則不但沒有促進科學的經濟思想之發展，而且倒反證實了古典學派理論無力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底內部規律。所以他底學說是古典學派沒落底最後標誌。

## 第七章 所謂經濟浪漫主義

古典學派以後，差不多跟俗流經濟思潮同時發生的一種經濟學說，這便是以法國經濟學者西斯蒙蒂（Jean Charles L. Simonde de Sismondi, 1773—1842）為代表，被鄔梁諾夫稱為「經濟浪漫主義」（economic romanticism）的經濟學說。這一學說底倡導者西斯蒙蒂，是李嘉圖、賽依和馬爾薩斯底同時代人。假如說賽依、馬爾薩斯等人底思想是表現古典學派內部的庸俗化和沒落的過程，即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自己把古典學說庸俗化的過程，那末西斯蒙蒂便是古典學派之小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即站在小資產者的立場（小資產者急進主義的立場）向古典學派進攻的一個反對派；他，無疑地，也是古典學派沒落過程底促進者。除此以外，跟西斯蒙蒂和賽依等同時代的，還有古典學派之勞工階級的反對派，即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派。關於後者，在下一章中將要詳加論述。這裏先來檢討西斯蒙蒂底學說。

西斯蒙蒂底學說，包含着進步的和反動的兩種原素：西斯蒙蒂主義是反動的小布爾喬亞浪漫主義，同時它却也有某些科學的功績。這兩方面底結合，便形成了西斯蒙蒂底經濟學說。這一章底任

務就在於闡明這兩方面的理論及其特殊的結合。

## 第一節 西斯蒙蒂底社會經濟背景

西斯蒙蒂生長於瑞士，瑞士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對於他底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十八世紀末葉的瑞士，一方面還保存着半族長制的小生產，而另一方面這種生產組織却受着先進鄰國底勝利的資本主義之威脅，而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西斯蒙蒂首先發見了這一危險，他就想竭力防止這一危險底發生。這種願望，使他同時成爲資本主義底批判者，同時又是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派。資本主義批判者的他，站在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反對派底立場；可是當他對他以爲憂慮的那些問題作積極的主張和解答時，他却成爲經濟浪漫主義底倡導人了。

西斯蒙蒂跟李嘉圖、賽依和馬爾薩斯，同爲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經濟學者。關於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前幾章中已經述及。可是西斯蒙蒂的反應這些事變，跟其他幾位經濟學者並不一樣，這是因爲他所代表的是另一階層，他所處的是另一種環境。

在法國這樣一個國家，農民佔着全國人口之半；凡是起來反對資產集團而袒護無產者的那些思想家，終不免帶着農民小資產者的氣魄，換句話說，終不免持農民小資產者的觀點去反對布爾喬亞



制度而袒護勞動大眾利益的。

但是西斯蒙蒂主義不祇是法國獨有的、民族性的學說，而是一種國際的思潮。雖然在西斯蒙蒂時代，英國的小生產基礎業已被毀，可是小布爾喬亞幻想底根基却依然存在。所以經濟浪漫主義這種思潮，不僅存在於落後的瑞士和比較後進的法國，亦且存在於典型資本主義的英國。

在十八世紀末葉，廣大的勞苦民衆（工人也在內），對於賜予他們貧乏和困苦的那些變動，仇恨到了極點。他們所仇恨的，首先是機器底採用。勞動大眾底貧乏和痛苦，激起了工人搗毀機器的運動；因為他們誤認自己一切苦痛底來源是機器而不是資本。一般的勞動大眾，在當時還都沒有解除小布爾喬亞的幻想，沒有忘記他們不久過去的小康生活，所以他們企圖恢復過去，以求自身的路。於是搗毀機器的運動便浩浩蕩蕩地充滿了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西歐歷史。

工人和一般勞苦大眾要求回復過去的幻想，——縱然不能把歷史的車輪倒扳轉來，至少也得阻止它底加速前進，——這種幻想不但普遍地流行於大眾，而且也爲一般有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所維護。西斯蒙蒂便是把這種幻想理論化的一位經濟思想的代表。

這樣，西斯蒙蒂所主導的經濟思潮，在英國亦有其廣大而鞏固的根基。然而在考察這種思潮底社會經濟條件時，我們絕不可忘記西氏底瑞士。當時瑞士舊經濟形態底潰解過程業已發生，

但是這種過程是病態的。瑞士社會底保守性、閉關性的氣味，本來極其濃厚；然因瑞士底地理位置處於法、德、意幾個比較先進的鄰國底包圍中，它底閉關主義就不容易保持和貫徹。

在十八世紀中，瑞士底對外貿易發展得相當地快，它輸出農產品，甚至也輸出一點工業品。那時瑞士工業底發展還只處於所謂「散漫的工場制」底階段；手工業者和家庭工業者分別地替各種商業機關做工。棉織業和鐘錶業是瑞士主要的工業部門。單蘇黎支一州區，一七八七年有手工紡工三四、〇七五人，手工織工七六、四七九人；而日內瓦則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從事鐘錶生產和珠寶生產。此外，絲紡織業也相當地發達，在十八世紀末，全國絲紡績工人約達十萬人之多。

瑞士劃分為好些州區(Cantons)，而各州區之工業發展程度則各不相同；在一種州區內工商業頗發達，在另一種州區內則農業佔優勢，在第三種州區內，則以畜牧業為普遍事業。不僅經濟狀況如此，即就政治體制言，各州區也頗不一致。在那些落後的州區內，政權為貴族們所壟斷；而在比較先進的州區內，則新興的市民層已起來爭奪政權，這種新興的市民層便是中小資產階層。

可是在法國大革命前夜，在一切州區內封建制度都還相當地穩固。在城市中，手工業行會，商業行會和其他同業公會，都享有很大的特權。鄉村對於城市有封建的從屬關係；城市的特權階層對於四周鄰近的鄉村人民，自居於封主底地位以行使其威權。在市民層與貴族封主的矛盾，城市與鄉

村的矛盾之外，還要加上一種州區與州區間的衝突。布爾喬亞社會生育的痛苦在瑞士，因州區間的爭鬥，因它們底閉塞性和各自的獨特性而加重。在十八世紀全個世紀內，各州區內部酷烈的爭鬥，交編着州區與州區間的衝突。中央政權底存在只是名義上的，每一州區差不多等於一個獨立的「國家」。

雖然，在這樣一個分裂的國度裏，資本主義却還是在開拓它自己的道路。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大革命，把瑞士捲入漩渦中去了。瑞士在一八一四年已有七百架紡紗機；機械的紡軸已被採用，而且它底數量正在不斷地激增起來：一八二五年有三十萬紡軸，一八四四年增加到六十六萬，至一八五〇年已近於一百萬具了。政治組織中所發生的變化也很大。各個州區內先先後後地有革命的爆發，這些爆發到後來受了法國大革命底刺激，轉變成為強大的革命運動了。這便是改革瑞士政治組織的原動力。日內瓦比任何一州都先進些，它在一七八一年已經完成了一次革命：州總議會底職權被擴大了，居民大多數獲得了職業底自由；對於封建制度給了很重的打擊。但是那次革命並沒有堅實的基礎，它不久就被別的許多州區底聯合力量，加上革命前的法國底支助，所消滅了。只有等到法國本身革命爆發之後，瑞士全境的革命運動才開展和加速起來。

革命的戰鬥（革命的拿破崙的法國軍隊也參加了這種戰鬥）毀滅了瑞士的封建制度，並予族長

制以致命的打擊。這些激烈戰鬥底結果，使瑞士變成比以前統一得多的國家了。但是跟封建制度和貴族政治做過鬥爭的瑞士的小市民和農民，這時驚恐地見到了一種新的、更可怕的力量——資本。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方面雖解除了舊時的封建束縛和壓迫，但同時另一方面却又給廣大的勞動民衆帶來了新的「恩賜」——破產與貧困。因為資本主義底克服封建制度，也就是大生產底克服小生產。所以即使像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得比任何一國都前進的國家，人民間依然存在着留戀過去、幻想回復到過去的各种夢想。在後進的瑞士當然更免不了發生這樣的夢想了。瑞士廣大的人民層，在十九世紀初葉，很普遍地存在着阻止資本主義發展或不容許資本主義發生和恢復自給自給的小生產的各种幻想。此種幻想之理論化的體現，便是西斯蒙蒂底經濟浪漫主義。

鄔梁諾夫說：「西斯蒙蒂從事寫作的那個時代底特徵，就是交換（現代的術語是貨幣經濟）很快的發展，這種發展在法國革命消滅封建殘餘之後表現得特別顯著。西斯蒙蒂毫不含糊地咒罵這種交換底發展和強化，攻擊所謂「拼命的競爭」，籲請政府保護人民，使勿食競爭之惡果……」（註）。經濟浪漫主義便是鄔氏所描寫的這一個時代底產物。而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瑞士，正具備着極有利於這種意識形態之發生和發展的諸條件。

## 第二節 西斯蒙蒂底社會經濟思想總評估

西斯蒙蒂底思想發展過程，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當他還隸屬於古典學派和遵守自由主義之「信條」的時期；第二時期是他成為古典學派和自由主義之批評者的時期。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社會革命底完成，是促成西氏思想轉變的原因。普通經濟學說史中所論述的西斯蒙蒂主義或經濟浪漫主義，正是指他底第二時期而言（當他形成了獨立體系的時候）。

西斯蒙蒂底社會立場是小商品生產者（農民和家庭手工業者等社會羣）底立場。這一立場只容許他注意到社會經濟變革底一方面，即破壞舊組織、舊生活的一方面，而不注意到它底創造新的方面。固然，這使他特別注意於資本主義底矛盾，——這是他底一點功績；但是即這點功績和他底浪漫主義，也完全發源於他底社會立場，即小商品生產者底兩重性的社會立場。

小商品生產者底兩重性，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而在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它就表現於西斯蒙蒂主義，即表現於對資本主義和古典派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經濟浪漫主義。工業革命把一切以小生產為經濟基礎的舊關係盡行破壞了。堅持反動的小資產者觀點的西斯蒙蒂，當然不會瞭解這種「破壞」底意義的。他所願望、所呼籲和所要求的，主要地就是「阻止破壞」。小商

品生產者（小資產者）同時是勞動的生產手段所有者，他們底階級本性要求着反對資本主義而保持自足自給的小生產經濟。

西斯蒙蒂雖然嚴密地觀察着上述的破壞過程，可是他沒有根據那種觀察立即建立起自己特殊的理論體系來。他底經濟浪漫主義的體系是逐漸形成起來的。在他開始著作生涯時，他還是個亞丹·斯密底信徒。他底第一部經濟巨著商業之財富（*Richesse Commerciale*）係完全依據國富論底原理寫成的。在年輕的西斯蒙蒂底頭腦中，自由主義的傾向是高於保守主義的。當西氏初次到英國的時候，他還是古典學派底生徒。小商品生產者底本性，起初以其自由主義方面支配西斯蒙蒂底意識，到後來才以其保守主義方面表達於西氏底學說。起初，西斯蒙蒂和賽依等人一樣，也是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principle）底主張者，可是後來他却變成這種口號底極端的反對者了。那時他認定自由競爭和自由玩弄個人利益是一切罪惡和一切禍患底根源。要跟這種禍源做鬥爭，只能靠國家政權干預經濟生活的辦法，靠調節經濟生活的整個制度，纔能奏效。

這樣，西斯蒙蒂底主張，就由經濟自由轉變到國家干預了。因而他對於國家和國家職能的見解也跟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不同。經濟自由主義者（如西尼歐、巴師夏等）竭力限制國家政權底職能，把後者祇歸結於維持秩序和保護財產。西斯蒙蒂則將關注民衆——尤其勞動民衆——福利一

事，也歸入國家底職責中去。西斯蒙蒂不瞭解國家底階級本質，而直率地幻想地要求資產者的國家來關注勞動者底福利，這種與虎謀皮的愚行，西氏自己當然不會覺察到的。

講到經濟制度方面，西氏斥責自由競爭制而提出中世紀式的手工業行會制來跟它對抗。他所要的就是這種手工業的行會制；手工業者佔有生產手段；他們不依賴遼遠的、他們所不知道的市場；他們爲自己定貨的主顧或鄰近的市場而生產；那裏沒有階級的劃分，學徒和從業人經過一定年限都可以升爲行東的。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作者把小生產的農民經濟理想化了。他把小農經濟跟資本主義化的大農經濟對立起來，而認定前者是理想的經濟。他說在小農經濟中，生產底三要素——勞動、土地和資本——是聯結在一塊的；在大農經濟中，它們却各自分裂。在前者，生產服從着消費；在後者，則消費有賴於商品底實現，而這却不是常常可能的事。因此，小生產（工業的也包括在內）在西斯蒙蒂看來是一種理想的生產。他這種理想顯然帶着回復到中世紀黑暗時代的那種妄想底毒素；可是同時他又不能不明白，要完全回復到舊時的經濟生活，事實上已不可能，要藉恢復舊制度來重新聯結已分裂的生產諸要素已不可能。

但是社會主義又不是西斯蒙蒂所認爲適當。關於社會主義者，西氏曾發表過這樣的評論：『有些人以其愛人類的熱情……倡議一種完全新的社會組織，而稱之爲合作制度。這組織是要用集團底

利益去代替個人利益，此種集團之目的在於執行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工作。渦文便是這派最有名的一位代表，他在英國和法國有很多的信徒。『他對於社會主義學說的本身，避免做實質上的批判，他僅僅憑空斷言道：『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所建議的方法是不適於達到那種目的的。』（註）這裏所說的目的，西氏以爲他自己的跟社會主義者的（目的）一樣；同爲消滅現存的生產品分配不公平的制

度。

這裏，小資產者底兩重性表現得最爲露骨。小資產集團底思想家西斯蒙蒂，一方面替勞動者的小生產者說話，主張反對資本主義及其自由競爭制；另一方面替生產手段所有者的小生產者說話，他又主張反對「以集團利益代替個人利益」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所賴以存在的個人利益，照西氏底意見是應當保存的；但是這種個人的利益應當加以限制，應當以小生產者底個人利益爲限。

西斯蒙蒂會氣忿地拒絕別人給他的責備，——責備他爲技術進步底反對者。實際上他的確反對技術的進步，不過他企圖把技術進步的利益限制於小生產者利益範圍內罷了。

假使說俗流經濟學者拼命地在宣傳現代社會底利益調協（或和諧），把布爾喬亞社會描寫得像天國樂園一般，那末西斯蒙蒂却對於資本主義底矛盾不願有所掩飾。不過他認爲資本主義底矛盾祇

（註）西斯蒙蒂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俄譯本頁二四〇—二四一。



由於自由競爭和生產底無限發展，而不知道這些矛盾是內在於商品生產的。因而他就有好些願望，改良現制度的種種願望。下面就是他底願望：『我希望不論工業或農業企業都分成大量的獨立工場，而不操縱在管理幾百幾千工人的一個大企業家手裏。我希望實業資本爲很多的中等資本家所分有而不爲擁資千百萬的一個人所獨佔。我希望今後工廠工人有一種希望，而且差不多有一種自信：相信他是自己業主的產業底參加者……，可是眼前的工人則期待到老，一輩子也沒有改善自己境況的希望。然而要實現這些改良，我却主張用逐漸的、間接的立法機關所採取的手段，我祇要求廠主與工人間的關係底完全公平，要求廠主對於他所加於工人的損害負責任。我希望法律經常地助長遺產底分散而不促進它底集中；法律應當給廠主以獲得金錢的或政治的利益以加強他們跟工人們的聯繫之機會，給他們以在較長的時期內僱用工人並予工人們以參預企業利潤之分配的機會。也許到那時候，較好地運用着的私人利益，自身會除去它所加於社會的禍害。到那時候，廠主將致力於工人境遇底改善，引起工人們對於所有權和蓄積的興趣，簡言之，廠主們將致力於轉變工人爲人和公民，然而在現時他們却在努力於使工人轉變爲機器。』(註)

那末怎樣實現這些願望呢？西斯蒙蒂很坦白地承認道：『在我指出了如何才算是公平之後，我

(註)同前，頁二四一——二四二。

就自己覺得完全沒有能力指出實現願望的方法。」(註)

西斯蒙蒂連自己所說的一些狹窄的實際辦法也不相信能夠實現；這就充分地表現了他底主張底幻想性。他所幻想的實際辦法底基本原则是要建立企業主和工人中間的族長制 (patriarchal system) 的關係。他底主張就是要企業主關心工人們底生活，企業主應當在工人失業、殘廢和衰老的時候，也要對於他們底生活負責。爲了這樣，企業主就應當組織一個公會，共同來準備一筆必要的基金。最後，西氏又主張工人亦當參加企業利潤底分配。

這樣看來，假使把西氏當做批評家看時，他底見解是跟「利益和諧」論者分歧的；因爲他認定在現代社會內，企業主與勞動者，大財主與小生產者底利益都是衝突的，絕對不和諧的。可是把他當做改良家看時，他却完全跟「利益和諧」論者站在同一立場；因爲他所提出的一些實際辦法，仍然以承認布爾喬亞社會內有利益和諧之可能爲前提的。西斯蒙蒂和俗流學者所不同的，祇在達到和諧的手段：俗流學者認爲自然而然地（即由於各個社會羣底爭逐私自利益會達到利益底和諧；西斯蒙蒂則主張靠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手段來實現階級利益底調和。不論俗流學者或西斯蒙蒂都一樣地不知道：在生產手段私有制底基礎上社會利益底調和是沒有可能的。

最後，西斯蒙蒂對於人口問題的見解，也值得提出來約略講一講。他批判馬爾薩斯時，正確地指出了人口繁殖的可能和實在的，人口繁殖是完全兩件事情；實在的繁殖，總常常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發生的。西斯蒙蒂又正確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內人口過剩底不可避免性，雖然他沒有而且不能揭露出這種不可避免性底真實原因來。可是上面這一切正確的見解，都被他自己的結論一筆勾消了。他底結論是根據上面的見解（即資本主義社會內人口過剩底不可避免）而加深和發展他底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彷彿只有由小生產者羣所組成的社會，才是最合理的，即沒有人口過剩之危險的。只有在小生產者羣的社會內，人口底增長才跟實在收入底增長相適合。

### 第三節 西斯蒙蒂底研究方法與對象

西斯蒙蒂在其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一書中，是以政治經濟學對象之界說開始的。他寫道：『人類底物質幸福，就其能成爲政府底任務而言，是政治經濟學底對象。』（註）我們已經知道，古典學派把經濟過程當做自然過程研究，即是說，當做自發的自然現象底過程來研究。西斯蒙蒂則確定政治經濟學底任務在於研究這些爲政府所調節和指揮的過程。古典學派所感興趣的是財富如何生產、如

（註）同前，頁一七〇。

何流通和如何分配的問題。西斯蒙蒂則關心到政府如何指揮和如何領導財富底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問題。這種見解是跟西氏底總觀念——即反對「放任主義」而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那種觀念——相吻合的。

這樣解說政治經濟學底定義，證明西斯蒙蒂把政治經濟學跟經濟政策混為一談了：很明顯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只是一種經濟政策底行為而不是經濟活動及其法則本身。而且西斯蒙蒂對於經濟政策的瞭解又是完全主觀的和抽象的。他根本不知道一定的經濟政策不祇是主觀的東西，它同時必然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底產物，它必然適應着某一特定歷史時期之經濟組織底要求，亦即適應着這一歷史時期之經濟上（因而又是政治上）統治的社會集團底要求的。所以經濟政策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同時它必須是歷史地具體的。

當他給政治經濟學底對象下「新的」定義時，他又駁斥古典學者底方法。他把古典派底方法當作抽象的方法來反對，他常常責備古典學者從人那裏抽出財富來（即捨去了人來談財富），可是事實上財富底目的却在滿足人底需要。同時據此又責備他們捨去消費而談生產。

但是西斯蒙蒂批判古典學者底抽象方法時，自己的立場也是很抽象的。他所談的只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而不是在具體的階級關係中佔着一定位置的人。他所說的人是一般地「領有財富和

享受財富」的人。然而事實上這樣的人，祇存在於西斯蒙蒂底想像中：這種人就是理想化的小資產者，亦即西氏所願望所企慕的一種小有產者。因此，西斯蒙蒂所說的人，不祇是抽象的，而且是主觀的。把主觀主義用於經濟現象的研究，就表現西氏比古典學者退步的地方。

固然，西斯蒙蒂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採取批判態度的。這是他比古典學派進步的地方。但是他底批判是抽象的批判，是依靠某種理想的批判；同時，這種理想又被他抽象化了；猶如他底論敵們把布爾喬亞現實存在抽象化一樣。假如說古典學者認定布爾喬亞現實是正常的、自然的，那末西斯蒙蒂却咀咒這種現實，因為布爾喬亞制度跟他所認為正常和自然的制度不相適合。

西斯蒙蒂是一位大歷史家；可是這位大歷史家却跟非歷史家的李嘉圖一樣地不理解真實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即依據客觀的歷史發展底觀點去解釋現象）——即依據辯證法去解釋的歷史觀。不論西氏也罷，李氏也罷，他們底研究俱以各自所認為正常和自然的抽象概念為出發點。二人底區別僅僅在此種概念之不同的應用。李嘉圖應用此種概念於所存在的，西斯蒙蒂則應用此種概念於應存在的。前者認定現實的就是正常的、自然的，後者却認為按照一定的理想（即是他底小布爾喬亞理想），靠國家政權底力量來創造的，纔是正常的、自然的。所以我們應當明白，當西氏責備古典派學者沈醉於抽象思惟時，實際上他是在責備他們底客觀主義，即責備他們只知堅執實在的現

實而不顧及主觀的願望。

西斯蒙蒂底主觀主義不僅表現於他對客觀事實和事件的估量，而且又表現於他對它們的說明。古典學者用種種方法說明經濟現象底發生和發展是自發的（spontaneously），是被各自利益所指揮的許許多多人底行動之自然的結果。西斯蒙蒂却把決定的作用歸之於政策——在一定的主義領導之下施行着的政策。「人意統御世界」，——這便是西斯蒙蒂底方法論所根據的一個唯心論的原則。他主張根據這一原則去解釋一切現實。假如遇到惡劣的現實，遇到被西氏所唾罵的現實時，那末這是人意錯誤之結果；要改變現實，就必先改變這種不正確的人意。因此，西氏認為估量事實和事件，對它們作道德的斥責或贊助，便是政變或鞏固這些事實和事件（意即客觀的經濟現實）的唯一手段。

這麼一來，倫理就處於對政治經濟學之主導地位了；政治經濟學應當遵照倫理底「命諭」而建立起來。他底責備古典學派，說後者研究財富時捨去了人，實際上這是在責備他們不把倫理放在政治經濟學之上，不認倫理對於政治經濟學之主導作用。西氏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所說經濟現象應當跟一切社會現象密切聯繫起來研究，這句話底實際意思也不外乎經濟學應當服從倫理。

總之，西斯蒙蒂底方法上的根本缺點是他底主觀主義和唯心論。西斯蒙蒂沒有用唯物論去對抗

那接近布爾喬亞辯護派觀點的客觀主義（即古典學派底客觀主義），他所採取的不是表現革命的黨派性的唯物論而是代表小資產者黨派性的唯心論和主觀主義。他並不代表勞工集團，站到時代前面去推進社會經濟底發展，而是相反地企圖把社會拉往後退——重新再造出一個自足自給的小生產者底甜蜜之鄉來。西氏理論底黨派性，顯然比他所批判的古典派理論底黨派性要反動些；因為古典學派擁護布爾喬亞關係底發展，同時也就擁護爲此種關係之內容的生產力底發展；西斯蒙蒂却堅持布爾喬亞關係底不發展，同時也就是要求阻撓社會生產力底發展。

然而西斯蒙蒂也有他底長處。小商品生產者底兩重性促使小商品生產者底思想家底方法，也帶有兩重性。他對於布爾喬亞所有權（大的資本主義所有權）持仇視態度，他把這種所有權底集中和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諸矛盾，明白而顯著地描述出來了。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採取這樣批判的和戰鬥的態度，這在當時確是一大進步。可是他既擁護小布爾喬亞的所有權並把它理想化了，他就看不到、而且不能看到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單純小商品生產中已有其萌芽這一事實；他不知道小商品生產是每分鐘每秒鐘在那裏大量地產生出資本主義來的（鄔梁諾夫語）。西氏在發展了的布爾喬亞關係和不發展的布爾喬亞關係之間築起一堵不可逾越的萬里長城來，這樣他就自己阻塞了正確認識兩者的道路。西斯蒙蒂不瞭解大資本生產跟小商品生產之不可分裂的、自然的聯繫；他不瞭解這是同

一商品經濟底兩種形式或兩個不同的階段。他却把它們看做完全不同的、而且相反的東西；所以他一隻手高舉反對大資本的生產——商品經濟底一種形式——的旗幟，另一隻手則又舉着擁護小商品生產（特別是小農業）——商品經濟底另一形式——的旗幟，並且把它描寫成最高的理想制度。

由於西氏是小資產集團底思想家，所以他具有兩重「資格」：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底批判家，所以站在同情一般勞動者的立場，向資本主義進攻；同時他又是小商品生產底擁護者，所以他完全站在小私有者底立場，做他改良主義底美夢。

好些布爾喬亞經濟思想史家，如季特（Charles Gide）、英格蘭姆（Ingram）等人，把西斯蒙蒂當做歷史學派或社會倫理學派底先驅者，實際上這是重表面而不重實際的看法。從表面上看去，因為他是個歷史家，他常常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經濟，彷彿是個歷史學派底首創人。同時，因為他主張政治經濟學受倫理學底指揮，所以又彷彿是社會倫理學派底首創人，然而這祇是外表上的類似而已。在這種類似的外表之下，却隱藏着不同的階級立場。西斯蒙蒂（前面已屢經指出）深切地同情於勞動大眾；固然他是站在小資產者底立場去同情勞動者（產業勞工集團亦在內）的，可是他站在勞動者方面去進攻資本主義，這一點總是事實。建立歷史學派或社會倫理學派（註）的德國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都是替資本主義辯護的俗流經濟學者。在歷史學派底時代，資產集團與勞工集團間的戰鬥



已經十分激烈，前進的勞工階層已經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行動起來；而歷史學派（連社會倫理學派在內）的經濟思想者，則不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這樣看來，從本質上講（不從外表上講），西斯蒙蒂絕對不能歸入歷史學派或社會倫理學派。稱他為所謂經濟浪漫主義（或經濟的浪漫學派）底建樹者，是比較很恰當的。

#### 第四節 論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

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開始就寫着：『生產是人類財富底源泉，它是人類底願望和需要所引起的。』又說：『……人類天性中被賦予諸種需要和苦痛，刺激着我們去活動，並推動着我們去發展；假如能夠從世界上驅除需要的話，那末我們同時就連一切生產活動都驅除了。』從這幾句話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底一點基本思想，就是需要或消費駕於生產之上的主導性。

假使說斯密及其學派底研究中心是「經濟的人」（“homo oeconomicus”），即從事生產和貿易

（註）歷史學派是現代（十九世紀後半與二十世紀之初）德意志主要的布爾喬亞經濟學派之一，其代表有羅秀（Roscher），

希德勃倫特（Hildebrand），克尼斯（Knies）等人。社會倫理學派祇是歷史學派底一支派，亦被稱為新歷史學派，

如希莫勒（Schmoller），瓦格納（Wagner）諸人即其代表。

的人，那末在西斯蒙蒂看來，人首先就是消費的主體。在西氏底觀念中，人底從事生產，祇是就他底需要所指揮的限度內的生產而言。依據這個基本論綱，西氏做出了對於他底整個觀念有重要意義的一些結論來。第一，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內，生產是不能無限度的，因為那裏根本沒有無限度的生產底刺激。他拿人類的需要按照它們底急迫性底程度來分類，從而他就發見，並非一切需要都是對於勞動（特別是繁重的勞動）的刺激力。第二，他認為只有在階級社會內，可能發生無限度的生產，這種無限度的生產本身又是社會不平等底不斷發展和加深的原因。在這種社會內，生產被那些不勞動的人們底需要所決定；這些人不費絲毫勞力而能隨心所欲地滿足自己的一切慾望。西斯蒙蒂說：『只有當奢侈品被他人的勞動所購買時，它才有存在的可能。』接着又說：『勞動生產力之無窮的增加，其結果祇能是有閒的富人們底奢侈和享樂底增進。』（註）第三，在布爾喬亞社會這種為廣大的市場而生產的階級社會內，無限的生產引起了極大的困難，因為這種無限度的生產是靠縮小消費來達到的，其結果必然是供給超過需求。

從這三點結論中所得出來的總結論，只有一個：各個人底幸福和整個社會底幸福都不在於生產和生產力底發展，而在於確當的利用所創造的財富和公平的分配這些財富。固然，西斯蒙蒂並不一

般地反對技術底進步，相反的，他常常熱烈地主張技術的發展而怨恨技術底落後。可是因為他把注意底重心從生產轉移到消費上去，而對於生產和消費間的相互關係也瞭解得太過簡單，所以他把技術進步底意義限制得那麼小，事實上與否定技術進步之意義無異了。

西氏底研究出發點是一種完全無內容的「真理」，他說「人一生下來就把各種需要帶到這世界上來」，而這些需要便是迫着他去從事生產的刺激力。而且他底觀察需要也是抽象的，又是純生理觀的，因為他說「人一生下來就把各種需要帶到這世界上來的」；那末這裏所談的是一般的人，沒有階級性，也沒有一定的具體的歷史性的人；這裏所談的需要是「一生下來就有的」需要。雖然表面上西斯蒙蒂竭力提倡具體，主張「歷史主義」，他還指出了原始人和現代人底需要底不同，可是生產與消費之複雜的相互關係，對於他是茫茫然的。假如西氏真能依據科學的歷史主義（即史的觀點）去觀察需要的話，即是說，假如他能從人類的需要如何發展的觀點去觀察問題的話，那末他一定能夠明白，需要底發展是有賴於生產和生產力之發展的。須知生產底發展不但能完全滿足現有的需要，而且還能生產新的需要。

關於這個問題卡爾寫過以下的一段話：『生產不僅供給需要以材料，而且它也供給對材料的需要。當消費脫離了它底原始的自然粗野狀態和直接狀態時，……它本身，即當做生產之刺激看的』

它，就成爲被事物所決定的了。例如藝術作品，——其他任何物品都如是，——本身創造着理解藝術的和能夠玩賞美的觀衆。因此，生產所創造的不祇是爲主體的事物，而且也創造着爲事物的主體。』(註一)

西斯蒙蒂也沒有忘掉歷史，然而他底「歷史」是從魯濱遜式的生活開始的。在他底新原理中有一整章專門討論到「孤獨之人底財富」(即該章之題目)。在這一章書裏，他詳細地敘述孤獨者如何滿足他自己的各種需要，首先是最迫切的，然後漸次及於比較不甚迫切的需要。一句話說，西氏在該章中「證明了」需要如何推動生產的情形。

西斯蒙蒂說：『這個人(按即孤獨的人)底歷史就是全人類底歷史。』接着又說：『諸凡對於單獨的個人是對的一切話，對於全社會也一定是對的，反過來說亦然。』(註二)但是他却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孤獨生活的人底富或貧，是很容易明白的；可是在交換社會內，物品底交換使財富帶有某種混亂性，使財富從一種肯定的事物(在魯濱遜式的生活情況之下)轉變爲一種「差不多形而上」的東西了。西斯蒙蒂之所以感覺交換社會底財富是「差不多形而上的」(意即玄奧的，捉摸不住的)

(註一)卡爾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註二)西氏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頁一三。

的），這是他以孤獨者（魯濱遜）之財富觀爲出發點的緣故。他腦子裏的財富觀既然以孤獨之人底財富爲根據，那末對於商品交換社會底財富自然完全沒有法分析了。

正因他以魯濱遜式的經濟生活爲出發點，於是他把生產和消費這兩個範疇等同於供給和需求，把生產與消費底關係解作供給與需求底關係了。在魯濱遜式的生活場合之下，消費總在生產之前，因而西氏確定，在商品交換社會內，需求應當在供給之前。這就是他底消費（需要）主位論。實際上，很明顯的，魯濱遜式的孤獨經濟場合上的生產與消費及其相互關係，跟商品社會內通過交換而實現的供給和需求及其相互關係，是大不相同的。

西斯蒙蒂底觀點既是如此，所以他反對賽依和李嘉圖底見解。照李、賽兩人底意見，先有了某種商品底供給，然後才發生對別種商品的需求；換言之，一商品底供給就等於對另一商品提出了需求；因此供給也就是需求。西氏底見解則反是，他以爲先有了需求，才引起供給；消費是生產之母！

## 第五節 生產與分配，資本與收入

前面已經指出，西斯蒙蒂係以孤獨之人底生產與消費爲其研究底出發點。對於現代布爾喬亞社

會底生產和分配的看法，亦復如是。在這裏，西氏底基本觀點，仍然是消費駕馭生產和決定生產。同時，在西斯蒙蒂看來，分配問題是理論的和倫理的問題。他認為不是在一分配場合之下，經濟都能發展，都能有條理地很順利地發展起來的。這個關於這問題之理論的實質。至於這問題之倫理的實質，則在於分配應當按照每人底情形供給他以幸福。

西斯蒙蒂把批判底刃鋒對準着資本主義的分配，認為這種分配是最不公平的，是一切社會糾紛與禍患之原因。他深深地感覺到資本主義底矛盾，然而他所瞭解的矛盾，僅僅是就資本主義分配領域內所表現的那種形式而言；『殊不知分配關係祇是生產諸關係之另一形式而已』。（註）

西斯蒙蒂因不瞭解這一點，所以他把分配問題當做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底基石了。在考察分配的時候，他企圖揭露資本主義體系不穩固的原因，特別是想說明經濟危機底原因。他並主張以國家調節分配的手段，來醫治布爾喬亞社會底疾病。但因他持着不正確的立場，結果是兩種企圖都未能實現。卡爾說得好：『他（指西氏——沈）確當地指出了布爾喬亞生產底諸矛盾，可是他不能瞭解這些矛盾，因而也就不瞭解它們底解決過程。』而因為是個改良家，所以『他往往從過去中尋找救濟之道；他變成了過去底頌揚者；而且他想藉收入和資本、或分配和生產之正確關係底建立以削弱

這些矛盾。」（註）

西斯蒙蒂既視分配問題有決定的意義，他就集中注意於收入這一範疇，特別注意到精確劃分資本與收入之區別的必要性。那末他怎樣確定資本和收入底界說呢？

關於這個問題，他實際上沒有對斯密所說的意見加以重大的改變。他仿效着斯密底說法，解說資本第一是作為繼續生產之用的一部分財富；第二是生產利潤的那部分財富。我們在第四章中已會說明，這兩個定義遠非等同的。拿西斯蒙蒂自己所舉的例子而言，就充分地證實了它們底不同。一方面他發見那孤獨者手中的資本，是完全跟他底第一個定義相符合的；但跟第二個定義却絕對不適合，因為在荒島上孤居的魯濱遜是什麼利潤也無從取得的。在另一方面，他又認資本家所購買的工人底勞動為資本。這就跟資本底第一個定義不相適合了，——因為不論勞動，或用於購買勞動（西氏認為所購買的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的貨幣，都怎樣也不能歸入生產手段中去的；但被購買的勞動，却得根據第二個定義而當做資本看，因為它是生產利潤的。

在對收入的解說中，西斯蒙蒂也沒有明確的觀念。有時他把它解說為財富領有底結果，有時他又把它解說為當作消費的那部分財富。前一定義是指資本主義性質的收入而言，然而它太狹窄

（註）同上。

了；對於工資就不適用這個定義。後一定義則完全抹煞了收入底資本主義性，因為在任何社會形態之下，總有一部分財富是用於消費的。

從社會的觀點去劃分資本和收入底區別時，西斯蒙蒂底見解更含混不清了。有好些地方，他重複了斯密底意見；說從社會的觀點來看，資本是生產手段，收入則是消費資料。然而他又不能貫徹這種見解到底，因為他後來把工人底消費資料歸入資本中去了（也是根據社會的觀點的）。到最後他索性不劃分資本和收入底區別了。

然而西斯蒙蒂在這個問題上却也有一些功績。他因為要想嚴格地區別資本和收入，並想駁斥一種流行的見解——彷彿對於一種人是資本，對於另一種人就是收入的那種見解；因此他就發揮了這樣一種思想：說資本和收入不應當跟他們的物體的負持者 (material bearers) 混淆起來。資本和收入之物的負持者（即其物體的形態），在買賣行為底交替中不斷地變化着，而它們本身却始終留在它們底所有者（即資本和收入底所有者）手裏。西氏寫道：『然而這種價值是跟商品分離的；它變成了抽象的、非物體的一個量，後者永遠是土地所有者底所有物，但它却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最初，代表這一價值的是麵包，後來變成同價值的勞動，以後又變成同價值的這種勞動底生產品，其後又變成靠信用出賣生產品的一種債權（亦是同等價值），最後乃變成同價值的貨幣；然後再由貨



幣轉變爲麵包或勞動。這種順次進行的交換完全沒有改變資本本身，後者始終保留在原先把它積蓄起來的那雙手裏。」（註一）

可是因爲他缺乏正確的資本觀，使他不能發展這種思想，亦不能把資本看做採取循環形式的一種運動。此外，他還被自然的資本觀纏住着，以爲資本是「靜止着的一種事物」。這也就由於剛纔我們所述及的西氏兩重性的資本界說。

在其對於各種收入形式所下的定義中，也表現了西氏觀念底兩重性。西氏重複了斯密底利潤論之一，並寫道：『企業家底利潤往往不外乎對他所用的工人們的掠奪。他底獲利，不是因爲他底企業所生產的，大於他在企業上所消費的；而是因爲他沒有支付它底全部所值，因爲他不給工人們底勞動以充分的報酬。』（註二）

在這段文字中，西氏蒙蒂又給了兩種不相符合的說法。起初說利潤是「對工人們……的掠奪」；後來却說資本家「不給工人們底勞動以充分的報酬」。這裏顯然是兩個不同的解說。我們看了西氏底解說很可以發生這樣的疑問：那末所謂剝削勞動，其實究竟何在？是資本家佔有工人底全部剩

（註一）西氏蒙蒂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頁三八。

（註二）同上，頁四〇。

餘勞動呢，抑是他支付工人們以低工資？

這連西斯蒙蒂自己都不明瞭，因為他像亞丹·斯密一樣，提供了不止一個利潤論。當他視財富僅僅為勞動之產物時，他就得出結論來說：利潤是「掠奪工人」底結果。可是當他視資本為生產底要素時（這裏西氏接近於賽依底「生產三要素論」），指資本跟生產手段等同起來並且把價值和使用價值混同為一，這時他就提供了別的利潤論。他一忽兒把利潤解作資本生產性底產物，一忽兒又把它解作資本家節儉底報償。

對於社會收入底其他範疇的解說，西斯蒙蒂也表現了類似的糊塗觀念。他底地租論即其顯例。上面已經說過，他底財富觀之一是認定財富祇是勞動底產物；根據這一觀點，所以他把地租也看做勞動生產品中的一部分。但是他同時又根據他底「土地生產性」觀來下定義，於是他就陷於俗流派和辯護派的地租論立場上去了。

至於講到工資，西氏認為它總是停留在低水平上的；而且隨着機器底採用，技術底改進和資本底集中，工資水平將愈來愈往下沉。在這個問題上，他跟斯密底見解迥異，因為後者以為工資是隨着社會財富之增長而提高的。其次，西氏還有一點功績，就是他十分尖利地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一種辯護派的理論——「補償論」；依照這種理論底意思來說，工人一方面雖被機器所排擠，但另一方

面即可因生產之一般的擴大和新生產部門之出現而很快地找到工人。換言之，工人一面遭到損失，一面却可得到補償。這種理論是西氏所極端反對的。同時他又反對「和諧論」者底見解，彷彿工人可以因採用機器而獲得利益似的。西斯蒙蒂很公允地指出，對於一個被機器剝奪了工作或因降低工資而失去一部分收入的工人來說，生產品底降價（由於採用機器之結果），僅僅是很微細的一點撫慰而已。然而西斯蒙蒂雖正確地指出了工人階級貧乏化底擴展是資本積累之必然的隨伴，可是因為始終被狹隘的小布爾喬亞眼界所限，沒有看到資本積累過程底另一方面：生產力底增長，勞動底社會化，工人階級團結力底強大，以及它底轉變為強大的革命力量。西斯蒙蒂眼框中的工人，只是行慈善事業的一個對象，一個被救濟的客體，而不是能改變世界、能為新社會制度而奮鬥的一個戰士，主體。

## 第六節 論實現與危機

前面已經說過，照西斯蒙蒂底意見，生產品是拿收入去購買的。這一見解就成為西氏底實現論（theory of realization）底核心。同時它又是他底危機論（theory of crisis）之最接近的基礎。這兩個理論形成一個整體，西斯蒙蒂就把實現問題和危機問題合併起來加以解釋。可是這裏我們却要把

它們分別地考察一下。

先講實現論吧。在沒有講到實現論本身以前，我們首先要提一提西斯蒙蒂底價值論，因為這是跟他底實現論有密切關係的。西氏也認定價值由勞動所決定。可是他跟整個古典學派一樣，也不懂得包含於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他跟古典派學者的不同點祇在他比較銳利地提到那創造價值的勞動底社會性。卡爾寫道：『在對李嘉圖論戰時，西斯蒙蒂特別着重說到那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底社會性，並且指出……價值底大小歸結於必要的勞動時間，歸結於「全社會底需要和足夠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關係」。』(註)

因為西斯蒙蒂不瞭解包含於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所以他，和亞丹·斯密一樣，也只把商品價值劃分為幾種收入。由此就產生我們已經知道的幾點結論：(一)一切收入都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一部分；(二)在布爾喬亞社會內，即在商品價值分解為幾種收入的社會內，商品與商品的交換就等於商品與收入的交換。

後面這一論點，可以說是西氏底實現論底實質；這一點他重複了無數次。例如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他寫道：『一年的生產……由兩部分組合而成：一部分是發生於財富的利潤；另一部分則為

(註) 卡爾著，政治經濟學批判，頁七九。

勞動力，後者等於它所交換到的生活資料……這樣看來，國民收入和一年的生產是互相平衡，成爲兩個相等的量。」（註）

商品只與收入相交換的這種論綱，是亞丹·斯密將商品價值只劃分爲幾種收入的那個「教條」的「擴充」。在亞丹·斯密底論綱中，略去了不變資本；在西斯蒙蒂底論綱中，則變爲略去生產手段底購買，而把市場祇看做消費的市場了（即看做祇買賣生活消費品的市場了）。這裏就表明了他底消費和生產的學說，即消費爲主、生產爲屬的學說。在西斯蒙蒂看來，消費的意義是主導的，是駕於生產之上的。這種以消費爲主的觀點，阻止他瞭解：（一）生產只在最後的歸宿點上是以消費爲目的；（二）生產分爲生產手段底生產和消費資料底生產；（三）因此，在商品生產者社會內，商品底供給與需求不僅應當包括消費資料，亦且應當包括生產手段。

西斯蒙蒂當然也知道有生產手段，有不變資本（他隨亞丹·斯密之後而分資本爲固定、流動兩種）；可是正由於他底消費爲主的觀點，致使他沒有可能重視和正確地估量到這些事實，在他製定他底整個的觀念體系時。鄔梁諾夫曾對西氏加以評論道：『這樣看來，由收入與「生產」（即所生產的一切）的等同，產生了實現與個人消費的等同。如像鐵、煤、機器等物品底實現，即一切生

（註）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頁五二——五三。

產手段底實現，是以不同的方式發生的，——這一點西斯蒙蒂已經忘記，雖然他以前談到過它。」

(註)

這一種消費觀點，迫使他把資本主義制下所存在的爲生產而生產的現象當做不可解決的矛盾。他在這種現象中看出了矛盾，並且集中注意於這種矛盾；這固然是他底功績。可是因爲他曲解了這一矛盾，他底功績就大爲減色。這種矛盾底實質何在，他是不知道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而沒有相應的消費底發展，這當然是矛盾。但是現實中的這種矛盾是發生於資本主義本質的矛盾，它不容與資本主義的本質隔離開來的。

假如拿西斯蒙蒂底論綱（即商品祇靠收入去購買）爲根據，則結論必然是積累沒有可能。須知所謂資本積累，不外乎一部分剩餘價值之轉變爲追加資本（新增資本）。但是這部分剩餘價值如何實現呢？誰來購買體現這部分剩餘價值的商品呢？站在西氏底消費說的觀點上是不能解答的。

然而事實上資本積累是發生了。它怎樣發生的呢？對於這個問題，西氏並未給予明確直白的答覆。可是從他底一切見解和判斷中，可以看出他所認定的「正常」積累底條件有二：（一）小生產者底存在；（二）國外市場底存在。

(註) 鄒氏全集卷二，頁二〇。

西斯蒙蒂根據頭一個條件所做的結論是：隨着小生產者底消滅，使實現日益困難，市場日益縮小。他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中寫道：『由於財富集中在少數私有者之手，國內市場就愈益縮小，因而工業就愈得在國外市場上尋找銷路了。』

至於講到國外市場，則隨着資本主義生產底普遍化，西斯蒙蒂認為就得把它拋棄於計算範圍之外。因為等到全世界都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時候，它就彷彿形成爲一整體的市場，那時要獲得新的購買者已不可能了。那時全世界市場底需求是等於一定的生產量，所有的工業國家都要互爭這個市場了。假如一個國家多售出了一些生產品，即它在這個市場中所佔的份額比別國大了一點，那末這是由於別個國家損失了一部份銷路的結果（註）。

但是實際上國外市場是跟西斯蒙蒂所提出的實現問題毫無關係的。因為假如剩餘價值在國內市場上依據西斯蒙蒂所指出的理由而不能實現的話，那末它在國外市場上也一樣地無從實現，因為既有剩餘生產品輸出國外，就有別種商品輸入國內來，那末誰來購買這種輸入的商品呢？

以上講的是西氏底實現論；現在要講與實現論有密切關聯的危機論了。

假如生產品只是用收入來購買的，那末生產對於收入的超過，就等於生產對於消費的超過，結

（註）參閱西氏著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卷二。

果就一定是工業危機。西斯蒙蒂力圖證實以下的見解：自由競爭迫着每一企業家盡量擴大生產，結果是使後者超過了收入和消費，於是危機就發生了。

西斯蒙蒂底危機論結束了他底全部經濟學說，後者底基本假設為生產與消費之均衡和消費對於生產的主導性。而所謂消費，在他底理解中又祇是收入所限的個人生活上的消費。

他從資本主義的現實中注意到以下的一些事實。首先是由工業革命所產生的一些悲慘結果：機器排擠工人，工資下降，城市和鄉村的小生產者宣告破產。在這些事實中西斯蒙蒂又首先看到：隨着大生產底發展，生產和收入間的均衡被破壞了。其次，商店和貨棧中堆積着商品賣不出去，這是大量生產和民衆飢寒貧乏的結果；工業危機底真相就是如此。這樣，危機正是表明生產和收入間的「均衡」底破壞。

危機怎樣促成的呢？西斯蒙蒂回答道：由於生產超過了收入。換言之，危機是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底表現。這裏有着一點方法論的缺陷，就是西氏底危機論是抽象的：他把一定的生產方式抽去了。根據西氏關於生產和消費的一般論斷——即前者超過後者的結果，總要引起危機的，那怕在孤獨生活的魯濱遜底場合中亦如此。當然在別種社會形態（非資本主義的）內，工業危機更有可能了。他認為只要一發生生產超過消費，就一定要發生危機。他不瞭解，在某種社會形態內（例如在



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內），生產品底多餘不會引起任何危機的；因為這多餘的部分，將變成社會的積蓄資財，在計劃中規定作為繼續生產之用了。同樣，在原始的自然經濟社會內，縱有大量生產品多餘，但是也決不會引起任何危機。因此，問題不在生產超過消費這一事實本身，而在這事實發生在何種經濟體系中。

同樣的，民衆消費不足這一事實本身，也不能成為危機底原因。消費不足的現象，在奴隸主社會和封建社會內都有過的，但是在那些社會內，却並沒有危機。這又是事實。

西斯蒙蒂既從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抽去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他就不能瞭解這種矛盾在他所研究的經濟形態內的特殊性。他不能瞭解在資本主義之下，它只是固有於資本主義的那個基本矛盾底形式之一。這個基本矛盾便是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之矛盾。

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不能作為危機底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是違背事實的。事實告訴我們，危機常發生於繁榮行市之後，即發生於工人工資和其他階層底收入最高（因而消費也最多）的那個階段之後。那末怎麼能說危機底原因在於消費不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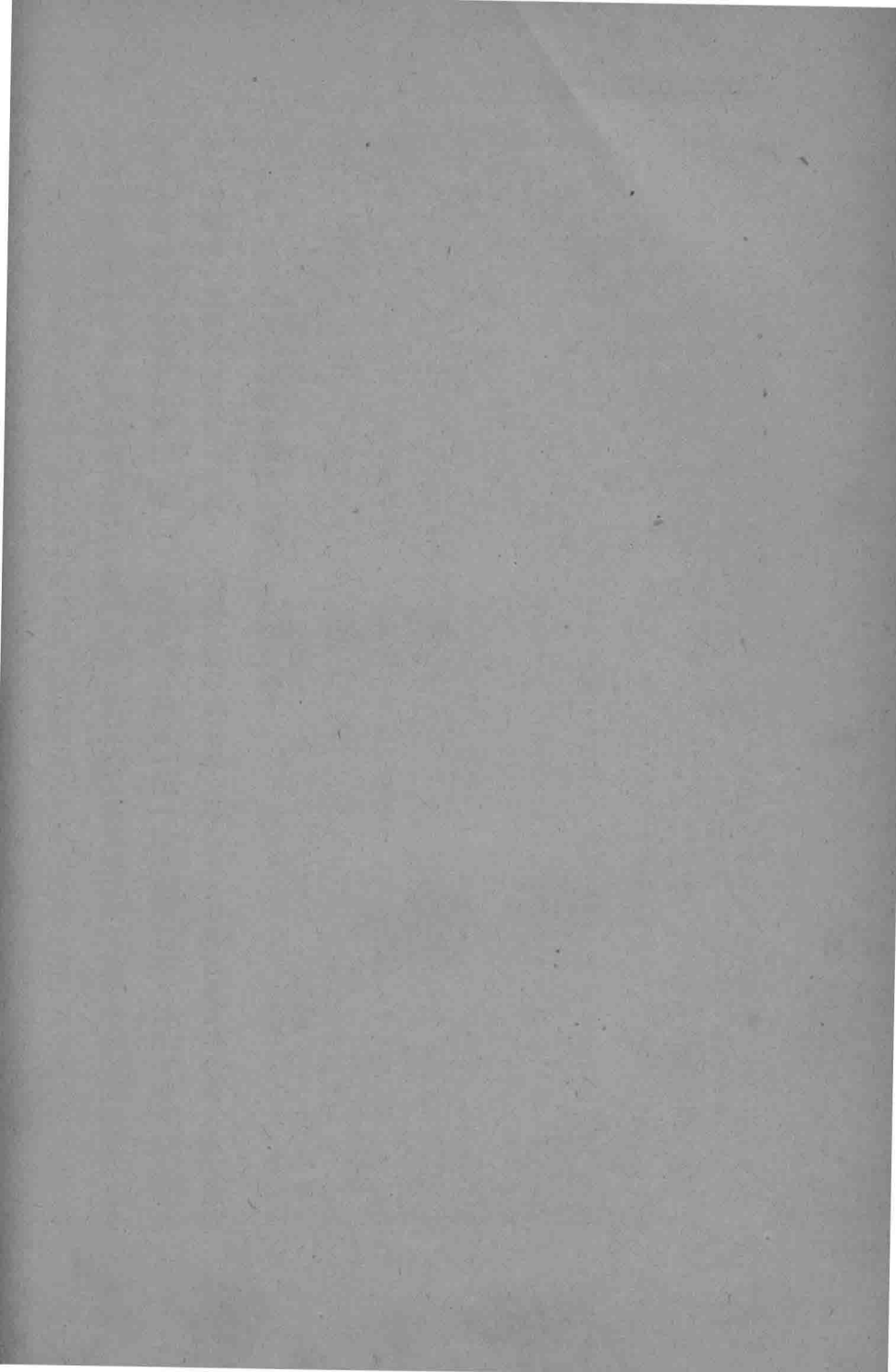
西斯蒙蒂似乎也覺察到這一點，似乎覺察到這種解釋的不充分，所以他又用另一解釋來補充：他說因為市場廣大而複雜，企業家不明白市況底究竟，——這也是經濟危機底一個原因。這裏西斯

蒙蒂所談的，彷彿是指資本主義生產底無政府性。但是生產底無政府性決不能簡化為不明白市況，因為縱然資本家明白了市況，要是資本主義還存在的話，生產底無政府性依然不會消滅的。要知道無政府性祇是上述基本矛盾之另一表现形式啊。各個別的資本家經常地擴大他底生產，不是因為他知道市場能夠銷納全部的生產品，而是因為他企圖——而且不得不企圖——把他底競敵從市場上排擠出去；不然的話，他自己就會被排擠出市場來。但這並非由於不熟悉市場的情形，乃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強迫法則使然的啊。

現在我們可以把西斯蒙蒂底危機論做出幾點結論來了。西氏底危機論是他底全部經濟學說底結論。他底危機論和他底全部經濟學說，一樣地建立在現實跟理想的對立上的。西斯蒙蒂不在現實本身中去找尋客觀的和主觀的諸因素，而企圖藉對現實之道德的作用（或影響），去修改現實。他底整個理論，連危機論在內，根本上是唯心的和主觀的；它底基礎原則是生產和消費底均衡與消費對於生產的主導作用。

同時，他底危機論是抽象的，並且自相矛盾的。他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特殊性中去找尋危機底解釋，但同時却又承認危機是純粹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底現象。這麼一來，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就被這矛盾諸表现形式之一所代替了。

然而西斯蒙蒂底危機論，却也有一些長處，是我們所不可不注意的。第一，它第一次不視危機為偶然的現象，而視之為資本主義之必然的隨伴；第二，這種危機論乃以最集中的形式給了一個對資本主義這種矛盾體系的批判；第三，它是對「和諧論」的一個猛烈的反抗，特別是對賽依底俗流的實現論的一個激烈的反抗；第四，西氏底危機論和他底全部思想，始終貫徹着對勞動大眾之深刻的同情，因而引起了俗流派和資產階級辯護派底憤恨。



## 第八章 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想

### 概說

在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完成了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奠定了俗流經濟學基礎，發生了經濟的浪漫主義（浪漫派的經濟學說）；在同一時代，又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給予布爾喬亞社會以無情的批判，並拿自己的理想去跟布爾喬亞制度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底理想却又跟西斯蒙蒂理想極端相反的。假如西斯蒙蒂底批判資本主義，其目的在於企圖將歷史的輪子往後拉轉去，——從資本主義拉回到自足自給的小生產時代去，那末空想社會主義者底批判資本主義，却是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的；換句話說，他們要把歷史推向前進，從資本主義跳到社會主義（固然他們跳越了必經的階段）。

鄔梁諾夫在將空想社會主義者和西斯蒙蒂作一對比時寫道：『西斯蒙蒂是個空想家，他把自己的願望建立在抽象的觀念上，而不建立在實在的利益上；這些作家們（指空想社會主義者——沈）

也一樣地是空想家，他們也把自己的計劃建立在抽象的觀念上。可是他們（即西氏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沈）底計劃底性質却完全不同，因為對於最近經濟的發展……他們是從極端相反的觀點去觀察的。上述諸作家們預示了將來社會的情況，天才地猜中了過去機器工業在他們眼目中所做到的「破壞」底傾向。他們所着眼的方向，正是現實發展底客觀傾向；他們實在追過了這種發展。西斯蒙蒂則與這一發展背道而馳；他底空想不是預示將來，而是恢復過去；他不向前瞻望，而只是往後回顧；因而他夢想「停止破壞」，即「停止」那些空想家底空想所由來的那種「破壞」。

在這一章中，吾人將不詳論那些大空想家底計劃本身；吾人所欲論述者只是他們對於這種「破壞」的批判。因為他們猜想這種「破壞」底傾向，並把自己的眼光注射到將來，這樣他們就賦予一切社會科學以諸種新的觀念，當然政治經濟學也被包括在內。恩格斯曾說：『德國的理論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會忘記它是站在聖西門、傅利埃和渦文這三位思想家底肩膀上的；這三位底學說儘管十分玄幻和空想，可是他們終究不失為當代偉大的賢人；他們天才地預言了無數的論綱，這些論綱底正確性現在我們都從科學上得到證明了。』（註）

這些空想社會主義底創造人，雖然正確地說中了他們親眼看到的那種「破壞」底發展傾向，可

（註）見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序言。

是資本主義底真實本性，他們却不能了解。既不了解這點，他們就不能將政治經濟學從布爾喬亞的科學轉變為潑羅列泰利亞的科學。政治經濟學之澈底的改革，即從一敵視勞工集團的科學轉變為武裝勞工集團以進行爲社會主義的鬥爭的科學：——這樣的改革，只是卡爾底不朽功績。

卡爾的資本主義批判和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底批判，並不建立在抽象觀念之上，而是以資本主義之具體的研究，以資本主義發展底經濟法則之揭露爲根據的。因此卡爾論資本主義的學說是社會主義之科學的理論根據。不過上述幾位大空想社會主義者底批判，因爲他們猜中了業已完成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底傾向，因爲他們把自己的眼光投放到將來，所以它（空想家底批判）畢竟是經濟科學發展中的重要母醇。祇是在這種觀點之下，我們才把空想社會主義看做政治經濟學史中的一派學說。

正像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一樣，跟古典學派對立的空想社會主義也適應着布爾喬亞社會發展底某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資產集團和勞工集團底社會鬥爭尙未充分發展，勞工集團還只能被看做勞動大衆中最可憐的一部分，他們只能有自發的騷動，而完全不能做改造社會的革命的鬥爭。這使某部分最有遠見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把政治經濟學抬高到相當的科學水平；同時，這又使社會主義一方面具有革命批判的性質，在另一方面具有空想的性質。因此，政治經濟學底科學性（就布爾喬亞眼界以內的限度而言）和社會主義底空想色彩，是有同一社會經濟原因的。

古典派經濟學底科學成份和空想社會主義底批判的革命成份，到後來俱被科學社會主義底創作者卡爾和弗列德利赫所改造並綜合爲一個整體了。我們在這一章中的任務是在考察空想社會主義中的寶貴成份，即能夠成爲科學社會主義底源泉之一，因而亦即成爲卡爾主義政治經濟學底源泉之一的那種成份。

## 第一節 聖西門

### 一 概述

聖西門 (Saint Simon, 1760—1825) 底創作力表現，可以分爲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他以科學改良者底資格出現的時期，第二個時期，則爲以社會改良者資格出現的時期。在第一時期，他所感到興趣的，完全是自然科學，在第二個時期則完全是社會科學。然而他底全部創作却形成爲一個整體，貫徹着同樣的觀念和意向；對於這些觀念和意向，他不斷地予以發揮、確定和具體化。聖西門雖始終忠於他底二元論（即忠於這樣的一種社會發展觀：認爲社會底發展有賴於科學底發展和經濟底發展），可是他却首先願意改良科學，要使科學走上正確的道路，藉此就創造了改造社會的決定因素之一（依據他底觀點看來）；然後他才談到直接改造社會的問題。



簡括地說，在第一個時期，聖西門把社會看做一種前提。他在自然科學中尋找着能夠演引出社會發展法則來的一種原則。這種原則他宣佈爲一般吸引律；當時他底重要著作之一，也就定名爲一般引力論（一八一三年出版）。在同一時期，他又開始寫他底人類科學綱要，該書完成於一八二五年；此書之作就表示他過渡到創作底第二時期。

從一八一三到一八二五年，聖西門底重要著作有論產業制度、新舊政治體制論、新基督教義等。在這些著作中，對於當時一切最尖銳的問題都給了確定的解釋，它們引起了許多政治行動家、甚至年輕學者們極大的注意。很多的學者和信徒都環繞在聖西門底周圍，形成了聖西門學派。

可是聖西門底作用，遠不限於他對接近他的信徒們的影響。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底影響絕對不祇及於少數研究者，他對於當代和以後全部科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之發展，給了強有力的影響。他底各種著作，被廣大的社會閱讀和研究着，並且引起了大量的出版品來。

## 二 方法和理論

首先應當着重指出，聖西門是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社會現象的。這是他底方法和理論底決定特點之一。古典學派和俗流經濟學者視布爾喬亞以前的（即前資本主義的）關係爲錯誤的邪路。他們

研究的出發點是自然秩序底觀念；而這種自然秩序，只有在布爾喬亞社會中才得實現。明白地說，他們以為只有布爾喬亞社會才是唯一的自然秩序。然在聖西門看來，奴隸制、封建制、布爾喬亞制都是人類歷史發展中一定的必經階段。

固然，聖西門還不能說出上述諸社會形態之歷史的決定性何在。他有時宣稱知識（科學）底發展為歷史過程底動力，有時則稱經濟底發展為此種動力。在解釋社會現象的時候，這位空想家是個二元論者。可是事實終究是事實：聖西門把歷史主義帶進社會科學中去，這確實給予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底發展以極大的影響。

西斯蒙蒂也曾注意到歷史過，但是他往往把過去看得太理想化了，特別對當時尚殘留着的手工業小生產和族長制的農業看得太理想化了。聖西門却不作如是觀：他更明白地闡明封建體制底積極方面，但同時他了解它底歷史的決定性（即決定於歷史條件的那種性質），並揭示了它底崩潰底不可避免性底諸原因。他認定這些原因一方面在於財富和產業家經濟力量底增加，另一方面則在於科學底發展。產業家（包括商人和銀行家在內）起來代替了封建軍閥，科學家則起而代替僧侶教士。

聖西門底歷史主義，跟政治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底「歷史主義」完全不同。歷史學派底代表們，不知道歷史方法是認識各個社會形態底特殊性和由一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形態之轉變的認識工

具。他們竭力企圖拿自己的「歷史主義」去肯定舊制度底「萬古長存」；照這一派人底意見，彷彿舊制度依然留存於新制度中，而新制度只是逐漸地由舊制度生長而成的。聖西門則不然。他，第一，指出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矛盾和階級衝突；第二，他指示了「有機」時期和「批判」時期間的區別。所謂「批判時期」不是別的，即是由一個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形態的轉型期（用聖西門底口吻來說，則爲由一個有機時期到另一有機時期的過渡期）。

聖西門底二元論，大大地貶低了他底歷史主義底價值；同樣的，他底畏懼革命，也降低了他底劃分有機時期和批判時期之區別底價值。然而我們終究不能否認聖西門氏有一個嚴重企圖或嘗試，即一方面他他把理論跟歷史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則把歷史看做通過諸種矛盾和衝突而發展的一種過程。

聖西門底歷史主義自身包含着社會羣的鬥爭。不過他只看見產業家和封建分子間的社會鬥爭；他並且常常把這種衝突解作私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衝突。他把工廠主、商人、銀行家和工人，都歸入勞動者這一範疇中去。在這位大思想家底觀念中，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底社會鬥爭是找不着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僅比西斯蒙蒂落後，而且比斯密和李嘉圖還不如。因爲斯密和李嘉圖究竟還把布爾喬亞社會看成三個社會集團所構成的社會啊。而聖西門在崇揚產業家底作用時，却把他們看做國民

經濟底領袖和指導者了。這是賽依底庸俗見解底重複。

聖西門底忽略資產者和無產者底利害衝突，一半亦由於當時法國資本主義關係底不發達。到後來，隨着資本主義底發展，聖西門對於實際的勞動者的見解，就改變了。在他最後一部著作新基督教義（作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之初）中，因為當時法國的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聖西門就以「工人階級代表」底資格出現了。

可是即在他以「工人階級代表」底資格出現，並且宣佈工人階級底解放為其最終目的時，這位大空想家依然是勞工集團跟資產集團的社會鬥爭底反對者。這裏他所發表的觀點是和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的；他們都認為工人階級底解放不是工人們自己的事情，工人們底鬥爭甚至還有害於它底解放。

聖西門拿發展觀去對抗自然秩序觀；他認定自由競爭底制度是一時的制度，它屬於他所處的批判時期。各種不同利益底競爭和爭鬥，應為生產底有組織化和每個人為一切人底幸福而工作所代替。這是理想中的「勤勞者底社會」，在這種社會內，將不再靠他人勞動而生活的坐食者。

聖西門把一切從事有益社會的工作的人，都列入「勤勞者」行伍中去；不論是勞力的也罷，勞心的也罷，在生產領域、流通領域或分配領域中做工作的也罷，——凡是從事有益社會的工作者，

聖西門都認為勤勞之人。一切有用的工作，都是社會實業底一部分。只有在新基督教義一書中，關於勞動者的問題，才解釋得比較明確。然而即在那裏，他也只把勞動者解作最困苦和最不幸的社會層而已。在這一點上，即在資本主義矛盾底理解上，聖西門實比他同時代的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和西斯蒙蒂差得多。可是他對歷史過程及其發展趨勢的理解，他對於社會現象了解底深切和廣博，却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

拿發展觀跟自然秩序觀對抗起來時，聖西門確比自然秩序觀底信徒們更深切地了解國家和社會底關係。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把國家底任務歸結於保衛自然秩序，因而他們認為沒有國家，社會即無存在之可能。聖西門天才地預見到國家完全消滅底前途；他常常說，將來國家將變成單純的生產管理和指揮機構。所以他有一句聞名的格言，說『對人的管理將為對物的管理所代替。』而對物的管理將以科學為根據，以事物之性質與關係底認識為根據。因此，聖西門又極端重視科學和學術之重大的意義。

聖西門理想中的產業制度底領導者，就是學術家和產業家。學術家根據現實之精確的研究，擬定和創製出一些原則來，而工業家則從事實現這些原則。這樣，政治變成科學的，科學又變成實踐的了。兩者都解除了形而上的色彩而變成實證的東西了。它們共同一致，為着社會全體底幸福而領

導社會。

政治和學術兩者平行地發展着；關於這種發展聖西門指出了三個階段。最初，政治直接操在軍人手裏，它是毫無遮蔽的暴力。以後它變成了法律家和政治家底專門事務，這時已減輕了暴力底作用，把暴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到第三時期，政治將變成產業家底事情，同時它就由對人的統治轉變為對事物的統治了。根據這種見解，聖西門認為法國革命底未完成處和革命後的危機底意思，在於法國革命沒有解決它自身的基本任務：政權和國家社會底領導權沒有轉入產業家之手。

跟政治發展底三階段相平行的，便是學術（科學知識）底發展。聖西門指出，在學術發展底第一階段上，學術底壟斷者是牧師和教門底代表；到後來是玄學家，後者用推理去代替信仰；到最後（第三階段）才出現真正的科學——實證主義的知識。聖西門是著名的人類理性發展三階段論之真實的首創人。這三階段是：（一）神學的，（二）玄學的（即形而上的），和（三）實證的。

這整個的歷史觀念，都是二元論的，而且是偏於唯心論的二元論傾向。就事實方面說，他底歷史觀念犯着過分簡化和公式主義的弊病。這裏我們不想對這一觀念作精密的檢討；我們只預備把那些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有積極影響的，因而亦即對政治經濟學底發展有積極影響的諸種肯定的契機（Moments），加以指出。

聖西門底觀點固與唯物史觀相距尚遠，他不曾劃分基礎和上層建築底區別，可是他却把知識（學術）政治和經濟底發展描寫成一個統一的過程——通過矛盾和衝突而發展的過程。這個統一過程底發展法則，他並未予以揭露；須知他底發展三階段論，只不過是外表現象底描寫而已，而且還是公式主義的描寫。可是他却以極大的力量堅持這一過程底統一性，始終如一地貫徹這種統一觀。

聖西門雖尚未明瞭國家底階級性，然而他已不僅指出了國家和社會底區別，而且甚至離開國家而作思考社會的嘗試（固然思考得不甚明確）。他發揮了國家消亡的觀念；說得確當些，國家融解於社會的觀念。他確定地說，在他所理想的未來的「產業體制」中，「行政權是極其微弱，或差不多等於零的」。（註一）在別處，他又把社會跟游牧隊伍做起比較來。他說在舊制度之下，游牧社會完全由少數領袖隨心所欲地指揮着：「領袖們有無限威權，游牧隊員則毫無勢力」；然在新社會制度之下，「領袖並不是主腦，而是管事」（註二）。這種國家和社會底相互關係觀，就是他底政治進化論底基礎。他認定政治的進化，必將達到以組織與指揮生產為專務的科學政治之地步。雖然在他底產業體制中還存在着君王之權，但君王事實上祇為一國之元首，而並不掌理行政之權，實際的行政

（註一）聖西門文選集（俄文版）頁一〇。

（註二）同上，頁九。

權（或管理權）那時已轉入實業家和藝術家掌握中去了。

聖西門雖是按照賽依底精神去解釋實業和生產，把物品生產解作效用底生產或提供役務，——在這點上，他比古典學派落後了一步，但同時他却也表現了一個重大的前進步驟：他不視科學、藝術和其他各種意識形態為獨立自在的價值，而祇是一些鞏固和膠結產業體制的因素。他把學者、伶人、音樂家等都包括到產業軍裏去；這麼一來，他就把這些人降為跟其他勞動大眾同等級的人了。他根本不承認為科學的科學，為藝術的藝術；不論科學或藝術，在他看來都是產業底類型，都應當服從產業，為產業所役使，受產業底任務和目的之支配。這樣看來，依照聖西門底產業制度觀，事實上的社會指揮權應當操在產業家手裏，學者祇是產業家底顧問和報酬優厚的僱員而已。

最後尚須指出一點，即聖西門予政治經濟學以重大的意義。他寫道：『在斯密以前，政治經濟學尚處於幼年時代之狀態，它曾被視為輔助政府的工具，且與政治相混合的；到後來它日益強大，它就具有較為明白和確定的性質，自己宣佈脫離政治而獨立。再加以不多的勇氣，再加以不多的哲學的陶冶，政治經濟學就馬上要取得它自己的真實地位了：最初，它依靠着政治，以後政治將依靠於它，說得確實些，它本身將包括全部政治了。這個時期已不遠了。』（註）



### 三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聖西門

根據科學的社會思想做出發點，我們應當肯定聖西門是個空想社會主義者。但是現在要問：究竟他底社會主義表現在何處呢？從前面所述及的聖西門底理想「產業制度」（或「產業體制」）看來，他只把實業家——工廠主、商人、銀行家、農業者等人底意義估計得首屈一指的重大，試問有什麼社會主義可言呢？在聖西門底論述中，祇講到資本底利潤；他認定每一個人底收入是與所消費的勞動和所投入的資本相適應的。此外，聖西門又往往把利潤和工資混為一談。在他底「產業體制」中，並不要求私有財產制度消滅，他明明特別重視產業家（資本家）而且主張將國家社會底管理權交給產業家執掌。那末還談得到什麼社會主義呢？

現代好些社會主義的學者，如華爾根（V. P. Wolgin）、弗列德亮（T. Fridlyand）等，便是堅定否認聖西門為社會主義者的。華爾根說聖西門底產業制度可以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底理想；弗列德亮則謂聖西門是「科學資本主義」體制底創建人。弗氏說：『他不是想改造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想組織它』（註）。至於社會民主派理論家，如愛克斯坦、古諾夫等人，則簡直把聖西門看做孟却

（註）見弗氏著實業主義的理想家——聖西門一文，原文刊載一九二五年卡爾主義旗下雜誌第十期。

斯德的實業家了！古諾夫並且完全否認了他底創造才幹（註一）。

但是我們要反過來問：爲什麼科學社會主義建樹者卡爾、弗列德利赫和鄔梁諾夫，都一致肯定聖西門爲空想派社會主義者之一大代表呢？卡爾曾說過：『在聖西門最後的一部著作新基督敎義（*Nouveau Christianisme*）中，他坦白地以勞工階級代表底資格出來講話，並宣佈自己志趨底最後目的在於謀勞工階級底解放』（註二）。而謀勞工階級底解放却是社會主義者底任務。聖西門所主張和擁護的，不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也不是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而是有組織的勞動。他反對社會勞動之分散爲各個別的單位（即如商品社會中的狀況）。他底產業體制實際上是勞動組織的體制；而領導這一體制的，他認爲就是會組織勞動的人，即大企業家。關於後一點，他底見解是錯誤了；因爲他不了解企業家只會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組織勞動，而不把他們看做資本家而把他們看做單純的生產組織者了。

聖西門沒有正確地理解資本主義關係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實質。卡爾曾寫道：『資本家之成

（註一）請參閱古諾夫著，卡爾主義的社會史與國家論（*Umwelt Die Marxische 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 und Staatstheorie*）。

（註二）請參閱羅蘇貝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二八。

爲資本家，不是因爲他管理着工業企業；相反的，因爲他是資本家，他才成爲工業生產底管理者或領導者。』(註) 聖西門底看法却不然，在他以爲資本家之爲資本家，正因爲他管理着工業企業，所以資本家底利得是他底高級熟練勞動之自然的報酬。

的確，在聖西門時代的法國，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這樣高度的發展；即管理企業的職能與佔取剩餘價值的「職能」之分立，成爲極普遍的現象的那種高度；相反的，當時法國的普遍情形還是企業底所有者同時就是企業的管理者。當時現實的情形確是如此：資本家和企業底管理者是分不開的。因此就發生出這樣一種幻想來：彷彿資本家也是勞動者，而且是最熟練的勞動者。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就是聖西門把空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連結在一塊：他一方面因爲是暴力革命底反對者，所以信賴富人階級底理性和善良行爲，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爲要吸引這些富人階級到社會主義方面來，就需要別種誘餌——物質的利益。因此他不主張消滅私產權；在他底產業體制中，企業家不僅得受與他底勞動相適應的報償，而且也可得到與他所投的資本相適應的報償。不過有一點應當特別指出的，即聖西門認爲不論勞動或資本，都是由一個社團（以社團中所挑選出來的委員會爲代表）來指揮的。他認爲不是一切人都能指揮生產的，只最有才幹和最有經驗的實業家，

(註) 見資本論卷一，第十一章論協作。

才能負擔這種工作；因而他認定只有在大企業家中間，可以找到這樣的人才。

但是我們要問：在生產手段、社會領導權和國家政權都操在資本家掌握中的社會裏，有冇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可能的。假如聖西門理想中的產業體制真被實現的話，那時實際上必然變成資本主義而決非社會主義，這是毫無爭議的。然而問題並不在此；我們不能把一件事跟另一件事混同起來。這裏所探討的是聖西門學說之思想的內容，即他所企圖達到的理想：他想調整資本主義呢，抑或空想地爲社會主義而奮鬥。

聖西門不但把他底社會主義披上一件布爾喬亞的外衣，正如重農學派把他們底布爾喬亞體制披上一件封建外衣的情形一樣，而且在他底社會主義理想中，還包含着不少資本主義的原素。然而這些原素並不成爲他底思想體系底實質；他底中心觀念，除社會主義外，實不能給予別的稱呼。但是這種觀念，第一，時常被寄生着許多的雜草；第二，它經常地跟別種觀念交編而存；這別種觀念，我無妨稱之爲反封建的，它們不常掩蔽了他底社會主義觀念。弗列德利赫曾說過：『聖西門堪稱爲法國大革命底產兒……在聖西門底頭腦中，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底對立，被了解爲「工人」和「有閒者」之對立。……而他所謂「工人」，不僅是指僱用工人，而且也指廠主、商人、銀行家等

一般地說，聖西門底思想是彎彎曲曲地進行着的，可是它向着一定的方向進行着：向着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着。他底創作經過了多次的改變，可是他底創作活動從頭到尾始終是社會主義的。他底創作，始於以不確定的、含混籠統的人類底名義出面，而終於以「勞工階級底名義」出面而發表言論。但是他底志向底最終目的，却愈到後來愈見明確，比他頭幾次的社會主義體制底描述，更爲明確。這一最終目的，終於以解放勞工階級之主張底形式表現出來了。

## 第二節 聖西門學派

前而已經說過，當聖西門在世的時候，他底周圍曾經有過許多的學者，他們都是他底信徒。他死了之後，他底信徒們日漸增加起來；並爲宣傳新學說和吸收新信徒起見，他們就發行一雜誌，定名爲「生產者」(“Le Producteur”)。雜誌雖因經濟支拙、定戶稀少而不久停刊，但新學說底宣傳，却仍繼續進行不止；起初，每個聖西門派努力單獨地吸收信徒；以後則從事公開的講演；在那些講演中，他們不但有系統地闡明他們先生底學說，而且還發展了這種學說。後來把許多次演講彙集起來(均一八二九年所發表之演詞)刊印一冊，名爲聖西門學說解釋，全書包括十七篇演講稿。

(註)見反杜林論，頁一八五。

這部演講集是十九世紀初葉一部優良的社會主義論集，它表現着聖西門學說發展中的一大進步。有些人對這一點加以誇大而在聖西門和他底學生中間開闢出一條鴻溝來；以爲該演講集中的社會主義成份，都只屬於聖西門底學生們的。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對的。倒是聖西門主義者自身底見解正確的，他們稱自己的集體作品爲聖西門學說解釋，這並非無因的；因爲他們自認並未創造新的學說，祇是完成和加深他們先生底學說而已。

確然，學生們底社會主義觀念，要比先生的原則上更堅定些，這是沒有問題的。他們主張藉廢置遺產權的辦法以消滅私有財產權。我們當然不能夠輕視這一主張底嚴正意義，可是這種主張祇是聖西門觀念底繼續發展，尤其是他底社會勞動組織觀底繼續發展。正因這種觀念底繼續發展，使聖西門學派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的主張來：他們了解，在私有財產制保持着的情形之下，有計劃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無政府性底消滅是不可能的。這種了解，當然是他們底一大功績。

可是學生們和先生底主導原則，却是一致的：即社會組織——社會之經濟的，知識的和道德的生活之組織——底原則。這也正是聖西門本人底基本原則。但是我們可以說，聖西門師生們所共同的基本觀念，在其發展過程中發生了相當的變遷：在聖西門初次的計劃中，只是組織社會，與現存的生產無政府性做鬥爭，力圖儘快地結束批判時期；到後來，直到他晚年的時候，解放勞工階級的

思想才特別顯著起來，並且在他底觀念體系中才佔有重大的地位。然而在聖西門學派底觀念中（固然大體上是跟他們底先生一致的），組織社會底理想一開始就明白而確定地包含着勞工階級解放底思想。這是因為他們是從他們先生底結束之處開始的緣故啊。

他們比較堅定和自信地站在社會主義底立場，並且堅定地領悟聖西門底歷史主義；他們——聖西門學說解釋底作者們，給予私有財產制以精彩的批判。他們已不祇攻擊封建的私有權（他們底先生却主要地祇攻擊這一種），而且也攻擊到資本主義的私有權。該論文集集中寫道：『財產（即私有權——沈），從這個詞底最平常的意念上講，乃由不作爲直接消費之用而在現時給吾人以取得收入之權利的那些財富所構成的。照這點意思來說，它就應包括土地和資本，用經濟學者底口吻來講，即生產基金。』（註）在如此給私有權以解說之後，他們就開始全面地攻擊私有權。在他們看來，私有者就是「生產基金」底分配者。但是，第一，這些分配者對於他們自己所盡的職務，取得太多的報酬。第二，他們把這種「生產基金」分配得太不妥當；在各個區域間，各個生產部門間和各個企業家間，都分配得極不妥當。照聖西門派底意見，「生產基金」底分配，應當適應以下的幾個需要：（一）勞動工具（照他們底意見，土地和資本是屬於勞動工具的——沈）應按照每一地方和每

（註）參閱華爾根編現代社會主義之前驅，一九二三年俄文版，頁一一一九。

一工業部門底要求，作有比例的分配；（二）應按個人的能力來分配這些勞動工具；（三）應把生產組織得這樣：使得它底任何部門永不感覺不足或過多。他們認為只有在未來社會中，有確當地分配勞動工具之可能，因為在那種社會中，分配底職務係由社會機關所執行；這種社會機關是一切生產工具底保存者；它領導着全部的物質生產。

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指出的，即聖西門派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財產。當時有些經濟學者肯定「財產為社會秩序底基礎」，而聖西門主義者寫道：「我們也認為財產是社會秩序底物質基礎，然而我們對於政治組織的見解是完全跟當今流行的學說相反的……問題是在「財產」這個偉大的字在每一歷史時期是各不相同的事物，它在人類底思想中引起了不同的概念……」（註）。聖西門派接着就舉出古代社會的財產（以奴隸為其主要形式）和封建社會的財產（表現於封土的權利）之區別為例，以說明之。

聖西門學派在財產底分析中所持的歷史主義，尚不限於各個時代各種私產形式底指出；更重要的是他們認定上述不同的私產形式是歷史地必然的（historically necessary），因為它們都適應着社會底需要的。這樣他們就說明了為何像亞歷斯多德這樣的大思想家會那麼熱烈地擁護奴隸制。在



未來社會中，私產是應當消滅的，因為它不祇是多餘的，而且成爲生產解體和生產無政府性底根本原因了。

但是在聖西門主義者底觀念中，却也有不少的漏洞和不安當處。他們認爲奴隸制，諸侯的封土制，是從掠奪和戰爭中產生的，那時的社會沒有戰爭便不能存在。聖西門學說解說底作者們不了解：『私有財產底制度必存在於掠奪者有可能佔有他人財產以前，因而暴力祇能將財產從一個人底手轉移到別個人底手，而決不能產生私有財產本身。』(註)

假使說，在解釋古代和封建的私有權時，聖西門主義者不會超過著名的暴力論一步，那末對於布爾喬亞私有權他們簡直完全不予解釋。在他們底意念中，布爾喬亞私有權祇是過去各種私產形式底「後裔」。對於布爾喬亞的財產，他們不復用歷史的眼光去解釋了。同樣的，他們也就不用歷史的觀點去解釋由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布爾喬亞諸關係。他們因不了解資本主義底歷史使命，所以他們只看見布爾喬亞私有權底否定方面，而這種私有權他們認爲應當消滅的。消滅私產以後，社會便由他們所處的批判時期走入組織時期了。聖西門主義者既不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性（它在歷史上跟古代和封建的生產方式一樣地有根據的），因而他們不能正確地批判當時的經濟

(註)弗列德利赫著，反社林論，頁一五〇。

學者，縱然他們對於政治經濟學底問題理解得比聖西門本人清楚些。聖西門學派只知駁斥當時經濟學者底理論，只關心某種經濟理論之社會政治的結論，而對於經濟理論本身他們却不感覺興趣。講到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底級差地租論 (theory of differential rent)，他們就憤慨起來，指斥這是鞏固貴顯有閒階級之政權的理論；在那種爲貴顯有閒階級所統治的社會政治組織內，一部分人是靠另一部分人底血汗來生活的。這種地租論，他們認爲就是那種社會政治組織底理論根據。

聖西門學派也沒有略過危險問題不談。他們認爲危機是無限制的競爭之結果。這裏，他們底觀點與西斯蒙蒂一樣：以爲在無限制競爭的局面之下，工業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對於無限制競爭如何促成危機的問題，却不加深究，不作進一步的分析；他們離開了理論探討底道路，而即行開始駁斥那種袒護無限制競爭的理論了。該論文集中寫道：『一切由這一教義（即主張無限制競爭之論綱——沈）所發生的理論，必然地建立於敵視感覺之上。然而人類却不應當永遠地互相戰鬥，而應當和平地生活着；不應當互相傷害，而應當互相幫助。』(註)

聖西門學派視布爾喬亞私產爲過去的私產形式底「後裔」；同樣的，他們又視資本主義的競爭爲過去的掠奪和戰爭底「後裔」。但是在聖西門派關於工業危機和產生它們的競爭的論斷中，有一

(註) 參閱羅森貝格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三四。

點極重要的，就是他們把這些現象歸根結蒂地都歸結於私有財產。不論是危機或是競爭，其根本原因均在私有財產制。這一觀點却比西斯蒙蒂前進了一步，因為後者並不主張剷滅私有財產而只主張限制競爭而已。

再要講到聖西門學說解說底作者們關於信用和銀行的論斷。對於這個問題他們特別感到興趣，因為他們看出信用和銀行已經是某種新的事物；未來的實業體系組織底萌芽。該論文集中有這麼一句話：『建立這一實業部門（指銀行——沈）顯然是走向秩序的第一步。』確定銀行底組織作用和銀行在未來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這種觀念是由聖西門創始的。聖西門寫道：『產業底組織乃藉銀行底建立而完成；銀行把一切產業部門連繫起來，給予產業資本以這種或那種政治的應用。』（註）梁諾夫亦特別重視聖西門關於銀行在社會主義社會組織中的作用的見解，他認為這種見解是一種「天才的預測」。

聖西門底信徒們把聖西門底這一觀念發揮成爲整個的理論。說銀行在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中應起着重大的作用，——這種觀念絕對地是特創的獨具隻眼的觀念。但同時也不能忽略了它底相反方面：即這種見解過分地估計了信用和銀行底意義，彷彿有點近乎弗列德利赫所稱的「信用幻想」派。

（註）參閱一九二三年聖西門選集，頁一四六。

現在讓我們把聖西門學派本身的情形及其學術活動，做出一個簡括的總結來吧。聖西門學派不僅研究和宣揚他們先生底學說，而且還力圖實現這種學說。可是在理論領域內，他們固然獲得了相當的成績，繼續發展了聖西門底學說，而在實際的行動上，他們却只顯露了聖西門主義底弱的和有害的方面。隨着該學派之轉變為一教門，甚至轉變為一新的教會，聖西門主義之神祕的和宗教的原素，就被提到首屈一指的地位上了。該學派底領袖有安仿頓（Anfanten, 1796—1864）和巴沙爾（Bazar, 1791—1832）。這兩位堪稱為這個新教會底「兩位一體的」神父。

在該學派組織上起重大作用者，還有一位叫羅德利哈特（Rodrihard）的，是聖西門底最忠實的信徒之一。羅氏底專長本是數學，可是關於信用和銀行底各種問題他寫了很多東西。話雖如此，該學派之理論主腦却是安仿頓和巴沙爾。安仿頓留給我們不少的作品，其中有一種叫做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可是安氏大半迷惑於聖西門主義底神祕方面和宗教方面，而他底行動則特別表現得像一個教會底神父，因而每被人呼為「安仿頓神父」。另一位聖西門學派底領袖是巴沙爾。巴氏之加入該學派，已在聖西門死了之後；他過去有過很大的革命功績，是法國卡蓬那里社（French Society of Carbonari 1810年）底首創人之一，該社之任務在於推翻路易十八。巴沙爾在這一時期的活

動，結束於他底參加科爾摩（Colmort）和培爾福（Belfort）的暴動（一八二五年），他就因此而被判處死刑。自巴沙爾成爲聖西門主義者時起，他就由一政治的陰謀家和布爾喬亞共和國的奮鬥者轉變爲和平的社會主義者了。在聖西門學說底理論部分底探討和發展中，主要的功績便屬於他。同時他又是聖西門學會底主要講師，他將聖西門底見解和觀點整理成爲一嚴密的體系。在被他所發展和加深的聖西門主義中，他找到了下列一問題底解答：法蘭西革命底口號——平等、博愛和自由——如何跟現存的私有財產制相調和呢？巴沙爾對這個問題的答復是否定的，因而他就成爲廢除私有財產制底積極主張者了。

### 第三節 傅利埃

#### 一 概述

傅利埃主義和聖西門主義是兩個嫡親兄弟。它們產生於同一時代，同一國家和同一社會政治與經濟條件之下；可以說是同一樹幹底兩條枝椏，這個樹幹便是空想社會主義。然而這條枝椏却也有不少的區別；每一枝各有其特殊的徵質。它們對於社會和經濟思想底發展，對於社會主義底發展，亦各有其不同的影響。關於聖傅二人學說底比較，弗列德利赫曾作如下的估計：

「假如說聖西門見解底英明廣大，容許他抓住差不多一切晚近社會主義觀念底萌芽……，那末傅利埃却給吾人以深刻的現存社會制度之批判，而且這種批判還是用純法國式的智才表現着的。他抓住了革命前資產階級之鼓勵的預言家和現時資產階級所買收的奴才們底說話。他無情地揭露了布爾喬亞世界之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貧乏，並把它跟光明燦爛的諾言——說理性、文明和人人幸福底世界，以及人類無窮的進化行將到來的那種諾言，——作一比較；他指示出何等渺小的現實配合着當時布爾喬亞思想家之誇大的贊揚的演說，並表達出他對於這種言論底最後失敗的全部譏刺。」（註）

傅利埃（Francois Fourier, 1772—1837）底批判，不祇具有社會政治的性質，亦且具有經濟的性質。雖然嚴格地說，傅利埃也不是個經濟學者，雖然他底觀念裏充滿着各種的空想，可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注意集中於未來社會底經濟組織，並將它跟現代社會對立起來。他明確而冷酷地揭露了現代社會之經濟的不穩固性。傅氏對現存經濟關係之更深刻的和全面的批判，促使他實證主義地去探討許多的經濟問題——技術專門化和分工的問題，城市與鄉村對立的問題，生產和分配的問題等等。

傅利埃主義中包括着幾種成分，主要地是對現制度的批判和對關於未來社會的幻想。對於政治經濟學史有直接意義的是傅利埃學說中的批判部分。不過其他的部分我們也得加以探討，因為不然就無以了解他底學說底全部價值。而且對於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包括社會主義經濟之理論的研究在內的政治經濟學，詳細探討未來社會之經濟結構的那部分傅利埃學說，亦是有重大意義的。

傅利埃學說中的空想主義成份（甚至玄幻的成份）跟現實主義的成份交編着。這些成份及其批判的估量，對於社會主義底政治經濟學有重大的意義。固然社會主義底政治經濟學只能在社會主義的現實（如今日之蘇聯）中，在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基礎上，才能暢順地發展起來，但是為要明瞭科學社會主義實現底原因，則考察傅利埃的空想社會主義底現實主義成份，是頗有必要的。

傅利埃底空想主義，跟別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不祇在於他幻想靠「良善的」資本家或慈善的有產者來實現他所理想的社團或協會（*association*）那一點；空想主義底基本實質在於他企圖循和平的途徑以達到社會底根本改造，而且以為只有循和平的途徑可以達到。既然社會主義必須取和平的途徑而實現，那末自然談不到「剝奪資本家」了。

還要指出一點，即傅利埃底社團底結構本身和它底經濟基礎，跟科學社會主義毫無相同之點。他底社團由許許多多小規模獨立的經濟單位（稱為「集隊」[*phalanx*]）組合而成。社團底組織原

則是完全的分權制，幾乎與無政府主義相仿；它底經濟基礎是農業；工業僅被視為輔助農業的行業。在這點上講，傅利埃主義還比聖西門主義落後一大步，因為聖西門主義是以進步的、高度有組織的工業（或實業）為出發點的。弗列德利赫說得對，他說：「傅利埃——好似重農學者一樣，也視農業勞動至少是最優良的勞動類型；同時，相反的，聖西門則認為工業勞動是財富底實質，而且只願望實業家單獨的統治和工人們境况底改善。」（註）

雖然如此，傅利埃底未來社團說，直到眼前却仍未失去它底意義。例如分若干集團或隊伍的勞動組織，按照工作人員底心向或性情的勞動組織；各個集隊中供給公共伙食和日常生活需要的組織；按照社團基本原則之精神以實施兒童教育與訓練；實行婦女底澈底解放；將勞動由困苦的重担變為人人願幹愛幹的愉快的事業；最後是實行競賽制。所有這一切理想的原則，直到今日仍一一保留它們的實際意義。它們已在社會主義的蘇聯，一一實現出來，——祇是被批判地改造過了之後才實現出來的。

## 二 方法



在方法論上，傅利埃底立場跟他嚴厲批判的經濟學者（主要的是指古典學派）一樣，他和他們都以人類底本性爲出發點，並認定這種本性是永遠如此的。

這種固定不變的人類底本性，是傅氏底情慾論（Theory of passion）底基礎，而後者又是他底全部思想「建築物」之基礎（指方法論方面）。傅利埃歷述人類底情慾有十三種，都是人類本性之自然的、永久的屬性或品質（attribute）。在他寫述某種情慾的時候，他常常懷着情慾爲上帝所賦予的那種思想；這就是說，他認爲情慾不是歷史發展底產物。

傅氏曾竭力攻擊道學先生們主張壓制情慾的思想。他寫道：『一切被稱爲義務或責任的哲學幻想，跟人類本性毫無相似之點；義務發生於人類，慾望發生於上帝；因此，誰想知道上帝底意願，必須研究慾望，本性自身而完全撇開它跟義務的一切關係；因爲義務觀念是一世紀與一世紀都不相同的，而情慾底本性則任何民族都永遠不變。』（註）

這樣傅利埃認定義務觀念是每世紀不同的；他認爲義務和道德是人工的現象，它跟自然現象的情慾相對立。因此，他底歷史主義只應用於人工、痛苦的現象，只應用於否定的因素。照傅利埃底意見，歷史過程底意思在於使自然的和正常的免除非自然的和非正常的影響。可以說，傅利埃歷史

（註）見俄文傅利埃文選集，頁三四。

主義是否定性的、消極的；它不應用於證實原理（他認為那些原理是不發展的）而只用於否定的消極的原理：各種制度和各種道德形式在不斷地改變着。依照這種觀點，歷史主義並非別的，祇是自然現象為解除人工現象影響的鬥爭過程觀。這樣的歷史主義也是重農學派，亞丹·斯密等人所承認的。在所有這些思想家看來，自然秩序（即人類本性說底另一表述）跟人工創造的制度和人工施行的不正確的政策、危害自然秩序的政策，進行着不斷的鬥爭。這就是說，自然秩序不變性底肯定者，承認人工創作的東西是有歷史性的。

照傅利埃底意思，人類底本性向來就被歪曲着的；它被人工的條件阻止着，不能按照它內在的情緒自由地表現出來，因而就採取歪曲的形式。只有在未來的理想的「社團」內，情緒纔能獲得充分的自由表現的機會。傅氏確認「社團」是人類唯一的社會組織。人類一產生就和諧的，而且是為和諧而產生的（上帝所創造）。人之情緒相互間有一定的適應關係，處於一定和諧狀況中；它們是分着許多組或系列而作用的。

在文明社會中，這類系列並無一定的秩序與形式，因此情緒所能賜予這一社會的，只是混亂。假若說當時的經濟學者認為布爾喬亞秩序就是自然秩序——發生於人類本性的秩序，那末傅利埃却相反，他雖稱布爾喬亞社會為文明，却認為這種社會秩序是不自然的。照他底意見，只有當現代的

文明被新的傅利埃主義的和諧組織所替代時，自然秩序纔算實現。

由上所述，可知傅利埃跟他所批判的經濟學者雖有許多見解分歧之點，他們底方法論還是同一的。必須揭發人類本性並適應此本性之要求以改造社會關係。依照那些經濟學者底解說，人類底本性要求各個生產者之間生產底分散和自由競爭；而依照傅利埃底解說，則相反的，它要求組織成爲生產的社團而消滅自由競爭，因爲只有在這樣的組織中，情慾不僅自由地和正常地表現出來，而且又變成凝固和調節全部社會生活的力量了。

那末歷史底作用何在呢？它是否替新的社會組織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傅氏底形而上的人性觀跟他底辯證法的人類歷史觀交編着。弗列德利赫寫道：「傅利埃對人類社會歷史的見解，是高於一切的。他把歷史底全部過程劃分爲四個發展階段：野蠻狀況，半開化狀況，族長社會和文明社會……」。他指出了不可克服的和永遠新生着的諸種矛盾底「迷魂陣」；文明就在這迷魂陣中運動着；所以它常常達到跟它所企圖達到的相反的結果。例如他說，「在文明社會中，貧乏是過剩本身所產生的。」很明顯的，傅利埃也和他底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地精通辯證法。依據同一辯證法的觀點，他確定說，那怕當時流行着人類有不斷進步之無限能力的理論，不但每一個歷史階段各有其發達和衰落的時期，而且人類全體歸根結蒂亦必趨於消亡。傅利埃底這一觀念，在歷史科學中所佔的地

位，是跟康德底地球必歸毀滅的觀念在自然科學中所佔的地位一樣的。」（註）

思想家的傅利埃，以天才的眼光觀察人類所經過的歷史道路，實堪稱爲一位辯證法家；但是空想家的傅利埃，不從矛盾本身底發展中，不從社會鬥爭中，而從偉人底發見中去尋找文明社會矛盾底解決途徑，——這裏他又變成一個形而上學者了。其所以如是者，根本原因還在於那時資產集團和勞工集團間的社會鬥爭尚未充分發展。他以天才的眼光指出「文明」祇是過渡到其高無匹的社會形態的一個歷史階段。這是辯證法指示他這樣說的，可是因爲他看不見那種能夠實現這種變革的實在力量，於是他又陷於烏托邦（空想），這是使他走入形而上的邪路的原因。

在傅利埃底理論體系中，不僅形而上跟辯證法的觀點和平共居着，而且還有唯物論跟唯心論的成分一樣地和平共居着。傅氏寫道：『從我們走進文明底第三階段以來，總共祇過去一世紀；可是在這短時期內，由於實業底巨大進步，這一階段進行得異常地快，現在這個第三階段已經達到了它底自然的限界了。我們有太多的物質材料，而經濟的發展水平則未達到充分發展的高度；這些材料固找不着自然的應用之途，致使社會機體擔負過重而形成了此機體失調的原因。由此也就發生了根本動搖全部社會機體的騷亂；發現了衰疲之有害的徵候、朕兆，而此種衰疲底徵兆是由於實業資料

（註）弗列德利赫著，反杜林論。

和應用這些實業資料的太低的發展水平二者不相適應的結果。對於我們落後的第三階段而言，實業發展得太強了；它需要一第四階段了。『(註一)』

觀乎這段文字，可知傅利埃底觀念尙未明確；例如他用這樣的表述方式，如「這些材料……使社會機體擔負過重」或「實業資料和應用這些資料的發展水平二者不相適應」等。但在上面一段引證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傅利埃已接近於唯物的歷史觀；因為第一，他拿產業發展作爲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第二，他已能認識生產力（「實業資料」）跟生產關係或生產條件底發展階段的衝突（「跟應用這些實業資料的那種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然而傅氏這種本能的（不知不覺的）接近唯物史觀的觀點，却被淹沒在唯心論底大海中了。傅氏寫道：『文明是人類特有的病痛，好像小孩出牙一樣；這種病痛已延長了二千五百年之久，這都是疏忽的和傲慢的詭辯學者底過失，因爲那些詭辯學者不願意研究聯合和吸引；野蠻、族長制、半開化，和文明這四個時期，只是達到那種成爲人類之真實意向的社會制度的途程上的幾個階段；而且在這種制度以外，那怕最賢良的執政者也醫治不了人民底痛苦。』(註二)

這一段話底腔調已經是另一種了。第一，在他看來；文明只是一種病痛；第二，這種病痛之所

一 傅利埃文選集或羅森貝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四九。

以如此久長，是「疏忽的和傲慢的詭辯學者不願意研究聯合和吸引」的緣故。第三，是前二點底產物，社團制度底到臨，乃因它適應着人類的本性，即趨向健全的本性。

這樣，在傅利埃底學說中，唯物論的幼芽是跟極端的唯心論交編着的。

當我們檢討傅利埃底方法時，我們還應當指出它底主觀主義方面。傅氏方法上的主觀主義不僅在於他把存在的跟願望相比較，他不從現實本身中尋找改造現實的要素，而想拿烏托邦去代替它。他底主觀主義亦且表現於他底「內心經驗」使他陷於偏面的觀察，常常阻止着他深入現象底本質。

他底商業經驗和對商業的厭惡，產生了他底偏面的反重商主義傾向。他底極端注意的資本主義商業底研究，對於他並不是檢討資本主義某一方面的專論，而是對整個資本主義的批判方法。假若說重商主義者視流通商業，為財富之泉源，則傅利埃視商業幾乎為資本主義財富底一切禍害底淵源。再假若說重商主義者底功績之一在於他們把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則傅利埃却比重農學派退了一步：他又把研究轉移到流通領域中去了。重商主義者將商業置於第一位，是有客觀根據的，因為那時商業資本在社會經濟底發展中演着優越的作用。傅利埃却沒有這樣的客觀根據

（註二）傅利埃發揮這樣一種思想，說牛頓的一般引力說應用於社會時，就採取情慾吸引律底形式。傅氏和聖西門同以牛頓的引力法則為出發點，可是在後他們二人底見解却分道揚鑣了。

了；他底注重商業，完全由於一種主觀主義的因素。

固然傅利埃也有許多地方着重地說到生產底特質問題，例如當他對哲學家說話時，他說：「哲學家們呀，那怕你們怎樣努力地在圖書堆裏找尋人類的幸福，可是在一切社會災禍底主因——生產底零散或勞動底不相適應——沒有根本剷除以前，這種努力都是徒然的……」（註）。我們也不否認，傅氏底學說體系整個地說，也以組織生產而不以爭取商業勝利為任務的。然而這正足以證明傅利埃的方法底矛盾性。前面已經指明，在傅氏底思想中，辯證法跟形而上的觀點和平共居着，唯物論跟唯心論，實在論跟浪漫主義、空想主義，也和平共居着。同樣的，生產的觀點跟重商業的觀點也在他底理論體系中和平共居着。

在傅利埃底時代，由於資產集團和勞工集團間的社會鬥爭尚未充分發達，使傅氏沒有可能看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之本質來；在另一方面，他底「內心經驗」則逼迫着他在工業家和商人的鬥爭中看出資本主義（即指文明底第三階段）矛盾底實質來。不過他跟聖西門一樣，把工廠主和工人都歸入「工業家」（或「產業家」）之列了。

（註）傅利埃文選集或羅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五一。

### 三 文明底批判

傅利埃對於文明底第三階段——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在一個廣大的歷史基礎之上進行着，開展着的，而且它又跟他底天才的歷史觀念密切地連繫着。在他看來，布爾喬亞社會只是人類發展歷史中的一個階段。他完全駁斥了當時經濟學者所肯定的布爾喬亞關係底自然性和永久性的假設。他根據自己關於上帝的習慣見解，證明這樣的假設是跟那種習見相抵觸的。

這樣，他認定布爾喬亞的社會關係是歷史地暫時的——這一認識，在方法論上有很重大的意義。固然，他是根據布爾喬亞關係與上帝所創造的人類本性不相適應這一點，演繹出它底暫時性來的；正因如此，所以傅利埃把人類底本性看做出發點和最高原則了。

可是第一，傅利埃把人類本性觀要比當代的經濟學者（主要的指古典學派）底同一人性觀，內容豐富得多，充實得多。當代的經濟學者把資產者底本性絕對化了；他們提出了自己特創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把它看做人種底理想類型了。傅利埃則了解資產者和資產社會關係底全部限制性（狹窄性），把這種社會關係跟理想的社團關係對立起來。

第二，我們已經說過，傅利埃把形而上和辯證法的觀點結合在一塊。他形而上地解釋人的本性，同時又辯證地理解歷史過程，把後者解做不斷轉變的許多階段和由一個時期或階段到另一時期



或階段的許多次轉變之過程。

傅氏認爲他那時代的社會狀態，便是這許多階段之一；他稱之爲「文明底第三階段」。那末這個階段底特點何在呢？他寫道：『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是最後的科學妄想，它是狂熱於不用任何方法，沒有勞動報酬底一定比率、對於生產者或工人沒有任何保障以生產一切的一種妄想！；我們知道，工業國家底窮人，並不少於、也許還多於沒有工業的國家。』（註一）

對於資本主義底這些缺點，西斯蒙蒂已曾予以指出。西氏曾將資本主義底矛盾歸結於生產和消費底矛盾。傅利埃不同意這種見解。他發問道：『難道說，機體（指現代社會之機體——沈）底缺點只限於消費不足一端嗎？』（註二）

那末傅利埃底結論如何呢？他說：『工業主義促成了更昭著的現象——個人和集體利益底衝突。每一工作都是羣衆底仇敵，因爲後者底利益跟他個人的利益相衝突。醫生希望生病的人愈多愈好；檢察官則希望家家戶戶都有訟案。建築家在那裏夢想焚毀半個城市的大火災；配玻璃匠盼望下一陣大冰雹把屋上的玻璃都打得粉碎。假如大家都得到了惡劣的衣料和不結實的皮革，這樣他們底衣履就加倍快地破壞，——於是成衣匠和皮匠就高興極了。——由此可知，在文明社會內，每一個

（註一）與（註二）羅著，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一五三。

人都對集體處於經常的戰鬥狀態中；在反社會的、工業主義的社會組織內，我們也期望不到別的結果。』(註)

在這一段關於所謂「最昭著的現象」之尖利的描寫中，傅利埃已經提供了文明社會(即資本主義)矛盾底總結。這些矛盾就發生於「反社會的工業主義組織」，而後者自身則又被生產底零散性(或散漫性)所決定。這裏證明傅利埃比西斯蒙蒂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底特點；因為比較和估量資本主義所需的標度，他不像西斯蒙蒂那樣地求之於過去，而求之於將來，傅利埃底理想，也不像經濟浪漫主義者那樣地寄託於小生產，而寄託於有組織的、聯合成爲一個社團的大規模生產。

傅利埃從工業底零散性又得出缺乏比率、工業危機、商人底統治和工人境况底惡化等結果來，實際上它們中間是不相調協的，須知工業底零散性在文明底頭兩個階段上也存在着的，可是當時却沒有危機和其他傅利埃所描述的諸現象。因此，問題底要點不在工業底零散性本身，而在這種零散性在文明底第三階段上所具的特殊性，簡言之，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殊性。傅利埃尚未了解到這一點，所以他底批判有時深入到現象底本質，有時又脫離現象底本質，而僅就社會表面上所呈現的現象加以描寫——即就流通領域內，商業領域內的表面現象，加以描寫。

在觀察和描寫現象的時候，傅利埃既不用資產者的眼光，亦不用小資產者的眼光；鼓舞起他底興趣的，既非現在亦非過去，而是將來；後者浮現在他底意念中，作爲他描寫和批判文明的前提。

在他對文明社會的描寫中，不僅精確而奇特地指明了這種社會底疾病（或禍害罪惡），而且還揭露到這種疾病底根源。照傅利埃底意見，一切疾病或禍患底淵源，是工業底零散性，後者又決定了個人和集體利益底矛盾。從這一觀點出發，他乃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底問題。

把布爾喬亞關係看做絕對化的經濟學者，只能從這些關係底觀點出發來談這個問題。一派經濟學者

——古典學派——認爲生產布爾喬亞社會財富的勞動是生產勞動；另一派——俗流經濟學者——則認爲一切勞動，這樣或那樣，直接或間接地鞏固布爾喬亞體系的，均當歸入生產勞動之列。傅利埃底見解則相反；他寫道，『若將文明人底勞動跟未來和諧社會中的勞動作一比較的話，我們就會知道，三分之二人民底勞作是完全不生產的或帶着否定性的。』於是傅利埃就歷數幾種不生產的分子。這種不生產的分子，他分爲三大類如下：家庭寄生者——婦女、兒童、僕人；社會寄生者——海陸空軍、征稅官、工廠主、商人、運輸人；其他的寄生者——訟師、詭辯家、有閒者、社會叛徒、積極的破壞者、破壞工具底生產者等。

照傅利埃底意見，只有在他所理想的社團內也需要的那種勞動，才算是生產的勞動；反之，只

存在於文明社會內的那種勞動，是不生產的勞動。大多數婦女羣和一切從事家庭事務的僕役們底勞動，都是不生產的，因為在未來的社團中，由於公共伙食公共生活文化的供應制度底實施，那些人底勞動已成爲不需要了。依據同一理由；上文所說的「社會寄生者」底勞動，也是不生產的。至於上述的「其他寄生者」中，有些屬於不從事任何勞動的人（如訟師和有聞者），有些則屬於從事有害工作的分子，如詭辯家和社會叛徒之流。

傅利埃強有力地揭露了文明社會內大部分勞動底劫掠性和反社會性。他底描寫各種類型的非生產勞動，實無異於一件對文明社會的控訴狀。可是對於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這兩個範疇，他却沒有正確地了解：他不了解它們底歷史性。布爾喬亞社會底生產諸關係，在一些相應的範疇上得到表現，而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兩個範疇，也包括在內的。因此範疇也和它們身上所表現的生產諸關係一樣是歷史性的。因此，我們就該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即配合着每一經濟形態去考察它們。但是這一考察本身，又以對每一經濟形態之歷史觀察爲前提。當時的經濟學者對於布爾喬亞生產持絕對肯定的態度，而傅利埃對於這種生產方式却持絕對否定的態度，他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底歷史使命。其次傅氏認資本主義爲絕對反社會的，他不了解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正是生產底社會性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因此，他雖比西斯蒙蒂更深刻地了解經濟危機底原因

(以爲在於生產底零散性)，他却沒有能夠把這問題分析到底。這一任務他連提也不會提起；在他看來，危機正和不生產勞動一樣，只是吾人藉以排斥文明社會內的生產零散性（即散漫而無組織）和反社會性之論據而已。

復次，傅利埃又發揮了在當時堪稱難得的集積和集中底理論。他確定地指出，文明底第三階段是向着大企業排擠中小企業這一方發展，同時也向着藉助於股份公司底組織將許多個別的資本融合成爲一個大資本這一方發展的。傅利埃稱大企業排擠中小企業的過程爲集積 (Concentration) 過程；稱股份公司底形成爲集中 (Centralization) 過程。這樣的解說，在現今我們看來，顯然是一種模糊觀念；因爲這裏傅氏沒有正確地了解資本集積，他把資本集中底一種方式當做資本集積看了。不過這裏重要的不是集積和集中底定義，重要的是在他正確地指示了資本主義發展底趨勢。

傅利埃根據他所預見的集積和集中底趨勢，指出它必然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他稱這階段爲「實業的或「商業的封建主義」。這該是資本主義發展底第四階段；他說：『當然，自由競爭底將來的結果是商業的封建主義。它產生於一些特權的（按即壟斷的——沈）商業公司體系之形成；那些商業公司跟執政當局相協同；它們貢獻自己的一部分利潤給執政當局，作爲取得壟斷權的代價；從此它們就可對一切不在它們羽翼之下的商業實施壓迫了。它們巨大的資本容許它們能夠毫無阻礙地

在一般的商品市場上建立起自己的法則來。一切中等的產業家都該遵從它們所規定的價格。……這是文明底最後階段，而按照極端相接觸的法則，這種制度底結束正跟它底開始一樣——倒轉來實施的封建主義。』（註）

可是傅利埃底不理解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大大地貶底了他底這種理論（集積和集中底理論）底價值。在資本集積和集中底發展中，在它們轉變到所謂「商業封建主義」的趨勢中，傅氏看不見勞動和生產底社會化是在矛盾的基礎上增長起來的，因此他自己所發見的集積和集中的事實及其發展趨勢，他自己又予以不正確的解釋：他認定集積和集中只是商人們底有害活動底結果；商人們拼命地追逐利潤，拼命地進行酷烈的相互競爭，並且由於競爭過程中不斷地紛紛破產，其結果是最強大的排擠和併吞了弱小的和不甚強大的企業。簡單地說，傅利埃是從流通現象中推演出集積和集中來的。

再則，因為，傅氏不了解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並且將一切都諉之於資本主義商業底缺陷，因之他就忽略了「文明第三階段」底基本的社會矛盾。勞動和資本在生產領域內的矛盾是他所看不見的，他事實上把這一矛盾完全轉移到流通領域中去了。他這樣闡述勞資間的矛盾：工人們一方面以

（註）見傅利埃文集頁六〇。

購買者底資格吃了虧，因為商人常盡量提高大眾日用消費品底價格；在另一方面工人們又因商人們底激烈競爭和競爭所造成的破產而紛紛失去工作。在這樣的闡述之下，彷彿勞資間的矛盾祇是商業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了。固然傅利埃亦稱僱用勞動為奴隸勞動，這無異地是他底功績之一；可是仍然因為對於資本主義底特質缺乏正確的了解，就降低了他這一僱用勞動底估計之價值，因為他底這一估價並不產生於勞資關係之正確的分析，這樣的分析是傅利埃所做不到的。

而且，傅氏底解說僱用勞動底奴隸性，從道德的意念出發，重於從社會經濟的意念出發。他底解釋這一奴隸性，主要地說是因為工人們沒有自由依據各自的志趣和性情去選擇工作；他們被人強迫而接受某種工作。於是工人羣底苦境在他看來祇是對文明的控訴狀中的罪狀之一了。在他底觀念系統中，勞資間的矛盾或衝突不是、而且不能是資本主義社會底主導矛盾了。因此，傅利埃不斥責「文明」底罪惡在於資本對僱用勞動的剝削，而祇指謫它不讓工人們參加利潤底分配這一點。

講到關於資本意義底估量的話，傅利埃特別重視商業資本底重要性，這是已在前面指明了的。他根本忽視產業資本（工業資本）底意義，自然更想不到工業資本是主要的基本的資本形式了。殊不知工業資本是基本的資本形式；開拓文明的正是這種資本；商業資本和放款資本只是它所派生的資本形式。因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底批判底尖鋒老是準對着商人和銀行家，而始終對產業家盡

衛護之力。

#### 四 政治經濟學批判

傅利埃單方面的批判「文明底第三階段」，決定了他單方面的批判經濟學者。傅氏正確地斥責當時經濟學者替現制度辯護的行爲，但是他底批判實質則最後歸結於斥責經濟學者抹煞和甚至完全袒護商人和商業。這裏又暴露了他底一貫的偏重商業意義的觀點。

傅利埃把政治經濟學底錯誤分割爲二種：一種是「神秘的」(Cabalistic)，另一種是「教條式的」(dogmatic)，前一種錯誤他認爲由於經濟學者無力對付商業資本底權威，後者強迫他們替自己鼓吹。後一種錯誤則在於經濟學者做了自由競爭底戰鬥員，並提出了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的口號；他們根據這種教條來建立他們底理論體系。傅氏——這位激烈的反重商主義者——把當代的一切經濟學者都看做重商主義者，祇有奎奈是例外。他說：『應當承認奎奈底公正思想只有他很勇敢地擁護真理而不放棄自己的信念：商業應當服從農業底利益。可是已經出賣給商人的英國人（指英國的經濟學者——沈）却很隨便地把實現這種見解的企圖都拋棄了』。(註)

(註)見傅利埃文集頁六九。



由於不正確地了解資本主義生產底特質，傅氏就不正確地解釋古典學派底思想，連奎奈在內。我們姑且不談他底歪曲事實：須知奎奈及其門徒底擁護放任主義，並不遜於英國經濟學者（主要地指古典學派）啊！但更嚴重的是另外一點。第一，奎奈所主張的不是商業服從農業底利益，而是服從資本主義生產底利益（奎奈舉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為其說明對象）。第二，英國的古典學派原則上完全持着跟奎奈一樣的觀點；他們祇是反對狹窄的——重農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觀；在他們看來，農業不過是生產部門之一而已。第三，傅氏把擁護自由貿易跟擁護商人利益混為一談了。擁護自由貿易（其口號即為「放任主義」）是表示主張經濟的自由，即主張使資本主義生產從商業資本統治時期（中世紀末期）底一切束縛和桎梏中解放出來；而擁護商人利益却是指重商政策了。

固然傅利埃明白，在文明社會內取消商業將產生比沒有商業更大的害處，因而他認為非將文明社會根本改造過不可。他也知道商人底「陰謀和詭計」在文明社會內是不可避免的；他並且指出商業底性質是隨時代而變遷的。「交換的商業，跟其他任何社會關係底類型一樣，在每一歷史時期各有其自身的特徵……」

但是傅利埃沒有說明：為什麼「交換的商業……在每一歷史時期各有其自身的特徵」，為什麼文明時代商業底特徵是自由競爭？他既不明瞭這一點，所以他一方面只得以指出上述的事實為限，

另一方面則只得加罪於商業及其袒護人。而在他對於商人及其思想家（即從學理思想上袒護商人之人）的罪責中，他持着抽象的倫理觀點，跟任何歷史主義不相容的倫理觀點。

然而我們却也不應輕視傅利埃所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底意義。弗利德列赫·恩格斯有過一句格言，他說：『在正式的經濟學的意義上說是謬誤的，在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說可能成爲真確的。』在正式經濟學的意義上講傅利埃底見解是不對的，可是在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講，他底見解却是正確的。因爲他預測到文明發展底趨勢，他就特別有力地強調政治經濟學底無能，它底眼界底狹窄，這種狹窄的眼界阻礙着它（指經濟學）提出超過布爾喬亞諸關係範圍以外的問題；同時又指出了它底辯護性。

這樣，傅利埃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第一點是指謫它底眼界狹窄，不提出根本問題來，所謂根本問題當然是指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了。照傅利埃底意見，這就是如何過渡到「社團」的問題。他底第二點批判是指謫政治經濟學底無能——無能跟文明底主要禍害——跟商業底罪惡做鬥爭。傅氏曾譏評經濟學者說：『政治經濟學底作用是完全消極的，它底任務只限於分析現有的罪惡。這正好像醫生對病人說：「我底任務是分析君之疾病，而不是示君以消滅此疾病之藥物。」對於這種醫生我們只有一笑置之……』（註）

此外，傅利埃又再三斥責經濟學者底辯護主義，甚至簡直指斥他們爲出賣人格。傅氏預見到「商業的封建主義」底到臨，同時又預言經濟學者和一般學者都會跟這一文明階段妥協的。最後，傅利埃正和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沒有把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和俗流經濟學者劃出任何區別來。

## 五 社團說

從社會科學發展（連政治經濟學包括在內）底見地上講，傅利埃主義中最有價值的當然是它底批判部分和歷史部分。可是傅氏本人和傅利埃主義者却不這樣觀察；在他們看來，全部體系從頭到尾底中心理論就是傅氏底社團說。在他們底眼睛裏，不論是文明底批判或是歷史哲學，都只是社團制底理論根據。

在他對於社團的理論根據中，經濟的理論根據當然對於經濟科學，尤其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之研究，爲最有價值。關於社團底經濟，傅利埃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於勞動及其組織。他主張在社團內一切團員均須從事勞動，連兒童也包括在內。但他們底參加勞作，並非按照需要而是依憑各人底熱

（註）見傅利埃文集頁五一。

忱。勞動底條件應當要這樣：能夠使每一個人都不願意站在勞動過程之外，袖手旁觀。

在社團制之下，工資是被廢止了的：那裏根本沒有僱用勞動，有的祇是社會生產底參加人，他們都得按照他們底勞動資本和才幹，領取自己在社會生產產品中應得的一份。

社會全年的利得，傅氏劃分為不等的三部分如下：(一) 5/12 歸給積極的工作參加者；(二) 4/12 歸屬於股份資本底利得；(三) 3/12 對理論的和實踐的知識的報酬。

傅利埃相信，勞動收入之豐厚，將使勞動者亦能從事積蓄和購買股票。因此，貧窮者亦將參加紅利底分配，而他們對於產業之經濟的，合理化的經營，也就很關心了。同時，社團底每一成員，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之保障的，而這一最低限度，較之文明社會內從事生產的工人底生活水準却要高得多。

在傅氏所列舉的各種勞動組織條件中，他指出自由和勞動底誘致性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底重要因素。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重視傅氏提及集體競賽之觀念。他底了解「比賽」和「競爭」，並非依照布爾喬亞觀點的。因為他所說的比賽和競爭，並不是個人利益互相競爭而貽害及社會；相反的，他說的是個人利益跟集體利益相結合。在理想的社團中，比賽和競爭是受下列諸條件之約束的：一、勞動是自由的，吸引人心的；二、人人參加勞動結果之分配；三、因而每人替社會勞作，

亦即替自己勞作。

在社團內，私有財產仍然保存着；因而同時也保存着不平等狀態。但是財產已起不了布爾喬亞社會內所起的那種作用；它不支配着生產和勞動。簡言之，傅利埃認為在社團中，財產已非布爾喬亞的財產了。生產和勞動都已被一個集體組織起來，調節起來和管理起來了。資本和土地將爲社團所掌理；一切動產和不動產底所有者，可從社團方面換得股票，後者按期給予他們一定的收入——紅利。資本家和地主變成了食利者羣（或有閒者羣），但是他們跟文明社會的食利者羣不同，因爲他們也要做工作的。他們爲何也要做工作呢？因爲前面已經指明，在傅利埃的社團內，工作不是由於需要而是由於愛好勞動（爲勞動所誘致）。而這種愛好心是富人也有。

這裏，傅利埃不了解：第一，將土地和資本變爲股票——取得收入之權，——就等於保存勞動底剝削；因而在他底社團中不僅保存着不平等，而且還保存着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第二，他錯誤地憶測，以爲千百年來支配着他人勞動的那些剝削者階級，會不受絲毫強迫而突然自願轉入社會一般的勞動輪子中去。這裏他完全迷於情慾的勞動觀，而把勞動和遊戲之間的任何界綫都擦去了。他以爲股票底所有人對於勞作也像對於遊戲那樣地愛好。

傅利埃雖然尖銳地批判文明，他却沒有確當地了解它底階級實質，這就表現在他底上。社團說

傅氏主張拿集中的社團生產代替分散的私人生產並解除商人對於生產的控制權力（在他看來這是文明社會最大禍害之負持者），——這當然對的；可是他沒有主張從社會內剷除剝削階級。在他底論述中，只是把剝削階級改變了下面目，而沒有主張根本剷除。

#### 第四節 渦文

渦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空想社會主義底第二支派底代表。渦文主義是在比較發展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政治條件之下發生的。它底「故鄉」是首先完成工業革命和業已成爲「世界之工廠」的英吉利。那裏的商業、工業、農村經濟，都已具有大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社會底階級結構和社會鬥爭，那裏也比任何地方都顯著些。

渦文主義底空想性並不減於聖西門主義和傅利埃主義，可是它却不像聖西門主義的崇拜產業家，也沒有傅利埃主義的偏面的反重商主義。它比它們更急進，同時又比它們更散漫（*prosaic*）些。渦文主義是以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潮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可是它絕少在空洞的幻想中飛舞不停地兜大圈子，它內部包括着很多實踐的成份。固然渦文跟聖西門和傅利埃一樣，他底學說也是對富有的上等階級陳訴的；他跟他們一樣，都是政治的社會鬥爭底反對者。然而渦文却比聖傅二位更接近

地站在勞工階級方面，而且在某一時期，客觀的事變形勢且將他推上了勞工運動底領導地位。他底思想加於勞工運動的影響，是表現於對工廠立法的鬥爭，為聯結兒童底工廠勞動和學校教育而鬥爭，組織勞工合作社等等活動上。

### 一 實踐家兼理論家

渦文自幼就極頂聰敏，短短的二年半（四歲半到七歲）就習完了小學校底全部課程；以後並且做了教師底助理。從九歲起，他已進了一家商店裏做學徒；從此他就開始認識經濟底力量。不過應當馬上指出，商業對於渦文並不像對於傅利埃那樣發生重大的影響，因而他並沒有把商人看作文明社會一切禍患底淵源。比較發展的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指示渦文認識商業資本底統治時期業已過去，這時的領導勢力已經屬於工業資本了。

渦文在商業機關服務了足足九年。在這九年中間，他服務過好多不同的店舖，並且跑過許多碼頭。他從這九年商界服務和奔跑碼頭的經歷中，獲得了豐富的、多方面的經驗：他知道了如何識事和看人。自他從倫敦跑到曼切斯特——棉紡織業底中心之後，他就得到了接近棉紡織工業的機會。這是當時工業生產中惟一的領導部門。最後，他結束了商業生活而轉入工業裏去了。

跑入工業界後，他藉告借所得自行開辦小規模的紡織工場。直到一八〇〇年，當他僅僅二十九歲時，他已轉輾一躍而成爲紐倫拿克（New Lanark）地方的實業領袖了。

渦文在紐倫拿克的活動，經過了二十五年之久。在這二十五年活動底前期，一半用在實業組織上面，一半則用在勞工大衆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準底提高方面。但這兩方面都是屬於實踐方面的。在這兩方面，渦文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他絕不以此爲滿足；相反的，他拿這點成就不僅當作他以後更廣大的活動底起點和支撐，而且還把它當作以後廣泛的理論發揮底根據了。所以到後來一個時期，實踐家的渦文，就跟理論家的渦文打成一片了。

渦文一方面把實踐跟空想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在理論上）乃把唯物論跟唯理論也結合起來。不僅如此，他還把法國的唯物論跟邊沁（Bentham）的哲學思想——功利主義融合起來了。在人性之培養（“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一書中，渦文寫道：「就自然法則論，人類是由迷盲進步到較高的知識程度；這種發展程度底界限，決不能由人類自己來決定的。在這條道路上人類發見：只有在行動上促進周圍環境幸福之增進和擴充，才能增進個人的幸福。」（註）然而在實踐的結論上，渦文却跟邊沁和布爾喬亞急進派有極大的紛歧：後者是經濟自由底主張

（註）見渦文著，人性之培養。



者，而渦文却主張國家政權干預經濟活動以扶持經濟力量較弱的生產者。他又是工廠法底最澈底的奮鬥者。在這方面他底具體主張，大約有下列幾點：（一）禁止僱用不滿十歲之童工（這在紐倫拿克的工業區中，他已經實行）；（二）規定自十歲至十八歲的未成年工人每日工作時間以十小時半為限，並禁止此等工人做夜工；（三）指定監察員若干人，組織專門的監察機關，其職務在監督上述條款之執行。

其次，他還提出了一個消滅失業的計劃書，就是著名的渦文計劃書（Plan of Mr. Owen）。這一計劃底主旨，在於為失業者組織一些「合作的村落」。依照這個計劃，每一合作村落應購得或長期租得一方土地；土地面積之大小，須視土質與農工業之相互關係等條件來決定。但每一村落底基礎必須是農業，工業只應盡輔助之作用。每個村落均應成爲一獨立的經濟單位；它底生產，首先是爲着自己的消費，祇有剩餘的物品可以售與別的村落。合作村落底建設經費，一方面應由政府、州郡和各種收入來供給，另一方面則由私人捐助。渦文並說明，這類村落底建立，使得有惠貧民的捐稅變成不必要了；因而對於政府和對於收入而言，這是一件絕對有利的事業。其次，資本有年利五厘，而債務則將逐漸償清。

渦文底計劃是有理論根據的。由於化學和農業科學底發達，工業和農業便獲得了極大的成績；

渦文根據這種成績而跟馬爾薩斯做堅決的鬥爭。他確定地說：『當全部土地尚未變成深耕的園地的時候，那種恐由人口過多而招致某種禍患的恐懼心理，在細察之下就變成幻覺了。此種幻覺由這樣一種想像和企圖所造成：即想使社會滯留於並非不可避免的迷盲、惡習和罪惡中的企圖。根據個人利益而反對社會幸福的原則所產生的人工杜撰的供求律，向來在逼迫着人們進行爲生存的鬥爭。』

(註)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渦文已有了這樣的思想，——縱然還不完全明確，——認爲貧苦底原因不產生於自然而存在於社會關係中——即存在於「根據個人利益……的原則」之支配中。此外，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則，這原則在十九世紀前半的社會主義運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就是關於「勞動權利」的原則。渦文同意馬爾薩斯的一點是說當時關於貧民的法律是毫無用處的；但是他反對讓貧民自己去處理他們底命運的觀點；他主張社會應予貧民以勞作的機會。他說假如社會不實行一定的改革，使一切能夠和願意做工的人有工作做的話，那末體力勞動大概很難重新得到真實的和必要的價值。

但是對於渦文底計劃，牧師們、守舊派、自由主義者、甚至至於急進派，都表示反對態度的。

(註)同上。

偉大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李嘉圖（當時曾任國會議員），也是渦文所提的計劃草案底反對者。李氏完全明白，渦文底草案跟自己的原理（即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不能共容。李嘉圖曾寫道：『像渦文所草擬的那種社會，說它會比某時候用同樣數量的人更生產多些和更繁榮些，假如人們底努力是靠社會的利益連同他們私人的利益來刺激的話，——試問凡是稍具常識的人，有誰能相信呢？千百年來的經驗豈不與此相背反嗎？』

李嘉圖和渦文顯然是兩個階級底代表：前者代表業已長成爲「自爲階級」(“Class-for-itself”)的布爾喬亞階級；後者則代表尙未長成爲「自爲階級」的勞工階級。李嘉圖是具有實際思想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渦文則是理論上和政治上的空想家。李嘉圖擁護資產者羣底利益，並依憑着這一社會羣；渦文則袒護勞動集團底利益而不以（且不能以）此集團爲依靠。

## 二 渦文底經濟思想

渦文關於政治經濟學沒有專門的著作，可是關於一切重要的經濟問題，他都曾發表過意見。他底經濟思想表白得最充分的，要算他在倫拿克的那篇報告了。

渦文稍稍改變了斯密氏底論綱底說法，他宣稱道：『使用適當的體力勞動，是國民財富和國民

繁榮底泉源。』因此他得出結論道，勞動該是價值之內部的尺度。他解釋道：『人類底平均體力是可以度量的；平均的人類勞動也可以確定的；而因人類勞動是一切財富底基礎，所以它在每一生產品中的價值，亦能加以確定，同時並能按此以決定它對於其他一切價值的交換價值；這些標準，在一個特定的時期以內是不會變動的。』

看了這一段引文可以知道，渦文認為價值底尺度，不是個人的、也不是具體的勞動，而是「人類底平均體力」，即一般的勞動，指一般平均的勞動而言的人類勞動；這並不是說，渦文已了解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底兩重性。他並沒有比古典學派更進步些，後者也知道價值不決定於個人的和具體的勞動，可是抽象勞動這一範疇，他們却不知道。

看了上面的引文我們還可以知道，渦文雖然也知道區別價值和交換價值，但是對於這個問題他却不會加以研究。他只注意到另外一方面——注意到由這些論點所產生的諸結論；而依照渦文底意見，以為從那些論點產生出來的結論是：價值和交換應由勞動來決定。他根據倫理的觀點去解釋價值問題。

我們知道，斯密確定說，勞動決定價值只是原始狀態之下情形，自從資本積聚和土地底私有權發生以來，勞動生產品就被分配於社會底三個階級，因而價值就由收入來決定了。渦文反對這樣

的分配，他認定不適當的分配是他那個時代的社會底一切禍患之根源，經濟危機也是這些禍患之一。他就像恢復勞動應享的權利；勞動應該成爲價值底尺度。

渦文沒有斯密那種關於所購買的勞動和所消費的勞動的糊塗觀念；他是依照李嘉圖的觀點，肯定價值是由勞動決定的：即由所消費的勞動決定的。但他亦有一點與斯密共同的見解：即價值律到資本主義時代就被破壞了。可是他不以爲這種破壞是自然的（斯密則認爲收入所決定的價格是自然價格）。那末要怎樣做才能使價值律不至遭受破壞呢？

渦文底意見以爲必須按照新原則來改組社會。弗列德利赫說過：『全部渦文式的共產主義，就它參加經濟論戰的情形而論，完全是以李嘉圖爲依據的。』（註）。渦文想依據李嘉圖底由所消費的勞動決定價值的那個定義，來造成這樣的條件——即使這一價值定義得以遵守實現的那些條件。他認爲必要的條件就是創造一「國民生產大聯盟」和「國民公平交易市場」底組織。這兩種組織照渦文底設想是整個的一體；它能保證依據價值律的交換。

按照勞動的交換之結果，渦文有下列一段文字的描寫：『這樣，人類的勞動就得到了自然的、內部的價值，後者將隨科學底前進運動而增長起來。對於人類勞動的需求，將不復依賴偶然性；人

（註）見資本論卷二序言。

類的生活資料將不復像現在這樣的成爲經常變動其價格的商業對象；勞動者諸階層亦不復成爲人爲的工資制度底奴隸，此種奴隸制實比半開化社會所通行過的奴隸制更殘酷些。價值尺度這樣的改變，立即會造成一高度有利的國內市場，當全社會底需要尙未完全滿足的時候。」（註）。

寫到這裏疑問就來了：既然將來交換和市場關係仍然保存着，那末「人類的生活資料不復——成爲經常變動其價格的商業對象」的保障何在呢？這是第一。第二，渥文以後又聲明說：『誰能夠創造新的財富，他當然應得他所創造的那麼多的財富。』由此可知，依照他底意見，工資應與全部勞動生產品相等。在另一方面，他又接着寫道：『生產者應該得到他所創造的全部財富之公正的和適當規定的一份。』這意思彷彿是說，生產者不應享有他底勞動生產品底全部。這裏顯然存在着一種矛盾。

這種矛盾的主張，一半是由於渥文同時把現社會所必趨的最終目的和由現社會過渡到未來社會的準備時期合併成爲一談了。在未來社會中，全部財富將屬於生產者；而在過渡時期中，生產者只能取得所創造的財富中之公正的一份。我們不要忘記，渥文所擬擬的合作公社以及他底「國民公平交易的市場」，都要求教於借款的，即都要利用他人資本的，因而對於這類資本就有支付利息的必

（註）見渥文在倫拿克的報告詞，譯文轉錄羅森貝著的政治經濟學史卷二，頁二二六——七。

要。

渦文又認為新的價值尺度將『有利於地主和資本家，同時亦有利於工人』，因為在施行這種價值尺度之後，由商業的變動所引起的冒險就除去了。在過渡時期中，資本家和地主還存在着，可是他們將如何被除去的問題，渦文却不予說明。從他底意思上去推測，彷彿他們是會自行消滅的，因為他們底理性迫使他們自覺到新制度底優越！

渦文是根據李嘉圖的價值論以得出社會主義結論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所以他底理論思路是這樣：既然價值是勞動所決定的，那末工人就應保證得到他底勞動生產品全部，可是渦文跟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有別，他明白在商品生產底基礎上，這樣的要求是不會實現的，只有在另一種勞動組織之下它才能實現出來。不過他始終未曾明瞭價值是商品經濟（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亦在內）底範疇，價值律只適用於這種經濟體系的。渦文却用倫理的觀點去解釋勞動價值底原則。他提出這樣一個主張來：勞動應當成為價值底尺度。他不了解勞動實際上正是這一尺度，不過只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下存在着而已。

渦文底功績在於他不僅指出，機器底採用惡化了工人們底境況；而且說明，由於機器底採用，勞動貶了價了。他說：『真實的貧乏是勞動者人手貶價之自然的結局，這種結局是歐、美各國工廠

普遍使用機器、特別是英國工廠中使用機器所促成的……。」渦文則想藉「新的」價值尺度之採用，以提高「勞動價格」，因為這麼一來，我們已在前說過，工人在自己創造的財富中所取得的份額就增大了。

渦文又根據機器底採用降低了勞動價格這一論綱，企圖揭露危機底原因。他認為危機底原因，在於「勞動價格」底降低，降低了工人們底購買力，因而縮小了商品銷售底市場。由此便發生供給與需求底不相適應。他在致倫拿克的報告詞中寫道：「……但是現存的社會制度不給勞動者以其應得的勞動報酬，其結果是一切市場都感覺得不夠了。」可以看出，在經濟危機底解釋中，渦文是跟西斯蒙蒂底觀點一致的。然而他底結論却跟西氏的不同。瑞士的經濟學者西斯蒙蒂看到了「生產方式反抗交換方式」（弗列德利赫語），企圖把時代向後拉回去；英國的偉大的空想家則勇氣勃勃地向前推進。根據產業革命所創造的新式技術底認識，他深深地相信可以創造這樣一種生產和分配底組織，在這種組織中不會發生任何危機的。

根據這些論點，他就予馬爾薩斯——拿自己的「人口律」去恐嚇社會的馬爾薩斯——以堅決的打擊。渦文提出了一個相反的論綱來，即肯定生產力底增長大大地超過了人口底增長。按照他底估計，大約在一七九二年，英國的人民祇有四分之一（約三百七十五萬人）從事生產的勞動。同時他



估量那時機械和化學的力量等於一千一百二十五萬人底力量。兩項相加，則英國全社會底生產力等於一千五百萬人底力量。換句話說，生產力和人口底比例，適為一：一。可是到一八一七年，照渦文估計，英國人口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一千八百萬，而生產力底總額則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二萬一千七百二十五萬人力了。換句話說，人口與生產力底比例變成一：一七（當然約數）。生產力大量增長底結果是：在一極端上表現財富大量的增加，在另一極端上則表現貧乏也大量的增加。而這一切現象底禍源，渦文認為在於不適當的分配。由此而得出結論道：只要把英國所有的生產力拿來公正地分配起來，它就能完全滿足英國全體人民底需要了。所以照渦文底意見，社會貧乏和經濟危機底原因在於不適當的分配。

### 第五節 渦文主義者——湯普遜

在渦文主義者中間，最著名的經濟學者便是愛爾蘭人威廉·湯普遜（William Thompson, 1785—1833）。湯普遜是一個富有的地主，他自己也承認他是『靠所謂地租生活，即靠別人勞動底產物為生』的。這樣看來，就社會出身言，他和渦文並不相同。還有一點跟渦文不同的，即渦文是工商業底實際經營家、是事業家，而湯普遜却是個書齋裏的學者。他在杜勃林大學、牛津大學和倫

敦大學裏受過有系統的和全面的高等教育。當他尚在倫敦大學做學生的時候，他就已傾心於邊沁底學說。到後來（大約在一八二三年），他認識了渦文和渦文的思想之後，他才把邊沁底功利主義哲學跟渦文底社會主義學說結合起來了。

湯普遜底所有著作，都在短短的六年間出現的。他底基本的理論巨著適應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則之研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即於一八二四年問世。其他著作如爲一半人類呼籲……（“Appeal of the half of human race……”），有報償的勞動（“Labour Rewarded”）等等，都是以後幾年出版的。下面我們要將他底理論底各部分，分別加以闡述。

### 一 方法和基本原則

湯普遜雖然利用着大批的事實材料並且常常援引歷史的事實，這彷彿跟斯密底研究方法有點相像，可是他底方法大體上還是比較接近李嘉圖的。他所引的一些事實，對於他底學說沒有獨立的作  
用，也沒有辯論的意義；他只是利用這些事實作爲他自己的理論原則底證明而已。而他所有的理論原則，都是嚴格演繹地（deductively）得出來的。

湯普遜根據邊沁哲學底基本原理，得出了好些經濟性質的定則來，他一貫地以極大的邏輯力量發揮他底全部經濟理論。歷史主義是與他不相容的，在這方面，他不但比聖西門遜一籌，而且連傅利埃都不如。他反對布爾喬亞關係，但是站着與這種關係底擁護人一樣的方法論立場去進行反對的。固然，湯普遜底社會立場是跟他們不一樣的，可是這種殊異的社會立場却缺乏適應它的方法論來表達。

要靠形而上的方法論去克服布爾喬亞眼界底狹窄性而創造普洛列塔利亞的政治經濟學，——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湯普遜却是個形而上的思想者。他在尋求絕對的真理和絕對的、自然的、永久的法則。他認定，在理論上，這些真理和法則包含在功利主義中；在實踐上，則包含在渦文主義中。兩者底連結圈，在他看來，便是古典派政治經濟學。

照邊沁底解說，原則是「鏈條底第一個圈環所黏附着的不動之點」。這個「不動之點」對於全部功利主義哲學便是利益底原則。那末何謂利益呢？邊沁回答道：「利益是個抽象的概念。它表明某種事物防止任何禍患或創造任何幸福的本性或能力……。」（註一）

現在來談一談那黏附於我們已經知道的「不動之點」的所謂「鏈條底第一個圈環」吧。邊沁繼續着說：「自然迫使人類受制於快樂和苦痛底威權。我們所有的觀念都受它們（樂與苦——沈）底

支配；我們一切的判斷，生活中的一切決定，亦都得受它們底約制……這兩種永久和不可克服的感覺，不論對於道德家或立法家，都應當成爲主要的研究對象。利益底原則使人人受制於這兩個推動機。』（註二）。

湯普遜底基本觀點，正與邊沁如出一轍。在湯普遜底觀念中，利益底原則也是「不動之點」；他不考察這一個概念如何隨每一時代之具體條件而變化；在他看來，這個概念是永久不變的。

所謂「鏈條底第一個圈環」，湯普遜底觀念也跟邊沁一樣。他也以爲「利益底原則使人人受制於這兩個推動機」：快樂和苦痛。可是以下的一些圈環，却不同了。雖然形式上它們依然不變（湯氏的跟邊沁的無異），但是事實上它們却已不復爲邊沁底範圍所限制了。因爲邊沁在他全部的思想鏈條中，始終是個個人主義者和布爾喬亞意志底宣揚者；湯普遜則企圖不澈底地使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化」，並且企圖把全部鏈條轉移去反對布爾喬亞集團。

這樣，湯普遜就已走到渦文主義底立場上去了。固然渦文主義也以永久真理爲根據，可是它却具有不同的階級內容。湯普遜利用了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幫助。爲要利用它，他就得把它轉過來，去反對它原來所擁護的那些人。他從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中抓住了它底勞動的核心。

（註一）與（註二）見經濟學者叢刊中邊沁著的立法原則。

人們底行動受着利益原則底指揮，所以他們總竭力企求着幸運。在功利主義者看來，幸運也就是利益，不過是利益之擴展形態罷了。當利益底原則實現出來的時候，就是達到幸運的時候；簡言之，幸運便是實現了的利益。在經濟底領域內，實現利益底原則，就是創造物質的用品、財富。

這就是功利主義者對於財富這一概念的看法；而湯普遜底觀點亦正如是。可是往後他底思路和他底先生（邊沁）底思路就開始分歧了，因為他有另一種企圖，迫使他堅持古典學派底勞動核心。例如邊沁給財富下這樣的定義：『財富一字之意義，是指任何事物之能成爲人類欲望底對象，能作爲人類底佔有對象而按其自然性能供人類享用者……』（註一）在這一定義中，連一點勞動底影子也沒有。湯普遜對財富的界說却不然。他在研究古典派政治經濟學時，曾這樣寫道：『沒有勞動，就沒有財富。土地、空氣、熱度、光線、電氣、人、馬——所有這一切，都不配稱爲財富。它們可能成爲欲望和幸福底對象，但是它們底變成財富，只有當它們被改造它們的人手所接觸過的時候。』（註二）

接着湯普遜發問道：『什麼使文明社會內美麗的馬匹變成財富底對象呢？當然不是自然……南非洲的野馬縱然是自然所創造的，它們却不是財富底對象。』（註三）

（註一）同上。

這樣，照邊沁底意見，財富底實質是事物底效用性，而照湯普遜底意見則認為財富底實質在於它是勞動底產品。湯普遜把效用性只看作必要的條件。在他底「財富分配原則之研究」一書中，竭力地說明：不是勞動生產品的有用事物，便不是財富。照他底意見，土地之成為財富，只是當它被耕作過了之後，即是說，只是當它變成勞動生產品的時候。但是邊沁或者要反駁他道：不耕作過了的土地也能給與其所有者以一定的收入，因此這種土地也是財富底源泉。對於這一反駁，湯普遜底答復是這樣：他認為未耕作的土地底所有者之收入是不公正的，即是不適合利益和幸運之原則的。

現在讓我們再來講一講另一個問題。

湯普遜會否說明某個一定的歷史的社會形態——布爾喬亞的、封建的、奴隸制的或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之財富底性質呢？當然不會。他底財富觀完全是形而上的，捨去了時間和空間性的。

然而我們却也不能輕視湯普遜底功績。第一，跟那些認勞動為財富之源泉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如彼梯、奎奈、斯密）相比較，則他更集中注意於勞動的原則；第二，他根據這一原則做出一切可做的結論來，這是他底布爾喬亞的前人們所做不到的。

（註二）與（註三）見湯普遜著之財富分配原則之研究。

可是在方法論上，湯普遜跟他底布爾喬亞反對者（即古典派經濟學者）一樣，是離開了歷史地一定的社會形態去研究財富的。對於「何謂財富？」這個問題，他給了一個一般答案，在這種答案上完全沒有反映出財富之歷史地具體的內容來。我們知道，在奴隸制社會中，財富底泉源是奴隸勞動；在封建社會內，是農奴勞動；在布爾喬亞社會內，則為僱用勞動。湯普遜把所有這一切具體地歷史的勞動和財富底定義都捨象掉了。並且，被他稱為不變的永久真理的這種抽象觀念，他把它當做他底全部社會經濟觀念底基礎了。

## 二 他底經濟思想

講到湯普遜底經濟思想，那是很周密地形成一整個體系的：他關於政治經濟學底一切問題，無一不發揮盡緻的。現在，讓我們約略地一一分別加以介紹和評述吧。

先講湯氏對於交換及其作用的見解。湯普遜沒有以財富為孤立的個人勞動底產物的那種思想；他反復地說明，財富是社會分工的勞動底結果。在他底財富分配原則之研究中，首先就重複斯密底觀念：認為社會是勞動的聯盟，同時又是交換的聯盟。他就根據這點去考察價值問題。

湯普遜雖反對布爾喬亞關係，但他却將這種關係底最一般的基礎絕對化了。他跟斯密底見解一

樣，認為交換和分工是同一過程底兩方面。湯氏說：『勞動沒有交換就變成無用，正和交換沒有勞動一樣，因為一個人決不能生產他所必需的一切的。』（註一）湯氏所特有的一個論據是：既然需要分工，那末就需要交換。這種觀點顯然是商品經濟絕對化的觀點，因為只有在商品經濟之下，社會分工中才包含着交換，作為它底契機之一啊。

再則，湯普遜不僅視交換為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因素，而且還把它看做唯一正常的因素。但是試問在未來社會主義之下，特別如在渦文式的合作公社內，人與人的相互連繫將如何實現呢？湯普遜這樣解答道：『這裏（即在渦文所理想的公社中——沈）大家互相工作着，互相賜與恩惠。雖然不容有各個人中間一定事物之交換，但是却存在着恩惠一般的交換』（按即互賜恩惠——沈）（註二）。湯普遜跟斯密底見解一樣：把商品底交換解作勞動底交換了。由此就可得出結論來，說一切為公共利益的共同勞動都是恩惠底交換。

一般地講，在湯普遜底理論體系中，交換問題始終是無所不包含的問題：分配問題也包含在它的裏面；他認為這個問題底解決應當成為一切社會經濟研究底目的。正確的、自然的和公正的交

（註一）財富分配原則之研究，德文版卷一，頁一九六。

（註二）同上，頁一一五。



換，這三個概念在湯氏看來是同一的；它底意思是：（一）自由的交換，（二）均等的交換，（三）以完全保證生產者以勞動生產物為任務的交換。

在為爭取經濟自由的鬥爭中，湯普遜不僅是放任主義之最有力的擁護者，而且他比古典學派更深刻地從理論上證實這種政策。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從勞動者底觀點去擁護這一政策。湯氏視壟斷與商業特權為交換均等性（或等價性）之破壞，他認為這類特權是掠奪勞動者的方式之一，即無異剝奪勞動者所生產的生產品底一部分。簡言之，壟斷和商業特權，是跟正確的、公道的和自然的交換所應有的現象相矛盾的。

其次要講到湯氏底價值論。從上面所講的看來，可以知道，湯普遜除了勞動價值論以外，不能有別的價值論。價值決定於勞動一語，是他底財富和交換論之必然的直接產物。正因為這樣，所以他簡直沒有把價值特別劃出來加以分析，他把它包括在財富和交換底總分析中了。雖然如此，他底價值論依然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

湯普遜跟渦文一樣，在價值論中也摻雜着倫理的成份，即是說：根據勞動為財富之惟一泉源這一點，就提出要求道：交換應該按照勞動來進行。可是價值論底其他各方面，他却比渦文發揮得更完滿了。例如他已經有了必要勞動底觀念，他說價值是由一個具有平常體力和技巧的勞動者底平均

的勞動是可以化爲勞動量來決定的。其次，湯普遜還知道由複雜勞動化爲單純勞動。他說：『無疑的，在一種勞動上和在一個勞動者所做的工作上，表現於比別種勞動和別個勞動者更大的熟練程度。但是這種較高級平常的社會勞動的。……一天工作日價值底估計，須視那靠平常的技巧和勞動者平常的勤奮程度所生產的物品而定的。』

湯普遜的價值論底特點又在於交換價值與財富底混同。他口頭上雖聲明「交換跟財富底概念不相連繫」，可是事實上他並沒有劃出交換價值和財富底區別來，因爲他把兩者都看做所消耗的勞動底體現了。他指出，只是在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底比較中發現它們底區別；他不了解，在商品經濟中，財富和交換價值並非同一事物。固然，在布爾喬亞社會內，財富呈現爲「商品底堆積」，因而亦即是「交換價值底堆積」，可是商品同時是價值又是使用價值。既不了解這點，湯普遜因而就不了解下面這一點：爲價值之總和的財富，真正只是勞動底表現；爲使用價值之總和的財富，却不只是勞動一種底產物了。

根據自然條件參加使用價值之創造這一事實，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得出結論來說，它（自然）也參加交換價值之生產。湯普遜則相反，他正確地指出自然不創造、而且不能創造價值；可是他把它一正確的論點跟下面一個不正確的論點混淆起來了：彷彿它連使用價值底創造都不參加的。布爾喬

亞經濟學者底混淆，目的在於替資本主義辯護；這種混淆底理論基礎則為著名的生產三要素論和「服役」論。湯普遜則從他底混淆中做出了革命的結論來：財富只是勞動底產物，因而交換應當按照勞動來完成，就是說，交換價值應當決定於勞動；這樣，勞動底產物就全部達到生產者手上了。

再次要講到湯氏底資本論了。

古典學派以勞動為財富之泉源為出發，而以財富決定於資本及其數量為終點。這樣，他們以不合理的形式表述了以下的事實：在布爾喬亞社會中，資本支配着勞動，勞動底生產率表現為資本底生產率了。湯普遜根本反對這樣的觀點。他認為不應把資本底作用估計得那麼高，因為『積聚起來的財富（意即資本——沈），從數量方面來說，較之全社會底生產力，是異常微細的。』

布爾喬亞經濟學者輕視所謂活的勞動底重大作用，而重視積聚起來的財富。湯普遜雖未予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之資本觀以嚴正的批判，但他却把活的勞動底作用抬高到應有的高度，因而揭破了過分估計資本之意義的布爾喬亞經濟學之辯護性。

湯普遜有時把資本解作在生產中逐漸被消耗的那部分財富，即將資本等同於勞動工具；但有時則比較正確地說：『資本是能夠被轉變為獲得利潤之工具的那部分生產品。』提到資本與勞動之對立時，他寫道：『資本家底收入愈大……餘下來給工人的當然愈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之

下，資本底利潤愈高，工資必定愈低。」這樣，他把勞資底對立限於收入底分配關係內，這一點是跟李嘉圖底觀點一致的。

此外，關於湯氏對分配問題和生產力發展的意見，也有略予介紹之必要。照湯氏底意見，社會經濟研究中的主要問題是分配問題。「……每年所生產的大量物品，像一條強有力的急流中的無數永久的波浪，不斷地向前湧去而消失在無窮大的消費之海洋中。可是這一永久的消費不僅規定了一切的享樂，亦且規定了全人類底生存。這個一年生產品底數量和它底分配，首先就應該作為研究底對象。實際的積累完全只有次要的意義，而且即此意義它也差不多完全由於它對一年生產品分配之影響而獲得的。」（註）

然而湯普遜却没有把分配特別提出來做專門的分析，正和他對交換價值底分析一樣，他把它包括到財富和交換底總研究中去了。這是因為他以為在正確的、公道的和自然的交換之下，不會發生任何的分配問題；因為在這樣的交換之下，每一生產者都可獲得他自己勞動底全部生產品。所以，分配問題無他，仍不外是公正交換底問題而已。當然這種觀點底目標是在反對資本家和地主；因為既然財富只是勞動底結果，那末它就應當全部為生產者本身所有，因之其他社會集團（主要的是資

（註）轉錄卡爾著資本論卷二，俄文版頁二二八。

本家和地主）底一切收入，就祇是從工人生產品中扣除出來的一份了。

說利潤和地租是從勞動者生產品中扣除出來的份子（或份額），這是亞丹·斯密底觀點。李嘉圖雖未曾明白說出，但實際上也把利潤當做從工人勞動生產品中扣除出來的一份看待，因為他說利潤和工資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底兩部分。因此，把利潤和其他非勞動的收入，解作從工人勞動生產品中扣除出來的份子，這並不是湯普遜首創的見解。然而在這個見解上，湯氏却有他自己的特點：第一，他把這一思想，解釋得特別尖銳，特別強調這一見解；第二，他把這一見解底鋒銳，特別運用對付資本家，斥責資本家不斷掠奪工人的罪惡；第三，這一見解可以說是他底全部學說底軸心；他認為不勞動者佔有勞動者底勞動生產品這一舉動，破壞了交換底自由，破壞了為任何社會之目的的平等、安全和幸福。

在分配論中，湯普遜底重大功績之一，是他從社會生產力發展底觀點去觀察分配。他列舉了各種從勞動生產品中扣除出來的份額之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來：這些份額是否促進生產之發展呢？他底答復是否定的。

固然他也同意對資本的報酬，他寫道：『工人假使不幸而自己沒有資本，就應當為借用資本而支付報酬；問題祇是應當從勞動生產品扣除出多少來。』（註）湯氏指出，計算這種扣除出來的份

額，有兩種尺度。一種是工人眼中的尺度，另一種是資本家底尺度。依照工人底尺度來說，這一份額應當等於：（一）全部流動資本和一部分固定資本底價值，（二）資本家之管理產業保存和積蓄資本底報酬，（三）土地、房屋等所有者底報酬，——這三者之總和。照湯氏底估計，認為資本家和土地私有者底收入，只能等於報酬優厚的工人底收入。可是還有一種資本家和私有者底計算標準（尺度）：他們從勞動底生產品中，只留給工人以最少限度的生活資料，其結果是一方面財富增長，另一方面普遍的貧乏化。

然而這樣的分配（即按照資本家底標準來分配）對於生產力底發展起着否定的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們就根本沒有擴大財富的刺激，他們僅僅為飢寒所迫而從事勞作。固然，資本家竭力以圖增加自己的資本；他們不恤用任何代價和任何方法以增加自己的財富；然而這不能補償由直接生產者之備受飢寒所引起的生產上的損失。

古典學派視布爾喬亞諸關係不僅為自然的和永久的，而且亦視之為最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生產諸關係。特別是他們視利潤為資本積累（亦即擴大生產）之惟一的和強有力的刺激。因而他們認為工業資產階級底利益是跟全社會底利益相符合的。湯普遜則相反，他認為從工人勞動生產品中扣除

（註）見財富分配原則之研究。

出來的一份——利潤，是阻礙生產發展的原因；只有財富底惟一創造者工人們底利益，才跟全社會底利益相符合。

湯普遜舉出勞動組織底形式有三種：（一）直接強迫底形式，（二）間接強迫底形式，（三）合作底形式，即自由的勞動組織。他認為生產性最大的是第三種形式，因為這種勞動組織能保證生產者獲得自己全部勞動底生產品，因而即能予生產底發展以最強大的刺激。





## 第九章 普魯東主義

### 第一節 引論

前一章所討論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想，可以說是布爾喬亞經濟自由主義（包括俗流經濟學說）底反面。一切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底代表們，都反對生產和流通領域內的自由競爭和無政府狀態，而他們底積極理想是根據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原則的勞動組織。普魯東主義（Proudhonism）則既與經濟自由主義相反，又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對立。至於從它底方法論和一般的「原則」上說，它和經濟自由主義要比它和社會主義接近得多。

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批判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同時也批判社會主義者；他企圖找出兩種相反思潮底綜合來。普氏利用黑格爾哲學底公式，確定經濟學者底學說為正題，社會主義者底學說為反題，而他自己的學說則為合題。

在跟經濟學者作論戰時，普魯東排斥私有財產，在跟社會主義作論戰時，他推翻了社會主義或

共產主義。可是他所提出的主張，却不外乎保存和鞏固小私有財產；後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時時受着大私有財產之威脅和摧殘的。他稱小私有財產爲個人的領有物，並作如下的描寫：『個人的領有是社會生活底必要條件；私有權殺害着生命，這已被五千年來私有權生存底歷史所證明了。領有是合乎公理的，私有權則反乎公理。消滅私有權和保持領有權；只要單單靠這一種原則上的改變，你就根本改變了法律、政治經濟和一切制度，你就消滅了人間的罪惡。』

接着又寫道：『既然領有權是平等地屬於一切人的，那末領有底多寡，就得隨領有者數目之大小而變動，因而私有權也就不會發生了。』（註）

普魯東費了很久的時間企圖解決他自己所提出的任務，即企圖找到一些能夠實現他底主張——『消滅私有權和保存領有權』——的條件。到後來他猛然醒悟起來，認爲要達到上述目的的方法是異常簡單的：只要予勞動者以無償的（不給利息的）貸款，兩件任務就可迎刃而解了！

普魯東底寫作生活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在第一時期內，他出現爲一個批評家，出現爲兩條陣綫上（反經濟自由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戰鬥者」和所謂「合題」底尋求者；在第二時期內，他已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改良方案，而且他表示跟聖西門主義者、傅利埃主義者、魯易·勃蘭等不同，因爲

（註）見普魯東著：何謂財產？（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他們在旗幟上都寫着「改組生產」的字樣，而普魯東則以「改組流通」爲其任務。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者，連湯普遜在內，都主張勞動底組織，普魯東則拿交換底組織之主張去和他們對立。

較之所有法國的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者，普魯東最完滿地表露了小資產階級底矛盾意向和希望。小資產階級一方面咒罵私有財產，一方面又崇拜私有財產；在他們底意識中，私有財產分裂爲兩種根源：善的和惡的。私有財產促成了貧富底不平等和貧者被富者所奴役，這是它底惡根源；私有財產予人以獨立和自由，這是善的根源。

普魯東對於財產的兩重態度，在黑格爾的三題法底形式中表現出來：正題、反題和合題。卡爾在其致安能科夫函中寫道：「普魯東先生從頭到腳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在發達的社會內，小資產者由於他自己所處的境地關係，一方面變成社會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成爲經濟學者；換句話說，他爲大資產階級底宏壯所述，而同時又同情民衆底苦痛。他同時是資產者又是民衆……這樣的小資產者是崇拜矛盾的，因爲矛盾就是他底全部本質。整個的他，就是活的、作用着的社會矛盾。他必須用理論去證實他在實踐上所表現的。」（註）

不僅就形式論，亦且就內容論，普魯東底觀念是十足的小布爾喬亞觀念。小布爾喬亞的生產

（註）見馬恩全集卷五，頁二九四。

者，感覺自己在流通領域內完全無能爲力，因爲流通領域內被市場的盲目性、無政府性統治着，物價常有劇變之虞，他就時時有破產底危險。反之，在生產領域內，則他自居爲獨立的產業主並自誇其獨立與自由。因此，一種理想的交換組織，足以使生產脫離市場底盲目性支配，脫離高利貸和商業資本這類最能危害小資產者利益的流通代理人底榨取的，——這樣的交換組織便是小布爾喬亞生產者所渴望的唯一救星。普魯東的信貸觀和交換觀正適合着這一理想的：他不想從生產中覓取社會問題底解決之道，而只想從流通中覓取這種道路。

爲小資產階級之最顯著而獨特的代表的普魯東，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中都佔有一定的地位。卡爾接續上面的引文寫道：『普魯東之成爲法國小資產階級之科學的說明者，這是他底功績，是一種實在的功績，因爲小資產階級將成爲一切準備中的社會革命之必然的參加者。』(註)

別的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只表達了小資產階級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底某幾方面。普魯東則表達了它底生活底一切方面，在這點意義上講，他才成爲它底「科學的說明者」。

(註)馬恩全集第五卷中卡爾致安能科夫函。

## 第二節 一般的前提和方法

以英國的自由貿易主義，特別是以巴師夏及其信徒們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完全否定國家為經濟活動領域中的積極因素之作用。他們對國家要求一件：不干涉那「自由地」積集起來的諸經濟關係，這些關係底基礎是分工。普魯東也持着同樣的立場；成爲他底全部經濟理論底基礎之基礎的交換論，亦正以同一立場爲其出發點。他並從同一立場出發，以批判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固然，普魯東也批判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但是後者底基本前提，他並未加以駁斥；相反的，他反而進一步地發展了這些前提，而對於布爾喬亞營壘裏的反對者，則斥之爲不澈底。普魯東跟經濟自由主義底代表們一樣地認爲分工和交換是正常的、自然的和公道的經濟關係發展之必需的和充足的基礎。不過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對於勞動和資本底關係亦作同樣的觀察，完全沒有一點兒不正常和不公道的成素；普魯東則認爲供人吸取非勞動的收入的資本主義財產制，是表示正常的交換法則之破壞，因而亦即公道的社會關係之破壞。換言之，勞動跟資本的交換，照普魯東底意見，是和那產生於交換法則的公道底理想，不相適應的。因爲這樣，所以他要想保存商品關係而只消滅資本主義的關係。

卡爾說：『普魯東根據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法律關係去說明永久正義 (justice éternelle) 理想，這無異給一切俗流之徒以慰藉的證明，證明商品生產底形式是和正義一樣永久的。然後他反過來力圖配合着這種正義底理想以改造實際的商品生產和跟它相適合的實際的法章』。(註一)

普魯東和自由貿易主義者一樣，所研究的不是現實的商品生產和它底規律性，而只是後者在布爾喬亞法章上的反映，在這種法章上，商品生產被視為永久的和公正的。從商品中抽去了矛盾而把商品關係看成和諧的關係，這樣他就不能了解商品與商品的交換如何發展到勞動與資本的交換。自由貿易主義者也不了解這點，但是他們連上述兩種交換底矛盾都看不見，普魯東則看見了這種矛盾而不去研究它，只是空想把它剷除掉。

普魯東不去研究現實，而以現實在一面凹凸鏡——布爾喬亞法章——上的反映底研究，去代替現實本身底研究；他夢想在布爾喬亞關係底基礎上，來改造這種關係。『說僱用勞動底出現歪曲了商品生產底真實性，這等於說：爲要使商品生產底真實性不致歪曲，它就不應當發展！』(註二) 可是普魯東和經濟自由主義者一樣，他也竭力擁護商品生產底全面發展；他跟經濟自由主義者不同的

(註一) 資本論卷一，第一章。

(註二) 同上。

一點祇在他斷定『僱用勞動底出現歪曲了商品生產底真實性。』

普魯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底區別，從社會性上講，是大資產者和小資產者底立場上的區別。大資產集團譏笑小資產集團底烏托邦（空想），指斥它背反分工和交換底自然發展過程，即是說，背反由單純商品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反之，小資產集團則憤恨大資產集團底自私和等價交換法則底被破壞。

卡爾接着說：『正如商品生產按照它自身的法則發展着，然後轉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為商品生產所特有的財產法則，亦以同樣的程度，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佔有法則。因此，我們不能不驚奇普魯東底機智，他想消滅資本主義的財產，而拿商品生產之永久的財產法則去對抗它！』（註）

依照小布爾喬亞急進主義底精神發展着，普魯東乃至走到無政府主義底立場：他否定國家，批判資本主義和按照他底理想「解決社會問題」等。

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從賽依底時代起，往往按照下列的標題去研究和劃分經濟的材料：（一）生產，（二）流通，（三）分配（亦有人將消費列為一項者）。這種研究程序絲毫也不反映社會底經濟史；自然，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亦不作此希圖。他們肯定布爾喬亞經濟體系是自然的和永久的，

（註）資本論卷一。

他們便根本不提出研究這一體系底運動的任務來；他們最好也只知道研究它底外部表現，它底各方面底連繫——照它們（即布爾喬亞體系底各方面）在現象表面上所呈現的去研究它們。

普魯東則想從經濟體系底運動中，從一個發展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變中去研究經濟體系。可是他所給的，並非運動着的物質底歷史，而是理性運動底歷史。普氏在其主要的經濟著作經濟矛盾之體系（或貧困之哲學，原名：“*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1846）中闡述這一「運動」道：『這裏我們所說的不是適應時間程序的那種歷史，而是適應觀念程序的那種歷史。各個經濟的階段或範疇，有時在它們底表現上是同時的，有時又是互相背馳的。雖然，經濟的範疇却有它自己邏輯的程序和它在理性中的連繫；正是這種連繫和程序，我們相信是能夠被我們發見的。』

那末所謂理性中諸範疇之邏輯的程序和連繫，究竟是什麼呢？

在每一範疇中，普魯東區別出來兩個對立的和互相鬥爭的觀念。而觀念對一個範疇的鬥爭，產生出另一個範疇來，後者在其對觀念的關係上說，是一個綜合（或合題）。而綜合自身又成爲觀念底新鬥爭，後者又在新的綜合中得到解決，如此不斷繼續，以至無窮。這樣看來，範疇底運動是由一批複雜性較小的矛盾到另一批更複雜的矛盾之不斷的轉變。換句話說，我們看到不斷地過渡到愈來愈



愈複雜的綜合，而範疇之運動是按着向上的路線進行的。

這一運動普魯東稱之爲經濟的進化 (évolutions économiques)，而每一範疇則稱之爲經濟的階段或時期。在經濟矛盾之體系一書中，普氏計算這樣的階段或時期有十，其程序如下：第一期——分工，第二期——機器，第三期——競爭，第四期——壟斷，第五期——國家或賦稅，第六期——商品均衡，第七期——信貸，第八期——財產，第九期——共產主義，第十期——人口。

這些範疇底程序跟現實的程序絕不符合，這是無待證明的了。試問誰不知道，信貸、競爭、賦稅等等在機器未採用前就已存在的，祇不過在工業革命之後，它們更發達罷了。然而創造新時代的却不是它們，而是工業革命。同時我們也不能把分工和機器底採用看做兩個接連着的時代，因爲分工在任何經濟形態中都存在的：從分工最初的萌芽狀態到機器底採用，中間隔着一個極大的距離。直接存在於採用機器之前的分工，是工場的分工；工場和機器實在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兩個階段。可是普魯東所講的不是工場的分工，而是分工一般。

不錯，普魯東自己承認：『這裏所說的不是適應時間程序的那種歷史，而是適應觀念程序的那種歷史；』對於這種觀念程序，普氏這樣解釋道：人類逐漸確定他自己的原則，一個又一個的順次確定起來，同時每一後起的原則，都是前一原則底否定。最初，人類（普氏亦用以下的名詞：如

「集體的理性」，人類的才智」等等）確定分工底原則，然後它被繼之而起的機器底原則所否定。機器底原則自身又被競爭底原則所接替，而競爭原則則又被壟斷原則所代替，這樣不斷地繼續交替，直到人口爲止。

假如人類所建立的原則真如普魯東所描寫那樣的話，那末這種程序必須在現實歷史上找到反映，社會經濟的發展路線，必須與普魯東所設想的程序相吻合。可是因爲普魯東完全忽略了時間上的程序性，這一來他就無異承認人類是時間以外建立自己的原則的。

這樣，普魯東就完全分裂了邏輯的和歷史的。

普魯東的觀念程序底邏輯基礎是什麼呢？譬如說，機器底觀念是在分工底觀念之後，並否定分工底觀念。這是由於什麼緣故呢？普魯東解答道，這是由於分工打散了勞動，將它分散爲各個單獨的部分；而機器則將打散了的勞動重新聯合起來。首先出現的，是分工底觀念；後者在其實現底過程中，一方面促使職業底形成和以職業爲基礎的各個社會階層和等級底形成；另一方面則促使各個生產部門底形成和各個工場內部狹窄的專門化。分工底觀念行盡了它自己的路程時，這一觀念就轉變爲（何以會轉變呢？如何轉變呢？——這些問題普魯東並未加以說明）它底反對方，轉變爲機器底觀念了。照普魯東見解，機器底原則是聯結底原則：機器將打散了的勞動聯合一綜合的整體。

但是第一，普魯東沒有正確地了解機器底原則。卡爾說：『機器是勞動工具底聯合，而並不是對於工人自身各種工作底結合。』接着又說：『生產工具底集中和勞動底分工兩者互相不可分裂，正如政治領域內國家政權底集中和私人利益底分散兩者之不可分開是一樣的。』(註一)

第二，機器不但不消滅勞動底分工，而且還替分工之充分澈底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基礎。卡爾接着說：『勞動分工之巨大的成就，在英國正開始於機器發明之後，這是無待贅述的。……機器底發明完成了，製造工業和農業底分立。從前聯合在一個家庭內的織工和紡工，後來却被機器分散了。……因爲應用了機器和蒸汽，分工就達到了這樣的規模，以致跟國家疆土相分離的大工業，已惟一地依賴世界市場，依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註二)

機器底應用當以某程度內分工底發展爲前提，這當然卡爾不否認的。假如沒有社會分工之一定的發展程度，那末連商品生產、商業、世界市場都不會有，因而也就不會有發明和應用機器底條件與刺激。但是普魯東所要說的不是這個；他是肯定着以下兩點：(一) 分工和機器是兩個相反的(即對立的)原則；(二) 前者藉自身之轉變爲反對方而產生後者。

(註一) 卡爾著，哲學之貧困。

(註二) 同上。

這兩點論斷，既不適合歷史，又不適合邏輯。

直接先於機器而存在的，不是一般的分工，而是工場的分工。而且即使工場的分工，也只為機器底發明創造了技術的前提，而絕對不是它底經濟的條件；這些經濟的條件，可以說，是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底發展所造成的。假使說，手工工場生產和機器生產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兩個階段，——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前一種觀念產生後一種觀念。不論是手工工場或機器生產，都是採取矛盾的資本主義形式之生產力發展底產物而已。

其次，正如機器之不成為分工底反對方（或對立體）一樣，競爭也不是機器底反對方。「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底口號，是自由競爭觀念之最顯著的表現，可是它在工業革命以前很久就出現了。因此，應該倒轉來說才對：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底發展，因而亦即大規模的競爭底發展，競爭底觀念，為對機器的需要和機器本身底發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至於講到競爭和壟斷的話，那當然可以說由前者產生後者；但是第一，也不能像普魯東那樣地了解，彷彿競爭底觀念產生了壟斷底觀念似的；第二，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先有封建的壟斷——在資本主義曙光時代尙盛行着，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而消亡的封建壟斷，然後乃有自由競爭。並非重商主義跟隨於自由貿易主義之後；相反的，是自由貿易主義跟隨重商主義。這裏顯然證實了「由壟

斷產生競爭」這種說法也是對的。資本主義的壟斷是資本主義競爭之否定，而資本主義的競爭本身又是封建壟斷之否定。因此，資本主義的壟斷便是封建壟斷之否定底否定。

實在普魯東似乎也應當這樣設想，因為他原來就把壟斷解作特權，那末封建的特權或壟斷當然也不該置而不談。況且他又像傅利埃一樣地稱資本主義的壟斷為商業的或工業的封建主義，那末他就該承認封建的壟斷在自由競爭之先，而資本主義的壟斷則為封建壟斷之否定底否定。但是普魯東不作如是觀，事實上他也不能作如是觀，因為如果他承認這種說法，那末他底全部「觀念程序」就要被推翻了：要知道他是以競爭為機器之對立體的啊。競爭既是機器底對立體（反對方），自然不能同時又是封建壟斷底對立體。

因此我們可以說，普魯東不僅沒有說破「跟時間程序相適應的」歷史，亦即沒有說破「跟觀念程序相適應的」歷史。縱使從唯心論底觀點（唯心論認定歷史底創造者是觀念、意識或精神）看來，普魯東不但把邏輯的跟歷史的分裂開來，而且還完全歪曲了歷史。

## 第二節 普魯東底「體系」及其「柱石」

普魯東在其經濟矛盾之體系（即貧困之哲學）中，首先提出價值底分析來，肯定它是全部經濟

建築之柱石。他認為一切經濟範疇底矛盾，均為價值底矛盾所規定的，因此價值底矛盾底解決，也就是一切矛盾底解決。簡單地說：不論是社會問題底本質或這本質底確定，普魯東都認為就是價值問題底本質及其解決。

價值並不像其他經濟矛盾一樣地形成經濟進化底特殊時代，可是照普魯東底意見，這種經濟的進化也不外乎價值矛盾之進化而已。只是當價值底正題和反題找到了它們底合題的時候，經濟的進化才根本地改變過來——它由矛盾的轉變為和諧的。

### 一 價值底矛盾

普魯東責備當時的經濟學者，說他們雖亦劃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區別，但是沒有看出它們中間的矛盾來，沒有看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同時互相依賴又互相排斥。

照普氏底意見，使用價值是正題、肯定，交換價值是反題、否定。前者產生後者。怎樣產生呢？這便是普氏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他底答復可歸結於下列數點：（一）人類底需要超過他們在自然中所能現成獲得的；（二）這迫使人類不得不從事生產，以彌補自然之「缺陷」；（三）但這件事不是個人能力所及的，誰也不

能生產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四）因此每一個人就都需要別個人，需要在各個勞動部門中工作的同事們，需要拿自己的生產品去交換一部分別人所生產的生產品。這樣，就從需要中——從對於使用價值的需要中——發生出交換和交換價值來了。

這樣的解釋交換之發生，是依據十八世紀唯理主義（rationalism）之精神的：交換被解釋成自覺的協同之產物了。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是年輕的資產集團底思想家所藉以說明布爾喬亞關係為最自然和最合理性的一種根據。他們不從客觀現實的歷史中而從理性中去找尋經濟現象底解釋。可是到了十九世紀，這樣的解釋只有像巴師夏這類俗流經濟學者會應用它；而不幸普魯東却附和了巴師夏這類人。

需要和生產一樣，都是不斷地在發展着的。需要一般正如生產一般一樣地是抽象概念。普魯東却依據着這些抽象概念，因而他不但忽視需要底歷史性，亦且也忽略了它們底社會性：統治者和被壓迫者底需要是完全不同的。

假如從需要底歷史發展中去觀察它們的話，那末我們就會立即明白，需要底發展並不在生產發展之前，而是相反，生產底發展却產生了新的需要並改變了原有需要底性質。譬如說對於皮鞋的需要實際上只發生於人們會製造皮鞋之後；可是要使人們能夠學會製造皮鞋，則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

展底一定階段上。卽如食物這一種最基本的需要，亦在人類底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改變着的。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差不多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新的生產部門創造新的需要的事實。

然而我們却也不能忽略相反的作用——卽已造成的需要對於以後的生產發展的重大影響。

卡爾寫道：『生產使消費成爲可能，生產替消費創造了物質，沒有後者消費就失去了對象。然而同時消費也使生產成爲可能，因爲只有它替生產創造了主體，對於後者，生產品才成爲生產品——不行車的、不被使用的、不被消費的鐵路，只是可能性的 (dynamel) 鐵路，而不是現實的鐵路。苟無生產，固無消費；然而苟無消費，亦無生產，因爲在這樣的場合下面，生產就變成無目的了。』(註)

普魯東底錯誤不在他指出生產與消費底連繫，而在他認消費(需要)爲主導的根本要素，他純粹唯理主義地思攷問題：人們沒有生產底刺激就不會去生產，而這種刺激就是需要，因此生產和流通都是需要(消費)所產生的。這樣的說法不但在方法論上錯誤，而且假如把應用到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上去的話，還曲解了資本主義性質本身。因爲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底刺激是利潤，而一家新工廠底開始生產不是因爲在先已經有了利潤，相反的，資本家底開設這一新工廠，爲的是要掙到新的

(註)卡爾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二節。



利潤。

普魯東不曾明示，而且也不能明示使用價值如何產生它自身的反題——交換價值。而且，價值底矛盾本身也是懸想的。普魯東認定使用價值底增大引起交換價值底下降；反之，使用價值底減少引起交換價值底增大，——他認定這便是價值底矛盾。他舉出下面的例子來：豐收常常招致生產者虧損，歉收倒反使他們獲得贏餘。

但是我們要問：這能不能稱為價值底矛盾呢？當然不能。這裏普魯東把價值跟價格混為一談了。在豐收的時候，即供給大大地超過需求的時候，出賣者中間的相互競爭，促使價格降到價值以下（普氏拿交換價值代替了價格或將兩者等同起來了）。反之，在歉收的時候，即需求超過供給的時候，購買者中間的競爭把價格抬高到價值以上。這樣看來，由供求關係之變化所促成的市價擺動，被普魯東視為價值底矛盾了。

競爭是商品生產之矛盾底表現形式，而絕不是什麼「永久的」價值觀念，像普魯東所想像的。而價值「劃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的見解也是不對的；因為交換價值只是商品底基本因素之一，是跟另一因素——使用價值——對立的。為互相依賴和互相排斥的兩因素之統一體的商品，其矛盾被普魯東看成價值底矛盾，即看成商品兩因素之一底矛盾了。這樣一來，普魯東把現實的矛

盾變成虛構的矛盾了。

## 二 綜合的價值

照普魯東底意見，價值可「分裂」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前者是正題，後者是反題。那末它們底綜合是什麼呢？它們底綜合，普氏稱之為組合的或綜合的價值。其方式如下：



但是這一綜合，這一矛盾底調和究竟怎樣的呢？

普魯東把社會的財富比作化學上的化合物了！正如諸種化學原素只有按照一定的比率互相配合起來時，才形成一新的物體，社會財富也一樣地基於各種組成原素之比例性的。假如，比方說，所生產的紡織物，超過了一定的比例性所要求的那個數量的話，那末多餘的一部分紡織物就不成其為社會的財富。

把各個財富原素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便是交換。而當它們成為社會財富之原素時，它們便成為組合的或綜合的價值了。

交換完成了某種的選擇：一部分財富底原素被它（交換）吸取去了，就變成了價值；另一部分財富底原素被它排擠掉了，就轉變為「非價值」。但是被交換「認可」的價值，已經不是使用價值，亦不是交換價值；它是這兩個對立體底互相滲透，形成了所謂綜合的價值。後者普氏亦稱之為有比例的價值，因為它表現着交換所規定的比例。

「綜合的」和「有比例的」這兩個形容詞，各自表現過程底一方面。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對立體底調和，表現於「綜合的」這個形容詞；各個財富原素之溶合成為一整體，表現於「組合的」這一形容詞；而這種溶合中所包含的量的比率，則表現於第三個形容詞「有比例的」。

這全部「多方面的」過程，都發生於交換，可是它底原因和創造力却在交換範圍以外。這種力量（或原因）便是勞動。普氏認為只有勞動生產一切的財富原素，它把這些原素結合起來。只有勞動，才使社會的財富運動起來，正如精神把物質激動起來的情形一樣。社會，集體的人羣，生產着無窮多的生產品，這許多生產品底享用，形成了社會底福利。社會福利底增進，不僅有賴於生產品底數量，亦且有賴於它們底種類（質地）和比例。根據這一基本事實，我們可以明白，社會無時不在企圖達到生產品底一定的比例；依照這種比例，在現存的生產力和生產手段之條件下，使社會底福利能夠達到最大限度。生產品底豐富，種類複雜和有一定比例——這便是財富底三個基本條

件。(註一)

現在我們要把普魯東底觀念來分別地考察一下。

說交換規定了財富原素底比例，這句話對不對呢？當然不對。因為在交換中祇表現出來需求與供給底狀況。所以說交換中一部分財富原素變為價值，另一部分變為「非價值」，這是錯誤的。在交換中規定着市場的價格，這種價格有時高於、有時低於價值或生產價格，只是在個別的場合中，它們才互相符合。

在交換的觀念方面，普氏又拿價值去代替市場價格。市場價格在警告生產者，有時候他們生產得太多，有時候他們生產得不足。但是這種警告之作用，並不在促成所謂比例性，而是促成新的供求關係。亦即促成新的價格脫離價值的局面。卡爾說：『供給與需求之比例性的關係，亦即某一生產品跟全部生產總體之有比例的關係，絕不是藉這生產品之按照等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而出賣這一行為來確定的。只有供給與需求底擺動，指示生產者以某商品所應生產的數量，使得他在交換時至少可以獲得生產成本。而因為這些擺動是不間斷的，所以資本之流出與流進各個工業部門的運動，也是不間斷的。』(註二)

(註一)參閱普氏著的經濟矛盾之體系。

(註二)卡爾著哲學之貧困。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領域內，也一樣地沒有比例性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流通領域內也沒有比例性；不斷變動着的供求關係，是支配着生產的無政府性所造成的。個別的生產者在自己的工場或製造廠內部愈使生產合理化，則他們就愈加強了整個社會全部生產和再生產底混亂狀態。弗列德利赫赫鄭重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底表現形式之一。固然經濟矛盾之體系底作者也知道有競爭、無政府性、經濟危機這類事實存在着。但這並未阻止他視社會為有目的的一致體，其運動底歸趨在於達到一定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社會力圖以最少量的勞動消耗，生產大量的種類極複雜的價值（指使用價值）。這樣的目的論觀點，當然是非科學的。

假如說普魯東底交換觀產生了價格與價值相等同的結論，那末他底勞動觀，就把價值轉變為虛幻觀念——對於布爾喬亞關係底分析和對於真正合理的社會經濟關係底分析均無任何意義的虛幻觀念了。在布爾喬亞社會中，根本不存在有比例地分配着的勞動，因而價值不能表現這種勞動。至於對蘇聯計劃化的社會主義經濟，則根本不適用價值這個範疇。

### 三 貨幣觀

照普魯東底理論，假如說商品之轉變爲價值（指組合的價值）祇是就它們爲交換所「吸取」而被包括到社會財富中去的那種比例範圍而言，那末對於貨幣就不存在這樣的限制了。在普魯東看來，貨幣和它底數量多寡無關，它永遠是組合的價值。爲證實這一論點計，普氏提供了兩點理由：第一，對貨幣的需求是無限的，因此它們永遠被包括在社會財富中；第二，貨幣底價值係固定於鑄貨中的：譬如說，一個金鎊永遠是一個金鎊。

讓我們對這兩點理由分別加以檢討吧。

首先要指出一筆：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都並不能證明所要證明之點。所要證明的是貨幣價值是組合的；而組合的價值，則依據普魯東本人解說，是一切勞動種類及其相適應的一切財富原素之比例性底表現。可是普魯東所證明的則爲貨幣永遠按照它們底價值而實現，而其原因却跟勞動分配底有比例性和跟財富原素底有比例性均毫無相同之點。普氏要想證明一種商品——貨幣——底價值業已按照比例性底法則而成爲「組合的」價值，可是實際上他却證明這一商品由於特殊的原因而不受比例性法則底支配。

但是所要證明的和實際上在證明的二者之不相一致，一到我們個別地去考察每一上述的理由時，則表露得更加明顯了。

對於貨幣存在着無限制的需求，或者說，就貨幣論，供給永遠不超過需求的。但是由於什麼呢？爲供應商品流通之用，貨幣底需求完全不是無限的。大家知道，爲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決定於流通界中的商品底價格，它們底量和同一單位的鑄貨底流轉速度。因此，在每一固定的時間內，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是有一定的（當然這裏把信用和貨幣當作支付工具的職能暫行擱置不談，因爲這些因素只能使情形複雜化，而不會改變流通所必需的貨幣數量有一定的「這個原則」）。貨幣之無限的需求，發生於它底當作積累工具、當作寶藏的那種職能。而在這一職能中，貨幣跟別種社會財富底原素並無一定的比例。當然，隨着一國底工商業和財富底發展，貨幣底積儲——當作寶藏的那部分貨幣——也不斷地增長起來。但這並不是表示貨幣積儲之隨全部財富之增長而增長，係按照一定比例的。

普魯東所提供的第二點理由就更壞了。

須知鑄貨中所凝固的不是製幣金屬底價值，而是它底重量，它底成色。鑄貨上所標出的某一貨幣單位（例如一鎊或一先令）並不決定它底價值，而祇是向人們證明：鑄造這一貨幣單位所需要的實在的重量和成色。在公開鑄貨制之下，鑄貨底價值保持着造幣金屬底塊條底價值水平；這顯然地表明：在鑄貨中任何價值底凝固是不可能的。固然，在專利的鑄貨制之下，鑄貨跟塊條（金銀等）

底連繫是斷裂了；但是當鑄貨失去它自己的實在價值時，它們就不成其為滿價的貨幣而祇執行流通工具之職能了。到那時候，對於貨幣的需求就極有限制，因為它們只能代替流通所必需的真實貨幣底數量。

普魯東既堅持貨幣底價值凝固於鑄貨，他就陷於這樣一種幻想中：陷於作為所謂「國家的」貨幣論之根基的幻想中去了。依據「國家的」貨幣論來說，貨幣是國家創造的，不論製造貨幣的材料是金銀或是紙張，它底價值——國家所規定的價值——始終如一，凝固在鑄貨中。這樣的見解，當然跟普魯東一般的無政府主義立場相衝突的。但是這裏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假如貨幣是國家創造的，那末它們就完全跟商品不一樣，因而就不能成為商品組合價值之實現底例子了。然而普魯東却又表示貨幣應當等於一切商品，而後者則將成為組合的價值，像貨幣已經成為這種價值一樣。

普氏底思維路程如下：（一）金和銀起初都是普通的商品；（二）後來它們才變成貨幣並獲得組合的價值；（三）一切商品也像金銀一樣地變成貨幣並獲得組合價值；（四）可是當一切商品都變成貨幣的時候，對於特殊的貨幣的需要，就失去了；（五）社會解脫了貨幣底權力和資本底權力，因為那時凡有商品的人，同時也就是有貨幣的人。在這全部思維底鏈條中，決定的一環是『金和銀起初都是普通的商品，後來才變成貨幣並獲得組合價值』這一論斷；根據這種論斷，我們就有



理由去設想：其他一切商品也都能獲得這種價值。但是普氏對於貨幣價值底組合原因的解釋和他按照國家的貨幣論（亦稱名目論）底精神去解釋貨幣，這樣一來他又自己消滅了上述的一環，因而整個鏈條就都解體了。

普魯東底見解之所以站不住，不是由於某些邏輯上的錯誤，或駁論上的失敗，而是第一因為它建立在一種虛幻的設想上——在所謂組合價值底觀念上；第二因為普氏完全不了解貨幣底社會性。依據新經濟學底觀點，貨幣是生產關係底體現者；一種商品之變成貨幣，祇是因為其他許多商品在它身上表現它們底價值。既然是這樣，那末很明顯的，不能一切商品都變成貨幣了。妄想把一切商品都變成貨幣，無異於妄想使商品在自己身上表現自己的價值。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商品世界之分解為商品和貨幣是不可避免的。

#### 四 交換實現和分配

前面已經說過，照普魯東底意思，以為交換將一部分財富底原素變成價值，將另一部分變為「非價值」。因此，交換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壞的一方面。交換將一部分商品變成了價值，這樣就把它們歸入社會底財富中去，這是它底好的方面。可是它把一部分商品棄置於社會財富範圍之外而

使之成爲無用之物，這樣就暴露了它底壞的方面。由此而產生吾人之任務：堅持交換之好的方面而消除它底壞的方面。而這意思就是要把交換組織得這樣：使一切商品能夠實現和因而變成財富原素（價值）。

爲要實現這一任務，普魯東建議創辦一國民交換銀行，其所依據之諸條件如下：（一）銀行接受一切交付給它的商品；（二）確定這一切商品底價值並發給一紙標明這許多價值的證書；（三）證書所有人，得用證書去向同一銀行購買他所需要的商品。

照普魯東底意思，國民銀行在商品關係上應起之作用，正應和鈔票發行銀行在金或銀的關係上所起的作用一樣。發行銀行收受了金或銀，就發出鈔票去代替它們；國民交換銀行則於收受商品之後發給一證書。但是這裏普氏顯然忘記了他自己所說的基本論綱之一：對於金銀的需求是無限制的，那末發行銀行任何數量都可以接受它們；反之，對於商品的需求是有限制的，銀行也不能創造這種需求，因之它就不能無限制地收受。

普魯東企圖藉助於賽依底實現論以逃出這一難關。照賽依底見解，生產品是跟生產品相交換的，因而一般的生產過剩就不可能。普氏認定這一理論是一個偉大的真理，但是他斥責賽依不了解下面一點：由於市場底無組織，這一真理是不會實現的。只有組織國民銀行，由此銀行來組織市

場，創造各種條件以達到生產品與生產品底無限制交換。可是普魯東沒有揭露以下的祕密，即國民銀行收受了一切商品和將它們轉變為「貨幣」之後，如何組織市場呢？實際上是相反的，正因為銀行接受了一切商品，市場就變成完全混亂無組織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市場是指示企業家們的唯一南針（固然是很不可靠的指南針）——指示他們在何處與如何應用勞動和資本，須縮小抑擴大自己的生產。這是因為市場所收受的不是一切商品而祇是購買力的需求所及的那部分商品；它底規定商品底價格，並不按照它們底價值，而是按照供求關係來決定的。假如消滅了這一指南針，則定期的生產過剩之危機，就將變成永久的生產過剩之危機了。

也許有人要說，國民銀行把需求和供給集中在自己手裏，就可以製定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而給每一生產者以一定的任務：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但是這樣就不祇是交換底組織而是生產底組織了；銀行業已變成指揮和計劃生產的機關了。而在商品資本主義的關係之下，組織一個統一的銀行以指揮、調節和計劃生產，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現今社會改良派底「統一托辣斯」或「有組織資本主義」之終於成爲夢想，也就是這個道理。

復次，普魯東之提出統一的國民銀行之計劃，其目的，又在藉此改變分配——消滅一切非勞動

的收入。一切商品既均將變為貨幣，則一種特殊貨幣之存在，就變成多餘了。這樣一來，從勞動者身上榨取不勞動的收入的那種力量，就隨之而消滅。

照普魯東底見解，一切罪惡底根源在於貨幣，而貨幣底消滅只有在一切商品變成貨幣的時候。由一種空想產生另一種空想：一方面是無政府生產基礎上的有組織的交換，另一方面是消滅貨幣底威權而保持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保持那種產生貨幣和賦予貨幣以特殊威權的制度。這是何等的矛盾呢！

普魯東對貨幣底意義同時作過低的估計，又作過高的估計。他一方面容許沒有貨幣的資本主義財富之存在，這樣他無異廢除了貨幣固有的權威而把它簡化為單純的流通工具了。在另一方面，他又視貨幣為不平等底原因，為勞動者貧困底原因。這樣，普魯東實際上已將資本底威權看作貨幣底威權了。貨幣底所有者剝削那些沒有貨幣的人，此種情形表現於貸款和抽取利息底方式。放款資本家不斷地把自己的貨幣變成收入底源泉，這樣就減少了勞動底收入。

普魯東視利息為資本剝削勞動的基本形式，因而他從利息中抽出利潤來（而不是相反）：他認為工商業資本家底所得，是他們所投出的資本上的利息。由於這樣的情形，工人就不能取回他們自己的勞動生產品。

但是我們知道，利潤可劃分為企業家的收入和利息兩部分；前者呈現為企業家底「勞動」報酬，後者則呈現為資本自身底產物。堅執事物底表面現象的俗流經濟學者，把這些當做真理看了，他們不知道從這些不同的外表形像後面，看出它們統一的內容——剩餘價值——來。而普魯東也看不出企業家的收入和利息只是同一剩餘價值之不同的特殊形式。他承認企業家的收入是企業家底「勞動」報酬（是「工資」），它包括於商品底價值中；而利息則他認為是附加於價值以上的東西。

照普魯東底意見，工人們不因其為勞動力底出賣者和剩餘價值底生產者而被剝削，而因其為商品底購買者而被剝削的。他說，由於利息這一種價值以上的附加額底存在，工人們就無法取回自己的勞動生產品了。因此，資本與勞動底對立，不表現於產業資本家與工人們底對立，而表現於放款資本家與勞動者底對立了。這顯然是一種顛倒事實的模糊觀念。